

#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

## 第四辑

*Information und Forschung über  
deutschsprachige Länder*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 编

顾 问 梅兆荣 顾俊礼  
主 编 殷桐生 刘立群  
副 主 编 姚晓舟 姚 燕 吴 江  
执行编辑 包葛耿 周海霞  
德语编辑 李 克 (Patrick Kühne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 目录

## 采访精撷

对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孙永福司长的访谈·····	本刊编辑部	3
------------------------	-------	---

## 新闻鸟瞰

外交新闻·····	吴江	9
经济新闻·····	徐丽莉	14
媒体新闻·····	周海霞	19
政治、社会与文教新闻·····	史笑艳	24

## 热词诠释

Balance Sheet Policy 和 ABS·····	关海霞	29
Industry 4.0 和 Solvency II·····	徐四季	32

## 外交观察

读施密特三部著作有感·····	梅兆荣	37
我国政党外交肩负“双重任务”，形成“三位一体”格局·····	吴兴唐	41
从中国视角观察欧盟这一辅助性国家联合体中的德国·····	连玉如	46
乌克兰危机与德国的北约政策·····	李微 刘立群	57
欧债危机后德国的外交政策：更积极、更有为、更全球化？·····	Michael Staack	66

德国的新外交角色“建构力量” .....	于芳	99
美国国安局窃听事件对德美信息安全合作的影响 .....	田佳峰	105

### 经济视野

欧洲央行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殷桐生	113
工业 4.0 与中德创新合作 .....	史世伟 寇蔻	127
欧洲央行负利率政策——背景、原因和评价 .....	黄燕芬 陆俊	136
统一监管背景下瑞士金融法的变化 .....	任丁秋	149
德国在华跨国公司中德员工语言交流与跨文化人际交往 .....	姚燕	156
中国对欧洲保险监管的反应 .....	徐四季	163
欧洲央行抗通缩政策评析 .....	李微	170
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联合执政协议》的经济等部分（译文上） .....	孙浩林 詹佩玲	180

### 文教论坛

奥地利对外文化交流政策与现状 .....	贾建新	207
德国高校经济专业的新观察 .....	张凯 徐四季	213

### 科研环视

科研新动态 .....	孙嘉惠 邹露	221
-------------	--------	-----

# Inhaltsverzeichnis

## Interviews

Interview mit SUN Yongfu, Leiter der Europa-Abteilung im Handelsministerium der VR China ..... die Herausgeber	3
---	---

## News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

Außenpolitik.....	WU Jiang	9
Wirtschaft.....	XU Lili	14
Pressemeldungen.....	ZHOU Haixia	19
Politik, Gesellschaft, Kultur und Bildung.....	SHI Xiaoyan	24

## Modewörter und was sie bedeuten

Balance Sheet Policy und ABS.....	GUAN Haixia	29
Industry 4.0 und Solvency II.....	XU Siji	32

## Außenpolitik im Fokus

Drei Bücher von Helmut Schmidt – Gedanken zur Lektüre.....	MEI Zhaorong	37
Unsere Parteiaußenpolitik – eine doppelte Aufgabe auf drei Ebenen.....	WU Xingtang	41
Deutschland im subsidiären Staatenverbund der EU aus einer chinesischen Sicht.....	LIAN Yuru	46
Die Ukraine-Krise und die deutsche Nato-Politik.....	LI Wei, LIU Liqun	57
Aktiver, globaler, engagierter? Deutschlands Außenpolitik nach der EU-Schuldenkrise .....	Michael Staack	66
Die neue außenpolitische Rolle Deutschlands als „Gestaltungsmacht“.....	YU Fang	99
Die Auswirkungen des NSA-Skandals auf die deutsch-amerikanische Zusammenarbeit im Bereich des Datenschutzes.....	TIAN Jiafeng	105

## **Wirtschaftliche Horizonte**

Die EZB und die QE-Währungspolitik .....	YIN Tongsheng	113
Industrie 4.0 und die deutsch-chinesische Innovationspartnerschaft .....	SHI Shiwei, KOU Kou	127
Die negative Zinspolitik der EZB – Hintergründe, Ursachen und Einschätzungen .....	HUANG Yanfen, LU Jun	136
Der Wandel des schweizerischen Finanzgesetzes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gemeinsamen Finanzaufsicht .....	REN Dingqiu	149
Sprachkommunikation und interkulturelle Beziehungen deutscher und chinesischer Mitarbeiter von deutschen „Global Playern“ in China .....	YAO Yan	156
Chinesische Resonanz auf die europäische Versicherungsaufsicht .....	XU Siji	163
Kritische Analyse der anti-deflationistischen EZB-Politik .....	LI Wie	170
Der wirtschaftliche Teil und andere Teile des Koalitionsvertrages von CDU, CSU, SPD (Übersetzung Teil1) .....	SUN Haolin, ZHAN Peiling	180

## **Kultur- und Bildungsforum**

Österreichs Kulturaustausch mit dem Ausland – aktuelle Entwicklungen und politische Vorgaben .....	JIA Jianxin	207
Das Fach „Wirtschaft“ im tertiären Bildungsbereich Deutschlands aus neuer Sicht .....	ZHANG Kai, XU Siji	213

## **Forschungsübersicht**

Neue Forschungstrends .....	SUN Jiahui, ZOU Lu	221
-----------------------------	--------------------	-----

# • 采访精撷



# 对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孙永福司长的访谈

本刊编辑部

## 一、如何评价中欧和中德经贸关系的总体发展？

欧盟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已连续10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近年来，中欧贸易和投资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双边贸易额从2010年的4797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5591亿美元，增长了16.5%。今年1至9月双边贸易额达4571亿美元，同比增长11.8%，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亮点。在投资领域，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存量从2010年底的733亿美元上升至今年9月底的949亿美元，增长了近30%。中国企业对欧投资存量从2010年底的125亿美元升至今年9月底的490亿美元，翻了两番多。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已举行三轮，双方还将在条件具备时开展自贸区合作。2015年恰逢中欧建交40周年，中欧双方将把握机遇，相向而行，落实好《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共同保持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推动中欧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近年来，中德两国建立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和总理级政府磋商机制，为双边经贸

关系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目前，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欧盟内对中国投资最多、对中国技术输出最多的国家，中德贸易额占到中国与欧盟28国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中德经贸合作已成为中欧经贸合作的“领头羊”和“排头兵”。德国在经历深刻的生产和能源转型，中国正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四化”以及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两国的利益契合面更加广泛，经贸合作仍拥有巨大潜力。

## 二、如何看待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里？

欧债危机会对中欧经贸合作造成一定影响，但是危中有机。双方应借机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特别是双边投资和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出口的冲击。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其占中国出口总量的比重约在18%至21%之间。来自欧盟的外需下降，会给中国出口带来较大波动。第二，欧债危机加剧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导致全球避险情绪加重，资金纷纷回流美元，中国面临更加汹涌

的短期资金流入。第三，在危机背景下，欧元贬值，欧洲市场流动性紧缩以及整体经济不景气，导致来自欧洲的直接投资下降。这将对利用外资总体形势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欧债危机也有其积极影响：一是欧债危机导致欧洲资金短缺，有利于中国大规模海外投资；二是中国支持欧洲解决债务问题，这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

### 三、如何评价美欧自由贸易协定（TTIP）谈判的前景，它会对中欧贸易关系和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美欧两大经济巨头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初衷，是强强联合，在世界市场中赢得更多利益。但是美欧在经济模式、经济政策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矛盾。目前美欧贸易冲突约占世界贸易争端的20%。因此，这一协定想要达成，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美欧 TTIP 谈判对我国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从 TTIP 的构想看，其产生的短期影响可能不显著，但中长期看，将使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对我国对外开放进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带来挑战与制约。

一方面，中欧这两大经济体的互补性较强，中国一些产业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有机组成部分。美欧经济形势改善，对外需求扩张，将有利于带动我国对美欧出口。美欧加强经济一体化会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这也会给中国对外贸易投资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另一方面，美欧高标准协议将给中国企业在欧发展设置新的障碍和壁垒。一旦美欧形成并主导全球贸易的新规则与新标准，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将成为新规则与新标准的被动接受者。欧洲市场准入门槛将提高，将对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增设新的

壁垒，从而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 四、欧盟是对中国进行“双方”诉讼最多的国家，原因在哪里？我们应如何更好地应对？

中欧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已达近 5600 亿美元，出现贸易摩擦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妥善处理。2013 年以来，中欧双方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积极对话和磋商成功解决了光伏、多晶硅、葡萄酒双反案和欧盟对华无线通信设备反倾销案。近期，双方就欧盟撤销对华无线通信设备反补贴调查决定取得共识，并就保持相互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达成一致，再次表明双方有智慧有能力管控贸易摩擦，为中欧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 五、中欧光伏贸易争端为何能友好解决？今后中欧的贸易争端是否都能这样友好地解决？

从贸易争端解决的角度看，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也是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国，中欧贸易对双方都十分重要。“贸易战”一旦开打，必定“斗则俱伤”。以这次中欧光伏贸易争端来说，如果欧盟只顾自身利益，而执意对中方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就可能引来“贸易战”，而且中方光伏产品也可能会最终退出欧盟市场。与此同时，中方可能采取的贸易报复措施，也可能使欧盟的债务危机更加严重。就光伏产业发展角度来讲，目前国内的光伏产品行业与欧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双方还有着较强的互补性，光伏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中欧光伏产业发展的利益。通过对话与磋商解决光伏贸易摩擦，有助于维持一个开放、合作、稳定、持续发展的中欧经贸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光

伏争端的妥善解决，也为日后解决类似的争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 六、中欧、中德之间产业内贸易正在增长，这对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利大还是弊大？

20世纪中叶后，产业内贸易这种新型的贸易形式逐渐占据国际贸易的显著地位，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共存已成为当今贸易格局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国际贸易中约有半数以上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这些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又约有60%以上属于产业内贸易。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产业内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中欧、中德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有利于开拓更多的合作空间、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虽然竞争不可避免，但总体上对中欧、中德经贸关系发展利大于弊。

## 七、中欧和中德经贸关系目前有何问题及障碍？如何解决？

中欧经贸关系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欧盟对华贸易救济措施多发，对中欧经贸合作造成了一定阻碍。2013年，中国对欧盟出口3390亿美元，进口2206亿美元，

中国顺差1184亿美元，如根据欧盟的统计口径，欧盟的逆差为1318亿欧元。欧盟认为中国市场开放度不高。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是欧盟采取的三种主要贸易保护手段。其次，欧盟始终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非常完整，而欧盟仍从政治角度去看待中国经济，令人感到遗憾。另外，“中国威胁论”等言论和情绪一直在欧洲国家非理性蔓延。但总体来说，中欧经贸关系的前景是美好的。未来几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的90%将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创造，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每年有2000万个家庭进入中产阶级行列，欧洲企业将因此获得大量商机。只要中欧双方都实实在在地行动，化解双方的不满，处理好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的关系，落实在城市化、创新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以上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当前中德经贸合作不存在大的障碍，双方主要关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德方希望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和加强与中国在上海自贸区的合作，而中方则希望德国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加强中欧贸易摩擦管控，推动中欧尽快开展自贸区合作，并为中资企业在德发展提供更为宽松、便利的环境等。



# • 新闻鸟瞰



# 外交新闻

吴 江

## 一、中德高层互访频繁，成功举行第三届政府磋商

2014年7月5日至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默克尔2013年连任后的首次访华，也是默克尔2005年当选德国总理后的第七次中国之行。默克尔此次访华的首站是位于中国西部的大省四川。在省会成都默克尔除与四川主要领导人会谈之外，还参观了一汽大众成都分公司，出席了中国（四川）-德国新型城镇化论坛并致辞，论坛由四川省政府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共同主办。包括林德集团、西门子等22家知名德企负责人，40多名德国在华企业负责人及80多位四川企业代表等共计240余人参加。<sup>①</sup>此外，默克尔在成都还造访了一家社会工作中心。繁忙的访问工作之余，默克尔参观了成都市神仙树农贸市场，并在川菜大厨的指导下学做川菜“宫保鸡丁”。默克尔此次访华访问的第二站是北京。在北京默

克尔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起出席了首次在北京召开的“德中咨询经济委员会”，并共同在天坛会见了出席中德语言年闭幕式活动的两国青少年代表。2014年7月8日，默克尔以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后的当天还出席了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德电动汽车充电项目”启动仪式。

2014年10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抵达柏林，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10月10日，李克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由两国26位部长参加的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磋商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多项政府间合作文件和商业合同，并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此外李克强还出席了第七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并发表演讲。紧张的访问之余，李克强在默克尔的陪同下忙里偷闲，光顾了临近柏林勃兰登堡门的一家德国超市。10月11日，李克强访问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出席中欧论坛汉堡峰会第六届会议。

<sup>①</sup> 默克尔访华首站选成都透露出两个信号，<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7-07/6355994.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0月26日。

此访期间，两国签署双边贸易与相互投资及技术合作协定总额为 181 亿美元。<sup>②</sup>

评述：2014 年下半年，中德关系继续保持行驶在快车道的速度，高层互访频繁。中德第三次政府磋商的顺利召开验证了李克强总理的评价：“中德合作只有升级版，没有终极版。”<sup>③</sup>

## 二、欧洲大选尘埃落定，欧盟领导层大换血

2014 年 7 月 15 日，卢森堡前首相容克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中赢得多数，当选为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此次欧洲大选中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另一位候选人、来自德国的社民党政治家舒尔茨当场祝贺容克的当选，称容克的获胜是“欧洲的幸福”。<sup>④</sup>面对自己在欧洲大选中的对手，容克友好地回应道：“我们曾经是竞争者，但从不是敌人。”<sup>⑤</sup>至此，持续数月的有关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容克的当选标志着欧盟在欧盟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首次考虑到了欧洲大选的票数。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的人选经常是欧盟各国首脑之间内部议定的结果。<sup>⑥</sup>

2014 年 8 月 30 日，欧盟特别首脑峰会在

布鲁塞尔举行，确定了欧盟领导层的另两位重要人选：波兰总理图斯克当选为欧洲理事会主席，接替即将离任的范龙佩；意大利年仅 41 岁的新任外长莫盖里尼当选为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接替即将离任的阿什顿。德国总理默克尔祝贺图斯克的当选，称图斯克是一位“富有激情的，对欧洲坚信不疑并具有说服力的欧洲人”。<sup>⑦</sup>她认为选择莫盖里尼出任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是正确的，并期待与她进行合作。

评述：欧洲大选后，欧盟内部就领导层人选的确定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议：不仅容克的提名遭到了英国的质疑，就连图斯克不太流利的英文以及莫盖里尼略显单薄的政治阅历都未能逃脱媒体的拷问。毋庸置疑，一场欧洲大选再次印证了欧盟内部复杂的矛盾纠葛，再加上欧盟新的领导层上任恰逢欧洲多事之秋，新的“三驾马车”是否能够带领欧盟重振雄风，尚需拭目以待。

## 三、德国为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武器引发争议

自伊拉克局势恶化以来，德国积极参与

② 中德签 181 亿美元经贸技术合作协定，<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4/1011/c70731-25808414.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8 日。

③ 如何理解李克强“中德合作只有升级版 没有终极版”，<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012/c70731-25816851.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8 日。

④ Drewes, Detlef: Neue EU-Kommission mit Präsident Juncker an der Spitze, <http://www.suedkurier.de/nachrichten/politik/themensk/Neue-EU-Kommission-mit-Praesident-Juncker-an-der-Spitze;art1015367,7347661>，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5 日。

⑤ 同上。

⑥ (Verfasser unbekannt): „Mr .Euro“ ist neuer Präsident der EU-Kommission, [http://www.t-online.de/nachrichten/ausland/eu/id\\_70243826/jean-claude-juncker-ist-neuer-praesident-der-eu-kommission.html](http://www.t-online.de/nachrichten/ausland/eu/id_70243826/jean-claude-juncker-ist-neuer-praesident-der-eu-kommission.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5 日。

⑦ (Verfasser unbekannt): Tusk und Mogherini in der EU-Spitze,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eu-gipfel-128.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6 日。

斡旋。此前德国政府已决定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非致命性军用装备，包括床、帐篷、防弹背心和多功能军用卡车等。在法国与伊拉克中央政府达成协议、并立即着手向该国库尔德当局提供武器后，德国领导人也多次表示，德国将审时度势，不排除向伊拉克政府提供战斗武器的可能。<sup>⑧</sup>

德国政府打算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武器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绿党和左翼党均强调议会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参与决策，只有征求议会的同意后政府才能做出提供武器的决定。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德国中部电视台（MDR）采访时拒绝了在野党的要求。默克尔强调此决议必须由联邦政府做出，并表示会就此发表政府讲话，议会可以借此了解情况并参与辩论。<sup>⑨</sup>与此同时，默克尔还指出，德国正在面临伊斯兰激进分子制造的恐怖威胁。“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中有将近 2000 名成员来自欧洲，其中包括德国。这就意味着恐怖主义的威胁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实际存在的。德国如果不支持库尔德人抗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就意味着德国政府失灵。默克尔强调，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撑下，德国政府才做出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武器的决定。<sup>⑩</sup>

德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引发了武器研究专家的担心。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武器研究专家韦泽曼（Pieter Wezeman）在接受德国《每日新闻》网站采访时指出，武器一旦到达冲突地区后经常会落入到不负责任的人手中。韦泽曼认为，虽然与美国和

法国相比，德国实行的是紧缩的武器出口政策，但是德国在武器出口方面并非一直坚持不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的原则，而是视具体情况处理。例如德国绝不向索马里提供武器，但是却向阿尔及利亚以及沙特阿拉伯出售过武器，尽管这两个国家也都卷入了武装冲突。2011 年和 2012 年德国还曾向处于内战状态的伊拉克出售战斗机。采访中韦泽曼强调指出：“我们当然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决定是出于何种基础做出的，以及与此伴随的经济利益有多大。”<sup>⑪</sup>

**评述：**德国政府在武器出售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武器抗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德国或许更应该思考：武器的提供是否会导致“越反越恐”的怪圈？恐怖分子打而不绝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从“克制文化”到“责任文化”，德国外交应该谨慎地对待每一步。

#### 四、德韩就朝鲜半岛统一外部问题成立咨询小组

2014 年 9 月 18 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艾德和与韩国驻德国大使金在信（Kim Jaeshin）在德国外交部签订谅解备忘录，针对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外部问题成立咨询小组。艾德和在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仪式上指出：德国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在柏林墙倒塌 25 年之后，为德国在朝鲜半岛的伙伴传授有关德

⑧ 柴野：德国准备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光明日报》，2014年8月21日，第8版。

⑨ Götschenberg, Michael : Erst wird entschieden, dann debattiert,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irak-waffenlieferung-103.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

⑩ 同上。

⑪ Stalinski, Sandra : „Unklar ist, was mit den Waffen passiert“,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waffenlieferungen-interview-101.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

国统一外部条件方面的经验。<sup>⑫</sup>

在再度出任德国外长后首次与韩国外长的通话中，施泰因迈尔就曾提出过建立这一咨询小组的倡议，韩国总统朴槿惠3月份的德国之行促成了这一倡议的具体实施。该咨询小组的德方成员一共六位，分别是资深议员、学者以及外交官，例如担任德韩议会小组组长的德国议员科什克（Hartmut Koschyk）以及曾担任民主德国外交部长的梅克尔（Markus Meckel），梅克尔曾和时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根舍一起参加过德国统一进程中的“2+4会谈”；德国知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汉堡国防军大学施塔克（Michael Staack）教授以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李恩静（Lee Eun Jung）教授也受邀参与咨询。

该咨询小组的任务是为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解决提供路径和方案。相关话题将涉及：统一是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抑或统一问题的解决必然导致朝鲜的终结？此外，专家们还将探讨统一如果实现后与朝鲜经济改革相关的话题。<sup>⑬</sup>

**评述：**1990年德国和平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虽然朝鲜半岛统一问题在何种程度上能借鉴德国的经验尚存疑问，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输入经验”到“输出经验”，德国此举旨在国际舞台承担更多的责任，提高自身的“软实力”。

## 五、德国和荷兰通过合作解决边界问题

2014年10月24日，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和荷兰新任外交大臣昆德斯（Bert Koenders）乘船航行到德国埃姆登（Emden）与荷兰代尔夫宰尔（Delfzijl）之间，在船上签署《埃姆斯-多拉儿特条约》，和平解决了几百年来困扰两国的海上边界问题。

15世纪开始，德国和荷兰围绕埃姆斯河入海口的边界一直未能确定。德国人一直以临近荷兰的海岸为界，西边邻国则更多以埃姆斯河的中部为界。<sup>⑭</sup>1960年签订的《埃姆斯-多拉儿特条约》仅只解决了0至3海里近海海域相关的问题。伴随着近些年海上风力发电厂的修建，两国亟待解决3至12海里海域的边界问题。2011年开始，德国和荷兰就展开会晤，酝酿问题的解决。2013年8月，双方谈判团长在荷兰的代尔夫宰尔达成了一个务实性妥协方案，这一妥协方案在历经五轮谈判后，变身为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新版《埃姆斯-多拉儿特条约》其实并未具体划出两国的海上边界，而是包含了有关两国3至12海里海域的经济使用以及管辖规定，其中涉及建筑、能源开采、航道管理以及海上交通等。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该条约的签字仪式上强调：“在埃姆斯河入海口问题的解决上人们能够具体地看到，双方通过合作才能通向更好的结果，而非划界。”<sup>⑮</sup>

<sup>⑫</sup>（Verfasser unbekannt）：Beratergruppe zu außenpolitischen Aspekten der Wiedervereinigung Koreas ins Leben gerufen,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Laender/Aktuelle\\_Artikel/Suedkorea/140918-MoU\\_Wiedervereinigung.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Laender/Aktuelle_Artikel/Suedkorea/140918-MoU_Wiedervereinigung.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0月19日。

<sup>⑬</sup>（Verfasser unbekannt）：Südkorea und Deutschland gründen Beratergruppe zur Wiedervereinigung Koreas, <http://www.kpompomagazin.de/2014/10/04/suedkorea-und-deutschland-gruenden-beratergruppe-zur-wiedervereinigung-koreas/>,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0月25日。

<sup>⑭</sup>（Verfasser unbekannt）：Grenzstreit mit Niederlanden beigelegt,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grenzverlauf-emsuendung-101.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0月25日。

<sup>⑮</sup> 同上。

**评述：**在国界的划分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重陆地，轻海洋”的传统。20世纪中期，海上发现了油气资源，唤起了各国保护海上国

土的意识。德国和荷兰海上边界问题的解决体现了“合作共赢”的智慧，值得借鉴。

**作者简介：**吴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 经济新闻

徐丽莉

## 一、德国经济总体情况

### 1. 经济增长趋势与预测

2014年10月9日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等几大著名经济研究所共同发表了关于德国经济发展的《2014年秋季共同体诊断报告》<sup>①</sup>。报告中指出:德国2014年度的经济增长率将为1.3%,最近又调为1.2%,预计2015年经济景气状况明显遇冷,经济增长放缓,增长率将为1.2%。

2014年第二季度德国经济产出(Wirtschaftsleistung)有所下降,第三季度停滞,经济景气发动机很难再加速,无论是内需、投资还是外需均疲软。原因在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而人们所期待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尚未真正出现,经济增长缺乏动力。2014年上半年世界贸易几乎没有增长。而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风险:一方面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于俄罗

斯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与冲突。

根据欧洲央行的统计数据:4月至6月的这个季度,欧元区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为零,而第一季度增长0.2%;同时7月通胀跌至0.4%的四年半低位。货币政策方面:美国的主导利率继续保持在0的水平,但是如果美国经济景气继续发展,该利率将会在2015年初提高。而欧洲央行面对经济的不景气状况于9月将再融资利率降为0.05%,储蓄利率降为-0.2%。财政政策方面:虽然欧元区许多国家的国债利息很低并且利息负担减轻,但各国整饬财政的努力仍落后于各自的“稳定计划”。虽然德国利率极低,但最新的措施对实体经济几乎没有额外的推动力。

德国联邦经济部发布的2014年10月德国经济情况报告<sup>②</sup>中也指出:经济景气指数的情绪气氛指数(Stimmungsindikatoren)广泛堪忧。乌克兰危机以及其他地缘政治矛盾令企业和消费者更加不安。欧元区经济复苏

---

① 参与“共同体诊断”项目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有:德国经济研究所(柏林DIW)、哈勒经济研究所、慕尼黑大学ifo研究所的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及莱茵兰-威斯特法伦德国经济研究所。

② (Verfasser unbekannt):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in Deutschland im Oktober 2014, <http://www.bmwi.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did=662372.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0月25日。

比预期要缓慢得多，这也对德国企业产品与劳务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继2014年第二季度德国经济产出小幅回落后，德国经济在夏季经历了疲软阶段。

2014年德国工业产出遭受2009年以来最大月度降幅，引发人们对于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可能走向衰退的担忧。7月到8月间，德国工业产出急剧缩减4%。而10月初的工业订单数据也较为疲软。这些低迷的数据表明，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和欧元区其他国家经济放缓，德国已开始受到出口需求下降的影响。

尽管财政策略有“扩张”，并且持续保持低利率，德国2015年经济的“开工率不足”将很明显。共同体各经济研究所预测：德国国内生产总值2015年的增长率将为1.2%。如果排除日历因素，增长率仅为1%。

德国经济趋于疲软，将对柏林的政策制定者加大压力，要求他们通过减税或提高投资支出来提振国内需求。最近，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欧洲央行（EZB）呼吁德国政府放松自我实施的财政控制，以提振欧元区的增长。

而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弗拉泽9月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sup>③</sup>：眼下的主要问题不是出口需求疲软，或消费者不愿消费，而是企业不愿投资于新的生产性资产。目前，投资在德国产出中的占比低于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公司经理人一直抱怨经营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把它视为低投资的主要原因。与俄罗斯的冲突也加剧了这一不确定性。

一是金融动荡可能再度泛起，因为有关银行体系的健康性和中小企业获得信贷太少的问题相继浮出水面。能源成本不断上升是

引发进一步担忧的问题。另外，自由贸易受到威胁，可能的加税和监管趋严引发担忧，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政治不稳定，还有人担心欧洲一体化进程会发生逆转。

德国以及欧洲政策制定者最紧迫的挑战在于如何促成更多投资——投资增加将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生产率，为持续增加家庭收入奠定基础。政府也应当调动手中一切财政自由空间来推动就业，比如降低工资税。欧洲应当创建一种融资工具，让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

## 2. 消费与物价水平

私人消费继续保持经济景气发展的可靠支持力度。上半年私人消费支出排除价格因素比2013年同期增长了1%，消费指数还预示着进一步的增长。7月和8月除去企业贸易的零售业销售额相较第二季度增长更为明显。但9月的商务气氛指数（Geschäftsklima）<sup>④</sup>降到104.7，比8月份降低了1.6，达到2013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零售业的商务气氛指数8月为-0.8，9月为-2.1。消费者的情绪也受到外界影响变得不安，但他们采购的意愿依然较强。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强劲发展，收入的提高和物价的稳定，人们可以期待私人消费的进一步增长。

通货膨胀率低。9月消费者价格比2013年同期增长了0.8%。主要是外部因素起的作用，如能源价格有所回落。预计2015年消费者价格将增长1.4%。其中0.2个百分点来自“最低工资”的引入。

2014年10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强调了高收入经济体在中期内面临潜在增长率过低

<sup>③</sup>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8003>，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0月25日。

<sup>④</sup> 商务气氛指数（Geschäftsklima）是Ifo经济研究所每月对7000名公司高管进行询问后得出的数据，该指数一直被视为德国经济的风向标。

和“持续停滞”的风险。前一风险意味着供给增长疲软。后一风险意味着需求的结构约束，包括脆弱国家信贷急剧收缩。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反馈关系：需求增长弱会降低信心，压抑创新与投资。当增长预计放缓时，私人消费和投资就会停滞不前。欧元区即将看到这一螺旋式下降，那里实际需求比危机前峰值低了5%，通货紧缩风险很高。通胀率超低会加剧债务负担，通货紧缩就更不用提了。

### 3. 劳动与就业市场

劳动市场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国内经济稳固发展的保证。9月的失业人数降至280.8万，但排除季节因素失业人数同比增加了12,000人。总的来看，目前的失业情况保持相对稳定，这也体现在低就业(Unterbeschäftigung)方面，低就业人数亦保持不变。排除季节因素，有社会福利保险义务的就业人数在7月份增加了30,000人，8月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6,000人。按照原始数据，8月份的国内就业人数为4284万，比2013年同期增加了35.5万，创造了新的就业记录。

景气疲软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初步影响，就业增长放缓，登记的就业人数小幅增长。预计2014年的失业率为6.7%，2015年失业人数将增加56,000人，年平均失业率约为6.8%。

### 4. 外经外贸

相较于进口，德国出口停滞或者缓慢增长，这就导致对外经济对整体经济发展起到负面作用。2014年1至6月，德国出口总额为5583亿欧元，同比增长2.4%；进口总额4590亿欧元，同比增长2.6%。其中，对欧盟国家出口3273亿欧元，增长4.7%，对非欧盟国家出口2310亿欧元，下降0.7%；从欧盟国家进口3011亿欧元，增长4.2%，从非欧盟国家进口1579亿欧元，下降0.3%。6月，德

国出口934亿欧元，同比增长1.1%，环比增长0.9%；进口770亿欧元，同比增长2.1%，环比增长4.5%，创2010年11月以来环比最高增幅。其中，德国对欧盟国家出口548亿欧元，同比增长2.6%，对欧盟外国家出口386亿欧元，下降0.9%；自欧盟国家进口511亿欧元，同比增长5%，自欧盟外国家进口258亿欧元，下降3.2%。7月和8月进口总额分别为776亿欧元和770亿欧元，环比增长10.0%和-2.4%。7月出口总额为1010亿欧元，环比增长8.6%。

德国联邦经济部预计2014年德国出口增长率为3.4%，2015年升至4.1%，进口增长率为4.0%，2015年升至5.5%。

### 5. 公共财政

2014年上半年联邦、州和区县的债务总计20,444亿欧元，比第一季度增加了44亿欧元，增长率为0.2%。第二季度公共财政收入5987亿欧元，支出6170亿欧元，缺口182亿欧元。预期2014年公共财政融资差额(Finanzierungssaldo)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0.3%，2015年降至0.1%。

2014年7月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低2.6个基点，至1.12%。除了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胀时期以外，这是自19世纪初以来德国借款利率的最低水平。继而8月又首次跌破1%，原因是市场猜测，欧洲央行将效仿美联储(Fed)和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的做法，推出大规模债券购买计划以提振欧元区经济。9月回升至0.92%。

## 二、德国商业银行通过欧洲央行“压力测试”

《经济周刊》10月13日报道，经内部人士证实：从目前的结果来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前景不妙的德国第二大银行“德国商业

银行”（部分国有银行）通过了欧洲央行的压力测试。这一德国第二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该银行拥有几十亿极具风险的不动产和船舶业的贷款，而这些贷款很容易被压力测试所模拟的危机波及。然而商业银行的资产足以消化这些贷款可能带来的损失。此消息一出，德国商业银行的股票上涨 3%。

背景：2014 年 3 月，欧洲央行宣布，从当日起到今年 8 月底将对 128 家银行的数万亿欧元资产进行详尽审查，促使银行剔除不良贷款、更新抵押品的估值及调整资本。如果某家银行在资产质量审查中表现不合格，该银行将会被资产重组或者被迫倒闭。

欧洲银行监管局 (EBA) 也与欧洲央行齐头并进，根据该局于今年 4 月 29 日公布的模拟情景测试内容，该机构将评价欧盟 28 国的 124 家银行在假设的重大冲击情境下是否仍有足够资本应对。测试情境主要包括：失业率跳升、经济萎缩、股市重挫以及房价平均暴跌 20%，时间框架为三年。对于未能通过压力测试的银行，将给予一段时间通过向投资人筹资、取消分红或出售资产，以填补资本缺口。银行流动性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压力测试结果，将对欧洲股市、欧元、量化宽松政策走向产生一定影响。

### 三、第七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

2014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第七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

李克强总理发表题为《在开放中再续合作黄金季》的演讲。他指出：中德合作只有升级版，没有终极版。双方加强创新合作，可以为两国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更好条件，通过互学互鉴，用智慧拆解难题，开启未来。

默克尔在演讲中表示，德中合作既是立足当前，更是放眼长远。德中建立和发展创新伙伴关系，将给两国合作和各自发展注入

新的动力。德国是中国企业值得信赖的投资目的地，德方将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希望两国企业进一步加强互利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该论坛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德意志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共同举办，中德政府高级官员和两国经济界人士共约 600 人出席。来自两国的 500 多家企业在论坛这一平台上讨论双方加强企业合作的可能性，论坛的重点在于创新合作问题，这也是两国政府协商的重要主题——建立中德创新伙伴关系。

### 四、企业要闻

1. 2014 年 10 月 10 日，李克强总理访德期间，中国移动与德国电信在中德两国总理见证下签署合资协议，将由各自的下属公司按各 50:50 的股比在中国设立车联网合资公司。将共同建设一个能让汽车接入互联网、播放在线音乐并相互通信的网络。这是各家电信集团争相在快速发展的车联网市场取得立足点的最新迹象。德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将于 2015 年组建一家合资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提供一个 4G 平台，服务于联网汽车。预计到 2018 年，中国公路上行驶的联网汽车将达 6800 万辆。德国电信的董事莱恩哈特·克莱门斯 (Reinhard Clemens) 说：“发展车联网业务是德国电信的一项战略性举措，而中国对我们的车联网业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从战略上来说，与中国移动的合作对德国电信极其重要。”

2. 德国《经济周刊》报道：德国第二大化工企业 BASF 下调了其 2015 年销售额与利润的预期。在展示 BASF 公司第三季度数据时，公司总裁伯克 (Kurt Bock) 指出：公司将 2015 年 140 亿欧元的毛利润（支付利息、税收和折旧费用之前的利润）调

低至 100 至 120 亿欧元。原因在于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活力降低而欧洲经济发展前景继续堪忧。该公司 2013 年的销售额仅为 72 亿欧元，2014 年将略有增加。此消息立刻导致该公司股票下降 3%。经济周刊同时指出：化工行业的坏消息未来将更多。德国赢创集团（Evonik）<sup>⑤</sup> 和朗盛集团（Lanxess）<sup>⑥</sup> 也不能幸免。朗盛集团 2005 年才从拜耳公司分离出来，该集团董事长提出一个宏大的节约计划，并寻求新的道路来减少对橡胶贸易的依赖性。赢创集团的塑料销售量占总销售量约 1/3，而该公司也削减了塑料生产业务。

3. 与化工行业的坏消息不同，9 月德国汽车销售量大增加。据《德国商报》报道：“奥迪公司立志成为高端品牌的头名。”奥迪公司总裁史达特勒在巴黎车展上指出：危机中的汽车市场面对巨大的挑战。虽然汽车市场面临诸多风暴，但奥迪公司的销售量在年初比 2013 年增长了 10%，预计 2014 年将销售 170 万辆。至 2020 年的销售量预期达到 200 万辆。

慕尼黑的宝马公司 9 月的销售量比前一月增加了 5%，而整个宝马品牌的销售量增长约 6%。据此，宝马公司总裁莱特霍夫（Norbert Reithofer）计算出 2014 年前 9 个月的增长率为 9%。由于宝马公司

将在年底推出新的车型，他预计 2014 年的最后三个月公司的销售量将再次大幅增加。但由于乌克兰政治危机导致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市场的销售额下降了 27%，莱特霍夫在巴黎车展上发言指出：在欧洲赢得少数新客户的价格折扣战依旧会十分激烈，而欧洲市场的价格水平却低于年初的预期。但他仍认为，市场发展状况不是非常剧烈，汽车企业不必因此而降低其盈利目标。而三大汽车巨头宝马、奥迪和奔驰公司在德国汽车市场上的竞争将非常严酷——主要是价格竞争。

尽管俄罗斯汽车市场上汽车销售量下降，但奔驰公司董事长 Dieter Zetsche 在巴黎车展上仍然指出：奔驰公司 7 月至 9 月在俄罗斯的销售量比 2013 年同期有所增加，其原因在于“奔驰公司的产品与其竞争者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

4. 2014 年安联保险公司购入 1.1 亿欧元的股份成为拜仁慕尼黑球队（FC Bayern München）的大股东，占有 8% 的股份，是继阿迪达斯（2001 年）和奥迪公司（2009 年）后第三个成为该球队的股东，并在监事会中获得一个席位。安联公司发言人证实了《德国商报》的报道，并指出 Markus Rieß 将会在 11 月初备选监事会。

作者简介：徐丽莉，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⑤ 德国赢创集团是一家跨国工业集团，在全球拥有约 41,000 名员工，业务遍及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在化工、能源和房地产行业均位于领先地位。

⑥ 德国朗盛集团是一家德国特殊化学品集团，总部及主要业务运营位于科隆。2004 年，拜耳集团进行战略重整分拆，将其化学品业务和部分聚合物业务进行了剥离，朗盛随之诞生。2015 年 1 月上市。按销售额计算，朗盛是德国第四大化学品集团。公司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特殊化学品、基础化学品、精细化学品、橡胶和塑料等领域。

# 媒体新闻

周海霞

2014年8月20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德国人菲利普（Phillip B.，国内媒体皆称之为“菲利普”，故本文也使用该名）死刑。该起谋杀案件发生于2010年6月，德国人菲利普在厦门街头杀害了他的委内瑞拉籍前女友和她的德国籍新男友，然后自杀未遂。据报道，菲利普和其前女友曾一起在慕尼黑学习汉学。2005年夏两人分手，菲利普因一直无法接受分手事实，专程尾随前女友及其新男友前往中国，杀害了两名受害人。案发后两名受害人的孩子成为孤儿，现由其德国亲属抚养。

死刑判决消息一出，德国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所使用新闻标题多为“德国人在中国被判处死刑”，几乎所有的报道都表示，“如果死刑执行，那么这将是第一例德国人在中国被执行死刑的案例”。<sup>①</sup>但德国媒体报道此

事的主要议题不在于案件本身以及量刑的公正性和适当性，而聚焦于阻止此次死刑执行的几率大小。报道称这个消息“震惊”德国，称“这场由嫉妒引发的事件在中国以可怕的结局收场”<sup>②</sup>。这里使用的“震惊”、“可怕的结局”并非描述他们对于案件的感知，而是对于凶手被判处死刑这一量刑的感知。死刑制度在德国已被废除，对中国依然存在死刑制度，德国媒体一直都持批评态度。相应的，在关于此次事件的报道中，德国媒体一再强调德国政府对于该事件的态度。报道称，“德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死刑刑罚”，又称“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德国政府将会‘尽一切所能’阻止死刑执行”。<sup>③</sup>德媒表示，面对类似事件，德国政府一向采取这样的态度，报道称德国外交部一直在境外其他国家致力于阻止死刑判决，因为德国已废除死刑，拒

①（Verfasser unbekannt）：Deutscher (36) in China zum Tode verurteilt, 2014-08-20, <http://www.bild.de/news/ausland/doppelmord/student-in-china-zum-tode-verurteilt-37320326.bild.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日。

② Landwehr, Andreas: Nach Doppelmord: Deutscher soll in China exekutiert werden, 2014-08-20, <http://www.news.de/politik/855555606/todesstrafe-in-china-deutscher-soll-nach-doppelmord-hingerichtet-werden/1/>,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③（Verfasser unbekannt）：Die Bundesregierung bekräftigte “in kategorischer Form” die Ablehnung jeder Form der Todesstrafe, [http://www.focus.de/politik/ausland/prozesse-menschenrechtler-wollen-hinrichtung-von-deutschem-verhindern\\_id\\_4074735.html](http://www.focus.de/politik/ausland/prozesse-menschenrechtler-wollen-hinrichtung-von-deutschem-verhindern_id_4074735.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绝死刑刑罚。

与该死刑判决案件相关，德国媒体在报道中也提及，近年来屡屡有外国人在中国被判处死刑，但被判刑者多为亚洲国籍的贩毒人员。报道称，迄今为止，在中国被执行死刑的唯一一个欧洲人是持英国护照的巴基斯坦裔毒贩。如果菲利普被执行死刑，那么这将是第一个在中国被执行死刑的德国人。

## 一、关于阻止死刑执行

立足于拒绝死刑刑罚的立场，德国媒体报道福建杀人案死刑判决事件时，其议题聚焦在于，阻止死刑执行的几率有多大。就中国司法程序框架内的可能性而言，德国媒体一方面认为，虽然中国已决定减少死刑执行人次，实行国家最高法院死刑复核制度，但此次案件改判的希望依然渺茫，因为凶手所犯案为双重谋杀。报道称：“中国领导人在年初承诺放宽刑法，减少死刑刑罚。但是这个政策对于一个36岁的德国人而言很可能没什么用处。”<sup>④</sup>德国媒体表示，在中国，死刑有可能改判死缓，但这种情况对于罪行明确的谋杀案件而言非常少见。德媒引用刑事辩护律师莫少平的话，称理论上法官可以将该案件判为“激情杀人”，从而推翻死刑判决。但菲利普杀了不止一个人，他犯的是双重谋杀罪。因此莫少平认为，菲利普获得减刑的可能性很小。

同时，德国媒体也表示，该谋杀案件案情明确，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死刑是唯一可能的量刑。报道称：“（中国）主审法官并不容易，他等了四年，尽管这起蓄谋已久的、残忍的、由病态的妒忌所引发的双重谋杀案件，其实在司法上让他并无其他选择。”<sup>⑤</sup>也有报道称：“德国外交官表示，对于中国办案的警察和厦门的法庭而言，菲利普的罪行在司法上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又是相当复杂的。”<sup>⑥</sup>

德国媒体还提出，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如果凶手有悔过表现，中国司法在量刑方面也可以有一些行动空间。就此点而言，德国媒体的报道并不一致，很多报道称菲利普并无悔过表现，但也有少数报道称，据其律师的言论，他在法庭上有悔过表现。有一篇报道提到，当事人既没有悔过表现，也没有征得受害人家属的原谅。报道称，如果征得受害人家属原谅，并同意将其引渡回德国的话，那么中国法庭在量刑时也有更多空间。但是报道表示，受害人家属担心受害人留下的六岁孩子的安危问题。受害人家属提出，假如凶手哪天重获自由了，谁能给他们保证，这个人不会再危及受害人的孩子呢？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报道中只提及两位受害人的孩子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由其亲戚抚养；但是像这篇报道一样，提及受害人亲属担心凶手一旦重获自由，将有可能危及受害人的孩子，则少之又少。可以说，在德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中，虽然议题聚焦于阻止死刑执行

④ Lee, Felix: Einem Deutschen droht in China die Exekution, 2014-08-21, <http://www.taz.de/1/archiv/digitaz/artikel/?ressort=au&dig=2014%2F08%2F21%2Fa0130&cHash=524906f280d1c45bd2f15872e9ef835f>,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⑤ Erling, Johnny: Todesurteil für Deutschen, 2014-08-21, [http://www.welt.de/print/welt\\_kompakt/vermischtes/article131436729/Todesurteil-fuer-Deutschen.html](http://www.welt.de/print/welt_kompakt/vermischtes/article131436729/Todesurteil-fuer-Deutschen.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⑥ Erling, Johnny: Philipp B.s Doppelmord ließ dem Richter keine Wahl, 2014-08-20, <http://www.welt.de/vermischtes/article131428063/Philipp-B-s-Doppelmord-liess-dem-Richter-keine-Wahl.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的几率问题，但对于受害人家属关于对凶手实行死刑的态度，却并无关注。

德国媒体对中国死刑制度的司法程序还是寄予一定希望的。至少德媒认为，中国的死刑复核程序规定可以使德方阻止死刑执行在时间上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德国媒体在2014年8月份报道中都提及，菲利普的律师表示，他的当事人还没有决定是否上诉。报道称，如果不上诉的话，死刑很快就会执行的，当然还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德国媒体也表示，根据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如果菲利普上诉的话，将会进入二审判决，如果二审维持死刑判决，还要通过死刑复核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到9月份时，德国媒体中开始出现菲利普提起上诉的报道，但无更进一步报道。

除了考量在中国司法框架范围内的行动空间之外，德国媒体主要寄希望于德国政府，希望其能够通过外交途径影响干预中国司法，从而阻止死刑执行。如前文所述，几乎所有相关报道都强调德国政府对于死刑的态度，称德国政府表示将会竭尽全力阻止死刑执行。德媒认为，从外交视角看，改判还是存有行动空间的。有报道引用一位中国律师的话，称外交手段是可以影响刑法司法程序的。这位律师表示，这样的事并非从未发生过。相应的，德国媒体中有报道称：“中国和德国两国关系友好。这个案子沉寂了四年之久，德国外交部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关注菲利普的情

况。德国官方以及知道此事的德国记者，都采取回避态度。他们想给中国司法机构提供更多的行为选择，比如引渡犯人，以及考虑德国刑法对谋杀案的量刑。”<sup>⑦</sup> 媒体称，德国外交官们对于此事也一再三缄其口，就像在其他外交事件中一样。也正因为德国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关注此案件，德国媒体表示，死刑判决来得很突然。<sup>⑧</sup>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德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一味关注阻止死刑执行的几率问题，却几乎又都绝口不提，德国试图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死刑执行其实是干预中国司法的行为。只有极少数报道提到，该案件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里适用的是中国法律，<sup>⑨</sup> 即使被害人都并非中国人，也不能因此对中国司法判决有任何影响。

## 二、关于采访对象

在德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出现的采访对象主要为律师、人权组织人士和德国官方。所采访律师除了凶手的律师之外，还有刑事案件律师莫少平等其他中国律师，所引用观点都围绕是否存在改判的可能性这一议题。如前文所述，德国媒体对于中国存在死刑刑罚一直持批评态度，德媒将之视为中国存在人权问题的论据之一。因此，在德国媒体的采访对象中，也多次出现人权组织的相关人士，比如国际大赦组织的亚洲专家韦雷

⑦ Erling, Johnny: Philipp B.s Doppelmord ließ dem Richter keine Wahl, <http://www.welt.de/vermishtes/article131428063/Philipp-B-s-Doppelmord-liess-dem-Richter-keine-Wahl.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⑧ Hengst, Björn/Zand, Bernhard:Todesurteil gegen Deutschen in China, 2014-08-21, <http://www.spiegel.de/panorama/justiz/todesurteil-in-china-bangen-um-deutschen-staatsbuenger-philipp-b-a-987393.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⑨ dpa-infocom GmbH: Erstmals Deutscher in China zum Tode verurteilt, 2014-08-20, [http://www.welt.de/newsticker/dpa\\_nt/infoline\\_nt/brennpunkte\\_nt/article131407231/Erstmals-Deutscher-in-China-zum-Tode-verurteilt.html](http://www.welt.de/newsticker/dpa_nt/infoline_nt/brennpunkte_nt/article131407231/Erstmals-Deutscher-in-China-zum-Tode-verurteilt.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娜·哈尔佩 (Verena Harpe)。报道称,哈尔佩呼吁德国政府,应将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但是她认为,德国政府此举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很难预料,因为这是第一例德国人在中国被判处死刑的案例。也有报道称,哈尔佩表示,德国政府应利用该案件跟中国政府谈废除死刑制度的问题。另一受访者是“人权观察组织”的王松莲 (Maya Wang),报道称她同样很担心这个事件。她说:“我不确定,菲律宾的国籍或者德国政府的介入是否能够影响终审判决。”<sup>⑩</sup>

德国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又再次嵌入一直以来德国媒体中一再出现的对中国死刑制度的负面评价。

如上文所述,关于德国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德国媒体则是必提的。除了表示“德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死刑刑罚”,称“德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德国政府将会‘尽一切所能’阻止死刑执行”。<sup>⑪</sup>也有报道提及,巴伐利亚州司法部对此事的态度是坚决支持德国联邦政府,因为凶手的家乡在巴伐利亚州。报道称,巴伐利亚司法部表示,“只要有可能,巴伐利亚州一定会竭尽全力(阻止死刑执行)”。<sup>⑫</sup>

### 三、关于中国国内的态度

关于中国官方对于此事的态度,德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涉及较少。一方面,只有少数报道提及,中国政府一向不允许外国干预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德国媒体提及,中国官方机构控制该话题的讨论范围。相比之下,德国媒体对于中国民众关于此案死刑判决的态度则报道较多。德媒称,中国网民支持死刑判决,称德国政府介入干预遭遇中国网民的不理解。德媒引用了几个网帖来证明他们的这种观点:“如果凶手不被执行死刑,那么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声誉。法律不能只针对本国国民。”<sup>⑬</sup>报道称,该网帖得到1200多个回帖支持。德国媒体引用的另一个帖子内容如下:“欧洲人无权对我们指手画脚。殖民地时期已经过去了。在中国就应该适用中国法律。”报道还称,很多中国读者表示,如果一个中国人犯了抢劫罪就会被判处死刑,而一个外国人却因为德国政府的干预,就可以杀了两个人都还能逃脱死刑惩罚,那么就太不公平了。德媒提出,多次调查显示,很多中国人都是赞成死刑制度的,虽然中国存在关于死刑刑罚的讨论,但是废除死刑制度

<sup>⑩</sup> (Verfasser unbekannt): „Die Chance für Gnade in dem Fall ist gering“, 2014-08-21, <http://www.bild.de/news/ausland/todesstrafe/zum-tode-verurteilte-deutscher-china-chance-auf-gnade-gering-37337480.bild.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sup>⑪</sup> dpa: Menschenrechtler wollen Hinrichtung von Deutschem verhindern, 2014-08-21, [http://www.focus.de/politik/ausland/prozesse-menschenrechtler-wollen-hinrichtung-von-deutschem-verhindern\\_id\\_4074735.html](http://www.focus.de/politik/ausland/prozesse-menschenrechtler-wollen-hinrichtung-von-deutschem-verhindern_id_4074735.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sup>⑫</sup> dpa-infocom GmbH: Erstmals Deutscher in China zum Tode verurteilt, 2014-08-20, [http://www.welt.de/newsticker/dpa\\_nt/infoline\\_nt/brennpunkte\\_nt/article131407231/Erstmals-Deutscher-in-China-zum-Tode-verurteilt.html](http://www.welt.de/newsticker/dpa_nt/infoline_nt/brennpunkte_nt/article131407231/Erstmals-Deutscher-in-China-zum-Tode-verurteilt.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sup>⑬</sup> Hengst, Björn/Zand, Bernhard: Todesurteil gegen Deutschen in China, <http://www.spiegel.de/panorama/justiz/todesurteil-in-china-bangen-um-deutschen-staatsbuerger-philipp-b-a-987393.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并不现实。<sup>⑭</sup>

#### 四、关于凶手家乡人的反应

在凶手的出生地，人们对此判决持何种态度，德国媒体的报道并不多。一篇报道称，这个谋杀案当地人是知道的，但是当地政府并没有介入司法程序。泰森多夫（Teisendorf）的第二市长诺伯特·沙德尔（Norbert Schader）称：“他是在我们这里上的学，但是

在地区公共生活中他根本没有出现过。”<sup>⑮</sup>

#### 五、关于凶手对于死刑判决的态度

关于该起谋杀案件的凶手对于死刑判决的态度，德国媒体报道称，据知情人表示，菲利普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消极<sup>⑯</sup>。还有报道提到，据菲利普的律师告知，他的当事人对于被判处死刑根本不吃惊。菲利普甚至预想到这个结果，因此在庭上反应相对冷静。

作者简介：周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

<sup>⑭</sup> Hartwich, Inna: Deutscher in China zum Tode verurteilt, 2014-08-20, <http://www.fr-online.de/panorama/doppelmord-deutscher-in-china-zum-tode-verurteilt,1472782,28171932.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sup>⑮</sup> dpa-infocom GmbH: Erstmals Deutscher in China zum Tode verurteilt, 2014-08-20, [http://www.welt.de/newsticker/dpa\\_nt/infoline\\_nt/brennpunkte\\_nt/article131407231/Erstmals-Deutscher-in-China-zum-Tode-verurteilt.html](http://www.welt.de/newsticker/dpa_nt/infoline_nt/brennpunkte_nt/article131407231/Erstmals-Deutscher-in-China-zum-Tode-verurteilt.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sup>⑯</sup> Hengst, Björn/Zand, Bernhard: Todesurteil gegen Deutschen in China, 2014-08-21, <http://www.spiegel.de/panorama/justiz/todesurteil-in-china-bangen-um-deutschen-staatsbuerger-philipp-b-a-987393.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

## 政治、社会与文教新闻

史笑艳

### 一、德国联邦政府应对埃博拉疫情的措施

今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暴发已半年多，截至目前已致 4000 人死亡、8000 余人感染。疫情继续蔓延至西非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趋势一直没能得到有效抑制。<sup>①</sup> 国际社会针对埃博拉疫情的相应救助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德国也参与了救助工作。近日，德国联邦政府正式任命颇有非洲工作经验的外交官林德纳作为联邦政府埃博拉疫情专员，由他负责全面协调疫情危机的处理事项。德国联邦政府计划动用 1700 万欧元专项经费，用以支持帮助

西非地区抗击疫情的各个项目。<sup>②</sup>

德国联邦陆军也从科隆和波恩的机场出发开始向西非地区运送救援物资。他们运送的近五吨重救援物资主要是手套、消毒水和靴子等医疗设备。德国联邦陆军计划在非洲当地塞内加尔共和国首都达卡设立临时空运中心，以便日后从那里继续向其他西非国家运送物资。<sup>③</sup>

联邦卫生部长戈洛尔近期通过媒体向德国民众表示，当前的疫情对德国没有威胁。他对德国的疫情防范和医疗救治系统充满信心。他表示，近来发现的一些疑似病人和传染途径都在各州防疫部门的领导下得到了有

---

① Rasche, Uta: „Kann Ebola auf dem Landweg nach Deutschland kommen?“,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inland/epidemie-kann-ebola-auf-dem-landweg-nach-deutschland-kommen-13203323.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12 日。

② Denkler, Thorsten/Seeling, Luisa: „Ebola-Beauftragter will schnell in die Krisenregion reisen“,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hilfe-der-bundesregierung-ebola-beauftragter-lindner-warnt-vor-mega-aufgabe-1.2165844>,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9 日。

③ (Verfasser unbekannt): „Erste Bundeswehr-Flieger starten in Ebola-Gebiete“, <http://www.sueddeutsche.de/gesundheit/epidemie-in-westafrika-erste-bundeswehr-flieger-starten-in-ebola-gebiete-1.2146107>, Stand: 25.09.2014.

效处理。<sup>④</sup>

联邦政府和卫生部官员的这些表态受到了在野党绿党和医疗防疫界专家的批评。绿党的代表谴责联邦政府反应迟钝、效率低下，他们认为联邦政府非但没有将具体防范和抗击疫情的措施作为首要任务贯彻落实，还沾沾自喜地不断标榜自己纸上谈兵的举措和虚高的项目经费。<sup>⑤</sup>

联邦卫生部长戈洛尔对局势的判断也被一些传染病专家公开质疑。他们认为在德国一些人口大州，如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只有两三张病床用以应对埃博拉病情。整个德国只有十几辆能用来运送埃博拉患者的专用车辆。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德国对埃博拉疫情的准备并不十分充分，在疫情发生的情况下政府是难以应对的。<sup>⑥</sup> 专家们指出，德国政府低估了疫情的风险。埃博拉疫情有可能由诸多通过陆路进入德国境内的非法非洲移民带入，对于这一问题联邦政府各部门似乎还在踢皮球，仍然没有具体的应对措施。<sup>⑦</sup>

## 二、德国慕尼黑啤酒节趣事

具有 204 年悠久历史的德国慕尼黑啤酒节 2014 年又一次落下了帷幕。慕尼黑啤酒节始于 1810 年 10 月 12 日，当时皇家为了庆祝巴伐利亚王国的王储路德维希和特里西亚公主的婚礼，特意在慕尼黑市郊举办了盛大的赛马和庆典活动，之后这一习俗作为每年一度的十月啤酒节延续下来。<sup>⑧</sup>

慕尼黑啤酒节广受各国游客和当地人民的喜爱，被称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百万富翁和乞丐在一起狂欢的节日。今年，它再一次通过一系列有趣和令人惊讶的数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up>⑨</sup>

2014 年德国慕尼黑啤酒节共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630 万游客。

啤酒节期间，各啤酒棚共售出 650 万升新鲜啤酒。

烧烤餐厅共向游客提供了约 160 头烤牛，每头牛的重量约为 600 斤。

德国联邦铁路局额外调用了 500 趟列车

④ (Verfasser unbekannt): „Gröhe will mehr freiwillige Helfer gegen Ebola“, <http://www.faz.net/aktuell/gesellschaft/gesundheit/groeh-will-mehr-freiwillige-ebola-helfer-13203597.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0月12日。

⑤ Denkler, Thorsten/Seeling, Luisa: „Ebola-Beauftragter will schnell in die Krisenregion reisen“,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hilfe-der-bundesregierung-ebola-beauftragter-lindner-warnt-vor-mega-aufgabe-1.2165844>,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0月9日。

⑥ (Verfasser unbekannt): „Gröhe will mehr freiwillige Helfer gegen Ebola“, <http://www.faz.net/aktuell/gesellschaft/gesundheit/groeh-will-mehr-freiwillige-ebola-helfer-13203597.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0月12日。

⑦ Rasche, Uta: „Kann Ebola auf dem Landweg nach Deutschland kommen?“,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inland/epidemie-kann-ebola-auf-dem-landweg-nach-deutschland-kommen-13203323.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0月12日。

⑧ (Verfasser unbekannt): „Die Geschichte des Oktoberfests“, <http://www.oktoberfest.de/de/article/Das+Oktoberfest/Geschichte/Die+Geschichte+des+Oktoberfests/621/>,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0月16日。

⑨ Schubert, Andreas: „3646 Fundstücke und ein erschlagenes Monster“, <http://www.sueddeutsche.de/muenchen/oktoberfest-bilanz-fundstuecke-und-ein-erschlagenes-monster-1.2159365>,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10月5日。

用以保障啤酒节期间游客的顺利出行。

啤酒节失物招领处目前共存有 3646 件游客在啤酒节期间丢失的物品。这些物品中除了有各种证件、手机和照相机之外，还包括丢失的结婚戒指、联邦荣誉勋章和义齿等。

慕尼黑警察局共出警 2205 次，办案 1688 起，找到 8 名走失的儿童。

慕尼黑红十字会今年一共救治了 7914 名病人，其中包括 681 名酒精中毒者。第一位酒精中毒者在啤酒节开幕后两小时就被送进了医院。

### 三、法兰克福书展

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专业图书展会。自 1949 年第一次打开图书世界展览的大门至今，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一直在经历着各种发展和变化。从 1976 年起，法兰克福书展每年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和主题国。<sup>⑩</sup> 今年书展的主题国是位于欧洲北部的芬兰，主题为读书。每年 10 月份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都会吸引很多文学艺术界和政治界的明星参与。今年，书展上再次迎来了每年

都不会缺席的一位老熟人，他就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sup>⑪</sup>

84 岁的科尔因 2007 年的一次事故只能坐着轮椅来参加书展，虽然他只是用轻微的声音并时常通过其夫人的帮助与观众进行了短短 30 分钟的对话，但还是在书展期间引发了一个小小的科尔热。科尔来到书展介绍了自己的两本著作，分别是有关描述两德统一艰难历程的最新著作和即将在年末出版的另一本新书。两本书的书名分别为《从推倒柏林墙到统一》和《担忧欧洲》。除了介绍自己的新书，科尔也十分积极地参加了时政的讨论，仍然表现出了资深政治家的风范及其对德国和欧洲发展的关心。他表示，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新书来促进德国的发展。<sup>⑫</sup>

今年，虽然共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7000 余参展商和 27 万参观者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但书展的总体规模同比还是再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面对电子媒体的发展、网络经济的挤压以及欧债危机中仍难以自拔的南欧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出版业的困境，法兰克福书展还需在诸多挑战面前寻找新出路。<sup>⑬</sup>

作者简介：史笑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sup>⑩</sup> (Verfasser unbekannt): „Frankfurter Buchmesse“, [http://de.wikipedia.org/wiki/Frankfurter\\_Buchmesse](http://de.wikipedia.org/wiki/Frankfurter_Buchmesse),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16 日。

<sup>⑪</sup> Gupta, Oliver Das: „Kohls Fernduell über zwei Etagen“,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altkanzler-auf-frankfurter-buchmesse-kohls-fernduell-ueber-zwei-etagen-1.2165734>,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8 日。

<sup>⑫</sup> Späne, Klaus: „Kohl auf Buchmesse: Gebrechlicher Altkanzler sorgt für Furore“, <http://www.fnp.de/nachrichten/politik/Kohl-auf-Buchmesse-Gebrechlicher-Altkanzler-sorgt-fuer-Furore;art673,1070767>,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9 日。

<sup>⑬</sup> (Verfasser unbekannt): „Erneut Besucherminus auf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http://www.deutschlandradiokultur.de/erneut-besucherminus-auf-der-frankfurter-buchmesse.265.de.html?drn:news\\_id=410038](http://www.deutschlandradiokultur.de/erneut-besucherminus-auf-der-frankfurter-buchmesse.265.de.html?drn:news_id=410038),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12 日。

# • 热词诠释



# Balance Sheet Policy 和 ABS

关海霞

## 一、资产负债表战略 ( Balance Sheet Policy )

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指的是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是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进行政策操作等活动所形成的债券债务存量表。通过对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观察分析，可以有效评估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执行成本，从而促进一国货币政策的优化设计和实施。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对资产负债表的管理成为各国中央银行非常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和调整资产负债表项目结构，可以实现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等目标。

2011年之后，由于欧洲央行一系列常规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的出台，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始终处于上升态势。到2012年3月2日，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突破3万亿欧元，达到3.02万亿欧元，短短一年增长了56.8%，是2008年3月份的2.19倍，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超过同期的美联储和日本央行。2014年3月21日，由于前一周欧元区各大银行偿还了欧洲央行的长期

再融资贷款 (LTRO)，其资产负债表缩减16.91亿欧元，减至2.166万亿欧元。

同时，到2012年3月2日，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对欧元区金融机构的欧元贷款”、“为货币政策目的持有的证券”和“欧元区信贷机构欧元负债”项目的规模都迅速扩大。

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的管理，欧央行可以有效地调控自己的货币政策操作，有效地保持价格稳定和财务健康。在欧债危机转折关头，欧央行将“增强的信用支持”视为可以保证利率信号正确传达到欧元区的重要机制。关于央行的财务健康问题，只要费用没有以欧洲央行发行的货币计价，欧洲央行就不会像商业银行那样面对流动性问题。反而是央行由于购买了欧元区边缘国家的主权债券因而极大地增加了对欧元区边缘国家主权债务的风险，但在资产负债表整体规模和构成部分方面，欧洲央行应该还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 二、资产抵押证券 ( Asset-backed Securities, ABS )

资产抵押证券，又译为资产支持型证券，

简称 ABS，是以金融资产为支持型的债券或票据。这些用以支撑的金融资产可以为银行、信用卡公司或其他信贷机构的贷款或应收账款，比如，信用卡应收账款、汽车贷款、房屋建造合同以及房地产贷款等等。此外，发行人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的银行信用证或保单形式的信用提级手段常常会为该类证券提供保证。

和其他大多数债券不同，ABS 的信用价值不取决于标的资产<sup>①</sup> 初始持有人的偿付能力。包括银行、信用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以及消费者金融公司在内的这些持有初始贷款的金融机构（也被称为初始贷款持有人）通过一种“证券化”的过程，把他们的贷款转化为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证券。这些初始贷款的持有人通常被称为资产抵押证券的发行人，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这些证券的发起人，并不是直接发行人。

这些持有初始贷款的金融机构把他们手中的贷款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V：special-purpose vehicle）。该机构唯一的任务就是购买这些贷款并将它们“证券化”。这些“特殊目的机构”实际上也是以公司的面貌出现，在将这些购买的贷款证券化后，会把这些证券化后的贷款出售给信托机构。接下来，这些信托机构会将这些购买来的证券化的贷款重新打包组合，使之成为能产生利息的证券，并真正发行这些证券。这些证券由投资银行承销，向投资者出售，并通过内部、外部或两者同时进行的一种或多种附加保护措施进行信用增级。<sup>②</sup>

ABS 证券是一种较新的证券形式，但在

证券市场增长很快。第一批 ABS 证券发行于 1985 年。那一年，市场公开发行的 ABS 证券有 120 亿美元。到了 1998 年上半年，市场上新发行的此类证券已高达 1022 亿美元。

投资资产抵押证券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ABS 证券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在众多的 3A 级的资产中，ABS 证券收益率比到期日与之相同的美国国债要高，和到期日和信用评级相同的公司债券或抵押支持型债券的收益率大致相同。

第二，较高的信用评级：从信用角度看，ABS 证券是做安全的投资工具之一。与其他债务工具类似，它的价值评估和信用评级的基础是看这些证券能否按期偿还本金和利息。但与大多数公司债券不同的是，ABS 债券有担保物品的保护，并由其内在结构特征通过外部保护措施使其得到信用增级，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债务责任得到实现。<sup>③</sup> 大多数资产支持型证券从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得到了最高信用评级——3A 级。

第三，投资多样化和多元化：ABS 证券市场是一个在结构、收益、到期日以及担保方式上高度多样化的市场。用在 ABS 证券的资产也是多元化，涵盖了不同的领域，比如，信用卡应收账款，汽车、船只和休闲设施贷款等。

第四，可预期的现金流：许多 ABS 证券的现金流很稳定，可预测性也有很好的设置。购买 ABS 债券的投资人一般具有较强的信心可以按期进行偿还。

第五，风险小：由于 ABS 证券得到标的

① 金融衍生品中的标的资产是指衍生品合约中约定的资产。

②（作者不详）：《资产支持型证券》，URL: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2859.htm?from\\_id=11257374&type=syn&fromtitle=Asset+Backed+Securities&fr=aladdin](http://baike.baidu.com/view/1452859.htm?from_id=11257374&type=syn&fromtitle=Asset+Backed+Securities&fr=aladdin), 2013,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31 日。

③ 同上。

资产的保证，从而提供了针对事件风险而引起的评级下降的保护措施。与公司债券相比，这点更显而易见。投资者对于没有保证的公司债券的主要担心在于，不论现在的评级有多高，一旦发生对发行人产生严重影响的事

件，评级机构将调低其评级。类似的事件包括兼并、收购、重组及重新调整资本结构，这通常都是由于公司的管理层为了提高股东的收益而实行的。

作者简介：关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 Industry 4.0 和 Solvency II

徐四季

## 一、工业 4.0 ( Industrie 4.0, Industry 4.0 )

“工业 4.0”是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在 2013 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的概念。它描绘了制造业的未来远景，提出继蒸汽机的应用、规模化生产和电子信息技术三次工业革命后，人类将迎来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 Cyber-Physical Systems, CPS ) 为基础，以生产高度数字化、网络化和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在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子公司等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建议和推动下，德国政府已将“工业 4.0”项目纳入《高技术战略 2020》的十大未来项目中，资助 2 亿欧元。德国政府将“工业 4.0”项目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目前，该战略已经得到德国科研机构 and 产业界的广泛认同：弗劳恩霍夫协会将在其下属 6、7 个生产领域的研究所引入“工业 4.0”概念；西门子公司已经开始将这一概念引入其工业软件的开发和生产控制系统。

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普遍认为，“工业

4.0”概念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革命性的生产方法。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分别源于机械化、电力和信息技术。如今，随着物联网及服务的引入，制造业正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具体来看，它包含了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传统的行业界限将消失，会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创造新价值的过程会发生改变，产业链分工将被重组。

“工业 4.0”项目主要分为两大主题：一是“智能工厂”，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和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二是“智能生产”，主要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 3D 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该计划将特别注重吸引中小企业参与，力图使中小企业成为新一代智能化生产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成为先进工业生产技术的创造者和供应者。

德国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之一，在全球制造装备领域拥有领头羊

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德国专注于创新工业科技产品的科研和开发，以及对复杂工业过程的管理。德国拥有强大的设备和车间制造业，在信息技术领域拥有较高的能力水平，在嵌入式系统和自动化工程方面也有很专业的技术，这些因素共同奠定了德国在制造工程工业上的领军地位。通过“工业4.0”战略的实施，德国将成为新一代工业生产技术（即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供应国和主导市场；这将使德国在继续保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前提下再次提升它的全球竞争力。

## 二、欧盟保险偿付能力 II 监管体系（Solvency II）

偿付能力 II 监管体系是欧盟委员会为了适应全球金融监管、保险风险管理和国际财务报告等领域的变化而努力建立的欧盟保险监管新体系。2007年7月10日，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提交了“Solvency II 框架指令”草案，成为 Solvency II 项目正式启动的标志。2009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批准了“Solvency II 框架指令”，在欧盟层面奠定了实施 Solvency II 的法律基础。但由于各种原因，正式实施新监管体系的时间表却一再推后。2011年1月，欧盟委员会建议对 Solvency II 进行修改，补充“综合 II 指令”（Omnibus II Directive）。经过数年谈判，2014年3月11日，欧洲议会批准了“综合 II 指令”，决定 Solvency II 将于 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

偿付能力监管一直是欧盟保险监管的核心：欧盟曾于 1973 年和 1979 年分别针对非寿险和寿险业务发布了偿付能力监管指令，开始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要求制定统一标准；2002 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颁布了现行的偿付能力 I 监管体系（即 Solvency I）。与 Solvency I 相比，Solvency II 的革新之处在于

新的监管体系是以风险为基础设定的，力求对保险公司的实际风险进行更全面和更合理的评估，在资本计提方面有效区分业务规模相同但风险程度不同的公司，并鼓励保险公司通过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有效控制自身风险，确保偿付能力。

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 Solvency II 采用了和巴塞尔 II/III 相同的“三支柱”体系，以实现保险监管和银行监管的协调一致。

### 1. 支柱一：对资金管理的数量要求

支柱一包含对资产和负债进行市价评估、技术准备金和自有资本测算的规定以及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资本的定量要求。

不同于现行的单层级标准，Solvency II 引入了双层级标准，即偿付能力资本要求（Solvency Capital Requirement, SCR）和最低资本要求（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 MCR）。其中，SCR 设定了监管目标，而 MCR 是最低门槛：自有资本满足 SCR 标准的保险公司被认为有实力应对各种风险；对于资本水平介于 MCR 与 SCR 之间的保险公司，监管机构将按照不足额度的程度进行不同等级的监管干预；自有资本一旦低于 MCR 标准，监管机构将立即采取严厉的干预措施，直至吊销其营业许可。两级指标在计算方法上也存在显著差异：SCR 的计算是以风险为基础的，具体计算公式可以选用监管部门给定的标准模型，也可以选用公司自行开发、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内部模型；而 MCR 的计算并不基于风险，仍然沿用现行体系中最简单的线性比例公式。

### 2. 支柱二：对风险管理的定性要求

支柱二包含对保险公司内部风险管理的定性要求和监管执行流程的规定。

与第一支柱“量”的要求相配合，第二支柱对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提出了“质”的要求，具体包括清晰的经营和风险战略、合理的组织结构和流程、有效的内部调控体系、必要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认证以及内部稽核制度与应急计划。

### 3. 支柱三：信息披露要求

支柱三规定保险公司对公众和监管机构均有定期进行信息披露的义务，以期利用市场力量约束、规范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当然，这些义务需要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协调一致。

作者简介：徐四季，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 • 外交观察



## 读施密特三部著作有感

梅兆荣

海南出版社即将再版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三部著作：《大国和它的领导者》、《未来强国》、《与中国为邻》，让更多中国读者分享这位著名前政要的远见卓识，不失为明智之举。

施密特在上述著作中，深刻阐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错综复杂的国际风云，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东西方关系和大国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并对今后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的走势做了发人深省的预测，对我们认识美国、西方的政策本质，研析世界各种力量及其相互关系，都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具有现实意义。

1987年发表的《大国和它的领导者》，即是作者与苏、美、中三大国领导人内部谈话的回忆，又是对当时国际局势的纪实，也是诠释德国当年外交战略的经典。该书还生动地描述了作者对三个大国以及日本的国情和领导人特点的认识，不仅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对我们了解国际关系的历史经纬也有重要意义。

2004年推出的《未来强国》，精辟地分析了当今世界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大国和各种力量的发展趋势，对美国推行扩张主义、帝国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根源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对

中国按照自己国情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和推行渐进的改革开放战略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中国将是“明日世界的赢家”。该书受到德国媒体和公众的高度评价，称它是作者对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提醒”，是为挽救我们的地球应该做些什么的“高瞻远瞩”。

2006年出版的《与中国为邻》，是以接受记者访谈形式对中国进行的全面阐述，被德国媒体誉为关于中国的“真正的知识宝库”，是“现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在“序言”中指出，他写该书的目的，一是使读者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应得到尊重；二是给那种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轻狂的好为人师者釜底抽薪；三是表明中国对西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没有任何过错；四是促使读者关注中国这个“最新的邻居”，因为中国和欧洲的未来将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显然，该书针对当时德国情况的指向很强。

施密特是德国社民党人。1962年汉堡发大水，他作为该市内政局长领导抗灾表现出色，一举名扬全德。1969年社民党上台执政，施密特在勃兰特政府中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1974年勃兰特因其秘书纪尧姆被揭出是东德卧底间谍而引咎辞职，施密特接

任联邦总理。1982年卸任后施密特任《时代》周报发行人，经常就重大国际问题发表政见。作为政治家，施密特较少有意识形态色彩，而以“实干家”著称；作为政论家，他观察问题犀利，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观点一针见血，态度鲜明，是德国威望颇高、影响力很强的重量级前政要。

身为西方政治家，施密特虽然坚持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但他承认世界的多样性，主张尊重各国按照自己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东西方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情况下，他主张通过对话和“均势”维护和平。当苏联的中程导弹威胁到西欧安全时，他力主北约通过“双重决议”应对，但坚持同苏联保持接触，与勃列日涅夫交往密切。面对2013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他对西方的“过度反应”和“制裁”措施持批评态度，并认为普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做法“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国际法固然重要，但西方早已多次加以破坏，而且，“比援引国际法更为重要的是克里米亚的历史经纬”，“如果设身处地替普京想一想，你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会做出与他（指普京）相似的反应。”

施密特赞赏美国人民的创造力，但尖锐抨击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2012年12月与基辛格在汉堡峰会上同台“论中国”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有人发明了所谓“保护的责任”，这个口号“接近于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在这个问题上他与美国的看法不同，而与中国人站在一边。2005年，他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欧美之间的战略利益仅部分地吻合，“欧洲在美国面前应保持尊严，不应退化为驯服的唯命是从者”。

作为由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组成的“国际行动理事会”创始人之一，施密特与

日本前政要交往密切，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政治精英阶层的心态有深刻的了解。他认为日本虽是经济、金融强国，但成不了世界政治大国，除了各种客观条件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在世界上朋友甚寡”。这“部分归因于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自我孤立，更多是因为日本后来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给所有邻国带来了灾难，邻国对此铭心刻骨，但关键还是日本人对过去的征服行径和犯下的罪行不愿承认和表示歉意”。

施密特对非洲大陆、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处于世界边缘的无奈”深表同情；他对伊斯兰教的力量和影响力高度关注，强调西方应承认伊斯兰教是与基督教平等的世界宗教，对它应持尊重和容忍态度，而不应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看作是不可避免的。

施密特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他赞赏中国根据国情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和谨慎的外交政策，还多次为中国仗义执言，批判西方对中国的无理攻击。例如：他批评欧洲人“倾向于接受一些美式偏见，爱从反面评价中国，从道义上指责中国人”，他抨击有些欧洲人“轻狂地好为人师，对中国指手画脚”。他曾写道：“如果以为，仅中国人是受益者，而发达的工业国家是施舍者，那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的智商、善学和发明才能与欧洲人是同等的，他们的劳动道德则优于欧洲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向中国人学习一些东西。”他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欧洲人——以及整个西方——要把中国的独立自主看作是平等的并加以承认和尊重，决不能允许经济竞争遮蔽甚至排斥这种尊重”；“不管是犹太教的真主还是基督教的上帝，都是没有赋予他们之中任何人以权力，把西方国家的文明看作是优越于一切的文明，

并宣称中国需要西方的说教或者反过来散布对中国的恐惧。他们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和理智应当告诉他们：中国在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时将走自己的道路”；“有些德国政论家和政治家也认为，归根结蒂，中国必须更加民主。他们没有认识到，由于德国 20 世纪的历史，我们德国人最没有权利在道义上指责这个中华文明古国”；“我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所保障的政治稳定是符合需要的，对中国人民及其邻国来说都是有益的。中国权威政治的文化很可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于国家开放的结果而发生演变。……如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享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应该听其自然发展，如果当真试图在政治上从外部加快这一进程，将不会有好结果。相反，这样做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中国人对自己几千年文化和当今国家繁荣的自豪感以及他们日益增长的自信心，在我看来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如果认为这是一种进行决斗的挑战，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施密特对中国的同情和深刻理解，是他多方请教、长期钻研、独立思考的结果。早在 2006 年《与中国为邻》一书问世时，德国书评就指出：德国没有第二个人像施密特那样，30 多年来“持续不断、兴致勃勃地跟踪中国发展成世界大国的进程”，他“扼要而直观地描绘了中国如何改变了世界”。施密特很早就开始对中国感兴趣，担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时，他不可能访问中国，因为当时两国还没有建交，他总是在访问中国周边国家时关注往访国如新加坡、日本、韩国、泰国、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看法。但作为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政治家，他不满足于间接了解中国。1975 年他作为联邦总理第一次访华是他直接观察了解中国的开端。这次访问给他的“印象是复杂的”。一方面毛主席、邓小平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使他赞叹不已，数千年的古老中国历史特别是源远流

长的中华文化使他倍感钦佩。但当时中国经济状况不好，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1984 年作为卸任总理访华参加中国 35 周年国庆活动时，他已有“一种轻松的感觉”，高兴地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瞎胡闹已经结束”，国家走上了一条很好的旨在实行改革的道理，大街上和商店里的景象已发生根本变化。1988 年他第三次访华，看到中国的进步到处明显可见，人们比过去快乐多了。1990 年他第四次访华，主要是想了解“六四风波”真相和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他对中国领导人就此真相的说明表示理解，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增强了信心。直到 2012 年，他又多次访华，会见我国领导人，同各界人士接触，研讨各种问题，不断加深对中国的认识。2005 年，他在外交学会做演讲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成为中国的朋友，不是一个狂热的崇拜者，而是一个友好的观察者，总是带着批判的眼光，但始终是一个朋友。”

笔者同施密特相识是 1975 年他第一次访华的时候，我是他的全程陪同。1978 年谷牧副总理率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对西欧五国进行考察访问，在德国受到施密特总理的会见，我是这次谈话的译员。1984 年他第二次访华同邓小平会见时，我以西欧司副司长身份参加陪见。1988—1997 年我任驻德大使期间，多次向他请教对国际形势和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也应询回答他的提问。在我 1997 年担任外交学会会长期间和退休以后，曾多次接待他来访，而他亦曾邀请我去巴黎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组织的高级专家会议，讨论对欧盟的看法。我曾以学者身份多次访问德国，每次都要争取去拜访施密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坦诚交换看法。他特别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形势，关注中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中美关系，关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外汇储备增多问题，亦关注中国年

轻人的精神支柱问题和儒家思想在中国的作用。可以说，我同施密特在长期、不断的坦诚对话中铸就了相互信任的关系，我从他的谈话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长达 30 多年的友好交往中，特别是通过翻译他的上述三部著作，我对施密特有三个突出印象：一是施密特对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研究、判断和理解，在我所认识和了解的西方政要中是最全面、客观和深刻的，令人敬佩；二是施密特对中国发展变化的观

察，特别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政治制度的评价，没有西方政治家通常有的那种偏见或者那种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的烙印，他常以人类进步和国际和平与合作的视角判断是非，凭借自己的良知和胆识敢于仗义执言，鞭挞西方一些人的偏见和错误观点，实属难能可贵；三是施密特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表达的独到见解、明确立场和鲜明态度，至今仍富有现实意义，发人深省。

基于上述，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

作者简介：梅兆荣，中国前驻德国大使。

# 我国政党外交肩负“双重任务”，形成“三位一体”格局

吴兴唐

**【摘要】**所谓“双重任务”是指政党外交既是党的事业一部分，又是我国总体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三位一体”是指以政党外交为主体，辅以同政党外交有密切联系的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形成“三位一体”的格局。调研是政党外交的基础。要研究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国对外战略的新发展，研究国外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研究外国政党的党建和执政能力。

**【关键词】**政党外交 双重任务 三位一体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党外交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不断开拓创新，深化内涵，扩展外延。突出表现在肩负“双重任务”和形成“三位一体”格局两个方面。

所谓“双重任务”，就是政党外交既是党的事业一部分，又是我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外交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一个新的提法，加强了政党外交的历史责任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党的事业包括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各个领域，也包括党的自身建设。因而要实施“政党外交升级版”，就要从党的事业大局和战略出发，增强创新意识，为中央决策服务，努力完成中央

交给的各项任务。我国实施“总体外交”，外交队伍千军万马，包括政府外交、政党外交、议会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生态外交以及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等等。政党外交是“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个领域的外交相互渗透、相互协调。政党外交同政府外交及各领域外交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三位一体”是指以政党外交为主体，辅以同政党外交有密切联系的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形成“三位一体”的格局。

## 一、我国政党外交的新发展

我国政党外交的主要对象是各国各类政

党，因此，认识政党在现代国家中的作用，确认和把握政党政治引领国家走向的大势，是至关重要的。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不同类型的政党，通过特定的选择形式，取得执政地位，组织政府实施以其政党纲领和主张为主导的政治活动。政党政治源于西方政治理念。但现代政党政治呈现多样性和国情适应性。我国的政党政治同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密切相关。各国社会、政党体制不同，政党类型也不同，因而呈现政党政治的多样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但各不相同。政党政治同时也随着时代特点的发展而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国家政党政治遇到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也在不断探索中，但引领国家的作用仍然没有改变。

由于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而我国的政党外交首要任务就是要同各国各类政党进行广泛的联系和交流，既让世界了解我们党的战略和政策主张，也使我们更深地了解世情和各国的党情与国情。

近年来，政党外交本身有新发展，表现为进一步发展政党外交的广泛性、多样性、灵活性与务实性的特点。同时表现在发挥政党外交战略性和理论性的优势。政党交流，特别是政党高层互访交流，主谈的大多是战略与理论问题。还表现在多边政党外交活跃和政党交流的机制化发展。

## 二、“四驾马车”和中共对外信息传播工程

“三位一体”中的同政党外交有关联的民间外交主要体现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主管下的“四驾马车”即四个民间组织的对外活动中。这四个民间组织是：中国

国际交流协会（交流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裁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促会）和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交流协会成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9月，目的是为适应打开国门后广泛发展同外国民间组织和政党关系的需要。经过10年国际共运大论战和10年“文革”，政党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入低谷和困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要求开创党的对外工作的新局面，同世界各类政党进行交往。但由于多年隔阂，政党交流需要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交流协会为政党交流和发展做了许多前期工作。同时，大国大党都有自己主管或影响的团体、组织、基金会、研究机构。交流协会同这些组织与机构积极发展关系，成为政党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交流协会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间组织，是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外事团体。经过30多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对外交往，交流协会已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民间组织。

和裁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10月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和大），从1957年起由中联部主管。和大是当时活跃于世界维护和平运动的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民间组织。“文革”期间和大被撤销。80年代中期，我国进行国际战略转变，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同时世界和平运动也发生了新的转变。适应上述转变，于1985年6月成立了和裁会。近30年来，和裁会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交往，在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适应非政府组织（NGO）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和我国民间组织不断扩大的情况，先后成立了中促会和和平发展基金会。中促会广泛联系国内外有关民间组织和人士，推动中国民间组织参与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参与联合国系统等重要国际活动。和平发展基金会打造“人文交流”、“公益活动”和“论坛研讨”三大板块，开展以医疗、教育为主的公益和民生项目，深化各国民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位一体”中的公共外交，既体现在政党交流中，又体现在上述四个民间组织的对外活动中。本着“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精神，要说好“中国故事”，自然也包括说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近年来，在政党外交及同政党外交有关联的民间交往中，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信息传播”工程，以广泛的联系面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将我们党的先进理念、战略思路、执政方式和各领域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对外的软实力。

### 三、调研为中央决策服务

调研是政党外交的基础。第一，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国对外战略的研究。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进行动态与跟踪研究和综合分析，向中央提出观点和看法以及政策性建议，供中央决策参考。近年来调研的主要课题有：多极化及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发展趋势，国际形势走向与对策，我国国际环境、“战略机遇期”与总体外交，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地区热点问题，我国周边环境与对策等等。

第二，研究国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主要课题有：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方针政策及经验与教训；新兴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及新兴国家崛起的国际影响；转型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发展战略及经验教训；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问题。为配合

国内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经济转轨，需要加强对城镇化、农业问题、社会保障体制、现代企业制度、混合经济、财税体制、维护社会稳定的调节机制、自贸区建设、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又要立足于自身，要结合我国实际具体运作。

第三，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分析这些国家内政外交走向和发展前景，为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特点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新动向以及国际政治思潮的发展变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当代资本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自由竞争、垄断和宏观调控，新自由主义和国际金融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此外，还宜研究“非资本主义道路”。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走的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有的国家向往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理念。这些国家在世界上占有多数，应加强研究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和趋势走向。

第四，对外国政党的党建问题的研究。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分析外国政党的党建理论与实践，总结外国不同类型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介绍一些国家政党惩治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的做法，研究外国执政党党建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以此依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借鉴。

中联部主管的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当研中心），成立于1994年，2010年进行重建。当研中心已与国内许多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与国外智库开展交流合作，

建立了“当代世界讲坛”和“当代世界多边对话会”等国际交流平台。

#### 四、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及其各种流派

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既包括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也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各国社会党，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苏东剧变后“转型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倾向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还包括发展中国家奉行和倾向社会主义理想的政党及由这类政党主要执政的国家。

我国政党外交把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共产党发展友好关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苏共解散、苏联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低潮。这是苏联模式的错，而不是社会主义理想和理论的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令世人瞩目，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充满生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所在。随着国际形势和各国国内形势的新变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既有共同点、相似点，也有相异点。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各自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要加强相互交流与了解，扩大和充实相同点，共同探讨国家发展战略和改革路径。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的关系，要坚持政党关系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我国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也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这一点我们党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就提出来了。

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苏东剧变后转型国家中依然存在着一批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都在艰苦探索适合

国情的革命道路，近年来这些组织的力量和影响有了发展。我们党同这些政党保持经常的交流关系。

社会主义思潮依然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并且有新的发展。当代社会主义同样呈现多样性，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信奉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但也应欢迎别的政党或政治组织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也应持宽容和欢迎的态度。不能像过去苏共那样，“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对待社会主义各种流派，要在观念上去掉“概念化”和“定式思维”。

拉美是政党和政党政治比较活跃的地区。拉美国家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相当活跃。推翻军事独裁政权之后，普遍实行“民主化”。在“民主化”道路上，出现各种类型政党。“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推动下，拉美执政的保守政党推行“新自由主义”，导致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调，相继发生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个别国家濒临“破产”。拉美国家“痛定思痛”，左翼政党举起“反对新自由主义”旗帜，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替代模式，赢得民众拥护，通过选举相继上台执政。

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组织，在取得国家独立后成为执政党。战后 20 世纪 50、60 年代，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有很大影响力，非洲取得独立国家的愿望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有的还进行一些有社会主义内容的改革，但因过于激进、不适合非洲国家的国情而受到挫折。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苏东剧变后，广大非洲国家受到西方“民主化”和“多党制”的冲击。一些信奉社会主义的执政党纷纷下台，各种各样政党在政治舞台上进行争斗，引发一片混乱。但仍有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传统政党以及左翼的或中间的民族主义政党站稳了脚跟。在多极化及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大多数国家的

政党格局趋于稳定。这些政党奉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对外政策，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重视发展同我国的传统友好关系。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同我们进行广泛交流，愿意了解和借鉴中国发展的经验。

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思潮。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以下简称社会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战后广泛存在于欧洲、拉美国家以及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苏东剧变后，一些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西欧的一些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社会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和本国国内政治生活中都有广泛的影响。

在欧洲，社会党作为左翼政党同右翼党或保守党轮流交替执政或联合执政。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社会党遇到了新的挑战。欧洲社会党在战后一向采取灵活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其影响虽然起起落落，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地位也经常转换，但其基本力量和作用仍保持稳定不变。我们党同社会党特别是欧洲社会党在意识形态上有根本的分歧，但我们党按照“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同社会党交流的方针，从20世纪80年代起同世界上几乎所有社会党都有政党对话与交流关系，这已成为我国政党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30多年来取得了对双方都有利的显著成就。

**作者简介：**吴兴唐，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 Deutschland im subsidiären Staatenverbund der EU aus einer chinesischen Sicht

Von LIAN Yuru

【 Abstract 】 Die vorliegende Arbeit vertritt die Meinung, dass sowohl die Deutsche Frage als auch die Frage der EU-Charakteristik, welche zwei Seiten einer Medaille sind, gelöst worden sind: Die EU ist ein subsidiärer Staatenverbund, der sich von allen anderen politischen Verfassungssystemen substantziell unterscheidet. Dass Deutschland öfters noch als kein normaler Staat wahrgenommen ist, stellt sich als eine Projizierung des europäischen Dilemmas dar, das selber eine Folge der scheinbar ungeklärten EU-Finalität ist.

【 Schlagwörter 】 : europäisches Dilemma, Subsidiaritätsprinzip, Staatenverbund

## 1. Die Normalisierung Deutschlands und die Lösung der Deutschen Frage

Das Jahr 2014 stellt ein wichtiges Kettenglied zwischen der Vergangenheit und der Zukunft dar. Was die Vergangenheit anbetrifft, erinnert das Jahr 2014 an den Ersten und Zweiten Weltkrieg, die jeweils vor 100 und 75 Jahren ausbrachen und enormen materiellen und menschlichen Schaden brachten; an die deutsche/europäische Teilung und Wiedervereinigung, die jeweils mit der Gründung vo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DDR vor 65 Jahren

sowie mit dem Mauerfall vor genau 25 Jahren geschahen; nicht zuletzt auch an die größte Osterweiterung der EU, die ihr 10jähriges Jubiläum feiern durfte.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erscheint das 20. Jahrhundert als ein kurzes Jahrhundert, und zwar in dem Sinne, dass es mit dem Jahr 1914 erst angefangen hat und mit der Wende von 1989/90 schon abgeschlossen wurde. Dies hängt mit der Stellung und Rolle Deutschlands in Europa bzw. in der Welt politik direkt und eng zusammen.

Wenn auch schon über 60 Jahre vergangen

sind, seit Thomas Mann 1953 an die deutsche Jugend appelliert hat, „klar und einmütig ihren Willen kundzugeben - nicht zu einem deutschen Europa, sondern zu einem 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 beschäftigt die Deutsche Frage bis heute immer noch Europa und das internationale Umfeld. Die Kritik an der Europapolitik der Merkel-Regierung ist nur ein Beispiel dafür. Nach einer Spiegel-Umfrage vertraten 88% Spanier, 82% Italiener und 56% Franzosen die Meinung, dass ihre Toleranz gegenüber der deutschen Dominanz in Europa ziemlich am Ende war; nicht wenige Leute in der EU verglichen das heutige Deutschland mit dem Wilhelmischen Deutschen Reich Anfang des 20. Jahrhunderts.<sup>①</sup>

Ist das vereinigte Deutschland ein normales Land wie alle andere Staaten? Auf diese Frage hat die politische Elite Deutschlands wie Helmut Schmidt<sup>②</sup> und Hans-Dietrich Genscher<sup>③</sup> mit „Nein“ geantwortet. Im Gegensatz dazu wird in der vorliegenden Arbeit die These gewagt: Die Deutsche Frage ist gelöst und das vereinigte Deutschland ist auch zu einem normalen Staat wie alle andere Staaten der Welt geworden. Die Normalisierung Deutschlands darf mit zwei Aspekten, dem inneren und dem äußeren, interpretiert werden. Was die äußere Seite anbetrifft, sind drei Daten von großer historischer Bedeutung. Erstens, der 5. Mai 1955, an dem die staatliche

Souveränität der BRD mit dem Inkrafttreten des Deutschlandvertrages usw. wiedererlangt wurde.<sup>④</sup> Zweitens, der 3. Oktober 1990, der Tag der deutschen Wiedervereinigung nach über 40 Jahren Trennung. Schließlich der 12. Juli 1994, an dem die Grundsatzfrage, ob die Bundeswehr im Rahmen kollektiver Sicherheitssysteme international eingesetzt werden kann, mit dem Urteil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positiv entschieden wurde. In den letzten zwanzig Jahren seit dem Urteil hat sich Deutschland nahezu am gesamten Spektrum denkbarer internationaler Missionen von der Friedenserhaltung bis zum Kampfeinsatz beteiligt.<sup>⑤</sup>

Die innere Seite der Normalisierung Deutschlands bezieht sich auf das deutsche sozioökonomische Modell,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Das hohe Niveau des materiellen Wohlstands, die Konsolidierung de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und die Wiederherstellung der staatlichen Einheit Deutschlands sind letzten Endes der erfolgreichen Durchführung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zu verdanken. Seit dem Ausbruch der Weltwährungskrise 2008 versuchte Kanzlerin Merkel, die deutsch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nicht nur als effektives Mittel zur Bekämpfung der Krise zu erklären, sondern auch zum universalen Wertschatz zu erheben. Gleiches geschah in ihrer ersten Regierungserklärung, die sie als

① Siehe DER SPIEGEL, 1/2014, S. 30.

② Siehe die Rede von Helmut Schmidt, „Deutschland in und mit Europa“, auf dem SPD-Bundesparteitag am 4. 12. 2011 in Berlin, [http://www.spd.de/aktuelles/Pressemitteilungen/21498/20111204\\_rede\\_helmut\\_schmidt.htm](http://www.spd.de/aktuelles/Pressemitteilungen/21498/20111204_rede_helmut_schmidt.htm).

③ Im September 2013 hat Hans-Dietrich Genscher, als ich ihn in Berlin besuchte, die gleiche Meinung wie Helmut Schmidt vertreten.

④ Siehe das Auswärtige Amt (Hrsg.), Auß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Vom Kalten Krieg zum Frieden in Europa. Dokumente von 1949-1989, München: Bonn Aktuell, 1990, S.189.

⑤ Vgl. Ulf von Krause, Die Bundeswehr als Instrument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Wiesbaden 2013.

wiedergewählte Regierungschefin der neuen großen Koalition am 29. Januar 2014 abgegeben hat.<sup>⑥</sup>

## 2. Das europäische Dilemma und dessen Auflösungsversuche

Warum wird Deutschland immer noch als kein „normales“ Land wahrgenommen? Nach Helmut Schmidt steht dagegen „unsere ungeheure, aber einmalige historische Belastung. Und außerdem steht dagegen unsere demografisch und ökonomisch übergewichtige Zentralposition inmitten unseres sehr kleinen aber vielfältig nationalstaatlich gegliederten Kontinents.“<sup>⑦</sup> Bei aller Achtung und Verehrung des Ex-Kanzlers wird meiner Meinung nach der Hauptgrund hierfür jedoch in der Widerspiegelung eines „Europäischen Dilemmas“ gesehen. Konkret heißt das, dass in Europa die deutsche Führungsstellung und –rolle zur Bewältigung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einerseits dringend gebraucht und andererseits allgemein nicht akzeptiert bzw. abgelehnt wird. Indem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Sicherheit für und zugleich auch vor Deutschland bedeutet, stellen sie praktisch zwei Seiten einer Medaille dar. Solange das europäische Dilemma noch höchst präsent ist, projiziert es sich notgedrungen auf Deutschland, wenn es auch längst ein normales Land ist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reits gelöst ist. Die Akzeptanz der deutschen Dominanz in Europa ist folglich von großer Bedeutung, nicht nur für Deutschland selbst, sondern auch für Europa, damit sich die großen Potenziale Deutschlands konstruktiv für Europa

und darüber hinaus entfalten können.

Wie kann man sich von dem europäischen Dilemma befreien? Helmut Schmidt versuchte die Frage vor allem aus deutscher Perspektive zu beantworten. Als ein tief- und weitdenkender Staatsmann, der noch den II. Weltkrieg mit-erleben müssen, appellierte er nicht nur an seine Parteigenossen, sondern auch an alle Landsleute, in Richtung zu einem „Deutschland in und mit und für Europa“ zu arbeiten.<sup>⑧</sup> Andere sprachen von einem Fingerspitzengefühl, welches die Deutschen gegenüber anderen Völkern Europas immer zeigen sollten. Diese Bemühungen könnten das Dilemma einstweilen relativieren, aber nicht zu einer grundsätzlichen Lösung verhelfen. Im Gegensatz dazu wird hier ein anderer Ausweg aus der europäischen Sackgasse bevorzugt, der primär theoretischen Charakters ist und sich direkt auf die Finalität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bezieht.

Im Rahmen der traditionellen Integrations-theorie sind zwei Hauptrichtungen vertretend, die Supranationalität und die Intergouvernementalität. Konkret soll das heißen, dass die EU entweder zu einer verspäteten supranationalen Föderatio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Europa durchbricht, oder sie bleibt eine intergouvernementale Union. Diese beiden Entwicklungsperspektiven der EU konnten jedoch, wie der Ausbruch und die Ausweitung der europäischen Schuldenkrise seit 2009 gezeigt haben, das Problem der europäischen Tragbarkeit der deutschen Dominanz nicht zu einer befriedigenden Lösung bringen. Zum Beispiel sollten, aus der supra-

---

⑥ Näheres dazu siehe Das Parlament, 3. Februar 2014, DOKUMENTATION, S. 4-7.

⑦ Siehe die Rede von Helmut Schmidt am 4. Dezember 2011, a.a.O., S.1.

⑧ Näheres dazu siehe die Rede von Helmut Schmidt, a.a.O., S.1.

nationalen Hinsicht, nach der Währungsunion Europas, auch andere Gebiete wie die Finanzpolitik, Sozialpolitik usw. als „spill over Effekt“ zwangsläufig vergemeinschaftet werden. Dies würde aber das europäische Dilemma, wenn Deutschland schon im Euro-Raum übermächtig erscheint und sich in einer ständigen Minderheitenposition und Isolationsgefahr befindet, nur noch verschärfen.

Außerdem droht die EU, sich erneut zu spalten, diesmal nicht durch den Eisernen Vorhang, sondern entlang der Außengrenzen der Euro-Zone; der Zustand einer Zweiklassengesellschaft von Mitgliedstaaten der EU mit und ohne Euro, in Gläubiger- und Schuldnerstaaten würde sich dann verfestigen. Eine derartige Entwicklung entspricht weder den Interessen Deutschlands noch dessen Nachbarn in Europa.

Eine Entwicklung der EU in die andere Richtung, nämlich „back to the future“, wie z.B. Austritt mancher Staaten aus dem Euro-Raum oder gar Auflösung der europäischen Währungsunion, würden sich noch destruktiv auswirken; denn dadurch würden genau jene Gefahren heraufbeschworen, die man eigentlich mithilfe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hinter sich lassen wollte, Isolation und Hegemonie, in der sich das Deutsche Reich zu seinem und Europas Unglück vor 1945 immer wieder befunden hat.

Gibt es einen weder linken noch rechten, sondern einen Mittelweg? Dazu hat der deutsche Historiker Dominik Geppert versucht, eine Zu-

kunfts-konzeption der EU nach der Eurokrise herauszustellen, die flexible Kooperation aller Mitgliederstaaten der EU, welche weniger als ein Bundesstaat, aber mehr als eine bloße Freihandelszone wäre – eine Vergemeinschaftung durch „horizontale Integration, nicht als Zentralisierung europäischer Politik“.<sup>⑨</sup> Dieses Modell kann eine praktische Funktion zur Schwächung der europäischen Verlegenheit bringen, lässt diese aber nicht beseitigen, nicht zuletzt auch deshalb, weil die Finalität der EU theoretisch nicht geklärt wird. Das Modell ist zwar nicht an beiden Polen der Integrationstheorie, der Supranationalität und der Intergouvernementalität, gelandet, bewegt sich jedoch unverändert im Rahmen der alten Integrationstheorie, wobei die nationale Souveränität das Leitprinzip bildet. Gibt es eine theoretisch alternative Klärung zu der Charakteristik bzw. der Finalität der EU?

### 3. Die Charakteristik und/bzw. die Finalität der EU

Ausgehend davon, dass der deutsche Ex-Außenminister Joschka Fischer mit seinem Plädoyer für eine europäische Föderation als die Finalität der EU-Entwicklung Unmut in Europa mit sich gebracht hat.<sup>⑩</sup> Deshalb wollten sich Politiker nicht festlegen, um die von ihnen angestrebte Integration Europas nicht zu erschweren. Wissenschaftler zögerten auch, die Besonderheit der EU beim Namen zu nennen; oder vereinfacht wurde sie als ein Prozess ohne Ziel interpretiert. Es sind

⑨ Näheres dazu siehe Geppert, Dominik : Da klappert die europäische Rhetorik – Weniger verbunden und flexibler, mit nationaler Ehrlichkeit und ihren Regeln verpflichtet – das Modell einer EU nach der Krise, in : DER TAGESSPIEGEL, 8. September 2013, S. 6-7 MEINUNG.

⑩ Rede von Joschka Fischer, „ Vom Staatenverbund zur Föderation - Gedanken über die Finalität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 , Vortrag an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FCE Spezial) am 12. Mai 2000.

bereits über sechs Jahrzehnte vergangen, seit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mit der Gründung der Montanunion am 23. Juli 1952 in Gang gesetzt wurde. Den EU-Bürgern immer noch verweigern zu sagen, in welchem Zug sie sitzen und in welcher Richtung der fährt, das ist zu einem Albtraum geworden, der die Zukunft der EU nur bedrohlich macht.<sup>①</sup> Das Hochkommen der alten Furcht vor einem „deutschen Europa“ während der Euro-Krise war nur ein Beispiel dafür.

Angesichts der Logik, dass der Schein eines deutschen Dilemmas nur die Projizierung durch ein europäisches Dilemma ist, muss ein neuer theoretischer Ansatz zur Bestimmung der Charakteristik und/bzw. der Finalität der EU vorgenommen werden. Dazu wird in der vorliegenden Arbeit auf die EU als einen subsidiären Staatenverbund rekurriert. Denn genau dadurch unterscheidet sich die EU von allen bisher existierenden politischen Verfassungssystemen der Welt - eine Neuartigkeit der EU!

Der Begriff „Staatenverbund“ ist ein neugeschaffenes deutsches Wort, das vom deutschen Rechtswissenschaftler und Bundesverfassungsrichter Paul Kirchhof geprägt ist. Er wird zur Bestimmung des Charakters der EU gebraucht und hat keine Entsprechung in anderen Sprachen.<sup>②</sup>

Der erste Teil des zusammengesetzten Wortes „Staaten“ bedeutet die Gleichberechtigung aller Mitgliedstaaten der EU, unabhängig von ihrer

Bevölkerungszahl, Ausdehnung, Wirtschaftskraft und internationaler Rolle. Jedes Mitglied der Union hat ein Vetorecht bei der Formulierung der Verträge und Abkommen der EU. Der „Verbund“ als zweiter Teil des neugeschöpften Begriffs verkörpert die Funktionsfähigkeit und Effizienz der EU als internationaler Akteur, wobei das Mehrheitsprinzip bei der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 der EU wichtig ist. So wird unter dem „Staatenverbund“ ein Neologismus für ein Mehrebenensystem verstanden, in welchem die Staaten enger zusammenarbeiten als in einem Staatenbund, jedoch im Gegensatz zu einem Bundesstaat die staatliche Souveränität behalten.<sup>③</sup>

Noch entscheidender als der neue Begriff „Staatenverbund“ für den Neuartigkeitscharakter des Verfassungssystems der EU ist das Subsidiaritätsprinzip, welches im Maastricht-Vertrag, in Kraft getreten am 1. November 1993, verankert ist. Dieses Prinzip stammt eigentlich aus der Katholischen Soziallehre, basierend auf deren religiösem Menschenbild, wonach das Individuum bzw. die kleine soziale Einheit, solange sie fähig sind, eine Aufgabe zu erfüllen, keine Einmischung von anderen bzw. der größeren Einheit haben sollte. Auf die EU-Ebene übertragen heißt es, dass die EU erst dann auf bestimmtem Gebiet wirken darf, wenn dies von den Mitgliedstaaten der Union erlaubt wird. Konkretes Verfahren dazu lässt sich in zwei Verfassungsregelungen

---

① Vgl. Wagner, Helmut : Die Originalitä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 S. 3.

② Der Begriff entstand in der Präambel des Urteils, das vom deutschen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am 12. Oktober 1993 in der Angelegenheit des Maastricht-Vertrages ergangen ist. Es heißt: Der Unionsvertrag begründet einen Staatenverbund zur Verwirklichung einer immer engeren Union der – staatlich organisierten – Völker Europas, keinen sich auf ein europäisches Staatsvolk stützenden Staat. Vgl. <http://www.servat.unibe.ch/dfr/bv089155.html>.

③ Vgl. <http://de.wikipedia.org/wiki/Staatenverbund> (Redaktionsstand vom 23. 09. 2014)

identifizieren, die im am 3. Dezember 2009 in Kraft getretenen Lissaboner Grundlagenvertrag festgelegt worden sind.

Zum einen können die Mitgliedstaaten der Union durch "begrenzte Einzelermächtigungen" die Ausübung bestimmter nationaler Kompetenzen auf die EU-Ebene übertragen; zum anderen "koordiniert" die Union die ihren Zielen dienende Politik der Mitgliedstaaten und übt die der Union von den Mitgliedstaaten übertragenen Zuständigkeiten in "gemeinschaftlicher Weise" aus.<sup>14</sup> Durch dieses Doppelverfahren ist das Verhältnis der EU-Mitgliedstaaten zur Union verfassungsrechtlich eigentümlich geregelt worden. Das ist das Subsidiaritäts- und nicht das Souveränitätsprinzip. Der klassische Staatscharakter ist der Union ausdrücklich verwehrt worden, indem sie nur über begrenzte, von den Mitgliedstaaten übertragene Kompetenzen verfügt und deren Ausübung von unten, d.h. kontrolliert auch von den Mitgliedstaaten, geschieht.<sup>15</sup> Das ist eine Entscheidung der EU-Mitgliedstaaten, die gar kein Bestandteil eines europäischen Superstaates werden wollen. Es sind die europäischen Staaten, welche die Initiative zur Integration ergriffen, eine eigene internationale Gemeinschaft gegründet haben. "Ohne sie gäbe es keine Europäische Union. Sie sind politisch ihr Rückgrat, ihr A und O."<sup>16</sup>

#### 4. Die Eigenschaften und Bedeutung des Subsidiaritätsprinzips für die EU

Die Frage, ob und wann das Souveränitätsprinzip, welches schon seit dem Westfälischen Friedensabkommen vom Jahre 1648 die Grundlage für die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sordnung dargestellt hat, durch das Subsidiaritätsprinzip abgelöst werden könnte, sei dahin gestellt.<sup>17</sup> Jedenfalls zeigen sich im Subsidiaritätsprinzip einige Elemente, die zur Klassifizierung der EU und eventuell auch zur Regelung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weltweit relevant sind.

Erstens ist die Freiwilligkeit, die den Kern des Subsidiaritätsprinzips bildet. Der Eintritt in die Union basiert auf einer freien Entscheidung des jeweiligen Staates. Auch kann "jeder Mitgliedstaat ...im Einklang mit seinen verfassungsrechtlichen Vorschriften beschließen, aus der Union auszutreten".<sup>18</sup> Letzten Endes kommt es allein auf eine einheitliche Entscheidung der Mitgliedstaaten der Union an, in welche Richtung sie weitergehen werden, ob sie eher eine supranationale Entwicklung der Union bevorzugen oder lieber noch bei dem Zustand einer auch erweiterten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ihnen bleiben.

Zweitens, das Subsidiaritätsprinzip hat zwei miteinander eng verbundene Stränge, die Eigenverantwortung und die Solidarität. Beide haben die gleichartige Zielsetzung, nämlich die Auf-

<sup>14</sup> Vgl. Wagner, Helmut : Die Originalitä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 S. 4-5.

<sup>15</sup> Ebenda, S. 5.

<sup>16</sup> Ebenda, S. 6.

<sup>17</sup> Nach Helmut Wagner hat das Subsidiaritätsprinzip eine neue Epoche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eingeleitet. Näheres dazu siehe ders., Das Unikat der EU – Die Frage ihrer Finalität, 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 S. 9-10.

<sup>18</sup> Lissabon Vertrag § 50. Konsolidierte Fassung vom 30.03.2010, Amtsblat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Reihe C 83/43.

gabe gut zu erfüllen. Derzufolge sollte man sich, wenn z.B. eine Wirtschafts- und Währungskrise ausbrach, um deren Bewältigung zuallererst mit eigener Kraft bemühen. Nur wenn das nicht gelingt, kann auf Einladung die Hilfe von anderen Mitgliedstaaten bzw. der Union solidarisch geleistet werden.

Drittens, die Funktion und praktische Bedeutung des Subsidiaritätsprinzips drückt sich in der Art und Weise aus, dass es die Macht, im Gegensatz zum Souveränitätsprinzip, welches den Anspruch erhebt und bestrebt ist, politische Entscheidungen “von oben nach unten” zu treffen, gerade umgekehrt “von unten nach oben” aufzuteilen; der Maßstab für die Aufteilung ist, dass die Macht nur dort und von denen ausgeübt werden, wo sie und von denen sie am sinnvollsten und effektivsten wahrgenommen werden können, während alle Funktionen, die sie unter- oder überfordern, der nächst niederen bzw. höheren politischen Ebene und ihren Repräsentanten übertragen werden.<sup>19</sup> Jedoch darf man dabei nicht darüber hinwegtäuschen, dass eine mögliche Entscheidung der nationalen Kompetenz-Übertragung immer mit einer Rationalität und Vernunft getroffen wird. Im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en Bereich beispielsweise – einem alle EU-Mitgliedstaaten einzeln schlechterdings überfordernden Bereich – handeln sie nach wie vor nach eigenem Ermessen und Belieben; hier

sind Entscheidungen des Europäischen Rates prinzipiell „einstimmig“ zu beschließen.

Es ist wichtig, darauf hinzuweisen, dass das Subsidiaritätsprinzip als eine neuartige Bestimmung der EU-Charakteristik sowohl in China als auch in Europa noch relativ unbekannt oder wenig geachtet wird. Trotzdem ist hier und da nicht selten abwegige Interpretation des Subsidiaritätsprinzips zu treffen. Z.B. meinten einige chinesische Europaforscher, dass unter ihm ein Prinzip der Machtteilung zwischen der EU und deren Mitgliedstaaten zu verstehen ist, mit dem im Grunde genommen die Leitidee und Rechtsgrundlage für die politische Föderation als Zielsetzung der EU geschaffen worden ist.<sup>20</sup> Dieses Verständnis vom Subsidiaritätsprinzip zeigt logischerweise, dass es keine Alternative, sondern nur eine Ergänzung zur traditionellen Integrationstheorie darstellt, bei der die staatliche Souveränität prinzipiell immer noch dominant erscheint.

Außerdem ist die These von der Unvollendetheit, Ungründlichkeit oder der Unreife der EU-Entwicklung zu nennen. In einem chinesischen Kommentar zum Lissabon-Vertrag wurde z.B. die Meinung vertreten, dass mit dem Vertrag zwar beeindruckende Fortschritte zur Erweiterung und Vertiefung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erzielt worden sind, aber immer noch keine klare Antwort auf die Finalität der EU gegeben

---

<sup>19</sup> Vgl. Wagner, Helmut : Das Unikat der EU – Die Frage ihrer Finalität, 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 S. 7.

<sup>20</sup> Näheres dazu siehe Hu, Jin u.a. : Ouzhou Dangdai yitihua sixiang yu Shijian Yanjiu 1968-1999 (Theorie und Praxis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1968-1999), Shandong Renmin Chubanshe (Volksverlag der Provinz Schandong) 2002, S. 75.

wurde.<sup>21</sup> Aus den Darstellungen des Kommentars lässt es sich herauslesen, dass die Zielsetzung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mit einer neu entstandenen politischen Autorität, einem europäischen Superstaat im Haasschen Sinne, identifiziert wurde.<sup>22</sup>

Die Unreife-These der EU-Entwicklung hängt in Deutschland auch mit der Diskussion über die EU-Legitimation zusammen. Im gängigen Demokratieverständnis wird vorausgesetzt, dass es ein Volk ist, das sich seine Verfassung gibt und seine Regierung wählt, auf welche Weise auch immer; deshalb darf von einer EU-Legitimation, solange es noch kein europäisches Staatsvolk entstanden ist, nicht gesprochen werden.<sup>23</sup>

Der bereits zitierte Wagner teilt diesen Standpunkt nicht. Nach ihm sei die EU nicht nur demokratisch, sondern auch als die Krönung demokratischer Bestrebungen anzusehen; mit den zitierten Begriffen von der „dualen Repräsentation“ von Manfred G. Schmidt sowie den „zwei Legitimationssträngen demokratischer Willensbildung“ von Udo Di Fabio, hat Wagner alle drei Formen demokratischer Herrschaft der EU aufgezählt und erläutert. Daraus zog er die Schlussfolgerung, dass alle Formen „mit dem in der EU-Verfassung verankerten Subsidiaritätsprinzip

zu tun haben, als ihm gemäß die politischen Funktionen sinnvoller Weise nach den jeweiligen Fähigkeiten, Möglichkeiten und Bedürfnissen der Regierten aufzuteilen sind.“<sup>24</sup>

Mit diesen Argumenten wurde das Legitimationsproblem der EU zufriedenstellend gelöst, indem Wagner zur Ablehnung der Unreife-Meinung das Subsidiaritätsprinzip wiederholt betont hat. D.h. man braucht nicht unendlich abwarten, bis eines Tages ein europäischer Superstaat mit einem europäischen Volk gegründet wird. Die EU ist ja schon ein großes vollendetes Werk; ihr Charakter bzw. ihre Legitimation ist mit der Durchsetzung des Subsidiaritätsprinzips als Originalität und Unikat der EU auch geklärt. Damit hat Wagner einen intellektuell bahnbrechenden Beitrag geleistet. Jedoch ist der Beitrag mit einem in seinem Werk festzustellenden Widerspruch verbunden, der darin besteht, dass er sich, in Bezug auf die europäische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an die eigentlich von ihm abgelehnte These der „Unfertigkeit“ und der „Unvollendetheit“ der EU doch angeschlossen hat.<sup>25</sup>

Es könnte sein, dass sich im Subsidiaritätsprinzip per se eine theoretische Falle verborgen hat; oder man ist noch davon entfernt, sich, im Gegensatz zur horizontalen Gewaltenteilung in Exekutive, Legislative und Judikative, an eine

<sup>21</sup> Vgl. Cheng, Weidong und Li, Xiangkun (übersetzt ins Chinesische),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s Amended by the Treaty of Lisbon*,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S. 30.

<sup>22</sup> Nach der Definition des amerikanischen Politikwissenschaftlers Ernst Haas darf nur dann von einer politischen Integration gesprochen werden, wenn eine neue Autorität entsteht, mit der die neue Einheit über den alten politischen Einheiten steht. Siehe der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 – 1957*, 2nd edi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6.

<sup>23</sup> Vgl. Wagner, Helmut : *Die Klassifizierung und Legitimation der EU*, 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 S. 5ff.

<sup>24</sup> Siehe Wagner, Helmut : a.a.O., S. 8.

<sup>25</sup> Näheres dazu siehe Helmut Wagner, *Die Originalitä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 S.14f.

vertikale Gewaltenteilung in Zentrum und Gliedstaaten nach dem Subsidiaritätsprinzip zu gewöhnen. Wie dem auch sei, die EU hat sich zu einem subsidiären Staatenverbund entwickelt. Das ist, wiederholt gesagt, die Finalität der EU; dadurch ist der EU-Charakter geklärt. Ebenso ist auch das genannte europäische Dilemma logischerweise aufgelöst, zumindest auf der theoretischen Ebene.

### **5. Die Entfaltung des 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s im subsidiären Staatenverbund der EU**

Die Entfaltung einer führenden Rolle des 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s, die dessen politischem Gewicht i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und den Erwartungshaltungen der großen Mehrheit dritter Staaten an Deutschland entspricht,<sup>26</sup> hängt von zwei Bedingungen ab, der Auflösung des europäischen Dilemmas und dem subjektiven Gestaltungswille Deutschlands.

Die erste Bedingung ist wie oben dargestellt schon erfüllt, was sich positiv auf Deutschland auswirken sollte. Was die zweite Voraussetzung anbetrifft, so darf auch von einem vorsichtigen Optimismus gesprochen werden. Zuerst ist darauf hinzuweisen, dass eine günstige Rechtsgrundlage

für ein europäisches Deutschland bereits nach der Verwirklichung der deutschen Wiedervereinigung geschaffen wurde. Der neue Artikel 23 des Grundgesetzes, der, nachdem der alte durch den Einigungsvertrag zwischen d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aufgehoben worden ist, durch das Gesetz vom 21. Dezember 1992 als die Staatszielbestimmung eines vereinigten Europas in das GG eingefügt wurde, verpflichtet Deutschland zur "Mitwirkung bei der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sowie für diese Mitwirkung auch zum "Grundsatz der Subsidiarität".<sup>27</sup>

Ferner zeichnet sich auf der praktischen Ebene eine neu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nach der Euro-Krise ab, die aktiver, globaler und engagierter bestellt ist. Nach Staack gab in der öffentlichen Wahrnehmung nicht Regierungschefin Merkel, sondern Bundespräsident Gauck das Leitmotiv vor, Deutschland solle sich international stärker engagieren.<sup>28</sup> Konkret lassen sich drei Herausforderungen identifizieren, welche die sich im Dezember 2013 neu gebildete Bundesregierung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 zu bewältigen hat. An erster Stelle steht eine Konsolidierung der EU, deren Zusammenhalt als Folge der Euro-Krise erheblich beschädigt wurde. An zweiter

---

<sup>26</sup> Bei einer im Jahr 2013 weltweit durchgeführten Umfrage der BBC erreichte Deutschland bei der Frage nach dem Land, das eine größere internationale Rolle spielen sollte, mit 59% sogar den Spitzenplatz. Vgl. BBC Poll: Germany Most Popular Country in the World, 22.5.2013, [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2624104](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2624104). Näheres dazu siehe Staack, Michael : Aktiver, globaler, engagierter? Deutschlands Außenpolitik nach der Euro-Krise, in: Information und Forschung über deutschsprachige Länder, Nr. 4, 2014.

<sup>27</sup> Art. 23 Absatz 1 lautet: „Zur Verwirklichung eines vereinten Europas wirkt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i der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mit, die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lichen, sozialen und föderativen Grundsätzen und dem Grundsatz der Subsidiarität verpflichtet ist und einen diesem Grundgesetz im wesentlich vergleichbaren Grundrechtsschutz gewährleistet“, Siehe Dieter Hesselberger, Das Grundgesetz – Kommentar für die politische Bildung, 9. Auflage, Bonn 1995, S. 189 f.

<sup>28</sup> Näheres dazu siehe Michael Staack : Aktiver, globaler, engagierter? Deutschlands Außenpolitik nach der Euro-Krise, in: Information und Forschung über deutschsprachige Länder, Nr. 4, 2014.

Stelle ist die Notwendigkeit, eine aktive globale Ordnungspolitik in einer sich schnell verändernden, multipolar strukturierten Welt zu betreiben, um multilaterale Kooperation zu stärken. An dritter Stelle folgt dann der deutsche Beitrag zum Management aktueller Konflikte; dabei stellt der Ukraine-Konflikt derzeit die größte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deutsche und europäische Außenpolitik dar.<sup>29</sup> Diese Aufgaben betreffen die Beziehungen Deutschlands jeweils zu wichtigen Staaten wie Frankreich, den USA, China und Russland.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nach dem II. Weltkrieg ist ein Wunder des Friedens, zu dem die Aussöhnung und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einen entscheidend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In diesem Sinne hat die EU den Friedensnobelpreis des Jahres 2012 verdient. Der weitere Erfolg der EU wird nach wie vor von dem deutsch-französischen Verhältnis determiniert. Eine Leitungsfunktion Deutschlands in der EU als stärkste Wirtschaftsmacht und damit politischer Bestimmungsfaktor Europas sollte weiter französisiert werden, so wie die französische Führung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jahrzehntelang germanisiert worden ist. In diesem Sinne hat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gleich nach Amtsübernahme mit seinem französischen Amtskollegen Fabius vereinbart,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nachdrücklich zu stärken“.<sup>30</sup> Außerdem wurde das Weimarer Dreieck vo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Polen intensiviert. Die Bundesregierung kündigte schließlich neue politische Initiativen zur Stärkung der Gemeinsamen Sicherheits- und Verteidigungspolitik der EU an – ein wichtiges Signal angesichts der Stagnation der europäischen sicherheitspolitischen Kooperation in den letzten Jahren<sup>31</sup>.

Die Lösung des Ukraine-Konflikts, der sich mittlerweile zur größten Gefahr für die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 nach dem Ende des Kalten Krieges entwickelt hat, verbirgt eine strukturell heikle Situation - eine ernsthafte Prüfung für die operativ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Einerseits entspricht den deutschen Interessen die Errichtung einer gesamt-europäischen Sicherheitsordnung, welche der KSZE zugrunde liegt und nicht gegen bzw. ohne Russland, sondern nur mit einer engen Zusammenarbeit mit Russland möglich ist. Andererseits bevorzugt Deutschland die Stärkung der teil-europäischen Organisationen EU und NATO, deren Osterweiterung das Verhältnis zu Russland belastet und die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sstruktur grundsätzlich in Frage stellt. Ob schließlich rationale politische Vernunft versus kritiklose Bündnistreue oder eine schwer zu haltende Balance zwischen ihnen die Oberhand gewinnen, wird sich noch zeigen.

Auch eine aktive globale Ordnungspolitik in einer sich schnell verändernden, multipolar strukturierten Welt stellt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auf einen Prüfstand. Auf der einen Seite will

<sup>29</sup> Ebenda, S. 8 f.

<sup>30</sup> Konkrete Maßnahmen sind u.a. systematische Abstimmung vor den EU-Ministertreffen, gemeinsame Reisen und Kooperation bei Konfliktprävention und Krisenfrüherkennung. Siehe Gemeinsame Erklärung von Bundesaußen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und Außenminister Laurent Fabius zur deutsch-französischen Zusammenarbeit, Auswärtiges Amt, Berlin, 21. 1. 2014.

<sup>31</sup> Vgl. Staack, Michael : Aktiver, globaler, engagierter ? Deutschlands Außenpolitik nach der Euro-Krise, in: Information und Forschung über deutschsprachige Länder, Nr. 4, 2014.

Deutschland insbesondere aufstrebende Mächte wie China zur Bewältigung der weltweiten Herausforderungen gewinn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wird China in Deutschland als bedrohlicher Konkurrent angesehen; denn die traditionellen Partner von Deutschland und der EU in Afrika, Lateinamerika oder Zentralasien orientieren sich zunehmend an China oder anderen aufsteigenden Staaten.<sup>③②</sup>

Das normale Deutschland im subsidiären Staatenverbund der EU gehört wie China auch zu den aufsteigenden Ländern nach dem Ende des „Kalten Krieges“.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besitzen, so wird die These vom 2008 trotz verschiedener Gegenmeinungen weiter vertreten, den Charakter einer „Natürlichen Partnerschaft“.<sup>③③</sup> Diese geht weder von der allgegenwärtigen Ideologie aus, noch leitet sie sich von der realen Tagespolitik ab. Vielmehr gründet sie auf der Struktur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und unterscheidet sich von den offiziellen Formulierungen des chinesisch-deutschen Verhältnisses.<sup>③④</sup> Die These von der „natürlichen Partnerschaft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lässt sich mit drei Argumenten erläutern: Erstens, beide Staaten haben jeweils

in ihren Entwicklungswegen nach der Staatsgründung 1949 sowie ihre Stellung und Rolle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eine erheblich Parallellität bzw. Ähnlichkeit aufgezeigt. Zweitens, die Hauptaufgaben Chinas, die zur Bewältigung der aktuellen internationalen Herausforderungen zu erfüllen sind, entsprechen im Wesentlichen auch den deutschen Interessenlagen. Drittens, seit dem Ausbruch der Staatsschulden-Krise in der EU wurde nicht nur die Interdependenz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vertieft; vielmehr wurden substantielle Kooperationsgebiete entwickelt bzw. ausgebaut, die auch anderen Staaten zugute kommen - wie z.B. regenerative Energie wie Wind, Solar und Biogas, nachhaltiges Bauen, die Förderung integrierter urbaner Mobilität usw.

Angesichts der gegenwärtigen komplizierten internationalen Lage und der großen Herausforderungen wird es ein Gewinn für die Weltentwicklung sein, wenn sich die „natürliche Partnerschaft“ zwischen einem 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 und einem an Reform und Öffnung festhaltenden China trotz aller Hindernisse weiter entfalten kann.

作者简介：连玉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③② Vgl. Kreft, Heinrich : Deutschland, Europa und die neuen Gestaltungsmächte.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Nr. 50-51, 2013, S. 16.

③③ Näheres dazu siehe Lian Yu-ru : Eine „Natürliche Partnerschaftsbeziehung“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n: Michael Staack (Hrsg.), Asiens Aufstieg in der Weltpolitik, Verlag Barbara Budrich, Opladen, Berlin & Toronto 2013, S. 89-106.

③④ Unter der Schröder-Regierung war es „die Partnerschaft in globaler Verantwortung im Rahmen der umfassenden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seit Juli 2010, als Kanzlerin Merkel China einen offiziellen Besuch abgestattet hatte, wurde es zu einer „Chinesisch-Deutschen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 乌克兰危机与德国的北约政策

李 微 刘立群

【摘要】乌克兰危机自2013年11月爆发以来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德国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但也暴露了德国在欧洲安全认知上与北约其他盟国尤其是与美国有较大差别，而且在安全参与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显得“雷声大雨点小”，更多强调“软实力”而非硬实力。德国的北约政策虽在原则上与其他北约国家基本一致，但其深层次认知背景和在操作层面上都有一定差异。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德国外交 北约政策

## 一、乌克兰问题导致德国安全政策出现不同声音

乌克兰危机自2013年11月爆发以来经历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戏剧性变化，欧洲政治和安全版图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无法想象的变化，至今仍未尘埃落定。德国在此事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其政策和表态一直广为关注。尽管默克尔一再强调“军事手段绝不可行”<sup>①</sup>，但随着事件的升级，欧美联盟内部出现了不大相同的声音。乌克兰方面于

2014年8月29日称“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援助，也包括军事援助”<sup>②</sup>。而在作为欧美安全防卫政策载体的北约，德国“谨慎”、“保守”、“不愿承担过多责任”的做法遭到了来自北约高层、美国以及东欧国家的诟病。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智库主席、北约专家杨·特肖（Jan Techau）指出，美国人已逐渐受够了为欧洲安全买单，“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保护欧洲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人就一直比欧洲人付出更多，这种趋势在冷战结束后急剧升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

① 德国政府官网：Doppelstrategie ist Schlüssel für Erfolg,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4/09/2014-09-02-eu-sanktionen-russland.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7日。

② 《明镜周刊》：Schutz fürs Baltikum: Nato plant angeblich Osteuropa-Eingreiftruppe,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reaktion-auf-ukraine-krise-nato-will-eingreiftruppe-schaffen-a-988965.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8月30日。

后更是达到顶峰”<sup>③</sup>。时任北约秘书长的拉斯穆森在2014年9月4日北约峰会上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违法军事行为是一次警钟。我们必须逐渐提高北约各国的国防军备支出。在过去五年内，俄罗斯军备开支提高了50%，而北约各国平均军备开支则减少了20%”，“大部分北约欧洲国家都未能达到军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要求”（德国为1.3%）<sup>④</sup>。同样将乌克兰事件视为“警钟”的还有美国方面，他们认为，欧洲国家应更多的“在政治、财政及军事方面增大对北约的支持，否则将失去美国对它们的信任”<sup>⑤</sup>。而早在2011年11月份，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就曾指出：“比起所谓的‘德国力量’，我现在更害怕德国袖手旁观。”<sup>⑥</sup>

这样的不满也出现在德国内部。德国总统高克在不同场合下均指出，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应向“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向发展。早在2011年利比亚事件后，他便对德国政府的“不作为”表达了不满。2011年6月，高克被授予路德维希·伯尔内奖，他在致辞中说：“在我的一生中，我认识到，那些毫无行动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2012年夏他

再次指出西方应当为全世界自由运动提供更为积极的支持<sup>⑦</sup>。在2014年1月底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他又在开幕词中说，德国应准备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包括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承担更多军事任务，历史包袱不应继续成为外交克制的理由<sup>⑧</sup>。

除高克之外，德国一些政治精英也表达了类似诉求。前国防部长德迈齐埃、现任国防部长冯德莱恩都对德国军备支出过低、在北约中发挥力量不够等提出过质疑<sup>⑨</sup>。甚至一向言行较为谨慎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也在2014年5月20日以“回顾2014——外交政策的广泛思考”为主题的会议上称：“当我们承担责任时，不仅应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也同时应为我们的‘不作为’负责。”<sup>⑩</sup>

近期这些不同的声音，无疑是受到了乌克兰事件的影响。2014年9月在北约威尔士峰会上，“乌克兰危机说到底就是俄罗斯危机”的声音比比皆是<sup>⑪</sup>。对俄罗斯霸权和扩张的担忧甚嚣尘上，而一直承担北约主体军事战力角色的美国则表现出希望转移其战略重心、将力量更多用在亚太地区的倾向。默克尔在军事和安全政策上“谨言慎行”、“少

③ 德国《每日播报》：Ist die NATO nur bedingt abwehrbereit?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debatte-um-ruestungshaushalte-100.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9月5日。

④ 同上。

⑤ Vgl. Major, Claudia: Der Nato-Gipfel 2014 im Schatten der Ukraine-Krise, in: SWP-Aktuell 51, S. 4, 7.2014.

⑥ Vgl. Rinke, Andreas: Raus ins Rampenlicht – Die Genese der „neuen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http://zeitschrift-ip.dgap.org/de/ip-die-zeitschrift/archiv/jahrgang-2014/juli-august/raus-ins-rampenlicht>, 2014年7月1日。

⑦ Ebenda.

⑧ 新浪国际新闻：<http://news.sina.com.cn/w/2014-02-04/065029395513.shtml>, 2014年2月4日。

⑨ Vgl. Rinke, Andreas: Raus ins Rampenlicht – Die Genese der „neuen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http://zeitschrift-ip.dgap.org/de/ip-die-zeitschrift/archiv/jahrgang-2014/juli-august/raus-ins-rampenlicht>, 2014年7月1日。

⑩ Vgl. Steinmeier, Frank-Walter: Schlussrede anlässlich der Konferenz „Review 2014 – Außenpolitik Weiter Denken“, 2014年5月20日。

⑪ 德国《每日播报》：Ist die NATO nur bedingt abwehrbereit?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debatte-um-ruestungshaushalte-100.html>, 2014年9月5日。

做少错”并过于“依赖北约同盟机制”的做法招致部分批评<sup>⑫</sup>。那么，默克尔政府的北约政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是否真的符合国内外“逃避责任”的指责？在乌克兰危机的阴影笼罩下，德国北约政策会否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又将如何影响乌克兰事件的未来走向？

## 二、德国的北约政策回顾

### 1. 冷战结束后——施罗德政府：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以及希望北约改革的诉求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德国外部安全框架和它的国际角色认同都有了极大改变，与此同时，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也在寻找全新的定位。可以说，德国的北约政策是伴随着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正常化”和北约的“现代化”双重进程而逐渐构建和调整而来的。因此，虽然自1955年5月西德加入北约以来，其成员国、甚至是核心成员国的身份就无可争议，但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对于自身在北约所扮演的角色、参与北约的意义，都没有停止过质疑和探索<sup>⑬</sup>。尤其是自1999年欧盟科隆峰会后决定建立欧盟独立安全防务力量以来，德国开始试图通过建立欧洲安全联盟的方式增大其在北约的影响力。北约和欧盟之间的平衡

和互补发展是德国安全政策的一贯目标，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是德国安全政策的基石。

但施罗德政府显然更注重发展欧盟内部的统一安全框架，希望与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平等对话。虽然“9·11”事件导致德美关系“理性升温”，2001年9月12日德国与其他盟友一起，启动了北约第5条款，为军事援助美国铺平了道路，并为配合美国“反恐”需要将近万名士兵部署到国外。同时，为了适应新安全环境的需要，德国国防部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于2003年5月发布了新的“防务政策指针”，允许德国参与北约国家防区以外的行动<sup>⑭</sup>。但伊拉克战争表明，施罗德更强调欧盟统一行动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欧盟与美国分庭抗礼<sup>⑮</sup>。这也充分反映了德国自主意识的增强和与德国实力相适应的外交活动空间的扩大<sup>⑯</sup>。2005年2月11—13日第41届慕尼黑国际安全政策会议上，施罗德提出新的安全理念和安全政策建议。他表示，随着战略安全威胁和挑战的改变，欧洲不必担心再受军事进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也不再具有安全政策的优先性。北约不再是跨大西洋伙伴磋商和协调其战略设想的首要场所，必须改革北约。这引起美国和北约其他盟国强烈的“吃惊和反对”。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北约是一个“杰出的组织”，具备“能力和活力”，没必要进行改革<sup>⑰</sup>。

⑫ Vgl. Hill, Steven: Merkels fragiles Europa – Die Ukraine-Krise offenbart europäische Schwäche, die Deutschland geschuldet ist, <http://zeitschrift-ip.dgap.org/de/ip-die-zeitschrift/themen/merkels-fragiles-europa>, 26.03.2014. 2014年3月26日。

⑬ Vgl. Theiler, Olaf: Deutschland und die NATO, in: Stephan Böckenförde/Sven Bernhard Gareis(HG.): Deutsche Sicherheitspolitik, Opladen & Farmington Hills: Verlag Barbara Budrich, 2009, S. 287.

⑭ 魏光启：《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及德美关系研究》，载《德国研究》，2014年，第1期，第37页。

⑮ 同上，307—309页。

⑯ 连玉如：《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外交与欧洲政策辨析》，载《德国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页。

⑰ 孙恪勤：《走向大国的努力与挫折——施罗德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战略》，载刘立群、连玉如（主编）《德国·欧盟·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228—229页。

无论出于何种目标,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机制的构建都对德国的北约政策产生了影响。虽然屡次遭受到“能力-期望差距”的概念挑战, 但自从2001年《尼斯条约》第一次提到军事合作的字眼,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机制逐渐开始形成突破。“9·11”事件后, 欧盟于2004年6月制订的《反恐行动计划》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2010年总体目标》标志着不断发展过程中的规则完善及任务制定, 为整合各成员国的力量, 2001年底发起的能力行动计划(ECAP)、2002年底和北约达成的军事资源共享协议、2004年7月成立的欧洲防务局(EDA)和同年提出的战斗群概念, 使得欧盟到2007年年初已达到能够同时具有投放两场不关联战争的快速反应能力<sup>⑮</sup>。在上述过程中, 虽然德国比起法国来不是最积极的政策推进者, 但德国也同样试图借助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从属地位, 提高双边关系中德国的地位, 并争取以欧盟领导国的身份与美国平等对话<sup>⑯</sup>。

但在实际参与行动的过程中,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机制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例如缺乏单一指挥结构、反应速度和效率低下、成员国武器标准不统一、缺乏政策连续性等。时至今日,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都更加凸显了政府间合作的性质, 科索沃战争则明确显示, 欧盟国家在军事打击力量层面, 都只能继续依赖北约和美国<sup>⑰</sup>。

## 2. 默克尔政府的北约政策: 安全基石、仍有分歧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 2005年11月默克尔上台之后, 以“价值观外交”为导向, 继续重塑德国的同盟战略, 并回归“平衡”路径, 尝试修复与美国的双边关系, 提升北约地位。2006年1月, 在她正式上台后不久, 她便出访华盛顿, 对布什承诺维持德美两国在跨大西洋同盟中的坚强“友谊”。<sup>⑱</sup>

在北约问题上, 默克尔一方面重视北约在保护欧洲安全层面上的基石作用; 另一方面, 也希望通过德国和欧洲的力量促使北约组织做出变革。2006年德国发布的《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明确指出, 北约盟友关系将继续作为德国未来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基石, “它构成了两个大陆联系的纽带, 它为维护和重建和平提供综合的政治和军事手段。从长远来看, 如果没有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北约盟国, 德国将无法应对安全上所面临的全球挑战。欧洲安全的根本问题只能通过美欧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是如此。”<sup>⑲</sup> 2010年10月, 在默克尔与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会晤时, 她重申北约是跨大西洋安全的支柱, 北约新战略纲要的准备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推进。而在2010年11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北约里斯本峰会上, 她强调, 无论是基于对现存危险的分析, 还是基于同盟对这些威胁做出的反应, 北约均驶入了21世纪<sup>⑳</sup>。

⑮ 刘海泉:《国际机制视角中的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12月, 第20卷, 第6期, 第66页。

⑯ 吴志成, 杨娜:《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 大国态度的比较分析》, 载《欧洲研究》, 2006年, 第2期, 第89页。

⑰ Vgl. Theiler, Olaf: Deutschland und die NATO, in: Stephan Böckenförde/Sven Bernhard Gareis(HG.): Deutsche Sicherheitspolitik, Opladen & Farmington Hills: Verlag Barbara Budrich, 2009, S. 309.

⑱ Ebenda.

⑲ 周庆建:《“9·11”事件以来德国防务政策的调整》, 载《史志鉴研究》, 2009年, 第4期, 第68页。

⑳ 魏光启:《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及德美关系研究》, 载《德国研究》, 2014年, 第1期, 第41页。

此外，为适应北约的需要，联邦国防军开始逐渐向“积极和多层参与行动”的方向发展，默克尔任总理后，2006年《国防白皮书》建议把德军维和部队增加到1.4万人。这一“姿态”被认为是：德国虽有自主需求，但主要是美国施加影响的结果<sup>④</sup>。

与此同时，默克尔政府的北约政策也存在希望革新的一面。首先，她希望北约不仅仅只作为一个军事联盟，而成为维系跨大西洋两岸盟友的广泛政治纽带，虽然在默克尔任下，联邦国防军更为配合北约的要求，但从行动目标、行动手段和行动后果来看，德国更多只在人道援助、战后重建、集体安全行动和危机管理上作出反应，对单纯军事干预行为敬而远之。冷战后德军所参与的北约军事实践表明，美欧之间军事技术和进行现代战争能力的差距是北约危机反应和联合行动的“软肋”。“欧洲以外的世界已非常清楚地看到：欧洲大国，无论是单独的国家还是欧洲整体，对于在欧洲大陆以外冲突地区动用决定性军事力量的能力和意愿，都是微乎其微而不足以依赖的。”<sup>⑤</sup>

这种“微乎其微”的能力和意愿，导致默克尔在前后三次担任总理后发布的施政纲领中，均将跨大西洋关系定义为“价值观共同体”，认为北约不应仅是一个集体防御和集体安全的组织，还应是一个处理军事、民事、政治等事务的综合平台<sup>⑥</sup>。秉持这个目的，2011年3月1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表决中，德国投了弃权票，与其北约盟友背道而驰，并且没有参与同年3月19日由法国、英国和美国领导的“奥德赛黎明”行动。对于这一决定，

德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彼得·维特希解释说：“德国完全支持经济制裁，但是，做出使用军事力量的决定常常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看到了巨大风险。德国将不会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为这样一场军事行动做贡献。”而当时的德国国防部长德迈齐埃则表示“虽然心（对军事行动）在说‘是’，但冷静下来的头脑说：随它去。”<sup>⑦</sup>事后，为了弥补这个决定对德国和北约盟友之间造成的矛盾，默克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主动示好，例如加强德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投入以减轻北约负担，但无论如何，这次事件充分显示了德国在处理国际危机事件时，与美国为首的北约之间存在着手段上的差异。

除了对单纯军事手段说“不”，希望通过政治途径引导北约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之外，默克尔政府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还在于对俄罗斯的不同定位。对于德国来说，俄罗斯是重要的战略伙伴，如果可能的话，德国希望能够缓和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甚至试图在 NATO 和俄罗斯之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但从2006年延续至今的反导系统之争充分体现了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深层次的互相不信任。而处于其中的德国，则不得不双面讨好，积极斡旋。2007年，在小布什政府擅自与波兰和捷克两国商议签订双边反导基地协议时，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于2007年3月18日《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中撰文表示对此事的不满。文章指出，美国在东欧国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在欧洲内部引起了争论，必须防止欧洲因此而分裂；美国和俄罗斯都不应倒退到冷战思维中；美国希望通过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对付来自伊

④ 刘惜戈：《使命与能力：德国联邦国防军的转型与域外行动评析》，载刘立群、连玉如（主编）《德国·欧盟·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245页。

⑤ 同上，第246页。

⑥ 魏光启：《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及德美关系研究》，载《德国研究》，2014年，第1期，第41页。

⑦ 郑春荣：《利比亚危机以来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载《德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6页。

朗的威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不能因此在欧洲引发不信任和新的不安全。他强调，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不能成为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原因和借口<sup>②8</sup>。

虽然德国加入了奥巴马政府改弦更张后的欧洲反导系统，但这大部分是因为新的反导体系能够给德国理由拉拢俄罗斯。在2010年里斯本峰会后，默克尔称，奥巴马的反导系统在防御结构上更加“完整”，这使得“已经持续了11年的西方军事战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约28个成员国的政府首脑敞开心扉，邀请曾经的对手俄罗斯共同打造欧洲安全，在军事防御事务上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sup>②9</sup>2010年10月，时任德国外长的韦斯特韦勒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讲话中还说：“眼下美国人和欧洲人就导弹保护伞进行的讨论比我们不久前进行的辩论要走得更远。当时曾建议搞华盛顿和布拉格之间或者华盛顿与华沙之间的双边计划，果真如此，欧洲将产生不同的安全区。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共同的解决方法，其目标是欧洲的共同安全，并且将俄罗斯紧紧纳入进来。这不仅是巨大的进步，而且也是将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置于全新基础之上的一次真正机遇。”<sup>③0</sup>

### 3. 乌克兰危机凸显问题

综上所述，虽然北约对欧洲和德国安全至关重要，德国名义上也是北约核心成员国，但其军费开支、力量、行动意愿都非常薄弱。此次乌克兰危机爆发，德国的北约政策再次

成为焦点，招致一些批评。这是因为，这次特殊的事件能够凸显出德国与美国为首的北约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

①美国重点转移，希望欧洲接手欧洲自身安全问题。奥巴马政府治下的美国正期待战略重心东移，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诉求显著上升，美国有意将北约塑造成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sup>③1</sup>。但与此同时，欧盟债务危机还在影响德国的任务重心，在现有情况下不计成本展开军事行动明显力不从心，因此出现了美国想要“收一收”，德国又不愿意“攻出去”的局面。

②乌克兰对德国和欧盟更具有战略重要性，对美国则一般。与此同时，北约将俄罗斯视作战略敌人，欧盟，尤其是德国则依然试图挽回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期望共同解决危机。

## 三、德国北约政策形成的原因

虽然问题出现，国内外不一样的声音也层出不穷，但默克尔依然坚持在乌克兰事件中保持清醒头脑，贯彻德国一贯的北约政策：即依赖这个机制，希望将北约作为危机解决平台，同时引导这个机制，使之在非军事层面发挥更大作用。联邦国防军可以参与行动，但更多限制在“维稳”和“援助”层面，“单纯军事手段依然是最后手段”。

默克尔在乌克兰事件中坚持这样的北约政策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②8 新浪新闻国际版：《德国担心美国反导系统计划将分裂欧洲》<http://news.sina.com.cn/w/233312544236.shtml>，2014年3月17日。

②9 《时代》杂志在线版：Russland und Nato wollen gemeinsame Raketenabwehr，<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0-11/nato-russland-raketenabwehr>，2010年11月20日。

③0 德国驻华大使馆官方网站：<http://www.china.diplo.de/Vertretung/china/zh/03-pol/aussenpol/grundlinien/rede-dgap-111021-s.html>，2011年10月21日。

③1 魏光启：《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及德美关系研究》，载《德国研究》，2014年，第1期，第41页。

## 1. 克制文化依然在起作用，尤其民心所向

虽然1994年7月12日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扫除了联邦国防军域外行动的障碍，并且德军参与了科索沃和阿富汗的战争，但德国的“克制文化”氛围依然浓厚。上文提到的利比亚战争即是一例。根据《莱比锡人民报》2011年4月初的一份问卷调查，有67%的德国人支持德国投弃权票和不出兵<sup>②</sup>。而在2010年10月，时任德国外长的韦斯特韦勒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讲话，称战胜暴力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对和平的渴望及当地人的和解诚意。就军事力量的使用而言，德国未来仍将坚持克制文化，军事力量是德国的最后选择<sup>③</sup>。在面对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默克尔依然在2014年9月4日召开的北约威尔士峰会上强调，“一方面，我们应当贯彻我们的原则，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关闭与俄罗斯交流的通道”，“我们应致力于找到一条政治解决途径，军事手段是绝对不可取的”<sup>④</sup>。

## 2. 内部财政问题，削减军备开支

2011年，德国颁布的最新《防务政策指导方针》指出，军事行动产生影响深远的政治后果，德国是否应该参加国外军事行动，将来要从德国利益的角度进行权衡<sup>⑤</sup>。而在当前欧债危机还未过去的局势下，德国首先考虑的是国内经济状况。同时，上述“克制文

化”也使德国更重视控制军备投入而不是增大军备支出。在2013年12月份召开的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德国反对欧盟为法国非洲军事行动提供资金，在针对为欧盟共同防务与安全机制提供财政支持一事上，默克尔同样态度暧昧，仅表示“欧盟成员国应在国际问题上保持协调一致”，而回避了“由谁为共同安全政策买单”的实质性问题<sup>⑥</sup>。而在美俄反导系统之争中，德国最终接受奥巴马提出的欧洲反导系统方案，也是因为根据新的方案，反导系统建设大部分使用美国技术与装备，欧洲各国只需承担维护费用与驻军费用，力所能及地提供相匹配的反导装置。据联邦政府预算显示，德国只需为该系统付出2980万欧元。

尽管北约在2002年的布拉格峰会上就通过的标准，规定北约各成员国的军备开支不得低于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但直至今日，德国也才达到1.3%（美国4%，英国2.4%，希腊2.3%，爱沙尼亚2%，法国1.9%，波兰1.8%，土耳其1.8%，克罗地亚1.5%，葡萄牙1.5%和阿尔巴尼亚1.5%）。虽然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在德国议会上就2015年国防财政预算发表讲话时指出，俄罗斯的行为不仅影响到乌克兰，同时会动摇欧洲安全框架的基本原则，并因此要求财政的支持，但最终2015年德国国防支出预算与2014年一致，维持在约323亿欧元。

② 郑春荣：《利比亚危机依赖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载《德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7页。

③ 德国驻华大使馆官方网站：<http://www.china.diplo.de/Vertretung/china/zh/03-pol/aussenpol/grundlinien/rede-dgap-111021-s.html>，2011年10月21日。

④ 德国政府官网：Doppelstrategie ist Schlüssel für Erfolg，<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4/09/2014-09-02-eu-sanktionen-russland.html>，07.09.2014. 2014年9月7日。

⑤ 郑春荣：《利比亚危机依赖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载《德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14页。

⑥ 《焦点》德国在线版：Spitzentreffen in Brüssel: Der Gipfel der offenen Fragen，[http://www.focus.de/finanzen/news/wirtschaftsticker/gesamt-spitzentreffen-in-bruessel-der-gipfel-der-offenen-fragen\\_id\\_3496364.html](http://www.focus.de/finanzen/news/wirtschaftsticker/gesamt-spitzentreffen-in-bruessel-der-gipfel-der-offenen-fragen_id_3496364.html)，2013年12月19日。

### 3. 不愿过度刺激俄罗斯

即使现在北约和俄罗斯的互相不信任已经达到冷战后的顶峰，德国却还是希望能够保持与俄罗斯对话，力图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危机。与美俄之间的战略冲突不同，俄罗斯对于德国来说，一直具有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重要地位。在2013年出台的德国联合执政声明中，德国外交战略部分章节下，德国与俄罗斯“开放的对话和广泛的合作”一节排在“在世界上成为令人信任的伙伴”以及“加强泛大西洋伙伴关系和与北约的联系”两节之后，充分说明俄罗斯在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受重视程度。德国历届领导人、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也都在各种场合谈到俄罗斯对于德国在构建新世界秩序和欧洲安全框架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上述联合执政声明中，德国明确指出，“欧洲的安全只有在与俄罗斯一起构建、而不是反对俄罗斯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sup>③7</sup>。德国现任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也在2013年12月份一次采访中谈到：“德国在解决国际争端的时候需要俄罗斯的合作，此外，由于地缘关系，欧洲有义务、也有责任与俄罗斯保持和谐理智的伙伴关系。”<sup>③8</sup>而在2006年颁布的《德国国防白皮书》中有这样的表述：“欧盟是德国与其他各成员国的政治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保证。德国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巩固和发展欧

洲团结和欧盟对东欧、南高加索、中亚和地中海地区国家积极的睦邻政策来加强欧洲地区的稳定形势。同样重要的是发展和加强与俄罗斯的长期和有活力的伙伴关系。”<sup>③9</sup>

在2014年初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施泰因迈尔指出，“美俄欧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是不可想象的”<sup>④0</sup>。“没有俄罗斯是不行的”，从长期来看，没有俄罗斯的欧洲安全建构是无法想象的<sup>④1</sup>。

除了安全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之外，德俄经贸关系对德国也非常重要。在德国的角色定位中，“贸易国家”同样具有优先属性。德俄不仅仅在经贸关系上存在互补的一面，从能源战略来说，俄罗斯更是德国不能得罪的对象。德国天然能源贫瘠，目前政府又在大力推动能源转型战略，到2020年，德国政府承诺将全面取缔核能发电站，到2050年，德国的传统能源消耗将降低至目前的一半，电力的获取将有80%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起1990年将降低至少80%。然而，在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发掘和利用技术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天然气资源对德国的能源战略不可或缺。2012年10月25日默克尔在德国经济界东方委员会（Ost-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演讲中谈到德俄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认为俄罗斯加入WTO不但对俄罗

③7 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 2013。

③8 Sergej: Russland Heute :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eine Chance für Russland?“ [http://russland-heute.de/politik/2013/12/17/ausserminister\\_steinmeier\\_eine\\_chance\\_fuer\\_russland\\_27353.html](http://russland-heute.de/politik/2013/12/17/ausserminister_steinmeier_eine_chance_fuer_russland_27353.html), 2013年12月17日。

③9 《德国国防白皮书2006》，见：[http://www.bmvg.de/portal/a/bmvg!/ut/p/c4/NYzBCsIwEET\\_aLcVVPCmFFEoehJtb0m6pEubpCTb9uLHmx6cgWHgDYMtZnuIsFXCwasRP9gYPukVtFssJDY9xZ5Y0hRGFh5AeUs6CEEXhtmRz20ITknPpsf39tcRmOBjtpQ84Jw2KkgkRphBl3MgcYybAHTZFWV2Ksvir\\_B5et6pud8f9\\_XF94uTc-Qejr8yc](http://www.bmvg.de/portal/a/bmvg!/ut/p/c4/NYzBCsIwEET_aLcVVPCmFFEoehJtb0m6pEubpCTb9uLHmx6cgWHgDYMtZnuIsFXCwasRP9gYPukVtFssJDY9xZ5Y0hRGFh5AeUs6CEEXhtmRz20ITknPpsf39tcRmOBjtpQ84Jw2KkgkRphBl3MgcYybAHTZFWV2Ksvir_B5et6pud8f9_XF94uTc-Qejr8yc)。

④0 Steinmeier, Frank-Walter: „Ohne Russland geht es nicht“, Beitrag zum Jubiläumsband der 50.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2014. In: Focus 27.01.2014.

④1 Ebenda.

斯，同时对德国也是一个重要里程碑。<sup>④②</sup>

虽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德国外交部措辞强硬，认为俄罗斯“侵占”了克里米亚，是对乌克兰主权的严重侵犯<sup>④③</sup>。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4年3月13日政府声明中措辞严厉，认为俄罗斯的行为是“强权政治”，是“将一己的地缘利益置于理解和合作之上”，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行为模式”，如果俄罗斯继续一意孤行，“迟早会伤害到自身”<sup>④④</sup>。而现任德国国防部长基民盟冯德莱恩则在2014年6月10日的《明镜周刊》采访中指出：“现阶段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伙伴，因为伙伴必须遵守同样的原则。而普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我们的信任。”<sup>④⑤</sup>但与此同时，德国政治精英依然不愿跟俄罗斯的关系彻底搞僵。即使在目前的乌克兰危机环境下，默克尔也一再重申“武力解决是不被接受的”，“应努力通过外交途径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上述冯德莱恩的采访中，在说明俄罗斯现在已经“不是伙伴”的同时，她也补充道：“但俄罗斯也不能成为我们的敌人。”<sup>④⑥</sup>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

1. 德国的北约政策具有一贯相承的特性，即

依赖北约，以北约为安全政策基石，但与此同时，也希望改革北约，使北约按照自己设想的道路发展；

2. 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上述北约政策与美国及其他北约成员国有一定矛盾，主要体现在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上；
3. 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主要在于对俄罗斯战略地位认识的不同、军备支出意愿不同和德国“克制文化”的影响；
4. 目前还看不出德国会因为乌克兰问题对其北约政策做出多大的调整，但迫于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和对德国期待值上升的压力，可能会在表述和态度上有所微调。
5. 乌克兰危机以来的整个过程暴露了德国在欧洲安全认知上与北约其他盟国尤其是与美国有较大差别，而且在安全参与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显得“雷声大雨点小”，也更多强调“软实力”而非硬实力。德国的北约政策虽在原则上与其他北约国家基本一致，但其深层次认知背景和在操作层面上都有一定差异。

作者简介：李微，北京科技大学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④② Merkel, Angela: Rede von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anlässlich der Jubiläumsveranstaltung „60 Jahre Ost-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http://www.bundeskanzlerin.de/ContentArchiv/DE/Archiv17/Reden/2012/10/2012-10-25-merkel-60-jahre-ostausschuss.html>

④③ 以上论断均来自德国外交部官网: Russland Information, [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Laender/Laenderinfos/RussischeFoederation.html](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Laender/Laenderinfos/RussischeFoederation.html)

④④ Merkel, Angela: Regierungserklärung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2014年3月13日。

④⑤ Spiegel-Gespräch: „Russland ist derzeit kein Partner“, [http://www.bmvg.de/portal/a/bmvg/!ut/p/c4/NYu7DsIwEAT\\_yGcLUYSOJA2io0lC5ziWc-CXLpfQ8PHYBbvSFDtaeEJp1Ac6zZii9jDCZPAyf8QcDideaeyig3Namm1yFtOHhnmNTrYoVJ0XII28hY6EhzIpETsa9mJypG4AKTVH0rlfxHfZv72A3duTn1t\\_YBOYTrD-qb-Zw!](http://www.bmvg.de/portal/a/bmvg/!ut/p/c4/NYu7DsIwEAT_yGcLUYSOJA2io0lC5ziWc-CXLpfQ8PHYBbvSFDtaeEJp1Ac6zZii9jDCZPAyf8QcDideaeyig3Namm1yFtOHhnmNTrYoVJ0XII28hY6EhzIpETsa9mJypG4AKTVH0rlfxHfZv72A3duTn1t_YBOYTrD-qb-Zw!)

④⑥ Ebenda.

# Aktiver, globaler, engagierter? Deutschlands Außenpolitik nach der EU-Schuldenkrise<sup>①</sup>

Von Michael Staack

## 1. Einleitung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vom 27. September 2013 hat eine neue, kontroverse Debatte über grundsätzliche Zielsetzungen und inhaltliche Schwerpunkte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eingesetzt. Diese Debatte war überfällig, weil Deutschlands Außenpolitik teilweise „ohne Ziel und Kompass“<sup>②</sup> agiert und sich in ihrem gestalterischen Potenzial über die gesamte vorangegangene Legislaturperiode (2009-2013) hinweg vor allem auf das Management der EU-Schuldenkrise

fokussiert hatte. Obwohl die Erhaltung und Vertiefung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und insbesondere die Etablierung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ls weltpolitischer Akteur *ein*, wenn nicht *das* herausragende Ziel der deutschen Politik darstellt, entspricht eine solche monothematische Verengung nicht dem politischen Gewicht des Landes i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und den Erwartungshaltungen der großen Mehrheit dritter Staaten an Deutschland.<sup>③</sup> Insofern war es logisch, dass sich die im Dezember 2013 neu gebildete Bundesregierung

---

① 此文中译文已刊载于《德国研究》2014年第3期。

② Vgl. Michael Staack, Ohne Ziel und ohne Kompass? Anmerkungen zur neuen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in: ders./ Dan Krause (Hrsg.), Europa als sicherheitspolitischer Akteur, Opladen/Berlin/Toronto 2014, S. 173-199.

③ Bei einer im Jahr 2013 weltweit durchgeführten Umfrage der BBC erreichte Deutschland bei der Frage nach dem Land, das eine größere internationale Rolle spielen sollte, mit 59 % sogar den Spitzenplatz. Vgl. BBC Poll: Germany Most Popular Country in the World, 22.5.2013 ([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2624104](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2624104); Zugriff 7.7.2014). Für eine engagierter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plädierten im Frühsommer 2014 einhellig auch 60 vom Auswärtigen Amt befragte wissenschaftliche Experten. Vgl. Denken für Deutschland.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Jg. 69 (2014), Nr. 4, S. 14-23.

der Großen Koalition eine inhaltlich breiter gefächerte Außen-, Sicherheits- und Entwicklungspolitik zum Ziel setzte. Vor allem der nach einer ersten Amtszeit (2005-2009) erneut ins Amt zurückgekehrte Außen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SPD) und die neue Verteidigungsministerin Ursula von der Leyen (CDU) verknüpften mit dieser Zielsetzung auch einen persönlichen Gestaltungsanspruch.<sup>④</sup> Bemerkenswert ist, dass sich Bundeskanzlerin Merkel an der gesamten Debatte öffentlich nicht beteiligte.<sup>⑤</sup>

In diesem Aufsatz wird die These vertreten, dass der außenpolitische Akteur Deutschland nach der vorläufigen Bewältigung der EU-Schuldenkrise die *Rückkehr zu einer aktiveren, gestaltenden Politik* vollzogen hat. *Europa* bleibt der wichtigste Schwerpunkt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aber *Russland*, *Ostasien* und den *transatlantischen Beziehungen* mit den USA wird ein stärker sichtbarer Stellenwert zukommen. Die wichtigsten außenpolitischen Zielsetzungen des „Handelsstaates Deutschland“<sup>⑥</sup>, nämlich die Gewährleistung wirtschaftlicher Wohlfahrt, die Erhaltung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und der Ausbau einer friedenswahrenden, regelbasierten internationalen Ordnung, bleiben unverändert bestehen. Dagegen ist eine politisch signifikante Zunahme

der deutschen Beteiligung an *Militäreinsätzen* nicht zu erwarten. Ausschlaggebend dafür sind die überwiegend negativen Erfahrungen mit der Wirksamkeit vor allem der Afghanistan-Mission, aber auch des Irak-Krieges und der Libyen-Intervention, obwohl die Bundeswehr an diesen Einsätzen nicht beteiligt war. Weil es durch diese Einsätze nicht oder nur sehr unzureichend gelang, Sicherheit und Wiederaufbau im jeweiligen Einsatzgebiet zu gewährleisten, wurde die Skepsis gegenüber dem Einsatz des militärischen Instruments der Außenpolitik sowohl innerhalb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als auch in dessen gesellschaftlichem Umfeld erneut gefestigt bzw. wieder verstärkt.<sup>⑦</sup>

## 2. Die Debatte über eine „aktiver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Die Auseinandersetzung über eine veränderte, „aktiver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begann nicht mit der Regierungserklärung der wiedergewählten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CDU) am 29. Januar 2014, sondern kurz darauf mit der 50.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31. Januar bis 2. Februar 2014). Nicht die Regierungschefin, sondern Bundespräsident Joachim Gauck gab das Leitmotiv vor, Deutschland solle

④ Steinmeier initiierte unter dem programmatischen Titel „Außenpolitik neu denken“ sogar eine außenpolitische Grundsatzdebatte, mit der die inhaltliche Ausrichtung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zur Diskussion gestellt und überprüft werden sollte. Die Einladung, an dieser Debatte teilzunehmen, richtete sich vor allem an internationale und nationale Experten, aber auch an interessierte Bürger. Vgl. [www.review2014.de](http://www.review2014.de).

⑤ Vgl. Andreas Rinke, Keine Sphinx an der Spree. Was und wie die Bundeskanzlerin außen- und europapolitisch denkt,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Jg. 69 (2014), Nr. 5, S. 118-127.

⑥ Vgl. zu diesem Konzept grundlegend: Michael Staack, *Handelsstaat Deutschland. Deutsche Außenpolitik in einem neu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 Paderborn 2000, S. 15-56.

⑦ Vgl. Julian Junk/Christopher Daase, *Germany*. In: Heiko Biehl u.a. (Hrsg.), *Strategic Cultures in Europe.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ies Across the Continent*, Wiesbaden 2013, S. 139-152.

sich international stärker engagieren. In seiner Grundsatzrede über „Deutschlands Rolle in der Welt“<sup>⑧</sup> plädierte der Bundespräsident dafür, dass sich die Bundesrepublik als ein „Garant internationaler Ordnung und Sicherheit“ verstehen und bei der Bearbeitung internationaler Probleme „früher, entschiedener und substantieller einbringen“ sollte. Deutschland sei überdurchschnittlich globalisiert und es profitiere deshalb überdurchschnittlich von einer „offenen Weltordnung – einer Weltordnung, die Deutschland erlaubt, Interessen mit grundlegenden Werten zu verbinden“. Aus dieser Konstellation leite sich, so Gauck, „Deutschlands wichtigstes außenpolitisches Interesse im 21. Jahrhundert ab: dieses Ordnungsgefüge, dieses System zu erhalten und zukunftsfähig zu machen“. Dieses „Kerninteresse“ in einer sich permanent und grundlegend verändernden Welt erfolgreich zu verfolgen, stelle „die große Herausforderung unserer Zeit“ dar.

Deutschland, so der Bundespräsident, erbringe durch seine 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durch seine Beiträge für eine „ressourcenschonende Zukunft“, durch seine Förderung internationaler Institutionen, durch seine Beteiligung an Militäreinsätzen zur Friedenssicherung und nicht zuletzt durch sein Eintreten für das „Zusammenwachsen Europas“ wichtige Leistungen als „Garant internationaler Ordnung und Sicherheit“. Es könne und solle sich, seinen politisch-diplomatischen, ökonomischen und militärischen Potenzialen entsprechend, aber noch stärker engagieren, z.B. für die „Stabilisierung“

der osteuropäischen oder afrikanischen Nachbarn Europas, ebenso dafür, „neue oder wiedererstarbte Großmächte für eine gerechte Fortentwicklung der internationalen Ordnung zu gewinnen“ oder dann, wenn militärisches Handeln erforderlich sei. Deutschland, so der Bundespräsident, werde „nie rein militärische Lösungen unterstützen“ und stets eine politische Gesamtstrategie fordern, es dürfe in Bezug auf Einsätze der Bundeswehr aber „weder aus Prinzip `nein´ noch reflexhaft `ja´ sagen“. Hilfe dürfe insbesondere dann nicht versagt werden, „wenn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in Völkermord, Kriegsverbrechen, ethnischen Säuberungen oder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münden“. Eine stärkere Wahrnehmung „internationaler Verantwortung“, so Gaucks Schlussfolgerung, sei im deutschen Interesse geboten.

Ganz ähnlich äußerten sich in ihren Reden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und Verteidigungsministerin von der Leyen, die sich mit dem Bundespräsidenten inhaltlich abgestimmt hatten. Der Außenminister kündigte an, dass Deutschland wieder „Impulsgeber“ für eine gemeinsame europäische Außen-, Sicherheits- und Verteidigungspolitik sein und sich bei der Lösung internationaler Krisen stärker engagieren werde.<sup>⑨</sup> Den Einsatz von Militär bezeichnete er als ein „äußerstes Mittel“, das nach wie vor mit Zurückhaltung gehandhabt werden sollte. Allerdings, so der Außenminister weiter, dürfe „eine Kultur der Zurückhaltung... nicht zu einer Kultur des Heraushaltens werden“. Deutschland wäre „zu groß,

---

⑧ Joachim Gauck, Deutschlands Rolle in der Welt. Anmerkungen zu Verantwortung, Normen und Bündnissen. Rede des Bundespräsidenten anlässlich der Eröffnung der 50.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31.1.2014.

⑨ Frank-Walter Steinmeier, Rede des Außenministers anlässlich der 50.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1.2.2014.

um Weltpolitik nur von der Außenlinie zu kommentieren“. Entscheidend sei, „gemeinsam mit anderen intensiver und kreativer darüber nachzudenken, wie wir den Instrumentenkasten der Diplomatie ausstatten und für kluge Initiativen nutzbar machen“ könnten. In ganz ähnlicher Diktion betonte die Verteidigungsministerin, dass „Abwarten“ ebenso wie „Gleichgültigkeit“ angesichts von Krisen und Konflikten „für ein Land wie Deutschland keine Option“ darstelle, und zwar „weder aus sicherheitspolitischer noch aus humanitärer Sicht“.<sup>⑩</sup>

Ein großer Teil der medialen Berichterstattung interpretierte diese Stellungnahmen vor allem als Forderungen nach einer größeren Beteiligung der Bundeswehr an internationalen Einsätzen.<sup>⑪</sup> Auf dieses Thema konzentrierte sich auch die Kritik, nicht zuletzt durch Teile der parlamentarischen Opposition.<sup>⑫</sup> Eine solche Verengung der Forderung nach einer aktiveren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auf das Militärische greift aber zu kurz. Dem Bundespräsidenten, dem Außenminister und der Verteidigungsministerin kam es primär darauf an, für eine Politik zu werben, die zukünftig wieder viel stärker eigene Konzepte, Lösungsinitiativen und direkte Beiträge in allen als außenpolitisch relevant erachteten Politikbereichen und Weltregionen verfolgen sollte. Tatsächlich hatte sich

Deutschland in der zurückliegenden Legislaturperiode nicht nur an der – inhaltlich durchaus gerechtfertigten – „Kultur der militärischen Zurückhaltung“<sup>⑬</sup> orientiert, sondern darüber hinaus eine generelle außenpolitische Zurückhaltung auch in Fragen praktiziert, bei denen es aufgrund seiner Fähigkeiten und seiner Interessenlage wichtige Beiträge leisten konnte.

Als beispielhaft für diese problematische Zurückhaltung kann die deutsche Position zum Bürgerkrieg in *Syrien* genannt werden, dem (von der Europapolitik abgesehen) einzigen außenpolitischen Thema, das im Bundestagswahlkampf 2013 überhaupt eine Rolle spielte. Mit guten Argumenten hatte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hierin unterstützt von der gesamten Opposition, gegen eine militärische Intervention und für eine politische Konfliktlösung ausgesprochen. Sie unterließ es aber, eigene Vorstellungen für eine solche Lösung zu entwickeln und in diplomatischer Abstimmung mit gleichgesinnten Mächten international zu vertreten. Als sich die Assad-Regierung im September 2013 überraschend bereit erklärte, ihre – zuvor höchstwahrscheinlich mehrfach eingesetzten – Chemiewaffen aufzugeben, war die Regierung Merkel/Westerwelle auch nicht bereit, sich an der Vernichtung dieser Waffenbestände zu beteiligen; und zwar ungeachtet der

⑩ Ursula von der Leyen, Rede der Bundesministerin der Verteidigung anlässlich der 50.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31.1.2014.

⑪ Vgl. Malte Lehming, Gaucks Rede. Neue Zeit, neuer Ton, in: Der Tagesspiegel, 1.2.2014, S.1.

⑫ Vgl. Stefan Liebich, Mehr deutsche Soldaten in UN-Friedensmissionen? Nein!, in: Vereinte Nationen, Jg. 62 (2014), Nr. 3, S. 114.

⑬ Vgl. Berthold Meyer, Eine kurze Renaissance der „Kultur der militärischen Zurückhaltung“. In: Detlef Bald u.a. (Hrsg.), Die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 und ihre Streitkräfte. Hamburger Beiträge zur Friedensforschung und Sicherheitspolitik, Nr. 162, Hamburg 2014, S. 21-43.

Tatsache, dass die Bundeswehr über entsprechende Fertigkeiten verfügt. Obwohl eine Vermittlerrolle bei internationalen Konflikten und eine aktive Abrüstungspolitik zu den traditionellen Spezialisierungsvorteilen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gehören und die Vereinten Nationen sich ein entsprechendes Engagement Deutschlands auch in Bezug auf den Syrien-Konflikt erhofften, war die Antwort negativ. Es gehörte zu den ersten Amtshandlungen der neuen Koalition, das an dieser Stelle verfehlte Nichthandeln zu korrigieren und sich an der Vernichtung der syrischen Chemiewaffen zu beteiligen.

Eine Debatte über die Wahrnehmung „internationaler Verantwortung“ durch Bundeswehreinsätze wirkt auch deshalb irritierend oder sogar „pseudorelevant“<sup>14</sup>, weil sie bereits im direkten Anschluss an die deutsche Wiedervereinigung geführt und beantwortet wurde.<sup>15</sup> Die *Grundsatzfrage*, ob die Bundeswehr im Rahmen kollektiver Sicherheitssysteme international eingesetzt werden kann, ist seit dem entsprechenden Urteil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12. Juli 1994) entschieden. In den letzten zwanzig Jahren hat sich Deutschland nahezu am gesamten Spektrum denkbarer Missionen von der Friedenserhaltung bis hin zum Kampfeinsatz beteiligt.<sup>16</sup> Alle Bundestagsfraktionen außer der Fraktion der Link-

spartei halten solche Einsätze prinzipiell für legitim. Dementsprechend muss eine neue, grundsätzliche Debatte über Bundeswehreinsätze auch nicht geführt werden. Tatsächlich geht es um Entscheidungen im Einzelfall, die nach Kriterien wie Erfolgsaussichten, spezifischen deutschen Interessen, Bündnisverpflichtungen oder Bündnisloyalitäten, vorhandenen Fähigkeiten usw. getroffen werden. So war für die Beteiligung der Bundeswehr an den Einsätzen *European Union Training Mission* (EUTM) Mali, *United Nation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Stabilization Mission* (MINUSMA) Mali/Senegal und *European Union Mission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EUFOR CAR) in der Zentralafrikanischen Republik die akute Krisensituation in diesen Staaten ausschlaggebend, noch stärker aber der Wille der neuen Bundesregierung, die in den letzten Jahren vernachlässigte sicherheitspolitische Partnerschaft mit Frankreich als dem wichtigsten Alliierten in Europa wieder zu stärken. Dagegen konnte von einer generellen Hinwendung nach Subsahara-Afrika im Rahmen einer neuen deutschen Afrika-Strategie als handlungsleitendem Motiv nicht die Rede sein.<sup>17</sup> Das wird auch durch den personellen Umfang der deutschen Beiträge deutlich, der auf *bis zu* 250 (EUTM), 80 (MINUSMA) und 150 (EUFOR CAR) Soldatinnen und Soldaten begrenzt

---

<sup>14</sup> Stefan Willeke, König Jochen. In: *Die Zeit*, 31.7.2014, S. 12.

<sup>15</sup> Vgl. Staack, *Handelsstaat Deutschland*, S. 462-524.

<sup>16</sup> Vgl. Ulf von Krause, *Die Bundeswehr als Instrument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Wiesbaden 2013; Hans J. Gießmann/Armin Wagner (Hrsg.), *Armee im Einsatz. Grundlagen, Strategien und Ergebnisse einer Beteiligung der Bundeswehr*, Baden-Baden 2013.

<sup>17</sup> Vgl. Julian Junk, *Vom Gestaltungsunwillen einer „Gestaltungsmacht“ – ein Kommentar zur deutschen Malipolitik*. In: *Sicherheit und Frieden*, Jg. 32 (2014), Nr. 2, S. 91-97.

wurde.<sup>18</sup> Dem entspricht die Festlegung in der Koalitionsvereinbarung von CDU, CSU und SPD, „dass gemeinsame Einsätze zur Wahrung und Stärkung der Sicherheit Europas vorrangig in unserer geographischen Nachbarschaft durchgeführt werden. Einsätze jenseits dieser Nachbarschaft sollten vermehrt regionalen Partnern und Organisationen übertragen werden, beispielsweise der Afrikanischen Union (AU), der Westafrikanischen Wirtschaftsgemeinschaft (ECOWAS).“ Diese und weitere regionale Organisationen sowie „verlässliche Partner vor Ort“ müssten bei der „Übernahme von Verantwortung“ unterstützt werden.<sup>19</sup> Die Region Afrika bildet nach wie vor, weder sicherheits- noch wirtschaftspolitisch, keinen vorrangigen Schwerpunkt deutscher Außenpolitik.<sup>20</sup>

Die nach Afghanistan, Irak und Libyen eingetretene Ernüchterung über die begrenzte Wirksamkeit des militärischen Instruments ist auch kein deutscher *Sonderweg*, sondern derzeit prägend für die mehrheitliche Einstellung in fast

allen westlichen Staaten. Besonders eindrücklich kam diese veränderte Einstellung durch das Votum des britischen Unterhauses gegen eine mögliche Beteiligung des Landes an einer Militärintervention in Syrien (29. August 2013) zum Ausdruck. Ursächlich für diese Ernüchterung sind die sehr begrenzten Erfolge, die besonders bei den großen und lang andauernden, auf *State Building* abzielenden Einsätzen festzustellen waren. So sollte in Afghanistan der Terrorismus bekämpft und Sicherheit hergestellt, eigene Streitkräfte aufgestellt, eine demokratische Verfassungsordnung aufgebaut, die Achtung der Menschenrechte gewährleistet, eine pluralistische Gesellschaft geschaffen und ein Rechtsstaat auf islamischer Grundlage begründet werden.<sup>21</sup> Dafür fehlten, nach über 25 Jahren Bürgerkrieg, von Anfang an wesentliche Voraussetzungen im Land selbst, es fehlte auch an praktikablen Strategien der westlichen Interventionsstaaten und es fehlte an der Bereitschaft dieser Staaten, koordiniert und zielgerichtet vorzugehen.<sup>22</sup> Afghanistan kann daher mit

<sup>18</sup> In allen drei Fällen wurde diese Mandatsobergrenze nicht ausgeschöpft. So nahmen (Stand Juli 2014) an EUFOR CAR nur vier (!) Soldaten teil und die Lufttransportunterstützung im Rahmen von MINUSMA wurde zum 1.7.2014 sogar ganz eingestellt, weil die Flugzeuge der Luftwaffe aus Sicht der Vereinten Nationen für den Betrieb in der Region nicht hinreichend geeignet waren.

<sup>19</sup> 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SPD, 17.12.2013, S. 166-167 ([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_Anlagen/2013/2013-12-17-koalitionsvertrag.pdf#\\_blob=publicationFile](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_Anlagen/2013/2013-12-17-koalitionsvertrag.pdf#_blob=publicationFile), Zugriff 30.7.2014).

<sup>20</sup> Daran hat auch die Verabschiedung neuer „Afrikapolitischer Leitlinien“ durch die Bundesregierung nichts geändert, in denen Afrika als „Kontinent im Aufbruch“ und „riesiger Zukunftsmarkt mit hohem Wirtschaftswachstum“ gewürdigt wird, der bei regionaler Integration und demokratischer Entwicklung vielfältige Fortschritte mache. Vgl. Bundesregierung, Afrikapolitische Leitlinien, Berlin, 21.5.2014.

<sup>21</sup> Vgl. Klaus Naumann, *Der blinde Spiegel. Deutschland im afghanischen Transformationsprozess*, Hamburg 2013.

<sup>22</sup> Vgl. Hans-Georg Ehrhart/Charles Pentland (eds.), *The Afghanistan Challenge: Hard Realities and Strategic Choices*, Montreal/Kensington 2009; Herbert Wulf, *Staatsbildung in Afghanistan: gut gemeint, falsch geplant, schlecht gemacht*. In: Bernhard Rinke u.a. (Hrsg.), *Interventionen Revisited. Friedensethik und Humanitäre Interventionen*, Wiesbaden 2014, S. 191-204.

guten Argumenten als „Interventionsruine“<sup>23</sup> bezeichnet werden.

In der vorläufigen Zwischenbilanz post-bipolar westlicher Interventionspolitik erwies sich *State Building* als ein historischer Prozess, dessen Verlauf beschleunigt, aber nicht auf einen Zeitraum von wenigen Jahren verkürzt werden kann. Wesentlichste Erfolgsbedingung eines solchen externen State Building ist außerdem, dass neben der Herstellung von Sicherheit eine nachhaltige 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im Vordergrund steht. Die Vorstellung, westliche Ordnungskonzepte auf nicht-westliche Gesellschaften übertragen zu können, erwies sich – zum zweiten Mal nach der Entkolonialisierung – als eine liberal-technokratische Illusion.<sup>24</sup> Weitaus erfolgreicher waren hingegen militärische Einsätze mit einem geringeren Ambitionsniveau, z.B. bei der Konfliktprävention bzw. Demilitarisierung in Mazedonien (2001), bei der Absicherung der Präsidentschaftswahlen in der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Kongo (2006) oder beim Schutz vor Piraterie am Horn von Afrika (seit 2010). An allen diesen Einsätzen war oder ist die Bundeswehr beteiligt – mit positiver Bilanz.

Die *zentralen Herausforderungen* für eine aktiv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stellen sich nicht im militärischen Bereich. An erster Stelle steht eine *Konsolidierung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deren wirtschaftlicher und politischer Zusammenhalt

als Folge der EU-Schuldenkrise erheblich beschädigt wurde. Das hat auch direkte Auswirkungen auf Europas Rolle i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denn nicht nur der Gestaltungswille und die Gestaltungsfähigkeiten der Union, sondern auch die Ausstrahlungskraft des europäischen Modells haben signifikant abgenommen.<sup>25</sup> An zweiter Stelle folgt die Notwendigkeit, eine *aktive globale Ordnungspolitik* in einer sich schnell verändernden, multipolar strukturierten Welt zu betreiben, um multilaterale Kooperation zu stärken. Deutschland will insbesondere aufstrebende Mächte für die eigenen liberalen Ordnungsvorstellungen, mindestens aber für Kompromisse zu gewinnen, damit kostenintensive Regelungsdefizite z.B. bei der Klima- oder Handelspolitik vermieden werden können.<sup>26</sup> An dritter Stelle folgt dann der deutsche Beitrag zum Management aktueller Konflikte, z.B. im Nahen und Mittleren Osten (Iran, Israel/Palästina, Syrien, Libanon, Irak usw.). Zur wichtigsten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wurde aber schon unmittelbar nach der Regierungsbildung ein Thema, dessen Krisenanfälligkeit und Eskalationspotenzial auch in Berlin offensichtlich unterschätzt worden war, nämlich der *Ukraine-Konflikt* und, ganz grundsätzlich, die Bewahrung der *gesamteuropäischen Sicherheit* und das Verhältnis zum Nachbarn *Russland*.

---

<sup>23</sup> Stellungnahme der Herausgeber und Herausgeberinnen: Aktuelle Entwicklungen und Empfehlungen. In: Ines-Jacqueline Werkner u.a. (Hrsg.), *Friedensgutachten 2014*, Berlin 2014, S. 24.

<sup>24</sup> Vgl. Susanna Campbell/David Chandler/Meera Sabaratnan (eds.), *A Liberal Peace? The Problems and Practices of Peacebuilding*, London 2011.

<sup>25</sup> Vgl. Thomas Wright, *Europe's Lost Decade*. In: *Survival*, Jg. 55 (2014), Nr. 6, S. 7-28.

<sup>26</sup> Vgl. Bundesregierung, *Globalisierung gestalten – Partnerschaften ausbauen – Verantwortung teilen*, Berlin 2012.

### 3. Ukraine-Krise, Russland-Politik und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

Mit dem Ende des Ost-West-Konflikts 1989/90 haben sich die Rahmenbedingungen für Deutschlands Außenpolitik entscheidend verändert. Die Überwindung von Blockkonfrontation und Hochrüstung, die Demokratisierung der meisten Staaten im bisher sowjetisch dominierten Mittel- und Osteuropa und die Einbindung Russlands in Strukturen kooperativer Sicherheit in Europa hatten für Deutschland einen *fundamentalen Sicherheitsgewinn* zur Folge. Dieser grundlegende Strukturwandel machte aus dem geteilten Land an der Trennlinie der Blockkonfrontation die *zentrale Macht eines zusammenwachsenden Europas*, umgeben nur noch von Partnern unterschiedlicher Nähe: eine Sicherheitslage, in der sich Deutschland in seiner Geschichte noch niemals befunden hatte. Allerdings blieb das ursprünglich angestrebte Ziel, eine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sordnung* zu errichten, unvollendet, weil kein neues gesamteuropäisches System etwa auf der Grundlage der KSZE entstand, sondern nur eine Ostausdehnung der teileuropäischen Organisationen EU und NATO erfolgte. Dennoch war es möglich, unterhalb der Schwelle einer umfassenden, gesamteuropäischen Sicherheitsorganisation kooperative Sicherheitsstrukturen aufzubauen, an denen alle Staaten Europas, die USA und Kanada beteiligt waren.

Der Ukraine-Konflikt kam für die deutsche und europäische Politik in seiner Dimension und den Auswirkungen überraschend. Im Herbst und Winter 2013/14 entwickelte sich aus dem hefti-

gen, auch gewaltförmig ausgetragenen innenpolitischen Streit über die außenpolitische Orientierung der Ukraine eine der *größten Herausforderungen* für die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 nach 1989*. Diese Krise verfügt über das Potenzial, sehr viel oder sogar alles zu zerstören, was im zurückliegenden Vierteljahrhundert an Strukturen kooperativer Sicherheit in Europa aufgebaut worden war. Darüber hinaus droht eine erneute Spaltung des Kontinents, gekennzeichnet durch eine dauerhafte Konfrontation zwisch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d der NATO auf der einen Seite und Russland auf der anderen Seite. Damit waren *grundlegende außenpolitische Interessen* Deutschlands bedroht, nämlich die Wahrung von Frieden und Sicherheit in Europa sowie die Aufrechterhaltung einer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mit der Russischen Föderation. Rückblickend muss festgestellt werden, dass die Risiken der Entwicklung in und um die Ukraine über längere Zeit hinweg nicht hinreichend erkannt wurden (auch in Berlin nicht) und, daraus folgend, das Krisenmanagement auf allen Seiten nicht der Größe der Herausforderung entsprach.<sup>27</sup>

Die Krise innerhalb der Ukraine entfaltete sich seit November 2013 schrittweise und unter ständiger Beteiligung externer Akteure (EU und EU-Mitgliedsstaaten, Russland, USA).<sup>28</sup> Spätestens mit der völkerrechtswidrigen Einverleibung der Krim-Republik durch Russland (18. März 2014) wurde aus dem innenpolitischen ein außen- bzw. geopolitischer Konflikt mit internationalen Auswirkungen. Auslöser für die Krise war die nach langem Abwägen – und Zögern –

<sup>27</sup> Vgl. Lawrence Freedman, Ukraine and the Art of Crisis Management. In: Survival, Jg. 56 (2014), Nr. 3, S. 7-41.

<sup>28</sup> Für einen Überblick: Andreas Heinemann-Grüder, Revolution und Revanche: die Ukraine am Abgrund. In: Werkner, Friedensgutachten 2014, S. 266-282.

Ende November 2013 getroffene Entscheidung des damaligen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Janukowitsch, das nach komplizierten Verhandlungen fertiggestellte Abkommen über eine *Assoziierung* der Ukraine mit der EU nicht zu unterzeichnen. Dieser Entscheidung war erheblicher Druck seitens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d Russlands vorausgegangen. Während die EU, im Vergleich mit anderen Assoziierungsabkommen, auf besonders anspruchsvollen Verpflichtungen bestand, setzte Russland das Nachbarland unter Druck, um es für sein Prestigeprojekt einer *Eurasischen Union* zu gewinnen. Der Mittelweg einer Assoziierung mit beiden Organisationen wurde nicht ernsthaft ausgelotet, vor allem, weil die EU dazu nicht bereit war.<sup>29</sup> Mitursächlich für die Entscheidung Janukowitschs war die russische Bereitschaft, das nahezu bankrotte Land durch kurzfristige Milliarden-Kredite zu unterstützen. Die vorläufige Absage an das Assoziierungsabkommen löste Demonstrationen vornehmlich in Kiew und in den westlichen Landesteilen aus, bei denen auch der Maidan-Platz im Zentrum der Hauptstadt von den Protestierenden besetzt wurde. Waren die Proteste anfangs eindeutig pro-europäisch und auch pro-demokratisch orientiert gewesen, trat seit der Jahreswende 2013/14 die

Forderung nach einem Sturz Janukowitschs und seiner Regierung in den Vordergrund.<sup>30</sup> Im Kontext dieser Entwicklung gewannen politische Kräfte wie der *Rechte Sektor* und andere nationalistische oder sogar faschistische Gruppen an Bedeutung, die eine Annäherung a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und „westliche Werte“ ablehnten und auf eine notfalls gewaltsame Beseitigung der Regierung abzielten.

Rückblickend betrachtet, erwiesen sich die Versuche eines Krisenmanagements durch Janukowitsch und sein Kabinett als politisch katastrophal. Angebote zum Dialog mit der Opposition kamen zu spät und waren wenig glaubwürdig. Der verzweifelte Versuch, den Maidan in Kiew Mitte Februar 2014 durch Sondereinsatzkräfte räumen zu lassen, entwickelte sich zu einem Fiasko mit über 100 Toten.<sup>31</sup> Politisch war es deshalb richtig, dass die Außenminister der drei EU-Staate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Polen direkt im Anschluss an diese Gewaltexzesse gemeinsam in die ukrainische Hauptstadt reisten, um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russischen Sonderbotschafter Lukin einen Weg aus der Krise zu finden, zu deren Lösung die innenpolitischen Kontrahenten offensichtlich nicht in der Lage waren. Tatsächlich gelang es dieser „3+1“-Grup-

---

<sup>29</sup> Vgl. „Deutschland ist für uns da“. Gespräch mit dem ukrainischen Außenminister Pawlo Klimkin, in: *Die Zeit*, 17.7.2014, S. 5; Neil MacFarlane/Anand Menon, *The EU and Ukraine*. In: *Survival*, Jg. 56 (2014), Nr. 3, S. 95-101; Verheugen zur EU-Russlandpolitik. Warum Helmut Schmidt irrt, in: *Spiegel Online*, 19.5.2014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ukraine-krise-helmut-schmidt-von-ex-eu-kommissar-verheugen-kritisiert-a970150.html>); Zugriff 20.6.2014).

<sup>30</sup> Vgl. Katerina Malygina, *Die Ukraine nach dem EU-Gipfel in Vilnius: Nichtunterzeichnung des Assoziierungsabkommens, Polizeigewalt und Radikalisierung der Massenproteste*. In: *Ukraine-Analysen*, Nr. 125, 10.12.2013 (<http://www.laender-analysen.de/ukraine/pdf/UkraineAnalysen125.pdf>); Zugriff 21.7.2014).

<sup>31</sup> Ob für diese Todesfälle Sicherheitskräfte der Regierung oder militante Teile der Protestbewegung verantwortlich sind, wurde (bis August 2014) noch nicht geklärt. Eine unabhängige Untersuchung fand bisher nicht statt.

pe, die ukrainische Regierung und die 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an einen Tisch zu bringen und ein Ergebnis zu vermitteln: die Wiedereinführung der Verfassung aus dem Jahr 2004, danach innerhalb von zehn Tagen die Bildung einer Regierung der nationalen Einheit, vorgezogene Präsidentschaftswahlen noch 2014, Beendigung der Besetzung von öffentlichen Gebäuden und Plätzen, Gewaltverzicht und Abgabe von illegaler Bewaffnung (20. Februar 2014).<sup>32</sup> Diese Vereinbarungen wurden innerhalb von 24 Stunden zur Makulatur, weil die Protestierenden auf dem Maidan die Ergebnisse nicht akzeptierten und deren gewaltbereiter, rechtsgerichteter Teil mit der Erstürmung des Präsidenten- und Regierungssitzes drohte. In dieser Situation floh Janukowitsch auf abenteuerliche Weise aus dem Land, dessen demokratisch gewählter Präsident er immer noch war. Auf die Unterstützung seiner *Partei der Regionen*, vor allem aber seiner Sicherheitskräfte konnte er sich nicht mehr verlassen. Die Flucht Janukowitschs definierte die politische Konstellation neu. Erst seine Flucht nach Russland, nicht eine Intervention westlicher Staaten, machte den nachfolgenden Umsturz in Kiew möglich. In dieser Situation verzichtete die Europäische Union darauf, eine Umsetzung des von ihr mitausgehandelten Kompromisses zu verlan-

gen – mit Blick auf die nachfolgende Entwicklung ein schwerwiegender Fehler.

Nachdem die Mehrheit der bisherigen Regierungspartei zur Opposition übergelaufen war, wurde Janukowitschs Abwahl ebenso möglich wie die Einsetzung eines Übergangspräsidenten (Turtschinow) und eines interimist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Jazenjuk).<sup>33</sup> Die neue Regierung stützte sich lediglich auf die *Vaterlandspartei* der früheren Ministerpräsidentin Timoschenko, die nationalistische *Swoboda*-Partei und den *Rechten Sektor*. Die pro-europäische *Udar*-Partei des früheren Boxweltmeisters Klitschko trat dem Kabinett nicht bei. Zu den ersten, wenig später nicht zuletzt auf Druck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zurückgenommenen Ankündigungen der neuen Machthaber gehörte die Aufhebung eines Gesetzes, mit dem das Russische als zweite Landessprache eingeführt worden war. Der neuen Regierung fehlte die *strategische Einsicht*, dass sie sich nicht nur auf den Westen des politisch gespaltenen Landes stützen konnte, sondern auch um den Osten bemühen musste. Gestützt auf einen Umsturz mit zweifelhafter verfassungsrechtlicher Basis, massenhafte parlamentarische Überläufer und ohne echtes demokratisches Mandat, war die rechtliche und politische Legitimation der Übergangsregierung von Anfang an

<sup>32</sup> Vgl. Auswärtiges Amt, Agreement on the Settlement of Crisis in Ukraine, 21.2.2014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cae/servlet/contentblob/671348/publicationFile/190025/140221-UKR-Erklaerung.pdf>; Zugriff 21.7.2014).

<sup>33</sup> Die Amtsenthebung Janukowitschs erfolgte im Widerspruch zur Verfassung der Ukraine. Diese sieht in Art. 111 vor, dass vor einer Amtsenthebung des Präsidenten eine Untersuchung der gegen ihn vorgebrachten Anschuldigungen durch das Verfassungsgericht erfolgen muss und auf der Grundlage eines entsprechenden Berichts die Zustimmung von mindestens drei Vierteln der gesetzlichen Abgeordnetenzahl für eine Amtsenthebung erforderlich ist. Das Verfassungsgericht wurde nach dem Umsturz von der Rada, dem ukrainischen Parlament, abgesetzt.

schwach. Hinzu kam, dass Korruption, Miss- und Vetternwirtschaft die erst vier Jahre zurückliegende Amtszeit der ehemaligen Regierungschefin Timoschenko (Vaterlandspartei) fast ebenso stark gekennzeichnet hatten wie es nachfolgend unter Janukowitsch und seiner Gefolgschaft der Fall gewesen war. Die Erinnerung an die neo-patriomiale Herrschaftspraxis dieser sogenannten Reformkräfte war und ist in der Ukraine präsent geblieben. Die Bundesregierung hatte deshalb, im Gegensatz zu den USA und einigen anderen EU-Staaten, seit einiger Zeit politischen Abstand von Timoschenko gehalten und für die Zukunft des Landes eher neue politische Kräfte wie die *Udar*-Partei favorisiert.

Mit der Abspaltung der Halbinsel Krim von der Ukraine, der nachfolgenden Eingliederung in die Russische Föderation und der gewaltsamen Einmischung Russlands in sein Nachbarland

wurde aus dem innerukrainischen ein internationaler Konflikt.<sup>34</sup> Die Einverleibung der Krim, aber auch die Destabilisierung der Ukraine durch russisch unterstützte Milizen war zweifelsfrei völkerrechtswidrig. Das internationale Recht beruht auf den Prinzipien der *Souveränität*, *Nichteinmischung* und *territorialen Integrität* und kennt kein Recht zur *Sezession* von einem Staat gegen den Willen dieses Staates.<sup>35</sup> Daran hatte auch die durch eine Militärintervention der NATO ermöglichte Sezession des Kosovo-Gebiets von Serbien (1999) und die Anerkennung der Unabhängigkeit des Kosovo durch die meisten westlichen Staaten (2007) nichts geändert. Völkerrechtlich gesehen, handelte es sich beim Kosovo um einen Sonderfall bzw. einen *Regelbruch*, durch den keine neue Regel begründet wurde. Die Berufung Russlands auf diesen Verstoß gegen das Völkerrecht beim Georgien-Konflikt 2008 (Sezession Abchasiens

---

<sup>34</sup> Die Frage nach den Beweggründen der russischen Führung für diese Politik und nach ihrer Einschätzung möglicher Folgewirkungen kann an dieser Stelle nicht diskutiert werden. Es spricht aber vieles dafür, dass Präsident Putin vom Umsturz in der Ukraine überrascht wurde und sich kurzfristig dafür entschied, die – aus seiner Sicht definierten – russischen Interessen durch die Annexion der Krim und die damit verbundene Kontrolle des Flottenstützpunkts Sewastopol zu wahren, also im Sinne einer geopolitischen Großmachtstrategie zu handeln. Mitentscheidend dafür dürfte auch das Bestreben gewesen sein, das innenpolitische Prestige des Präsidenten als „starker Führer“ ebenso wie das nationale Prestige Russlands aufrecht zu erhalten, was bei einer Hinnahme der Veränderungen in Kiew nicht der Fall gewesen wäre. Angesichts zahlreicher Konflikte bzw. der Nichtberücksichtigung russischer Interessen durch den Westen in der Vergangenheit (z.B. Kosovo, Raketenabwehr, NATO-Erweiterung, Libyen- und Syrien-Konflikt) trat, folgt man dieser Lesart, die schwerwiegende Beschädigung der Kooperation mit EU, USA und NATO hinter das innenpolitisch motivierte Streben nach Behauptung der eigenen Machtposition zurück. Einen „Masterplan“ Putins zur Wiedererrichtung der Sowjetunion gab – und gibt – es nicht. Die Politik der russischen Führung war insofern defensiv motiviert, wirkte aber offensiv und verursachte einen weitreichenden Vertrauensschaden nicht nur im westlich-russischen Verhältnis, sondern für die Reputation Russlands i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insgesamt. Vgl.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n Strategic Studies, *Russia's Motives in Ukraine*. Strategic Comments, Jg. 20 (2014), Nr. 19, Mai 2014.

<sup>35</sup> Vgl. Christian Schaller, *Sezession und Anerkennung. Völkerrechtliche Überlegungen zum Umgang mit territorialen Abspaltungsprozessen*, SWP-Studie, Berlin 2009.

und Südossetiens) und in der Krim-Krise zeigt, welche unerwünschten Folgewirkungen die Akzeptanz eines solchen Regelbruchs zur Folge haben kann.

Die Aufnahme der Krim-Republik in die Russische Föderation bedeutete für die USA und die Europäische Union einen „Tabubruch“<sup>36</sup>, denn zum ersten Mal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hatte sich ein europäischer Staat das Territorium eines anderen europäischen Staates einverleibt und mittels Gewaltandrohung die Grenzen verschoben. Auf diese schwerwiegende Verletzung internationaler Ordnungsprinzipien antwortete der Westen mit der Ankündigung von Sanktionen, die – abhängig von der Entwicklung der russischen Politik – in drei Stufen verhängt werden sollten. Im unmittelbaren Anschluss an die Annexion der Krim traten Maßnahmen der ersten und zweiten Stufe in Kraft, die eine Einschränkung von politisch-diplomatischen Kontakten (u.a. die Suspendierung der Teilnahme Russlands an den G8-Treffen, die Absage der nächsten G8-Konferenz im russischen Sotschi sowie der deutsch-russisch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 sowie Einreiseverbote und Kontosperrungen gegen russische Politiker, Militärs und Wirtschaftsführer beinhalteten. Auf Wirtschaftssanktionen, die „dritte Stufe“, wurde zunächst verzichtet, um den Weg zu einer Verhandlungslösung mit Russland offen zu halten. Außerhalb des Westens fand diese Sanktionspolitik in der internationalen Staatengemeinschaft kaum Unterstützung.

Die Besetzung von Teilen der Ostukraine

durch bewaffnete Separatisten beantwortete die Regierung in Kiew mit einer militärischen „Anti-Terror-Operation“, allerdings ohne den vorangegangenen Versuch eines politischen Dialogs. Die Eskalationsspirale konnte vorübergehend durchbrochen werden, nachdem Russland ein von den Separatisten am 11. Mai 2014 durchgeführtes Referendum zur Abspaltung der Regionen Donezk und Slawjansk nicht anerkannte. Zur vorsichtigen Entspannung trug auch die Mitte Mai 2014 erfolgte Einrichtung von *Runden Tischen* unter der Schirmherrschaft der OSZE bei, die auf nationaler und regionaler Ebene den Dialog zwischen den unterschiedlichen politischen Lagern (aber unter Ausschluss der bewaffneten Separatisten) organisieren sollten. Diese Einrichtung ging auf einen Vorschlag der Bundesregierung zurück und der deutsche Spitzendiplomat Ischinger übernahm im Auftrag der OSZE gemeinsam mit dem früheren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Kutschma den Vorsitz des zentralen Runden Tisches. Ein weiterer wichtiger Schritt zur Deeskalation erfolgte, als am 25. Mai 2014 der u.a. von *Udar* unterstützte Oligarch Petro Poroschenko bereits im ersten Wahlgang mit 55 % der Stimmen zum neuen Präsidenten gewählt wurde, während die anti-russische Kandidatin Timoschenko nur zwölf Prozent erhielt. Poroschenko war Außenminister in der Regierung Timoschenko gewesen, aber auch Wirtschaftsminister unter Janukowitsch. Russland erkannte seine Wahl zwar nicht förmlich an, machte aber deutlich, dass es die neue Führung als Verhandlungspartner akzeptieren würde.

<sup>36</sup> Andreas Rinke, Wie Putin Berlin verlor. Moskaus Annexion der Krim hat die deutsche Russland-Politik verändert,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Jg. 69 (2014), Nr. 3, S. 33.

Am 5. Juni 2014 kam es am Rande der Feierlichkeiten anlässlich des 70. Jahrestages der alliierten Landung in der Normandie zu einer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vermittelten ersten persönlichen Begegnung Poroschenkos mit Präsident Putin. Erstmals seit Beginn der Krise traf Putin auch direkt mit Merkel, US-Präsident Obama, dem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en Hollande und dem britischen Premierminister Cameron zusammen. Die vorsichtigen Hoffnungen auf eine weitere Deeskalation des Konflikts zerschlugen sich, nachdem die ukrainische Regierung einen Waffenstillstand mit den Separatisten Ende Juni 2014 nicht verlängerte bzw. ihre „Anti-Terror-Operation“ nachfolgend intensivierte und es am 17. Juli 2014 zum Abschuss des Flugzeugs MH 17 der *Malaysian Airlines* kam, bei dem alle 298 Passagiere getötet wurden. Für diesen Abschuss waren höchstwahrscheinlich die Separatisten verantwortlich. Auf die Forderungen von EU und USA an Moskau, diesen entgegenzutreten und insbesondere Nachschub und Ausbildung aus Russland zu unterbinden, reagierte die russische Führung aus westlicher Sicht wiederum nur unzureichend, weshalb nun Wirtschaftssanktionen der „dritten Stufe“ in Kraft traten. Diese beinhalteten eine Erschwerung des Zugangs staatlicher russischer Banken zu den EU-Finanzmärkten, ein Verbot künftiger Waffenexporte, ein Ausfuhrverbot für Hochtechnologieprodukte und Exportbeschränkungen für Spezialanlagen zur Ölförderung. Nachdem Ende August 2014 offensichtlich wurde, dass russische Militäreinheiten direkt in die Kämpfe in der Ostukraine beteiligt waren, erfolgte eine weitere Verschärfung der Sanktionen.

Für Deutschland stellte die Krim- bzw. Ukraine-Krise eine fünffache Herausforderung dar: *Erstens* konnte es als ein Staat, der einer regelbasierten internationalen Ordnung verpflichtet ist, das völkerrechtswidrige Handeln Russlands nicht hinnehmen. *Zweitens* sah es die gesamte Sicherheitsordnung in Europa bedroht. *Drittens* gehörte eine besondere Partnerschaft mit Russland seit dem Ende des Ost-West-Konflikts zu den Grundlagen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und auch diese stand auf dem Spiel. *Viertens* lag es im deutschen Interesse, die Ukraine in ihrer Staatlichkeit zu erhalten und eine weitere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Destabilisierung des sich am Rande des Staatszerfalls bewegenden Landes zu verhindern. Und *fünftens* kam es darauf an, eine gemeinsame Position der EU und der USA zu finden, um Russland entgegenzutreten, es aber auch wieder an den Verhandlungstisch bringen zu können.

Seit dem Ende des Ost-West-Konflikts ist das vereinte Deutschland mit der Russischen Föderation in einer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verbunden. Sicherheit in Europa, so ein Grundsatz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könne nur *mit* und nicht *ohne* oder *gegen* Russland erreicht werden.<sup>37</sup> Dementsprechend hat sich Deutschland in den zurückliegenden 23 Jahren immer wieder für eine möglichst intensive Ein- und Anbindung Russlands an westliche Institutionen wie EU, NATO und G 7/8 eingesetzt. Bis zur Krim-Krise war Deutschland im Westen stets der wichtigste Unterstützer legitimer russischer Interessen. Umgekehrt betrachtete die jeweilige russische Führung die Bundesregierung als ihren wichtigsten westlichen

---

<sup>37</sup> Diese wiederkehrende Formulierung findet sich auch im Koalitionsvertrag 2013, S. 170.

Partner neben und zeitweise auch vor den USA. Zentrale Grundlagen für dieses gute Verhältnis waren eine zunehmende wirtschaftliche Verflechtung, die deutsche Wertschätzung des russischen/sowjetischen Beitrags zur deutschen Vereinigung sowie die Versöhnung zwischen beiden Völkern nach den Gräuel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Obwohl politische Differenzen zwischen beiden Seiten während der zweiten Präsidentschaft Putins (seit 2012) zugenommen hatten, änderte dies nichts an den zentralen Axiomen. Ein weiteres grundlegendes außenpolitisches Ziel Deutschlands besteht in der Gestaltung einer multipolaren internationalen Ordnung, in der die Europäische Union sich gegenüber den USA und China erfolgreich behaupten kann. Angestrebt wird eine *möglichst enge Verflechtung* mit Russland als Voraussetzung für einen größeren europäischen Einfluss in der Welt. Demzufolge hat Deutschland kein irgendwie denkbare Interesse an einer neuen Spaltung Europas. Deshalb legte es – gemeinsam mit Frankreich und Spanien – im Jahr 2008 sein Veto gegen eine rasche Einleitung der grundsätzlich dennoch zugesagten NATO-Erweiterung um die Ukraine und Georgien ein, wie sie damals von der Bush-Administration mit großem Nachdruck betrieben wurde. An der Sachlogik, die diesem Veto zugrunde lag, hat sich seither nichts geändert.

Gemessen am Verhältnis zu Russland, waren Deutschlands Beziehungen zur Ukraine immer nachrangig. Dafür war nicht nur die Bedeutung der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mit der Russischen Föderation ausschlaggebend, sondern ebenso eine nüchterne Einschätzung der ökonomischen und politischen Entwicklung der Ukraine selbst. Seit Beginn der 1990er Jahre unterhält Deutsch-

land in Kiew eine große Beratergruppe zur Wirtschaftsreform und unterstützte Transformationsprozesse in der Ukraine auch auf vielfältige andere Weise. Im Vergleich zu den östlichen EU-Mitgliedsstaaten, aber auch zur Russischen Föderation fiel die Ukraine jedoch immer weiter zurück. Ungeachtet ihrer „pro-westlichen“ oder „pro-russischen“ Orientierung zeichneten sich alle ukrainischen Regierungen seit der Unabhängigkeit (1991) durch ein sehr hohes Maß an *bad governance* aus, verursacht durch ein politisch wie wirtschaftlich von Oligarchen-Cliquen dominiertes Herrschaftssystem. Gleichwohl traten alle Bundesregierungen seit der Schaffung der *Östlichen Partnerschaft* dafür ein, die Ukraine mit einem Assoziierungsabkommen a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zu binden. Die *Östliche Partnerschaft* wurde nicht als *Vorbereitung*, sondern als *Ersatz* für eine Beitrittsperspektive konzipiert.

In dem Maße, in dem die Spannungen in der Ukraine eskalierten, übernahm Deutschland die westliche *Führungsrolle beim Krisenmanagement*. Ausschlaggebend dafür waren seine oben umrissenen besonderen außenpolitischen Interessen und seine besonders intensiven Beziehungen zur russischen Führung, aber auch die Bereitschaft der Obama-Administration, dem wichtigsten EU-Mitgliedsstaat eine solche Führungsrolle zu überlassen. Die Bundesregierung bemühte sich um eine enge Abstimmung mit Paris und Warschau ebenso wie mit Washington. Innerhalb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verfolgte sie einen mittleren Kurs zwischen Staaten wie Frankreich und Italien auf der einen Seite, die die Bedeutung ihrer Wirtschaftsbeziehungen zu Russland betonten, und Polen, den baltischen Staaten oder Schwed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die sich direkt

bedroht fühlten, eine Rückkehr Russlands zu imperialer Politik diagnostizierten und eine entschiedene Antwort des Westens verlangten.

Die deutsche Diplomatie zielte darauf ab, die Eskalation des Konflikts zu verhindern, die Ukraine politisch sowie wirtschaftlich zu stabilisieren und Russland für eine Rückkehr zu kooperativer Politik zu gewinnen. Als Instrument dazu dienten klar formulierte und kommunizierte Forderungskataloge, die vor allem eine Beendigung der russischen Destabilisierungsstrategien gegenüber der Ukraine beinhalteten. Ein Eingehen Moskaus auf diese Forderungen sollte auch zu einer Rücknahme der Sanktionen führen können. Während die Bundesregierung in den ersten Wochen nach der Annexion der Krim für diese Strategie innerhalb der EU teilweise noch stark kritisiert wurde, fand dieses Vorgehen nachfolgend große Akzeptanz. Das Hauptziel des neugewählten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Poroschenko, die Eröffnung einer EU-Beitrittsperspektive für sein Land, stand für die deutsche Diplomatie ebenso wenig auf der Tagesordnung wie eine Mitgliedschaft der Ukraine in der NATO. An dieser Stelle unterschieden sich auch Deutschland und die USA signifikant: für Berlin hatte die Wiedereinbindung Russlands bei Stabilisierung der Ukraine Vorrang, während Washington seine geopolitische Einflussosphäre insbesondere durch die Integration Kiews in die NATO ausdehnen wollte. Auch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war klar, dass es selbst nach einer Erfüllung aller westlichen Forderungen durch die

russische Führung keine Rückkehr zum *business as usual* geben konnte. Sie teilte nicht die alarmistische Analyse, dass Präsident Putin das sowjetische Imperium restaurieren wolle, betrachtete Russland aber als eine bedingt berechenbare, grundlegende Regeln der internationalen Ordnung nicht mehr respektierende Macht, die nur noch eingeschränkt als Kooperationspartner zu betrachten sei.

Ob die Politik Deutschlands in der Ukraine-Krise erfolgreich sein wird, ist Ende August 2014 nicht abzusehen. Die Bemühungen um eine kooperative Lösung stoßen auch deshalb an Grenzen, weil dem aktuellen, ohnehin komplexen und zugespitzten Konflikt eine noch bedeutsamere Konfliktformation zugrunde liegt. Die außenpolitische Dimension der Ukraine-Krise ist unmittelbar mit dem ungelösten konzeptionellen Konflikt zwischen *gesamteuropäisch und teileuropäisch organisierter Sicherheit* verknüpft. Der ursprüngliche Versuch, nach 1989/90 ein neues gesamteuropäisches Sicherheitssystem auf der Grundlage der KSZE zu schaffen, wurde als Ergebnis einer veränderten westlichen Politik seit 1993/94 durch die Osterweiterung des Militärbündnisses NATO ersetzt, also durch die teileuropäische Erweiterung einer teileuropäischen Organisation unter Ausklammerung Russlands.<sup>38</sup> Spätestens zu dem Zeitpunkt, als sich die NATO auch für ehemalige Teilrepubliken der Sowjetunion öffnete (die baltischen Staaten ausgenommen), setzte eine *Integrationskonkurrenz* zwischen der NATO und Russland ein. Diese Integrationskonkurrenz

---

<sup>38</sup> Vgl. Michael Staack, NATO-Erweiterung und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 – Ein Zielkonflikt für Deutschlands Außenpolitik?, in: Die Friedens-Warte, Jg. 72 (1997), Nr. 3, S. 273-286.

wurde seit 2007, der Etablierung der *Östlichen Partnerschaft* der EU, auf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Russischen Föderation un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usgedehnt.<sup>39</sup>

Nachdem sich der Westen auf die Öffnung der NATO für neue Mitglieder festgelegt hatte, konnte Deutschland unter der Führung Bundeskanzler Kohls durchsetzen, dass dieser Prozess durch eine enge Partnerschaft Moskaus mit der Allianz begleitet werden sollte, festgeschrieben in der *NATO-Russland-Akte von 1997*.<sup>40</sup> In dieser Akte ist auch festgelegt, dass die Allianz keine dauerhaften Truppenstationierungen in den neuen NATO-Mitgliedsstaaten vornehmen wird. Gleichwohl wurde in den USA und im Bündnis insgesamt in den folgenden Jahren immer stärker eine Denkrichtung dominant, die Russland nicht als Partner, sondern als Rivalen betrachtete, dessen politischer Wiederaufstieg verhindert werden müsste. Daraus resultierte für Russland ein *Sicherheitsdilemma*, denn es sah sich nicht respektiert und politisch marginalisiert.<sup>41</sup> Auch das deutsche Eintreten für eine gleichberechtigte Partnerschaft mit Russland wurde unter Bundeskanzlerin Merkel nicht mehr so deutlich verfolgt wie das unter ihren Vorgängern Kohl und Schröder der Fall gewesen war. Die weitestreichende Lösung, eine Mitgliedschaft Russlands in der Allianz,

wurde gelegentlich von deutschen Politikern vorgeschlagen, aber nicht ernsthaft verfolgt. Bereits damals, so der frühere Staatssekretär des Auswärtigen Amts, Ischinger, „hätten wir den Schluss ziehen müssen, dass es nicht möglich sein würde, die NATO-Erweiterungspolitik fortzusetzen, ohne eine schwere Krise mit Moskau heraufzubeschwören. Logischerweise hätten wir die ... mögliche ukrainische oder georgische NATO-Mitgliedschaft ... auf Eis legen müssen.“<sup>42</sup> Im Ergebnis blieb der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sgewinn durch die NATO-Erweiterung zumindest suboptimal. Kritiker wie George F. Kennan, US-amerikanischer Diplomat und intellektueller Begründer der Eindämmungspolitik gegenüber der Sowjetunion, der den Entschluss der NATO zur Osterweiterung als „the most fateful error of American policy in the entire post-cold-war era“<sup>43</sup> bezeichnet hatte, konnten sich in ihrer Argumentation bestätigt fühlen.

Ein mit dem Konzept gesamteuropäischer kooperativer Sicherheit vereinbarer Ausweg aus der Integrationskonkurrenz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m Westen kann nur erreicht werden, wenn (1) der außenpolitische Status der Ukraine einvernehmlich definiert und (2) die Russische Föderation, wie in den 1990er Jahren versprochen, als gleichberechtigter Partner anerkannt wird. Während

<sup>39</sup> Vgl. Samuel Charap/Mikhail Troitskiy, Russia, the West and the Integration Dilemma. In: *Survival*, Jg. 55 (2013), Nr. 6, S. 49-62.

<sup>40</sup> Vgl. Wolfgang Ischinger, Baumängel am „gemeinsamen Haus“. Warum die Anbindung Russlands an den Westen gescheitert ist,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Jg. 69, Nr. 3, S. 19-21.

<sup>41</sup> Vgl. Regina Heller, Subjectivity Matters. Reconsidering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In: Roger E. Kanet/Maria R. Freire (eds.) *Russia and European Security*, Dordrecht 2012, S. 45-78.

<sup>42</sup> Ischinger, Baumängel, S. 20.

<sup>43</sup> George F. Kennan, A Fateful Error, in: *New York Times*, 5.12.1997 (<http://web.archive.org/web/19970501051048/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gknato.htm>; 21.7.2014).

der Westen nicht umhin kommen wird, Russland mit seinen legitimen Eigeninteressen zu respektieren, muss Russland zur Achtung grundlegender internationaler Verhaltensstandards wie der im Völkerrecht verankerten territorialen Integrität der Staaten zurückkehren. Falls am Primat gesamteuropäischer Sicherheit ausgerichtete Lösungsansätze.<sup>44</sup> nicht erfolgreich sein werden und der teileuropäische Lösungsansatz weiter dominiert, droht die Verfestigung einer Konfliktkonstellation, aus der sich neue, gefährliche Krisen entwickeln können. Deutschland hat, wie hier dargestellt, ein überragendes Interesse daran, dass Sicherheit in ganz Europa kooperativ und unter Einschluss Russlands organisiert wird. Für eine solche Politik im Westen einzutreten und Russland dafür zu gewinnen, stellt eine herausragende Gestaltungsaufgabe dar, vergleichbar mit der Vertiefung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Der strategische Gewinn für die Zentralmacht Europas wäre aber immens. In diese Richtung gehende Schritte und weitergehende Lösungsoptionen können aber erst dann verwirklicht werden, wenn Russland seine völkerrechtswidrige Destabilisierungsstrategie gegenüber der Ukraine aufgibt. Setzt Russland seinen Konfrontationskurs weiter fort, könnte sich das Fenster zur Kooperation vorerst auch ganz schließen.

#### **4. Von der EU-Schuldenkrise zur Re-Integratio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Das Eintreten für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gehört zu den zentralen Grundlagen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Durch diesen Integrationsprozess wurde zwischenstaatliche Gewalt als Mittel der Konfliktaustragung überwunden und es konnte sich zunächst im Westen, nach 1989 auch in der Mitte und im Südosten Europas eine *Friedensgemeinschaft* herausbilden. Im Rahmen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wuchs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u einem gleichberechtigten Mitglied des internationalen Systems heran und erwarb sich – trotz einiger fortbestehender Vorbehalte bei europäischen Nachbarn – ein Vertrauenskapital, das die deutsche Vereinigung (1990) erst ermöglichte. Nach der Wiedergewinnung der deutschen Einheit sorgte die Vertiefung der Integration dafür, dass die territorial und von der Einwohnerzahl her größer gewordene, nach der Bewältigung der Einigungsprobleme auch wirtschaftlich erstarkte *Regionalmacht* Deutschland Europa-verträglich blieb. Im beginnenden 21. Jahrhundert trat schließlich das Rational hinzu, Europa als *eigenständigen Pol* bzw. als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 handlungsfähigen Akteur in einer zunehmend multipolaren Welt zu etablieren: eine Funktion und Aufgabe, die keiner der Nationalstaaten der EU mehr aus eigener Kraft erfüllen konnte.

Über einen sehr langem Zeitraum hinweg, und ganz besonders unter der Kanzlerschaft Helmut Kohls (1982-1998), verstand sich die CDU – mehr noch als die CSU – als die deutsche Europapartei. Als außenpolitisches Fernziel wurde ein föderativer Zusammenschluss angestrebt,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Europa. Erst nachdem

---

<sup>44</sup> Vgl. Wolfgang Zellner et al., *Toward a Euro-Atlantic and Eurasian Security Community. From Vision to Reality*, Hamburg/Paris/Moscow,Warsaw 2012.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n seinem Urteil zum Vertrag von Maastricht (1993) die Erhaltung eines substanziellen Kerns deutscher Staatlichkeit als finale Schranke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spolitik benannt hatte, rückten sowohl die Union als auch die von ihr getragene Bundesregierung von diesem Fernziel ab, bekannten sich aber – wie SPD und Grüne – zu einer inhaltlichen Vertiefung der Union.<sup>45</sup> Diese *europäische Grundorientierung*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wurde im Kontext der seit Ende 2009 heraufziehenden EU-Schuldenkrise sowohl innerhalb Deutschlands als auch international in Zweifel gezogen. Deutschlands wirtschaftliches Erstarken nach den Krisen der 1990er Jahre hatte „die Dominanz des Landes in Europa in nachdrücklicher, aber auch in gefährlicher Weise bestätigt und noch ausgeweitet“: „Durch die wirtschaftliche Suprematie Deutschlands auf dem Kontinent, so wird befürchtet, könnten alle anderen europäischen Staaten in ein Abhängigkeitsverhältnis geraten, das sich dann auch ins Politische verlagere.“<sup>46</sup>

Seit der Ankündigung des EZB-Präsidenten Draghi, „das Erforderliche“ zu tun, um den Euro zu stützen, hat sich die europäische Währung stabilisiert. Die Folgewirkungen der EU-Schuldenkrise (ökonomisch fundierte Aufwertung der deutschen Führungsposition; Auseinanderdriften der Eurozone zwischen „reichen“ und „armen“ Ländern, „Norden“ und „Süden“; hohe Staatsverschuldung; Vertiefung der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schen Zusammenarbeit, aber auch unzureichende Regulierung des krisenauslösen-

den Banken- bzw. Finanzsektors) bestehen fort. Die Ende 2013 gebildete Bundesregierung hat sich zum Ziel gesetzt, die Einführung deutscher Europapolitik auf das Euro-Krisenmanagement zu beenden und andere Politikbereiche wie die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e Zusammenarbeit wieder aufzuwerten. Der Wiederbelebung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Partnerschaft kommt in diesem Kontext eine Schlüsselrolle zu.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Berlin und Paris wurde etwas einfacher, weil sich die französische Regierung seit Anfang 2014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k angenähert hat.

Die *EU-Schuldenkrise* begann im Herbst 2009 als *Refinanzierungskrise* des Eurozonen-Mitglieds Griechenland. Aufgrund seiner hohen Staatsverschuldung von 115 Prozent des Brutto sozialprodukts hatte Griechenland erhebliche Probleme damit, an den Finanzmärkten neue Kredite zu akzeptablen Zinsen aufnehmen zu können. Die wirtschafts- und haushaltspolitischen Probleme des Landes – die Schwäche der griechischen Wirtschaft, sein hohes Staatshaushaltsdefizit und eine überdimensionierte, aber wenig leistungsfähige Bürokratie – waren seit längerem grundsätzlich bekannt. Auch die Teilnahme Griechenlands als Gründungsmitglied der Eurozone war aus diesen Gründen umstritten gewesen. In der konkreten Entscheidungssituation im Herbst 2009 ging es nun darum, ob Griechenland seine Refinanzierungskrise aus eigener Kraft bewältigen oder ob eine Unterstützung durch die Europäische Union bzw. die Gruppe

<sup>45</sup> Vgl. Daniel Göler, *Europapolitik im Wandel. Deutsche Integrationsmotive und Integrationsziele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Staack, *Handelsstaat Deutschland*, S. 437-461.

<sup>46</sup> Ulrich Herbert,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2014, S. 1245.

der Euro-Staaten als Solidargemeinschaft erfolgen sollte. Im Verlauf der Krise wurde sehr schnell deutlich, dass die erste Option finanziell und politisch nicht umsetzbar war. Die Finanzmärkte waren nicht bereit, Griechenlands Staatsschulden weiterhin zu refinanzieren, ohne der EU bzw. der Euro-Gruppe als Ganzes eine politische oder, noch weitergehend, eine direkte finanzielle Garantie- bzw. Haftungserklärung abzuverlangen. Vieles spricht dafür, dass die Ausweitung der Griechenland-Krise zu einer EU-Schuldenkrise hätte verhindert werden können, wen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zu diesem frühen Zeitpunkt ihre Solidarität mit ihrem Mitgliedsland deutlich gemacht hätte.<sup>47</sup>

Auf Deutschland lastete in diesem Zeitraum eine besondere Verantwortung. Als wirtschaftlich leistungsfähigster EU-Staat und als eine der Führungsmächte der Union kam ihm eine *Schlüsselrolle* beim Umgang mit der Krise zu. Dieser Verantwortung wurde die Bundesregierung über längere Zeit nicht gerecht. Statt der Griechenland-Krise durch die entschlossene Befürwortung und Durchsetzung geeigneter Maßnahmen – wie die ein halbes Jahr später vereinbarte Gründung

der Europäischen Finanzstabilisierungsfazilität (EFSF) zur Kreditgewährung an EU-Mitgliedsstaaten – zu beugen, entschied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für eine Kombination aus Mahnungen an die Adresse Athens, einen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schen Kurswechsel einzuleiten, Drohungen, Griechenland gegebenenfalls aus der Eurozone auszuschließen und europapolitischem Zuwarten. Auf die Zusammenarbeit mit Frankreich mit dem Ziel, auch in dieser herausfordernden Lage gemeinsame Lösungsvorschläge anzubieten, wurde 2009/2010 kaum zurückgegriffen.<sup>48</sup> In einer Fortsetzungskrise, in der „die Märkte ... Orientierung und Klarheit“ erwarteten, bot die Bundesregierung – so das Urteil des damaligen Präsidenten der Weltbank, Robert Zoellick – lediglich eine Politik des „Durchwurstelns“ an.<sup>49</sup> Deutschland agierte nicht als eine europäische Führungsmacht, die das Projekt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vor Schaden bewahren wollte, sondern als ein „reluctant hegemon“<sup>50</sup> oder gar als „Hegemon wider Willen“<sup>51</sup>, der auf die Mehrheitsstimmung der veröffentlichten Meinung im eigenen Land reagierte, statt diese zu gestalten. Zugespielt formuliert, bestimmte die BILD-Zei-

---

<sup>47</sup> Vgl. Eric Jones, *Merkel's Folly*. In: *Survival*, Jg. 52 (2010), Nr. 3, S. 21-38.

<sup>48</sup> Vgl. Christian Deubner, *Der deutsche und der französische Weg aus der Finanzkrise*. DGAPanalyse, Nr. 2, Berlin 2011.

<sup>49</sup> Vgl. Henning Krumrey/Konrad Handschuh, *Weltbankchef Zoellick fordert klare Führung*. In: *Wirtschaftswoche*, 8.10.2011 (<http://www.wiwo.de/politik/ausland/schuldenkrise-weltbankchef-zoellick-fordert-klare-fuehrung/5755488.html>, Zugriff 28.7.2014).

<sup>50</sup> William Paterson: *The Reluctant Hegemon? Germany Moves Centre Stage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Nr. 49 (2011), Issue Supplement S1, S. 57-75.

<sup>51</sup> Marc Brost et al., *Alle Macht den Deutschen? Hegemon wider Willen – Berlin dominiert Europa und ist damit überfordert*. In: *Die Zeit*, 27.10.2011, S. 2-3.

tung<sup>52</sup> im Winter 2009/2010 die deutsche Regierungspolitik im Hinblick auf die Europa. Rückblickend erscheint das *Führungsversagen* der Bundesregierung in den Anfängen der EU-Schuldenkrise als der *Kardinalfehler*, der eine Eindämmung dieses Problems durch entschlossenes politisches Handeln unmöglich machte, die Kosten dieser Krise vervielfachte und sie zu einer bis heute noch nicht überwundenen Kris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werden ließ.

Wie lässt sich dieses Führungsversagen der Bundesregierung erklären? Tatsächlich liegt ein tiefer Graben zwischen der Bundeskanzlerin Merkel, die ganz entscheidend zum Zustandekommen des Lissabon-Vertrages (2007) und damit zur Erneuerung des institutionellen Fundaments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eitrug, und der Kanzlerin, an der bis ins Jahr 2011 hinein sowohl die notwendige *Leadership* als auch die Überzeugung vom Integrationsprojekt Europa zu vermissen war. Der besondere *Politikstil* Merkels, gekennzeichnet durch einen weitgehenden Verzicht auf strategische Zielsetzungen (zumindest öffentlich formulierte), eine äußerst pragmatische Orientierung auf das situativ Machbare und eine Präferenz für kurzfristige Lösungen („auf Sicht fahren“) wurde in der Krise besonders deutlich – und ebenso die Defizite dieses Politikstils.<sup>53</sup>

Darüber hinaus lassen sich drei Ursachen für das Krisenmanagement der Bundeskanzlerin identifizieren: (1) Eine Rettung des selbstverschuldet in eine tiefe Krise abgerutschten Griech-

enlands war in Deutschland höchst unpopulär. Die Ablehnung einer solchen Rettung verknüpfte sich mit historisch gewachsenen, in der politischen Kultur strukturell verankerten *Sicherheitsbedürfnissen* nach einer stabilen, inflationsresistenten Währung. Eine deutliche Mehrheit der Deutschen hatte den Euro als Gemeinschaftswährung akzeptiert, erwartete aber im Gegenzug eine dem deutschen Beispiel folgende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k in der EU. Mögliche Hilfen für Griechenland wurden so als der Einstieg in eine Politik interpretiert, mit der sich die Europäische Union von der bisherigen stabilitätsorientierten Währungspolitik verabschieden würde. (2) Die Bundesregierung hatte insbesondere im ersten halben Jahr die *Dimension* der Griechenland-Krise und deren Evolutionspotenzial zu einer veritablen EU-Schuldenkrise unterschätzt. Ebenso vernachlässigte sie die Folgekosten eines Nicht-Handelns für die Gesamthe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zw. der Euro-Gruppe. Daraus entwickelte sich ein zunehmender Vertrauensverlust bei den Akteuren der Finanzmärkte, der sowohl zu höheren Rettungskosten führte, als auch in eine generelle Vertrauenskrise der Euro-Währung mündete. (3) Als Folge eines zunächst ausbleibenden *Agenda Setting* durch die Bundesregierung wurde die innenpolitische Debatte in Deutschland von medialen Kampagnen gegen Griechenland und zunehmend auch gegen die 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swährung bestimmt. Die Bundesregierung vermochte es in den ersten eineinhalb

<sup>52</sup> Mit einer Auflage von über drei Millionen Exemplaren ist die populistisch und europakritisch eingestellte BILD-Zeitung die größte deutsche Tageszeitung.

<sup>53</sup> Vgl. Ralph Bollmann, *Die Deutsche. Angela Merkel und wir*, Stuttgart 2013; Judy Dempsey, *Das Phänomen Merkel. Deutschlands Macht und Möglichkeiten*, Hamburg 2013.

Jahren der Krise nicht, dieser Debatte eine von ihr gewünschte Richtung zu geben: sie versuchte es aber auch nicht wirklich. Stattdessen gab sie zumindest zeitweise „der Versuchung zum national-egoistischen innenpolitischen Populismus nach“<sup>54</sup> und schürte bzw. bediente „Sentiments, die ...kaum noch zu erschüttern sind“, wie „das Bild von den so sparsamen wie fleißigen Deutschen, die für sorglose Südeuropäer blechen müssen“.<sup>55</sup> Damit förderte sie auch eine Vertiefung der Spannungen innerhalb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gemeinschaft. (4) Die Koalitionsparteien CDU, CSU und FDP hatten die Bundestagswahl Ende September 2009 mit einem überzeugenden Mandat gewonnen; zudem war der bisherige Regierungspartner und politische Hauptkonkurrent, die SPD, mit einem Ergebnis von 23 Prozent regelrecht deklassiert worden. Sowohl im Bundestag als auch im Bundesrat verfügte die schwarzgelbe Koalition über eine eigene Mehrheit. Gleichwohl verzichtete die neue Bundesregierung in ihrem ersten Amtshalbjahr nahezu vollständig auf eine gestaltende, ihr Programm umsetzende Politik. Dieser irritierende *Attentismus* führte am 9. Mai 2010 zum Verlust der Regierungsmacht für CDU und FDP im größten Bundesland Nordrhein-Westfalen. Damit ging auch die Mehrheit im

Bundesrat verloren. Auch innenpolitisch gehörte Leadership offensichtlich nicht zum Markenkern des damaligen Regierungsbündnisses. Es dauerte bis zum September 2011, bis Bundeskanzlerin Merkel die Erhaltung des Euro zu einer Schicksalsfrage für die Selbstbehauptung Europas erklärte: „Der Euro ist der Garant eines einigen Europas, oder anders gesagt: Scheitert der Euro, scheitert Europa“.<sup>56</sup>

Die Folgen dieses Führungsversagens für Europa, für die Position Deutschlands in Europa und für die deutsche Europapolitik sind weitreichend. Die Zustimmung zum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sprojekt hat durch die EU-Schuldenkrise erheblich gelitten, und zwar nicht nur als Folge der Krise selbst, sondern als Resultat einer unzureichend ausgeprägten *strategischen Kompetenz* der Bundesregierung.<sup>57</sup> Diese gab dem Populismus nach, versäumte es längere Zeit, die Bedeutung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für Deutschland öffentlich zu vermitteln, und veranlasste durch ihr Handeln (und Nicht-Handeln) noch weitergehende Rückfragen zu ihren europapolitischen Grundsatzeinstellungen.<sup>58</sup> Diese verstärkten sich noch, nachdem die Bundesregierung (seit 2011) zu einer offensiven Durchsetzung ihres Konzepts einer *fiskalkonservativen Austeritätspoli-*

---

<sup>54</sup> Helmut Schmidt, ... aber die Währung ist gut. Wir haben keine Eurokrise, sondern eine Kris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n: Die Zeit, 5.5.2011, S. 22.

<sup>55</sup> Daniel Brössler, Merkels Gif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2.8.2013, S. 4.

<sup>56</sup> Angela Merkel, Rede in der Debatte über den Bundeshaushalt 2012. In: Das Parlament, Debattendokumentation, 123. Sitzung des 17. Deutschen Bundestages am 7.9.2011, S. 4.

<sup>57</sup> Ulrike Guérot/Jacqueline Hénard, What does Germany think about Europe?, ECFR Policy Brief (June 2011), London.

<sup>58</sup> Vgl. Roger Cohen, A New Era of Ambivalence. In: The New York Times/Süddeutsche Zeitung Supplement, 18.4.2011, S. 2.

tik übergegangen war<sup>59</sup>: „Genschers Vorstellung von der ‘europäischen Berufung’ eines kooperativen Deutschlands spitzt sich immer stärker auf einen unverhohlenen Führungsanspruch eines ‘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s in einem deutsch geprägten Europa’ zu. Nicht als wäre die Einigung Europas nicht von Anfang an im deutschen Interesse gewesen. Aber das Bewusstsein eines verpflichtenden historisch-moralischen Erbes sprach für diplomatische Zurückhaltung und für die Bereitschaft, auch die Perspektiven der anderen einzunehmen, normativen Gesichtspunkten Gewicht einzuräumen und gelegentlich Konflikte durch Vorleistungen zu entschärfen.“<sup>60</sup>

In der Rolle als *unwilliger Hegemon* hat Deutschland, vertreten durch die Bundesregierung, in den bisherigen Jahren der EU-Schuldenkrise sein Vertrauenskapital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nicht gefestigt, sondern abgebaut. Die Furcht und Aversion vor einem „deutschen Europa“<sup>61</sup> kehrte zurück. Deutschland wurde zunächst kritisiert, weil es nicht führte; und anschließend, weil es in eine inhaltlich höchst angreifbare Richtung führte, die einer strikten Sparpolitik den Vorrang einräumte, ohne dass ersichtlich war, dass daraus Wirtschaftswachstum zum Zweck der Krisenbewältigung entstehen könnte. Außerdem wurde die deutsche Regierung und ganz besonders die Bundeskanzlerin kritisiert, weil sie ihre jeweilige

Politik als alternativlos bezeichnete, zu wenig Anstrengungen unternahm, um sachbezogene Koalitionen zu bilden und stattdessen auf die ökonomische Machtwahrung zur Durchsetzung ihrer Ziele zurückgriff.<sup>62</sup> Teilweise handelt es sich um typisch wiederkehrende Muster der Kritik an einer Führungsmacht; teilweise ist die Kritik inhaltlich berechtigt. Die Ankündigung des EZB-Präsidenten Mario Draghi Ende Juni 2012, notfalls im Rahmen des (nicht näher definierten) Erforderlichen Staatsanleihen von Krisenstaaten durch die Europäische Zentralbank aufkaufen zu lassen, hat jedenfalls mehr zur Eindämmung der EU-Schuldenkrise beigetragen als die wesentlich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bestimmte Rettungs- politik der EU-Staaten.

Eine weitere Folge der deutschen Politik in der EU-Schuldenkrise stellte die besondere Ausprägung der *anglo-französischen Interventionspolitik* in Libyen und (mit Abstrichen) auch in Bezug auf Syrien dar. Beide traditionellen Großmächte, nach wie vor mit einem ständigen Sitz im VN-Sicherheitsrat vertreten, konnten Deutschlands ökonomischer Dominanz zumindest vorübergehend nichts entgegensetzen. Insofern diente ihre Vorreiterrolle beim militärischen Eingreifen in Libyen, ihre Advokatenrolle für die Anerkennung und Bewaffnung der syrischen Opposition und Frankreichs zunächst unilaterales Eingreifen

<sup>59</sup> Vgl. Sebastian Dullien/Ulrike Guérot, *The Long Shadow of Ordoliberalism: Germany’s Approach to the Euro Crisis*. ECFR Policy Brief (February 2012), London.

<sup>60</sup> Jürgen Habermas, *Ein Pakt für oder gegen Europa? An Gründen für eine Gemeinschaft fehlt es nicht, wohl aber an einem politischen Willen – und an Verantwortun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7.4.2011, S. 11.

<sup>61</sup> Vgl. Ulrich Beck, *Das deutsche Europa*, Frankfurt am Main 2012.

<sup>62</sup> Vgl. Ulrike Guérot/Mark Leonard, *The New German Question: How Europe Can Get the Germany It Needs*. ECFR Policy Brief (April 2011), London.

in Mali, auch der Bekräftigung eines außenpolitischen Führungsanspruches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d sind Ausdruck eines *European Power Play* um eine Führungsrolle in der Union. Die verstärkte sicherheitspolitisch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London und Paris deutet ebenfalls in diese Richtung. Durch die Politik aller drei Staaten wurde die Weiterentwicklung der GSVP erschwert.

Beschädigt wurde schlussendlich auch die Roll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ls eigenständiger, über das Ökonomische hinausgehend handelnder Akteur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sup>63</sup> Dieser Verlust an Reputation und Gestaltungspotenzial wirkte sich besonders auf die Beziehungen zu den aufstrebenden Mächten aus: „Während es der EU immer an *hard power* fehlte, hat sie aufgrund der Krise auch an *soft power* eingebüßt. Sie wird in den aufsteigenden Mächten weniger denn je als Modell oder starker Partner wahrgenommen, sondern als ein alternder, absteigender Kontinent, der mit sich selbst beschäftigt ist. Das hat auch Auswirkungen auf traditionelle Partner in Afrika, Lateinamerika oder Zentralasien, die sich zunehmend an China oder anderen Aufsteigern orientieren.“<sup>64</sup>

Die Ukraine-Krise führte dazu, dass die außenpolitische Kooperation innerhalb der Union wieder enger wurde. Den Staaten der EU war durch-

aus bewusst, dass es in dieser Krise auch um die *Selbstbehauptung Europas* als relevanter weltpolitischer Akteur ging. Allerdings wurde die Aufgabe, die Union wieder stärker zusammen zu führen, durch das Ergebnis der Wahl zu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am 25. Mai 2014 weiter erschwert, bei der eine beachtliche Minderheit ihrer Ablehnung des Integrationsprojekts eine Stimme geben konnte. Etwa ein Drittel der Parlamentssitze ging an europakritische bzw. rechtspopulistische und rechtsextreme Parteien. Besonders schwer wog, dass solche Parteien nicht nur in Großbritannien (*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t Party*), sondern auch in der europäischen Gründungs nation Frankreich (*Front National*) zur stärksten Kraft aufstiegen. In diesem Kontext wirkte Deutschland zu Recht als eine Insel der Stabilität.<sup>65</sup>

Der Bundesregierung war stets bewusst, dass ein starkes und selbstbewusstes Frankreich unverzichtbar war und ist für die Führung der Union. Sie ermutigte den engsten europäischen Verbündeten zu strukturellen Reformen und bemühte sich zugleich um eine verstärkte Zusammenarbeit, die durch die Regierungsbeteiligung der SPD erleichtert wurde.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sch sollte auf europäischer Ebene künftig stärker „ein umfassender politischer Ansatz“ verfolgt werden, „der Strukturreformen für mehr Wettbewerbsfähigkeit und eine strikte,

---

<sup>63</sup> Vgl. Kai-Olaf Lang/Gudrun Wacker (Hrsg.), *Die EU im Beziehungsgefüge großer Staaten. Komplex – kooperativ – krisenhaft*, SWP-Studie S 25, Berlin 2013.

<sup>64</sup> Heinrich Kreft, *Deutschland, Europa und die neuen Gestaltungsmächte*.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Jg. 63 (2013), Nr. 50-51, S. 16.

<sup>65</sup> Die pro-europäischen Parteien CDU, CSU, FDP, Grüne und SPD erhielten bei einer Wahlbeteiligung von 48.1 Prozent (2009: 43.3) zusammen 76.7 Prozent der Stimmen; die europakritisch-konservativ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7.1 Prozent. Angesichts der auch in Deutschland vorhandenen Kritik am Euro und an der EU dokumentierte dieses Resultat die ungebrochene Bindekraft der pro-europäischen Parteien.

nachhaltige Haushaltskonsolidierung mit Zukunftsinvestitionen in Wachstum und Beschäftigung in sozial ausgewogener Weise verbindet.“<sup>66</sup> Mit seinem Amtskollegen Fabius hatte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gleich nach Amtsübernahme vereinbart,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nachdrücklich zu stärken“, u. a. durch systematische Abstimmung vor den EU-Ministertreffen, durch gemeinsame Reisen und Kooperation bei Konfliktprävention und Krisenfrüherkennung.<sup>67</sup> Auch die Zusammenarbeit im *Weimarer Dreieck* vo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Polen sollte wieder gestärkt werden. Außerdem kündigte die Bundesregierung neue politische Initiativen zur Stärkung der *Gemeinsamen Sicherheits- und Verteidigungspolitik* an. Dieses Signal an die Partner war wichtig, denn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Kooperation auf EU-Ebene hatte in den vorausgegangenen Jahren stagniert, verursacht nicht zuletzt durch das Desinteresse der Bundesregierung bzw. ihres Verteidigungsministers de Maizière. Auch in diesem Sachbereich könnte die Ukraine-Krise zu einem Katalysator für verstärkte Zusammenarbeit werden. Die Krise des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s-projekts bleibt auf der Tagesordnung: wirtschafts-, finanz-,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sup>68</sup>

## 5. Globale Politik I: Transatlantische Beziehungen

Die transatlantisc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seinem wichtigsten außereuropäischen Verbündeten, den USA, haben nach dem Ende des Ost-West-Konflikts einen grundlegenden *Strukturwandel* erfahren. Deutschland ist sicherheitspolitisch nicht mehr existentiell abhängig von den USA, hat seine Souveränität zurückgewonnen und verwirklicht seine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in wachsendem Maße innerhalb der Struktur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Während des Irak-Konflikts wurden grundsätzlich unterschiedliche Weltordnungskonzepte beider Seiten deutlich.<sup>69</sup> Diese Differenz hat sich unter Präsident Obama abgeschwächt, besteht aber fort. Mit seinem *Pivot to Asia* verkündete dieser Präsident außerdem eine regionale Schwerpunktverlagerung der US-amerikanischen Politik. Gleichwohl sind Deutschland und die anderen NATO- bzw. EU-Staaten enge Partner Washingtons geblieben. Nicht militärisch, aber wirtschaftlich und zunehmend auch politisch ist diese Allianz symmetrischer geworden; außerdem hat sich die Schnittmenge gemeinsamer Interessen verringert. Im Zeitraum vor und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wurde das deutsch-amerikanische Verhältnis

<sup>66</sup> Koalitionsvertrag 2013, S. 157.

<sup>67</sup> Gemeinsame Erklärung von Bundesaußen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und Außenminister Laurent Fabius zur deutsch-französischen Zusammenarbeit, Auswärtiges Amt, Berlin, 21.1.2014.

<sup>68</sup> Vgl. Peter Schlotter, Vom Kontinent der Gewalt zum Friedensprojekt – und zurück? Zur Existenzkris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n: Werkner, Friedensgutachten 2014, S. 46-58.

<sup>69</sup> Vgl. Michael Staack, Nein zur Hegemonialmacht. Deutschlands außenpolitische Entscheidungsprozesse im Irak-Konflikt. In: Michael Staack/Rüdiger Voigt (Hrsg.), Europa nach dem Irak-Krieg. Ende der transatlantischen Epoche?, Baden-Baden 2004, S. 203-230.

vor allem durch zwei Themen bestimmt: die Aktivitäten US-amerikanischer Nachrichtendienste in und gegen die Bundesrepublik sowie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das Freihandelsabkommen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Während die erste Thematik zu politischen Spannungen zwischen den Regierungen und zu einer nachhaltigen Beschädigung der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führte, gilt das TTIP-Projekt der Bundesregierung als wichtiges Beispiel für nach wie vor übereinstimmende, zentrale Interessen zwischen beiden Seiten.

Die Debatte über die Tätigkeit US-amerikanischer Nachrichtendienste in Deutschland (und anderen Teilen der Welt) wurde angestoßen durch Edward Snowden, zuvor selbst Mitarbeiter vo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bzw. „National Intelligence Agency“ (NSA). Mit der Veröffentlichung geheimer Dokumente enthüllte Snowden eine Spionagepraxis der USA, die in ihrem Ausmaß und in der Art und Weise der Durchführung bis dahin kaum für vorstellbar gehalten worden war.<sup>70</sup> Die US-amerikanischen Dienste, insbesondere die NSA, hatten nach den Terroranschlägen vom 11. September 2001 offensichtlich damit begonnen, eine weitreichende, potenziell alle Länder der Welt umfassende Erfassung der elektronischen Kommunikation vorzunehmen. Ein solches Projekt der „globalen Massenüberwachung“<sup>71</sup> war machbar geworden durch wesentlich erweiterte technologische

Möglichkeiten zur Datenspeicherung und Datenverarbeitung, die in den 1990er Jahren noch nicht zur Verfügung gestanden hatten. Deutschland erwies sich dabei als das am stärksten überwachte Land der EU. Auch die Wirtschaftsspionage, noch stärker aber die politische Spionage der USA erwies sich als wesentlich weitgehender als bisher angenommen. So wurden nicht nur Bundeskanzlerin Merkel und ihr Vorgänger Schröder abgehört, sondern laut Snowdens, von den USA nicht dementierten Angaben über 30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aus den verschiedensten Staaten, darunter Brasilien, Frankreich und Mexiko; außerdem zahlreiche andere wichtige Funktionsträger, Ministerien oder Botschaften. Da sich die deutsche Spionageabwehr nicht gegen Verbündete richtete, wurde sie zumindest vom Ausmaß dieser politischen Spionage überrascht.

Die Bundesregierung befand sich in einem dreifachen Dilemma. *Erstens* konnte sie ein unkontrolliertes, rechtsfreies Agieren fremder Dienste auf deutschem Territorium ebenso wenig tolerieren wie die Überwachung des politischen Führungspersonals. *Zweitens* war sie daran interessiert, die Partnerschaft mit den USA unter Einschluss einer engen Zusammenarbeit im nachrichtendienstlichen Bereich fortzusetzen, nicht zuletzt mit Blick auf die Terrorbekämpfung. *Drittens* hatte sie die innenpolitische Dimension zu berücksichtigen, denn

---

<sup>70</sup> Vgl. Glenn Greenwald, *Die globale Überwachung. Der Fall Snowden, die amerikanischen Geheimdienste und die Folgen*, München 2014.

<sup>71</sup> Rolf Gössner, „Sicherheitsrisiko Mensch“. Globale Massenüberwachung untergräbt Völker- und Menschenrecht, Rechtsstaat und Demokratie, in: Till Müller-Heidelberg u.a. (Hrsg.), *Grundrechte-Report 2014. Zur Lage der Bürger- und Menschenrecht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2014, S. 19.

große Teile der Gesellschaft waren empört über die „Abschöpfung“ von Kommunikationsdaten und -inhalten, deren Vertraulichkeit grundgesetzlich und völkerrechtlich geschützt wird und zum Kernbereich privater Lebensgestaltung gehört.

Die Bundesregierung versuchte zunächst, die Bedeutung der Enthüllungen herunterzuspielen, um die Geheimdienstkooperation mit den USA nicht zu gefährden und diesen die Möglichkeiten zur Selbstkorrektur zu geben. Der damalige Bundesminister im Kanzleramt, Pofalla (CDU), erklärte die Affäre im August 2013 sogar für beendet.<sup>72</sup> Diese Haltung mag dazu beigetragen haben, dass die USA umfangreiche Fragenkataloge des deutschen Innen- und des Justizministeriums nie beantworteten. Stattdessen wurde von US-amerikanischer Seite ein sogenanntes *No Spy*-Abkommen in die Diskussion gebracht, mit dem die Spionage unter Verbündeten künftig ausgeschlossen werden sollte. Diese Idee wurde aber schnell fallen gelassen, weil sich die US-amerikanischen Nachrichtendienste ihre weitest gehende Handlungsfreiheit nicht einschränken lassen wollten. Gefördert durch diese absolut unbefriedigende Kooperation, kam es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zur Einsetzung eines Untersuchungsausschusses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der die Affäre aufklären soll. Allerdings war weder die alte noch die neue Bundesregierung bereit, dem im vorläufigen Moskauer Exil befindlichen Snowden politisches Asyl oder einen anderen Aufenthaltsstatus anzubieten. Ein solcher Schritt wäre vo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als grob unfreundlicher Akt angesehen worden. Auch andere außen- oder rechtspolitische Konsequenzen wie eine Neuverhandlung des *Aufenthaltsvertrages* von 1954, der die Präsenz alliierter Truppen regelt, blieben aus.<sup>73</sup>

Als Anfang Juli 2014 bekannt wurde, dass Geheimdienste der USA sogar einen Mitarbeiter des Bundesnachrichtendienstes (BND) und möglicherweise auch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angeworben hatten, war nicht nur für Bundespräsident Gauck, sondern für die gesamte Bundesregierung die Grenze des politisch Erträglichen überschritten. Nachdem wiederum keine zufriedenstellende Reaktion der Obama-Administration erfolgte, forderte die Bundesregierung den offiziellen Repräsentanten der US-Dienste in Deutschland auf, das Land zu verlassen.<sup>74</sup> Dieser Schritt, so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stelle eine „notwendige“ Antwort auf den „Vertrauensbruch“ der USA dar. Erforderlich wäre nunmehr ein „Neuanfang“ in den deutsch-amerikanischen Beziehungen.<sup>75</sup> Außerdem wurde beschlossen,

<sup>72</sup> Hendrik Hegemann/Martin Kahl, Debatte beendet? Die EU, Deutschland und die Antiterrorpolitik nach der NSA-Affäre, in: Werkner, Friedensgutachten 2014, S. 156-157.

<sup>73</sup> Vgl. Dieter Deiseroth, Rechtspolitische Konsequenzen aus der „NSA-Ausspähaffäre“. In: Till Müller-Heidelberg u.a.(Hrsg.), Grundrechte-Report 2014. Zur Lage der Bürger- und Menschenrecht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2014, S. 28-33.

<sup>74</sup> Vgl. Stefan Braun u.a., Regierung wirft US-Geheimdienstler raus.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1.7.2014, S. 1.

<sup>75</sup> „Steinmeier verteidigt Ausweisung des obersten US-Geheimdienstlers“. In: Spiegel Online, 11.7.2014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bnd-spionageaffaere-steinmeier-rechtfertigt-deutsche-reaktion-a-980508.html>, Zugriff 11.7.2014).

dass sich die deutsche Spionageabwehr künftig auch gegen die Verbündeten USA und Großbritannien richten sollte. Zugleich war die Regierung um diplomatische Schadensbegrenzung bemüht, indem sie die Bedeutung der transatlantischen Partnerschaft unterstrich und eine Fortsetzung der engen Kooperation der Dienste für sicherheitspolitisch notwendig erklärte. Während die Obama-Administration das Ausmaß des politischen Schadens anfangs nicht erkannt hatte, entsandte sie nun den Stabschef des Weißen Hauses nach Berlin, um mit dem Chef des Bundeskanzleramtes auf vertraulicher Ebene eine Neujustierung vorzunehmen, sowohl in Bezug auf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Diensten als auch in Bezug auf deren Aktivitäten in Deutschland.<sup>76</sup>

Nach dem Strukturwandel in Folge des Ost-West-Konflikts und der Zäsur des von Berlin abgelehnten Irak-Krieges könnten die nachrichtendienstlichen Aktivitäten der USA in Deutschland zu einer weiteren *Entfremdung* in den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und zwischen den Gesellschaften führen. Angesichts der vielfältigen Kommunikationskanäle zwischen beiden Seiten und des Vorrangs anderer, tatsächlicher sicherheitspolitischer Bedrohungen betrachtet die Bundesregierung eine Spionage zwischen engen Verbündeten als überflüssig. Der durch die amerikanische Praxis eingetretene *Vertrauensschaden* in Bezug auf

die Glaubwürdigkeit und die Reputation der USA könnte, so das zutreffende Urteil des früheren Regierungskordinators für die transatlantischen Beziehungen, Missfelder (CDU), sogar noch „länger und intensiver“ nachwirken als der Dissens im Irak-Konflikt.<sup>77</sup> Es spricht nichts dafür, dass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ihren umfassenden Ansatz aus globaler Erfassung von Kommunikationsdaten, politischer Spionage und Wirtschaftsspionage verändern werden. Dieser Ansatz ist Bestandteil einer übergeordneten Strategie, die die Vorherrschaft (*primacy*) der USA im internationalen System mittels technologischer Überlegenheit gewährleisten soll. Aus einer solchen Perspektive betrachtet, erscheint Deutschland nicht nur als ein Alliiertes, sondern auch als ein Staat, der eigene Interessen verfolgt, bei wichtigen Themen Position gegen die USA bezieht und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en einschließlich enger Wirtschaftsbeziehungen zu Ländern wie China und Russland unterhält, die vo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als Rivalen angesehen werden.<sup>78</sup> Es gibt aber nicht nur eine Positionsdifferenz bei Interessen, sondern auch bei zentralen Werten, denn das Verständnis von Bürger- und Menschenrechten, Datenschutz und Schutz der Privatsphäre hat sich auf beiden Seiten des Atlantiks sehr unterschiedlich entwickelt.

Auch das zweite aktuelle Thema auf der

---

<sup>76</sup> Vgl. Christoph Hickmann/Georg Mascolo, Berlin will US-Agenten überwach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4.7.2014, S. 1.

<sup>77</sup> Severin Weiland, Künftiger Amerikabeauftragter kritisiert US-Politik scharf. In: Spiegel Online, 16.1.2014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missfelder-kritisiert-us-politik-wegen-nsa-affaere-a-943873.html>, Zugriff 31.7.2014).

<sup>78</sup> Vgl. James Kirchick, Why We Need to Spy on the Germans. In: The Daily Beast, 9.7.2014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7/09/why-we-need-to-spy-on-the-germans...>, Zugriff 11.7.2014).

Agenda der transatlantischen Beziehungen,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ein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muss nicht automatisch zu einer Stärkung der Partnerschaft führen, sondern kann auch neue Konflikte evozieren. Die Bundesregierung, unterstützt vo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hat TTIP zu einer politischen Priorität erklärt und strebt dementsprechend einen zügigen Erfolg der Verhandlungen an. Aus der Sicht der Befürworter sprechen vor allem drei Gründe für das Projekt.<sup>79</sup> Eine Freihandelszone auf der Grundlage von TTIP würde, *erstens*, durch die Vereinheitlichung von Standards und, damit zusammenhängend, die Beschleunigung von Prozeduren und Transaktionskosten, eine zusätzliche Dynamik im eng verflochtenen transatlantischen Wirtschaftsraum und zusätzliches Wachstum erzeugen, wobei von 0.5 bis ein Prozent pro Jahr auszugehen sei. *Zweitens* könnten die EU und die USA, gemessen am Bruttoinlandsprodukt immer noch der größte bzw. der zweitgrößte Wirtschaftsraum der Welt, durch eine weitere Annäherung ihrer Standards dafür sorgen, auch weiterhin die Regeln der Weltwirtschaft zu bestimmen. Damit solle insbesondere dem zunehmenden Mitgestaltungsanspruch aufstrebender Mächte wie Chinas, Brasiliens oder Indiens entgegengewirkt werden. *Drittens* erhofft man sich durch diese Vertiefung der ökonomischen Kooperation auch „ein Signal für die Vitalität des Westens“;<sup>80</sup> eine Reaktivierung des politischen Zusammenhalts

der transatlantischen Allianz, die als Folge des oben skizzierten Strukturwandels an Bindungskraft verloren hat.

Demgegenüber argumentieren die Gegner und Kritiker von TTIP, dass der wachstumspolitische Effekt der Freihandelszone keineswegs gewährleistet sei. Stattdessen könnte es, besonders bei Umwelt-, Nahrungsmittel-, Datenschutz- und Sozialstandards zu einer Absenkung europäischer Vorschriften zugunsten qualitativ weniger anspruchsvoller Normen auf Seiten der USA kommen. Außerordentlich kritisch betrachtet wird auch die im Rahmen von TTIP beabsichtigte Schaffung von Schiedsgerichten außerhalb der staatlichen Gerichtsbarkeit, deren Entscheide gleichwohl auch für Staaten verbindlich sein sollten. Generell wird befürchtet, dass es durch TTIP zu einer Renaissance neoliberaler Wirtschaftspolitik kommen könnte, deren Defizite in der immer noch schwelenden Weltwirtschafts- und Finanzkrise deutlich offengelegt worden seien. Auf erhebliche Kritik stößt auch, dass die TTIP-Verhandlungen zwar unter Ausschluss nicht nur der Gesellschaft bzw. von Nichtregierungsorganisationen, sondern auch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aber unter Beteiligung der interessierten Wirtschaft durchgeführt werden. Durch TTIP und ähnliche Projekte würde zudem die seit 1945 bestehende Welthandelsordnung zunehmend ausgehöhlt.<sup>81</sup>

Angesichts der Vielzahl zu klärender Probleme und der zu überbrückenden Interessens-

<sup>79</sup> Vgl. Stormy-Annika Mildner/Claudia Schmucker, Wir brauchen TTIP! Eine Ausweitung des transatlantischen Handels bringt viele Vorteile.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Jg. 69 (2014), Nr. 3, S. 98-105.

<sup>80</sup> Hans-Ulrich Klose/Klaus Scharioth, Ein Gewinn für den Westen. Eine transatlantische Handelspartnerschaft besäße Modellcharakter.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Jg. 68 (2013), Nr. 5, S. 68.

<sup>81</sup> Vgl. Heribert Dieter, Strukturelle Schwächen des transatlantischen Abkommens. SWP-Aktuell, Juni 2014, Berlin.

gegensätze wird ein Verhandlungskompromiss bei TTIP nicht einfach zu erzielen sein. Es ist abzusehen, dass die dann auch öffentlich vorliegenden Ergebnisse zum Gegenstand einer kritischen Debatte werden. Weder die Zustimmung des US-Kongresses noch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kann als sicher vorausgesetzt werden. Auch ist noch offen, ob nicht zusätzlich, wie von Bundesjustizminister Maaß gefordert, alle 28 nationalen Parlamente der EU-Staaten zustimmen müssten. Ein TTIP-Abkommen, das als *Ausdruck neoliberaler Politik* oder als *Elitenprojekt* ohne erkennbaren Nutzen für die Bevölkerung perzipiert werden würde, dürfte auch die als Folge der EU-Schuldenkrise stark angeschlagene Legitimität der EU weiter untergraben. Außenpolitisch betrachtet, sind Zweifel angebracht, ob ein transatlantischer Wirtschaftsblock, möglicherweise noch verknüpft mit der einer „Transpazifischen Partnerschaft“ (TPP), den richtigen Weg darstellt, um – so das offizielle Ziel der Bundesregierung – die „neuen Gestaltungsmächte“ immer stärker in die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Weltordnung einzubinden. Allzu offensichtlich werden diese von vielen TTIP-Verfechtern nicht als Partner, sondern als einzudämmende Gegner oder Konkurrenten wahrgenommen. Angesichts dieser Konstellation muss das Verhandlungsergebnis inhaltlich sehr überzeugend sein, um wirklich zu einer Revitalisierung der transatlantischen Beziehungen beitragen zu können.

## 6. Globale Politik II: China und Ostasien

Die Beziehungen zu den Staaten Ostasiens,

besonders zu China, haben für Deutschland im letzten Jahrzehnt einen enormen Bedeutungszuwachs erfahren; und zwar sowohl wirtschaftlich als auch politisch. Diesem Bedeutungszuwachs ist institutionell und konzeptionell bisher erst ansatzweise Rechnung getragen worden. Deutschland benötigt eine inhaltlich geschärfte *Ostasien-Politik*, die die Beziehungen zu China, Indien, Japan und Südostasien (ASEAN) als ressortübergreifende Querschnittsaufgabe begreift und strukturiert. Dieser Ostasien-Politik sollte künftig in der außenpolit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der gleiche Stellenwert zukommen wie der Gestaltung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und der transatlantischen Beziehungen, denn „der Aufstieg Chinas und Asiens verlangt eine grundsätzliche Neuorientierung Europas.“<sup>82</sup> Seit der Aufnahme diplomatischer Beziehungen und der damit einhergehenden Anerkennung der *Ein-China-Politik* durch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72) war das bilaterale Verhältnis vor allem durch den wirtschaftlichen Wiederaufstieg Pekings und das Fehlen außenpolitischer Konflikte gekennzeichnet. Alle Bundesregierungen von Schmidt über Kohl bis Schröder betrachteten China vorrangig als riesigen Markt mit Zukunft. Diese Sachlage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erändert. Einerseits ist dafür eine deutlich kritischere China-Perzeption in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und bei Teilen der deutschen Eliten ursächlich: China wird nunmehr stärker als wirtschaftlicher Konkurrent wahrgenommen, als aufsteigende Weltmacht mit Interessen, die sich von deutschen bzw. europäischen unterscheiden, und als ein nicht

---

<sup>82</sup> Heinrich Kreft, Chinas Aufstieg – eine Herausforderung für den „Westen“.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Jg. 60 (2010), Nr. 39, S. 40.

westlich-demokratisch verfasstes politisches System. Andererseits hat sich die China-Perzeption aber auch verändert, weil das Land, noch beschleunigt durch die Weltfinanzkrise, zunehmend in eine neue Rolle als globale Gestaltungsmacht in nahezu allen Politikbereichen hinein wächst. Während im politischen System Deutschlands der Ausbau der Wirtschaftsbeziehungen und Chinas Einbindung in die Bearbeitung internationaler Ordnungsprobleme eindeutigen Vorrang genießt, wird in Teilen der Gesellschaft vor allem Kritik an der chinesischen Innenpolitik verlangt.

Nach anfänglichen Positionsdifferenzen hat sich die Vertiefung der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unter der Kanzlerschaft Angela Merkels seit 2008 nochmals verstärkt. Beide Seiten arbeiten im Rahmen einer „strategischen“ bzw. „umfassenden“ Partnerschaft zusammen, führen seit 2011 jährliche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 durch, erörtern die gesamte Themenbreite der Kooperation in über 50 Dialogformaten und stimmen sich nicht nur auf der Spitzen-, sondern auch auf den Arbeitsebenen in zahlreichen Fragen inhaltlich ab. Besondere Bedeutung kommt auch dem im Jahr 2000 eingerichteten Menschenrechts- und Rechtsstaatsdialogs zu.<sup>83</sup> Im Jahr 2014 vereinbarten Kanzlerin Merkel und Staats- und Parteichef Xi Jinping auch einen sicherheitspolitischen Dialog auf Spitzenebene. Nachdem die Wirtschaftspartnerschaft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weit vorangeschritten ist, strebt Deutschland auch eine in

Dichte und Tiefe vergleichbare politische Partnerschaft an. Das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smuster zeigt, dass eine intensive Partnerschaft zwischen Staaten mit unterschiedlichen politischen Ordnungen möglich ist, wenn Dialog und gemeinsame Interessen im Vordergrund stehen. Auf dieser Grundlage können dann auch unterschiedliche Auffassungen konstruktiv erörtert werden.

Auch wenn man nicht so weit gehen muss, von einer „natürlichen Partnerschaftsbeziehung“<sup>84</sup>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zu sprechen, so bestehen doch sehr gute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e enge Partnerschaft in der multipolaren Welt: Beide Staaten gehören zu den bedeutendsten Volkswirtschaften der Welt. Beide sind sehr stark vom Außenhandel abhängig und intensiv in die Weltwirtschaft integriert. Seit 2009 ist China Exportweltmeister; Deutschland liegt seitdem auf Platz 2. Wachstum und Wohlfahrtsmehrung haben für beide Staaten einen hohen innen- wie außenpolitischen Stellenwert.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hat sich zudem im letzten Jahrzehnt eine wirtschaftliche Interdependenz entwickelt: Deutschlands Wachstum wird entscheidend von der Nachfrage aus China beeinflusst; und für Chinas ökonomischen Fortschritt ist das Engagement deutscher Unternehmen von großer Bedeutung. Christoph Heusgen, Leiter der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en Abteilung im Bundeskanzleramt, hat deshalb zu Recht von einer *special relationship* gesprochen, die sich im sino-deutschen Verhält-

<sup>83</sup> Vgl. Katja Levy, Der Deutsch-Chinesische Rechtsstaatsdialog. Die konstruktivistische Untersuchung eines außenpolitischen Instruments, Baden-Baden 2010.

<sup>84</sup> Vgl. Yu-ru Lian, Eine „Natürliche Partnerschaftsbeziehung“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n: Michael Staack (Hrsg.), Asiens Aufstieg in der Weltpolitik, Opladen 2013, S. 89-106.

nis entwickelt habe.<sup>85</sup>

China und Deutschland unterstützen das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projekt. Beide wollen, dass die Europäische Union auch in der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zu einem stärker handlungsfähigen Akteur wird. Beide wollen den dauerhaften Erfolg der Euro-Währung; auch und gerade in ihrer Funktion als eine der führenden Währungen der Welt. Deshalb hat China die Stabilisierung des Euro durch eigene Beiträge unterstützt. Beide Staaten teilen ein gemeinsames Interesse an einer gut funktionierenden, regelbasierten internationalen Ordnung und handlungsfähigen Vereinten Nationen. China verfügt über eine ständige Mitgliedschaft im Sicherheitsrat; Deutschland strebt nach einem solchen Platz, möglicherweise auch durch die Einführung einer mehrfachen Wiederwahl. Beide Nationen sind schließlich umgeben von besonders vielen Nachbarstaaten: China (14) von noch mehr als Deutschland (9), woraus sich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aktiven Nachbarschafts- und Partnerschaftspolitik ergibt.

Ganz unterschiedlich stellte sich bis zur Eskalation der Ukraine-Krise und der damit verbundenen Gefährdung der bisherigen Grundlagen gesamteuropäischer Sicherheit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Lage* in Europa und in Ostasien dar. Während Europa in der EU und über diese hinaus zusammenwächst, gibt es in Ostasien keine umfassende, hinreichend institutionalisierte und normativ verbindliche Kooperationsstruktur des Staatensystems. Obwohl die wirtschaftliche Verflechtung weit vorangeschritten ist, fehlt eine entsprechende Entwicklung in der Sicherheitspolitik. In Europa sind die meisten Konflikte

gelöst oder doch wenigstens eingeholt oder „eingefroren“, während in Ostasien zahlreiche ungelöste Sicherheitsprobleme mit hohem Eskalationspotenzial fortbestehen, zum Beispiel Territorialstreitigkeiten, die Nordkorea-Problematik oder die Entwicklung Taiwans. Außerdem treffen in Ostasien die Interessen Chinas und der USA direkt aufeinander. Während Washington mit der 2011 verkündeten neuen Pazifik-Strategie seinen Status als Hegemon verteidigen will, zielt Beijing darauf ab, die Bedeutung der USA in der Region zu verringern.

Aus dieser Konstellation ergibt sich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Politik, die Konflikte präventiv bearbeitet. Deutschland und Europa haben in Ostasien nicht nur wirtschaftspolitische, sondern auch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e Interessen, aus denen das Eintreten für eine friedliche Entwicklung dieser dynamischsten Weltregion resultiert. Durch die maßgeblich vo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orangetriebene Entspannungspolitik der 1970er und 1980er Jahre wurde *kooperative Sicherheit* in Gesamteuropa möglich: erst zwischen den Blöcken, dann in einem zusammenwachsenden Europa. Wichtige Instrumente aus dem Werkzeugkasten der kooperativen Sicherheit könnten aus deutscher Sicht auch unter den ganz anderen Prämissen Ostasiens einen Zweck erfüllen, zum Beispiel vertrauens- und sicherheitsbildende Maßnahmen, Vereinbarungen zur quantitativen und qualitativen Rüstungskontrolle oder verbindliche Strukturen der Kooperation. An einer *Eindämmung* Chinas hat Deutschland kein Interesse, wohl aber an der weiteren Entwicklung des Landes zu einem aktiveren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der internationalen

---

<sup>85</sup> Vgl. Thomas Gutschker, Zwei Strebe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2.9.2012, S. 10.

Ordnung.

Deutschlands bilaterale Beziehungen sind nicht nur zu China sehr gut, sondern auch zu anderen wichtigen regionalen Akteuren wie Japan und Südkorea. Daraus ergibt sich ein Vertrauenskapital, das auch bei Konflikten nutzbar gemacht werden kann. Gleichwohl hat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kein Interesse, sich in Streitigkeiten zwischen diesen Partnern hineinziehen oder dabei gar instrumentalisieren zu lassen. Deutschland kann aber eigene positive Erfahrungen vermitteln, die nicht nur die friedliche Konfliktlösung, sondern auch die Vergangenheitspolitik umfassen und für Ostasien nützlich sein könnten. Die deutsche Erfahrung lehrt, dass eine selbstkritisch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eigenen Vergangenheit auch die internationale Reputation und den außenpolitischen Handlungsspielraum zu erhöhen vermag: „Der Wiederaufstieg Deutschlands zu einem nicht nur reichen, sondern auch geachteten, demokratischen Land ist jedoch auf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iesen Verbrechen (während der Nazi-Herrschaft, M.S.) in vermutlich nicht geringerem Maße zurückzuführen als auf seine Exporterfolge.“<sup>86</sup> Angesichts der krisenhaften Entwicklungen in anderen Weltgegenden sind alle Anstrengungen erforderlich, damit es nicht auch noch in Ostasien zur Eskalation bestehender Spannungen kommt.

## 7. Ausblick

Die weltpolitische Lage im Sommer 2014 wird von mehreren großen Krisen gleichzeitig bestimmt. Zwei dieser Krisen betreffen Deutschland unmit-

telbar: die Gefährdung der europäischen Sicherheitsordnung durch den Ukraine-Konflikt und die Eskalation verschiedener Konflikte im Nahen und Mittleren Osten, zugespitzt durch die Ausbreitung der terroristischen Miliz „Islamischer Staat“ in Syrien und im Irak. Diese Krisen haben vielfältige Ursachen; nicht zuletzt wurden sie auch mit verursacht von großen Fehlern westlicher Politik. Eine genaue Aufarbeitung dieser Fehler ist erforderlich, kann kurzfristig notwendige praktische Antworten aber nicht ersetzen.

Die von den USA, Großbritannien und Frankreich angeführte, in den letzten beiden Jahrzehnten betriebene militärische *Interventionspolitik* des Westens ist an ihre Grenzen gestoßen. Auch wenn sie in einigen Fällen erfolgreich war (so auf dem westlichen Balkan), so hat sie sich doch überwiegend als falsch erwiesen, weil die dem Eingreifen zugrundeliegenden Annahmen nicht stimmten, weil der „lange Atem“ zur Konfliktnachsorge fehlte oder weil es von Anfang an um bloße Macht- bzw. Regimewechsel-Politik ging. An zwei der besonders fehlgeleiteten Interventionen, im Irak (2003) und in Libyen (2011), hat sich Deutschland aus guten Gründen nicht beteiligt. Wie sich in der Rückschau erweist, war die Lagebeurteilung der damaligen Bundesregierungen realistisch. Der Westen ist gut beraten, seinen Interventionismus und den damit einhergehenden überzogenen Gestaltungsanspruch zurückzunehmen und stattdessen Diplomatie und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in den Vordergrund zu rücken. Deutschland kann diese Entwicklung durch eigene Beiträge vorantreiben.

<sup>86</sup> Herbert,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S. 1251-1252.

Grundlage *und* Ziel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sind eine regelbasierte internationale Ordnung und die vertieft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In diesen Strukturen können sich die Spezialisierungsvorteile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 multilaterale Kooperation, Konsens- bzw. Kompromissorientierung, Dialog und Vermittlung – am besten entfalten. Diese Strukturen ermöglichen dem Handelsstaat Deutschland auch am besten, seine wirtschaftliche Wohlfahrt zu mehren. Dringlichste Herausforderungen für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sind die Konsolidierung der angeschlagenen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und die Rückkehr zu einer regelbasierten Friedensordnung in Europa, wie sie nach dem Ende des Ost-West-Konflikts erreicht wurde.

Die Bundesregierung Merkel/Gabriel/Steinmeier hat die gewachsene internationale Verantwortung Deutschlands angenommen und gestaltet internationale Politik – über Europa hinaus – aktiver mit als die Vorgängerregierung. Auch künftig wird es militärische Einsätze unter Beteiligung der Bundeswehr geben. Der Schwerpunkt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liegt aber auf ziviler und wirtschaftlicher Diplomatie. Deutschland sollte sein in weiten Teilen der Welt vorhandenes Vertrauenskapital als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 nutzen, um auf diese Weise, aktiv und vorausschauend zur Lösung von Konflikten und zur Stärkung von regelbasierten Ordnungen beizutragen.

(Abgeschlossen am 31. August 2014)

Autor: Prof. Dr. Michael Staack,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iversität der Bundeswehr Hamburg.

# 德国的新外交角色 “建构力量”

于 芳

【摘要】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文明力量角色特征，在默克尔政府时期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价值观外交和以利益为导向、受价值观约束的外交政策上。但在德国更加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上，该角色模式面临挑战。在经历了始自2007年的一系列危机之后，德国看到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了新的“建构力量”角色方案，将德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都视作是共同建构全球化、建构国际新秩序的伙伴，以便于德国乃至欧盟能一如既往地受益于全球化。对比两个角色模式，可以看到德国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和价值基础始终保持不变，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与侧重点则发生了新的变化。

【关键词】角色 文明力量 建构力量 德国外交政策

## 一、从文明力量转向建构力量

在关于德国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中，有很多角色模式被提出，如核心力量、领导力量、文明力量、贸易国家等等，自德国重新统一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角色当属“文明力量”和“贸易国家”。其中，作为一种外交政策角色模式的“文明力量”，被定义为“有能力和意愿去建构国际关系，并使用特定的手段来实现目标，即有能力和意愿来推进国际关系的文明化。<sup>①</sup>”

作为文明力量，其外交政策的行动准则有如下几条：

- 在解决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时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国家有组织地使用武力；
- 国际关系更确切地法治化和规范化；
- 深化多边合作，创立多边决策机制以推进国际秩序的合法化，而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基本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

<sup>①</sup> Maull, Hanns/Kirste, Knut/Harnisch, Sebastian: Deutsche, amerikanische, japanische Aussenpolitikstrategie 1985-1995, 1997, S. 22, <http://www.deutsche-aussenpolitik.de/resources/conferences/wirt.pdf>, letzter Zugriff: 09.04.2014.

—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社会公正和公平；  
—加强控制和实现普遍规范的机制建设，并愿意让渡部分主权；  
—解决冲突的渠道化，在特殊原则和条件下才能使用军事武力。<sup>②</sup>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外交政策充分体现了文明力量角色特征。文明力量角色理论在各种关于德国的角色理论中，解释力可谓是最强的，也与德国战后的克制文化非常吻合。尤其是在默克尔政府时期，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全然符合文明力量强调外交政策价值基础的角色特征。然而，在德国面临国际问题需要使用军事手段参与海外行动时，是应当参与作战还是应当使用和平方式参与，政界的意见不一与民众和平反战的呼声，令该理论的解释力陷入困境。

2012年2月，联邦政府出台了新的方案，题为《建构全球化—加强伙伴关系—分担责任：联邦政府的方案》<sup>③</sup>，在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建构力量角色方案，以建构力量来指称在所在地区政治经济影响力较大的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南非等国，称德国将作为可靠伙伴与新建构力量一起共同塑造未来的全球化。这一文件并没有将德国定义为新建构力量，而是视德国为与新建构力量合作的伙伴。随后，德国学者如桑特施耐德教授提出了建构力量的角色特征，认为德国也符合这些角色特征，不管德国是否愿意，都应算作

是一个建构力量，与新建构力量应当可以互相以建构力量来看待。其他一些学者也认可了这个看法，在新的研究报告中都提到了德国的国际角色为建构力量。在2014年初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各位专家和学者也明确将德国的建构力量角色作为角色讨论的内容。<sup>④</sup>在媒体上，如《时代报》、《莱茵报》上均有相关报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建构力量”的概念。

建构力量角色方案的重点是与富有影响力的新兴国家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联邦政府在各个领域都出台了具体政策和措施，来加强与新建构力量之间的合作：打造更透明的决策过程，实现更有效的协调机制，联邦政府的各部门会分别加以调整，德国驻外代表处也被纳入全球化方案中，由外交部负责向所有相关机构和人员提供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培训；联邦政府在必要时会建立区域小组专门用于制定和更新关于新建构力量的国别策略，并会根据实际情况融入到德国与该国的双边关系中；外交部建立政府内部对话信息系统，简化与新建构力量交往中的信息传递步骤；联邦政府会建设对外联络网络，集合现有的各种手段，根据每个新建构力量的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对话与合作方式，灵活有效地与新建构力量合作，保障目标和结果的实现。比如说，德国和中国的合作将会持续在30多

② Maull, Hanns/Kirste, Knut/Harnisch, Sebastian: Deutsche, amerikanische, japanische Aussenpolitikstrategie 1985-1995, 1997, S. 23, <http://www.deutsche-aussenpolitik.de/resources/conferences/wirt.pdf>, letzter Zugriff: 09.04.2014.

③ Konzept der Bundesregierung, Globalisierung gestalten – Partnerschaften ausbauen – Verantwortung teilen, <http://www.bogota.diplo.de/contentblob/3606954/Daten/2357167/Gestaltungsmachtekonzepthtdt.pdf>, letzter Zugriff: 21.09.2014.

④ Messner, Dirk/Faust, Jörg: Gestaltungsmacht Deutschland – Herausforderungen globalen Wandels gehören auf die Agenda, <http://www.die-gdi.de/die-aktuelle-kolumne/article/gestaltungsmacht-deutschland-herausforderungen-globalen-wandels-gehoren-auf-die-agenda/>, letzter Zugriff: 21.09.2014.

项双边对话中继续进行，包括安全政策对话、经济和环境政策对话、人权对话、法治国家对话等等。此外，还会建设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进行政府间磋商，加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交流与互访。

## 二、文明力量角色与建构力量角色之比较

文明力量角色特别重视德国外交政策的价值观基础，对于不符合其价值观的国家，在文明力量理论中被视作是反对象。作为文明力量的德国，对于发展中国家采取发展援助或者进行发展合作，通过有条件的资助来推进受援国的良政——民主进程，这更多是类似一个有条件的传递过程。

然而建构力量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重新定义了看待新兴国家的视角，在这个角色方案中，中国和印度、南非、墨西哥等国家一样被视作是建构力量，是与德国共同建构全球化的合作伙伴。建构力量角色方案的重点就是建构德国与新建构力量之间的关系。重新建构了合作关系之后，通过更多合作带来的共赢逐步通过经济来实现政治、社会的转变。

根据2012年2月联邦政府出台的文件，德国和新建构力量之间进行多边合作，并辅以密切而有针对性的双边关系，共同打造全球化的未来趋势。德国在国际论坛、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都会奉行多边主义来与新建构力量合作。在文化、教育和科学领域，德国和欧洲都将文化差异视作文化多样性，希望加强文化交流、外语学习和跨文化能力。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的各种对话活动，有助

于德国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德国和欧洲都支持公民社会的建设，支持民主、人权、机会均等和政治基本权利，并在转型伙伴关系的框架内采取具体措施，如与埃及的非政府组织合作，来促进市场经济和人权保护。此外，德国政府还支持新媒体的建设，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交流；支持政治基金会、教会和其他社会主体的促进项目。欧盟成员国和亚欧会议成员国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中国都在亚欧会议的框架内进行相关交流。在中国、越南、巴西、印度、南非等地，还举办德国周、德国年等活动，建立交流网络，促进跨文化的沟通，也邀请新建构力量到德国去展示其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如2010年是越南年，2012年是中国年。文教方面，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和洪堡基金会为教育、科学、研究的交流提供了大力资助。

在探讨文明力量与建构力量的区别与联系时，有如下几点特别值得关注：

文明力量角色由学者提出，产生于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建构力量角色由德国政府首先提出，具有较强的导向性；文明力量角色可以说是德国学者为德国量身定做的国际角色，以应对重新统一之后国际形势的挑战；建构力量角色并非仅指德国的国际角色，中国、巴西等新兴国家也被德国政府赋予了建构力量的角色，而这些建构力量“应当”共同合作，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在与欧洲的关系上：德国要“和欧洲一同”以及“通过”<sup>⑤</sup>欧洲建构全球化，具体表现在：在国际事务中站在欧洲的立场上发声，与新兴的建构力量国家一起与欧洲并肩合作，既尊重欧洲各个国家的民族特性，也将欧洲

<sup>⑤</sup> Konzept der Bundesregierung, Globalisierung gestalten – Partnerschaften ausbauen – Verantwortung teilen, S.9., <http://www.bogota.diplo.de/contentblob/3606954/Daten/2357167/Gestaltungsmaechtekonzeptdt.pdf>, letzter Zugriff: 21.09.2014.

各国视作一个联合的整体。

在合作对象上：文明力量强调与价值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建构力量不仅看重德国与其他建构力量的合作，也看重欧盟与其他建构力量的合作，希望通过德国与欧盟的共同努力来维护欧洲的价值观念、利益和立场。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包括加强建设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欧洲外交部等。

在合作领域上：建构力量关注和平与安全、人权与法治国家性、经济和金融、资源粮食和能源、工作、社会福利和健康、发展和可持续性等重点，与文明力量角色的关注重点部分吻合，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经济和社会层面；建构力量理解的冲突不仅限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是更多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以及资源缺乏、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带来的冲突，而实现长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是尊重国际法和保护人权。作为建构力量的德国，其安全政策始终植根于北约和欧盟的框架之内，奉行多边主义。建构力量并没有否定甚至保留了文明力量角色在军事行动方面的原则，但显然并不以军事行动为其关注重点。

合作方式和手段上：在加强欧盟与建构力量合作的层面上，德国有意识地通过德国与中国、俄罗斯、墨西哥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来促进欧盟与之的合作，始终将欧盟作为德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框架。

### 三、关于外交角色转变的讨论

角色就其本质而言具有社会性，总是处

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按照社会、群体和他人对自己角色的概念以及对他人角色概念的理解而调节自己的行为。<sup>⑥</sup>角色固然有其相对稳定的一面，也具有更替性，在不同的环境结构下、不同的需求下，会发生变化。社会角色必然是社会存在的反应，也定会受到政治经济关系的制约，角色的产生是社会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sup>⑦</sup>

德国政府提出“建构力量”角色方案的出发点，是看到了国际社会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曾被称为是发展中国家或者门槛国家的那些富有影响力国家，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也参与建构着国际政治，他们对各自所在地区的合作产生重要影响，在国际问题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德国的角色方案中称这些国家为新建构力量，有两层涵义：第一，新建构力量有建构全球化的能力；第二，新建构力量有建构地区和国际合作的意愿。在此基础上，他们按照自己的设想影响着未来发展的结构，说服伙伴，影响国际议程。<sup>⑧</sup>德国意识到新建构力量的重要性，提出了与新建构力量对话与合作的方案，并且这一方案和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两大支柱完全一致，也遵循德国多边主义的外交传统，特别是在联合国、欧盟、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框架内合作。一方面，德国希望巩固既有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德国也希望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德国学者桑特施耐德教授认为，德国政府2012年关于建构力量的政府文件出台后，很难说会立刻给德国外交政策带来直接影响，然而作为研究和讨论的结果，这份文件的出

⑥ 奚从清，《角色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⑦ 同上，第14页。

⑧ Konzept der Bundesregierung, Globalisierung gestalten – Partnerschaften ausbauen – Verantwortung teilen, S.5., <http://www.bogota.diplo.de/contentblob/3606954/Daten/2357167/Gestaltungsmaechtekonzeptdt.pdf>, letzter Zugriff: 21.09.2014.

台本身就具有积极意味。

他指出，德国外交政策在寻求新定位的过程中，不宜太过拘泥于连续性，以免落入连续性的陷阱。例如，在价值观问题上，默克尔政府的执政协议中写有受价值观约束的外交政策，然而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尽管在各国概念相同，但概念所致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很容易导致双重标准出现。同时，过度强调德国外交政策的价值观基础，也容易为人诟病——为重大利益而在价值观上退步，这样反而有损于德国对价值观基础的坚持。由此可见，德国外交政策的价值观基础始终没有变化，有变的是坚持价值观基础的方式。桑特施耐德教授认为德国外交政策需要反思的能力、对国内国外环境的适应性和扩大行动空间。<sup>⑨</sup>

德国之所以给发展中国家一个新的角色，离不开德国和欧洲最近几年的发展情况。自从2007年末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蔓延到全球，欧洲先后经历了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尽管德国因其莱茵兰模式能够在危机遍布时独善其身，并能对欧元区克服危机施以援手，但是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动机，德国的确从机制上、从资金上为欧洲走出危机付出了巨大努力，曾多次寻求外界帮助。据2012年的报道，在当年的G20峰会上，发展中国家成为欧债危机的援助主力。经济刺激措施、救助机制、金融秩序的重建都是应对危机的具体做法，然而在这些机制需要真正发挥作用，需要所有参与其中的行为主体都有积极参与的意愿。而这种意愿，要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视角上，俯视的立场远不

如平视的立场能够实现真正的合作。因而，承认并强调新兴国家的重要性，指出他们对全球化的影响力，赋予他们新建构力量的角色，改变了德国政府一贯以来的以价值规划分伙伴关系的做法，树立起新的理念。

回顾德国自二战以后的发展，西方一体化政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是保障德国富强、安全、富有国际影响力的根本要素。随着全球化的波及，德国受益匪浅，在西方制度和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优势的双重作用下，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美国在欧洲的部署越来越有选择性，这就意味着德国，甚而欧洲应当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这种国际责任表现在参与海外维和军事行动上，更表现在建构安全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和财政秩序，避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发生在应对能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德国认为，西式民主国家比发展中的威权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强，<sup>⑩</sup>因而有责任去推动建构一个新的全球化秩序，这意味着德国外交政策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加入新的元素。“新”表现在重新建构德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特别是新兴国家。这一点从德国政府的角色方案文件中可以看到明确的表述，德国政府规划了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的六大领域：（1）和平与安全；（2）人权和法治国家性；（3）经济和金融；（4）资源、粮食和能源；（5）工作、社会福利和健康；（6）发展和可持续性。为了促成德国与发展中国家在这六个方面的合作，德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协调措施，由多个部门携手合作。相对于文明力量角色而

⑨ Sandschneider, Eberhard: Deutsche Außenpolitik: eine Gestaltungsmacht in der Kontinuitätsfalle, <http://www.bpb.de/apuz/75784/deutsche-aussenpolitik-eine-gestaltungsmacht-in-der-kontinuitaetsfalle-essay?p=all>, letzter Zugriff: 21.09.2014.

⑩ SWP, GMF, Neue Macht, Neue Verantwortung – Elemente einer deutschen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für eine Welt im Umbruch, S.1-6.

言，这样的侧重点是一种新元素。

但从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来看，德国致力于追求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国家性以及普世规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始终在联合国、欧盟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框架内行动。同时，德国的经济实力源于贸易和出口，因此，通往其他国家市场和原料的贸易渠道对德国的发展至

关重要，德国也意欲保护和加强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对于高速发展却无意采取西方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德国将保持和他们的关系，可能从短期看价值观和利益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或者可以进行平衡，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西方民主的价值观导向将会始终是德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利益。

作者简介：于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 美国国安局窃听事件对德美信息安全合作的影响

田佳峰

**【摘要】**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担风险。美国情报局大规模的监控引起全球不满，尤其德国总理默克尔被监听一事引起德国民众对美国的强烈批评。但德美政府在军事及信息安全方面仍维持着紧密的合作，德国也继续从美国那里得到大量信息并享受其提供的保护。这不得不让人疑惑：在维护公民自由、保护隐私的价值观与反恐、保障自身安全的利益之间如何抉择，德国是怎样权衡与博弈的。本文从德国各界态度、相互博弈、两国信息安全合作及德国对策等几方面分析了德国的行为并预测了两国关系走向。

**【关键词】**信息安全 德美合作 监控事件

科技的发展是把双刃剑。《侏罗纪公园》生动地体现了人类能够用高压电网来制服恐龙，但一旦电网受损，人类瞬间渺小到被恐龙任意宰割的残酷问题。科技的发展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也使人们过度依赖科技。人类受惠于现代通信网络，又使自己陷入虚拟世界纷繁的漩涡里。

由美国国安局监听事件引出的美国情报局监控全球通信网络的事件从2013年6月起就一直未断，美国不仅监听如中国等对手，就连其忠实盟友德国都没能逃过此劫。美国情报部门为什么会监听德国，这个二战后由敌人转化为朋友，同时也是美国在全球最紧密的盟友之一的国家？而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

策源国，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的德国，对于这次监听事件是怎样反应的？这轮监听冲击波对德美信息安全合作的影响又有多大？

## 一、德国各界态度

### 1. 德国政府

为了顺应局势和民意，默克尔对她大西洋对岸的朋友表示了不满：“窃听，不应是朋友之间的行为。”但她还是保持克制，极力寻求与美国的交流协商，其谈话中最常听到的是“重建信任”，以此巩固双方合作的基础。为了不激怒美国，德国政府表示不会为斯诺登提供避难。

就在美国“棱镜计划”(PRISM)曝光后不久,2013年7月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电话会谈,就近来美国针对欧盟的监视事件展开讨论,奥巴马希望通过这次谈话消除德国乃至欧洲方面对美国监视计划的担忧。尽管该事件对美欧关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二人在电话中依旧向对方保证,会在7月8日如期开展有关《美欧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2014年7月美国间谍被揭露几天后,默克尔就与奥巴马通了电话,两人在美德情报合作的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奥巴马表示将与德方保持密切沟通,以使该领域合作向前发展。声明称,两国领导人继续敦促俄罗斯立即采取措施缓解乌克兰东部紧张局势,并重申美国将与欧洲国家保持紧密协作,以在必要时令俄罗斯付出更大代价。在伊朗核问题上,两国领导人表示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步骤,向国际社会证明其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从此可看出,在国际重大安全问题上,德国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合作以及保护。

## 2. 各议会党团

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反对监控及网络攻击,注重信息安全,把国家网络安全纳入防御高科技袭击范围内,控制情报局的行为。

盗版党主张成立调查委员会,取消在德国活跃于情报工作的外国企业的特权。废除外国在德国的监控基地,如Dagger-Komplex。

绿党要求美国驻法兰克福领事馆解释监控事件,进行调查,限制乃至终止情报局间的合作。终止自贸协定谈判,引渡斯诺登来德国。

左翼党要求审查盟军特权或北约框架内的成员国权力是如何危害德国法律的。主张废除情报局,结束战略通信监控。援引法律来支持引渡斯诺登来德国。

## 3. 民意调查

“《经济周刊》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 für die “Wirtschaftswoche”)57%的人们认为互联网信息没有得到足够保护,17%认为国家处理个人信息很谨慎,16%没有任何顾虑,大多数人不信任经济界和国家,因为科技的发展便利了国家对公民的监控。

“福尔萨民调”(Forsa-Umfrage)72%的被访者认为联邦政府应对美国施加更大压力,78%认为NSA调查委员会没有说明清楚间谍事件的来龙去脉,69%更信任欧洲供应商,48%对网络服务商的信任有所或急剧下降,2%在获悉窃听事件后修改了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的密码,4%计划修改,94%不会改,这是因为他们很多人使用德国企业提供的电子邮件服务,而且也没有别的搜索引擎或社交网络的替代品。48%的被访者认为德国或欧洲供应商更加关注数据安全或个人权利。73%认为政府应努力保障数据交换安全和网络个人权益。

《星期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 GfK)访问了984人,76.9%改变了处理个人信息的方式,12.2%较少使用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如在线存储和邮箱门户,3.8%换别的电脑程序甚至机器。41.9%认为数据得到足够保护,49.8%认为没什么可隐藏的。结果存在年龄差异,年轻人更无所顾忌,14到19岁的人中90%没有改变行为,大学毕业生考虑改变行为,其中20%已经改变,还有56%认为已经够了。

“汉堡IPSOS所”(Hamburger IPSOS-Instituts)53%被访者和近三分之二的20岁到39岁被访者期待国家立即采取措施。

监听事件被爆出后德国民众反映强烈,议会党团及非政府组织给政府施压,德国政府开始反思自己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漏洞,包括容忍盟国监控的合法化,并向美国政府

施压。但由于德美的跨大西洋关系关乎德国的国家利益，德美相互依存，德美安全政策偏好同质性大于异质性，所以合作是主流，两国不会因为该事件撕破脸。

## 二、从博弈论角度看

德国从美国的情报活动中既得到好处，同时又不得不忍受被监控，德国如何选择，就看与美国如何博弈。

博弈论的中心思想是将具有自主利益的行为体设定为理性行为者，假设它们在给定的规则条件下，在预测其他参与者行为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行为类型（如合作、背叛等）所获得的结果进行得失比较，进而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策略。博弈论实质上是关于策略相互作用和理性行为的理论。

在很多现实主义者看来，在国际政治中取得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各国之上没有一个共同的政府来强行施加规则和法律。以国内社会的标准来看国际社会的机制是非常脆弱的。在这种脆弱的机制下，国家之间的欺骗极其普遍而且不可避免，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但事实上我们通过对现实的观察不难发现“合作”并不等同于完全的“和谐”。和谐要求参与者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但合作可以发生在利益相互补充或彼此依存的情况下。合作的各方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满足其他合作者实际的或期望的“偏好”。因此从道义上讲，合作也许不是一种最佳的状态，但它一定实现了利益的较为完美的调和。合作基于互惠。基欧汉把互惠界定为“大致相等价值的交易，在这一交易中，一方的行为取决于他方之前的行为，以善报善，以恶报恶”。

德国可以选择与美国终止情报合作，但德国民众却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高科技产品，

而且德国也得不到美国情报局搜集的信息与提供的保护。德国这样做非但没有获利，反而承受很大损失。那么德国与美国继续合作的话，德国可以继续搭美国信息霸权的便车，又可以在全球地区冲突中与美国一起维护共同价值与利益。

## 三、德美信息安全领域的合作

信息安全指的是信息技术加工的保护，体现了一个运行有效的系统。信息安全常指全球范围内的。应运用保护措施限制信息的获取。

早在四大战胜国对德国分区占领后，各国就采取监控政策，为了防范敌对势力对自己政权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在冷战紧张的局势下，情报间谍工作已成为战争的一部分，美国实行双重遏制政策：一方面通过在西欧建立反对力量以遏制前苏联；另一方面通过把西德融入西方盟友体系和自由经济世界来遏制西德。美国由于在德国建立很多军事基地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对德国监控最为凶猛，1955年《德国条约》签订后盟军保留了监控特权、情报机构特权和紧急情况特权等。1968年通过的《限制通信邮件和电信保密法》（Gesetz zur Beschränkung des Brief, Post- und Fernmeldegeheimnisses）也叫G10法，使战胜国对德国的监控合法化和规模化。后来即使德国统一后这个法令因为其隐秘性也没被废除，“9·11”事件后美国又加强了在德国的反恐配置，如在德国斯图加特的非洲司令部就全权统率美国在非洲的反恐行动。

在安全机制合作上，2001年11月，即“9·11”事件发生后两个月，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即与15个欧盟成员国以及加拿大、日本和南非等国共同签署了《网络犯罪公约》（Cyber-crime Convention），这标志着美国政府网络空间国际技术合作与军事合作得到了继续

深化。2011年美国通过规模不断扩大的网络空间联合军演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同时与更多国家在网络空间联合军事行动中逐渐达成默契。2010年9月，美、英、法、德、意、日等13国举行的“网络风暴3”联合军事演习反映出美国政府的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思维，其中凸显了“同盟资源”的重要意义，将美国政府在传统国际政治领域业已掌握的政治资源引入网络空间，希望试图通过建立美国网络空间主导体系下的政治、军事“同盟”或“准同盟”，以网络空间“集体安全”来应对新时期美国网络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2000年美国商务部与欧盟委员会签订了《安全港协议》，允许欧洲企业把个人数据合法转到美国，它用于调整美国企业出口以及处理欧洲公民的个人数据（例如名字和住址）。《安全港协议》要求：收集个人数据的企业必须通知个人其数据被收集，并告知他们将对数据所进行的处理，企业必须得到允许才能把信息传递给第三方，必须允许个人访问被收集的数据，并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安全性以及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条款得到遵从。该协议便利了欧洲数据大量转运到美国。

2009年教育部长莎万提到，德美要在共同研究项目开发创新的安全解决办法，来保护跨大西洋社交网络的开放性与自由性。德国“公民社会安全研究”项目就在实施联邦政府的高科技战略，旨在于保护民众免于有组织的犯罪、恐怖袭击、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事件的伤害，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比如能源供应、交通网络和电信。德国认为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法律、伦理及社科问题要一起解决。在这点上德国要与美国合作。

#### 四、德国对策

德国经济界从2013年11月起开始讨论

欧洲内部的通信网络问题。德国电信表示将与其他合作方共同建立起一个德国的网络。据《法兰克福汇报》的测试，如今经过美国的信息量与几年前相比已经明显减少。德国“焦点在线”称，德国电信的计划也遭到质疑——建立欧洲内部的信息网络无法制止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行为。

德国与巴西于2013年11月1日向联大第三委员会提交有关反对大规模监控的决议草案。此草案中，德国与巴西要求结束大规模监控行为，同时保障民众享有通信的隐私权。草案呼吁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对大规模监控造成的侵害予以关注。这份决议草案没有指明针对任何国家，但与美国近来被不断揭发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监控行为不无关系。

德国2013年提出与美国签订《互不监听协议》。在美国看来，德国的要求等于要加入“五只眼”情报联盟。“五只眼”情报联盟源于英美两国二战期间双边签署的情报合作协议，两国情报机关通过紧密合作，成功破译德国和日本的密码。战后，这一联盟扩大到五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三个英联邦国家，称为“五只眼”。五国除了分工合作监视全球外，还承诺互不监听对方。“五只眼”是清一色讲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可谓“同文同种”，其成员属美“一等”铁杆盟国。对德国加入“五只眼”的要求，美国2013年还是迫于舆论释放出有可能签订的暧昧信号，但最后还是拒绝了。美国一是不放心，对德国人还是心存芥蒂。二是怕攀比，如德国“免监听”，其他“二等”、“三等”盟国怎么办？如果不同意，就意味着“歧视”这些国家；如果同意，则意味着“五只眼”扩员没完没了。三是担心“五只眼”将变成一个“大杂烩”，鱼龙混杂，很难让美国放心，其工作效率、保密能力也必将严重下降，很可能意味着“五只眼”会名存实亡。

## 五、小结

国家要生存，就要维护利益。美国监听德国，德国监听土耳其，但美国、德国和土耳其都是北约成员，之间有密切军事合作。各国都在博弈中寻求最大利益的实现。德国虽然对美国监听有所不满，但受制于美国安全层面的保护也不敢发作，毕竟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美欧还是有共同的利益，两方是最有可能合作，也只能合作来维护彼此的利益，不论是在解决乌克兰问题、对抗俄罗斯，还是打击极端组织，打击阿富汗恐怖分子等，德国都必须与美国合作，依赖美国以保全自己。所以，监控虽然不符合民主国家宣扬的保护公民自由、保障公民隐私的价值观，德国还是选择了淡化价值而保护国家安全，体现了德国现实主义的考虑。

德国对监控事件的反应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民众，二是政府。德国的媒体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外的第四种力量有很大独立性，为了吸引眼球，获取利益，倾向于把事件夸张化，做的民意调查也是为了调动民众不满，民众掌握的信息不完全，反过来也很容易被媒体煽动，两方互相促进，就形成了德国公众的反美情绪。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并没有因此减少与美国的情报沟通，面临共同挑战时双方的合作反而更加紧密。国家获

取军事情报不受法律约束，因为没有超国家的机构及法律来规范国家为保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美国“棱镜计划”有两方面作用：一是保卫军事和国家安全，继续主导世界；二是在军事和国家安全之外的其他领域获取竞争优势，如经济、外交领域。其他国家也有类似项目所以无可厚非，只是美国在这方面优势太明显以至于掩盖其他国家。这体现了美国的野心和面临新兴国家崛起及中东变局带来的挑战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德国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反映了德美“普适人权”的尴尬。

事件曝光后德国依旧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可以看出德国希望维护跨大西洋联盟，德国必须允许美国采取一定手段来达到目的，因为只有这样，德国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当目的和手段不一致时，德国必须承认目的的重要性。德国想和欧盟建立自己的信息沟通体系以防范美国的监控，现在来看太幼稚，不可行。所以，双方既进行合作又有矛盾。但由于德国与美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德国不敢与美国撕破脸，所以合作仍是主流，美国监听事件对德美信息安全合作不但没有阻碍，反而有促进作用。德国受惠于美国的技术，因而可以学习美国先进技术，在很多领域达到自己到不了的高度。

作者简介：田佳峰，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 **经济视野**



# 欧洲央行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殷桐生

**【摘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当今世界上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国际金融领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当下，美联储已经宣布2014年10月底正式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则宣布，2014年10月正式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自然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本论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主要想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本体，与传统货币政策的异同，欧洲央行推行该政策的进程、效果来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欧洲央行推行该政策做一个解剖和分析。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欧洲央行 流动性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风乍起，吹皱了整个世界，也吹醒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施展出浑身解数来继续医治资本主义的痼疾，维系其生命。其中突出的一个手段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14年10月底美联储决定正式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却宣布，欧洲央行正式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自然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 一、何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 Quantitative Lockerung）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由中央银行“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指定金额的货币，即间接增印钞票，通过购买国债、给接受存款机构提供信贷、从银行购买资产等手段，增加基础货币<sup>①</sup>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以降低政府债券的收益率，降低银行同

① 基础货币，也称货币基数、强力货币、始初货币，因其具有使货币供应总量成倍放大或收缩的能力，又被称为高能货币，它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债务凭证，表现为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公众持有的通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基础货币指的就是真正印刷出来钱的总量。基础货币是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借以创造存款货币的基础，是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得以倍数扩张的源泉。

业隔夜利率，使银行因此而较愿意提供贷款以赚取回报，从而舒缓市场的资金压力。因此这一政策也叫QE货币政策或量宽货币政策。

“量化”指创造指定金额的货币，“宽松”则指降低银行的资金压力。当央行收购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债券时，新发行的钱币便被自然地投入到银行和金融机构内，为银行体系注入新的流动性。量化宽松政策所增印的钞票金额巨大，涉及的政府债券，数额惊人，周期也长。一般来说，只有当一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诸如利率、汇率、货币量等常规货币工具不再有效的情况下，央行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使银根松动，使货币倾向贬值，因此政府通常都是在经历通缩时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产生

世界第一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开始于1997年，采用国是日本。当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实体经济严重衰退、利率已无下调空间、信贷规模急剧萎缩，陷入严重的“流动性陷阱”。于是日本央行便采取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利用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同时借助货币乘数效应进一步扩大市场货币供给量，以此来建构宽松的金融环境。然而事与愿违，日本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给它带来多大的转机。

世界第二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开始于

2009年，采用国主要是美国。当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很快波及金融领域，并传播到全球，成为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3月为应对本次危机，英、美两国央行先后实行“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3月英格兰银行在数次下调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又将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sup>②</sup>3月12日，它向国内机构投资者收购政府债券，金额高达20亿英镑；3月18日，美联储宣布用1.15万亿美元向市场购买美元国债、机构债券以及抵押债券，也正式开始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sup>③</sup>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开动印钞机印制巨额美元纸币这样的举措实在出人意料，因而也就给全世界带来了极度的不安，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对浪潮。然而，同样令人意外的是，人们描绘、抨击的QE政策惊人的恶果并没有普遍、大量、持续地出现。例如，从2012年9月以来，以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维持在1.5%不变，以美联署美元指数来衡量的美元对全球其他货币汇率上涨了6.7%，<sup>④</sup>美国经济也有了起色，于是美国连续三轮实施该项政策，并取得一定的效果。2014年美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达到15.3%，竟与中国一起（中国的贡献率为27.8%）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力量。<sup>⑤</sup>因此尽管对QE政策至今评价不一，越来越多的国家却群起而效尤，推行这一货币政策。虽然由于经济状况、金融体制、经济政策目标等领域的具体情况不同，所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量化规模以及实施速度等也都不尽相同，但基本的操作模式却很相似。

② 汪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研究》，载豆丁网，2011年6月30日。

③ 其实20世纪末美国在度过了10年经济增长长期之后，经济增长开始下滑。于是2001—2003年美国就已经开始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使经济得到快速的复苏，就业率大幅度上升。但全面地看，还算不上正式的QE政策。

④（作者不详）：《美联署宣告终结“量化宽松”政策》，载《参考消息》，2014年10月31日。

⑤ 吴成良：《世界经济复苏期待新动力》，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3日。

今天，当人们面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现实思绪逐步平静的时刻，当一贯保守的欧洲央行也要正式实施量宽货币政策时，再来剖析一下该政策还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

### 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的异同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同传统货币政策之间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本质和做法上又有很多不同。它们这种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sup>⑥</sup>

#### 1. 内涵的异同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同传统货币政策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只是扩张货币政策，不含紧缩货币政策。它同扩张货币政策有很多相同之处，同紧缩货币政策则几乎无相同可言。

#### 2. 规模的异同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同传统扩张货币政策都要增加投入的货币量，扩大流动性，但金额一般都要大得多。例如，美国首轮 QE 政策新增的货币量就高达 1.15 万亿美元，其货币量与 GDP 的比例增幅超过了 7%，大大越出了危机前 10 年 1.7% 的年均增幅；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规定，从 2010 年 11 月到 2011 年 6 月新增货币量为 6000 亿美元，用以购买美元长期国债，每月购进 750 亿美元；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政策则进一步加码，实施每月总额 850 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即每月购买 400 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 450 亿美元中长期国债。这在一般性扩张货币政策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 3. 目标的异同

传统货币政策一般奉行下列目标：稳定物价、调节信贷、掌控利率、对实体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使经济健康发展（既不过热也不过冷），此外还奉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竞争力和国内购买力、寻求对外经济平衡等目标。至于传统扩张型货币政策的目标则是提高货币量、增大流动性、降低利率、增加消费、扩大信贷、刺激投资、促进增长。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具有上述的一般功能，但有实质上的不同，那是货币当局出于应对货币市场中流动性全面紧缩困境而采取的一项极端措施，目的在于通过投入巨额货币，迅速恢复国内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促进金融和物价稳定，刺激出口，抑制进口，拉动经济的增长。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人们就不能不怀疑美国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发行美元纸币还会有其他的目的：如使债权国的美元财富缩水，输出通货膨胀，推动非美元货币（特别是人民币）增值，提高国际大宗产品的交易价格，压缩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便于其资本扩张。

#### 4. 工具的异同

央行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贴现政策、抵押贷款政策、公开市场政策、外汇市场干预政策和最低准备金政策，其他还有口头市场干预、利率政策和立法干预等。欧洲央行则是将第一、二项合并为经常贷款，其中的最高再融资贷款相当于德国的抵押贷款，存款贷款相当于德国的贴现。在推行扩张货币政策时，人们就会相应地降低利率、贴现率、抵押贷款利率、最低准备金率，买入各类有价证券，加强对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干预。

<sup>⑥</sup> 王吟：《欧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研究》，载中国期刊网，2013年5月30日。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采用了上述这些工具，但重点放在公开市场政策、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上，因为贴现、抵押贷款和最低准备金政策的金额都相对较小，干预的功能自然也就较小。此外，量宽货币政策还大大扩张了相关货币政策工具的内涵，如扩展了公开市场操作的空间，扩大了抵押品标准，延长了各项贷款的期限，在降低获取流动性成本的同时刺激消费贷款以及中小企业贷款，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流动性，把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对象直接延伸到实体经济。

### 5. 传导途径的异同

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中央银行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金融市场传导至企业和居户，影响其生产、投资和消费等行为。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是通过信贷、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等渠道进行的。其具体途径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各类经济主体。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仍然采用上述渠道，还直接采用直通实体经济的途径，强调全面疏通通往实体经济的渠道，同时为应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需求，采取措施全面修复业已损坏的金融市场信贷机制。尤其重视核心利率→货币市场与主权债券市场的关键利率→商业银行对其客户提供存贷款的利率→实体经济部门投融资成本格局这一传导渠道的疏通。

### 6. 各国配合的异同

传统的货币政策属一国的主权，一般都是各国独立决策、独立实施；采用固定汇率的国家可以有相互支撑收购的联合行动；诸如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货币联盟也会有联合的行动。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与此不同，是多数独立主权国家采用协调一致、行动一致的货

币政策，从而降低了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向国内传导的危害，也优化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效果。但美国是个例外，它长期处于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这不仅决定了它可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也决定了执行QE政策时仍要以它为核心。

### 7. 操作内容和处理方式的异同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操作内容和处理方式上同传统货币政策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却具有很大的政策操作灵活性，政策可信度也高。世界主要货币当局可以同步降息并采用众多的新货币政策工具，这就可以大大减少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最大限度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此外，所有QE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和使用都要求公开、透明，政策的具体操作细节、政策工具的实施背景、操作计划和规模都要公布。连资产负债表的操作也同样如此。

### 8. 政策期限的异同

传统货币政策一般是长期的且比较持久，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多是临时性的，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变性。这主要是因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应急之举，是应对危机的特殊手段，是扩大流动性的短期行为。各主要经济体将根据经济复苏以及金融危机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退出或终止该政策工具的使用。

## 四、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欧洲央行是依照德国央行的模式建立的，而且长期受德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一直奉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保持货币稳定、控制通货膨胀为主要战略，坚持通胀率不得超过2%，即便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时依然不改初衷，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态度暧昧

并始终保持距离。然而残酷的现实却迫使它也不得不直面这两场危机，采取一些下调主导利率、扩大流动性的举措，但始终不照搬美国的QE政策，特别是不采取欧洲央行一竿子插到货币市场、插到实体经济的渠道，来直接干预市场、直接购买政府债券，而是通过各家银行来实施，搞间接干预，将各类举措控制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范围之内，并强调它执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常规货币政策的补充，而不是代替。这就有别于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那是常规货币政策的替代。于是欧洲央行的这一货币政策也被经济界和金融界称之为“变相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或“极端的膨胀货币政策”。因此，当特里谢发现国际金融危机即将过去时，便立即做出决定，最晚在2011年开始实施退出战略，全面采取紧缩、整治政策。2011年4月和7月他竟然“置债务危机国家死活于不顾”两次上调主导利率。2011年11月1日欧洲央行新行长德拉吉上台后力排德国的主张，改变特里谢的方针，接受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思路，推行欧洲央行应承担“最后贷款人”的理念，采取了一系列量化宽松的举措。2014年9月4日他更是正式宣布将于10月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sup>⑦</sup>

欧洲央行推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开始于2007年，至今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国际金融危机阶段，欧债危机阶段和欧债危机走出低谷后阶段。

## 1. 国际金融危机阶段

面对日益加剧的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央行向本地区金融市场逐步注入流动性，从而拉开了其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大幕。2007年8月9日，欧洲央行采取了三项措施：1)宣布

将按照4%的官方利率水平向欧元区各商业银行提供无限的隔夜拆借流动性资金援助，向欧元区内47家银行提供948亿欧元的短期流动性；2)实施补充性再融资政策，调整资金拆借的利率期限结构，扩大三个月和半年期资金拆借的规模，缩小短期资金拆借所占的比例；3)建立了与全球主要央行（特别与美联储）之间的货币互换机制，以此保证可以在欧元资产作为抵押的条件下向市场提供美元等货币的流动性。2008年10月13日，美联储进一步宣布取消与欧洲央行之间进行货币互换的美元上限。

2008年美国雷曼公司倒闭后，欧洲央行率先并一再下调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在2009年5月之前的七个月内，欧洲央行的主要再融资利率总共下调了325个基点，达到1%。然而随着危机的不断发酵，常规的利率传导机制已被切断，欧洲央行不得不采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拓宽公开市场的操作框架，突破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扩大公开市场微调操作时的作用对象，将此前约140家金融机构增加至2000家，并宣布正式启用半年期和一年期的相关再融资操作，延长向公开市场提供资金流动性的持续期限。

欧洲央行也开始采取更多的手段来扩大流动性的提供，如购买债券的方式。2009年5月，欧洲央行决定实施600亿欧元的有价债券购买计划，把参与欧洲央行实施主要再融资操作的300家金融机构增加到800家，并采取了调整资产负债表这一手段。2009年7月，欧洲央行正式推出资产担保债券购买计划(CBPP)，直接购买以欧元计价的资产担保债券。<sup>⑧</sup>

采取上述方针后，欧元区的金融市场

<sup>⑦</sup> 肖立晟：《解读欧央行再次降息 拉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幕》，来源：学术独立团，2014年9月12日。

<sup>⑧</sup> 宋洋：《欧洲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状况得到逐步恢复，宏观经济也开始复苏，2009年第三季度欧元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有了恢复性增长。2009年12月3日，欧洲央行声明将逐步退出此类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防止过度使用此类政策会对金融市场的正常合理发展形成干扰。

## 2. 欧洲债务危机阶段

2009年12月8日，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在如何应对问题上欧盟内部意见分歧，众说纷纭。特里谢则是以不变应万变，坚持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方针，实施一贯的紧缩货币政策。德拉吉接替特里谢担任欧洲央行行

长后，便反其道而行之，停止执行退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千方百计地扩大流动性的供给。

### 1) 下调基准利率，将欧元区基准利率维持在超低水平

将主要再融资利率(基准利率)保持在超低水平甚至确定下限为0，属于常规货币政策的非常规化操作，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央行采取的方针。德拉吉上台3天，就首次下调欧洲央行的三大主要利率，即存款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隔夜贷款利率，一个月后再次下调，2012、2013年又三次下调，使主要再融资利率最终降至历史低点：0.25%。

表1 2008—2013年欧洲央行的三大利率变化

日期	存款利率	主要再融资利率	隔夜贷款利率
2008.10.15	3.25	3.75	4.25
2008.11.12	2.75	3.25	3.75
2008.12.10	2.00	2.50	3.00
2009.01.21	1.00	2.00	3.00
2009.03.11	0.5	1.50	2.5
2009.04.08	0.25	1.25	2.25
2009.05.13	0.25	1.00	1.75
2011.04.13	0.5	1.25	2.00
2011.07.13	0.75	1.5	2.25
2011.11.03	0.5	1.25	2.00
2011.12.08	0.25	1.00	1.75
2012.07.11	0.00	0.75	1.50
2013.05.02	0.00	0.50	1.00
2013.11.13	0.00	0.25	0.75

数据来源：欧洲央行。

### 2) 扩大流动性，购买各类债券和国债

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银行业流动性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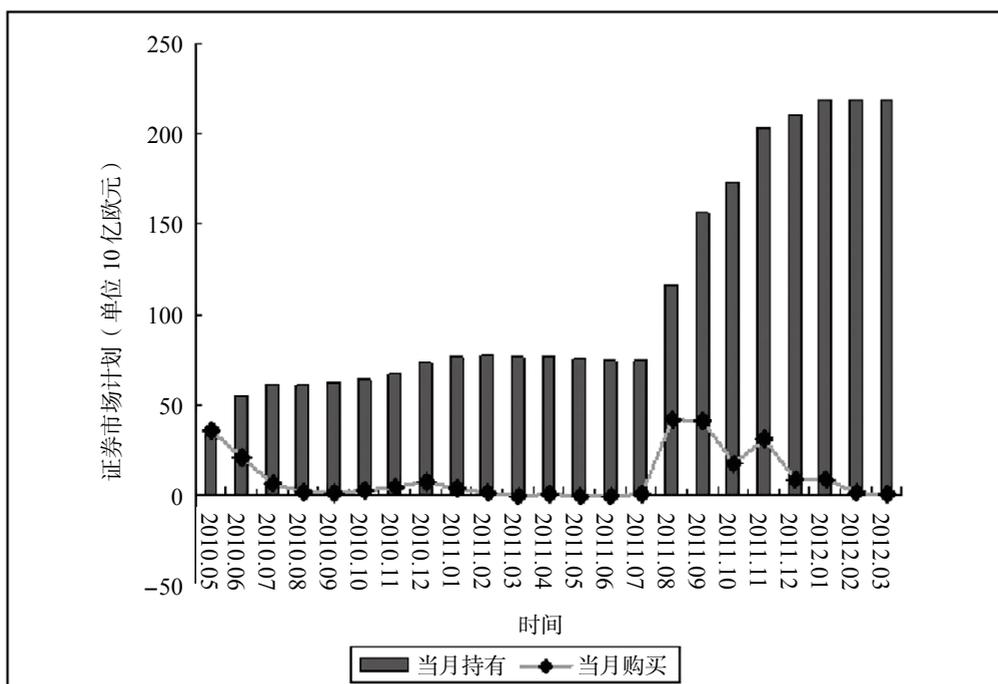
紧，借贷成本急升，惜贷情绪蔓延，很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都高度依赖欧洲央行

的融资。于是欧洲央行便推出了各类计划，向它们提供各类信贷，购买各类债券和国债，扩大流动性。

#### A. 推出证券市场计划 (Securities Markets Programme, SMP), 购买成员国国债

2010年5月14日，欧洲央行就已经推出证券市场计划，允许欧洲央行购买成员国的政府国债。截至2012年3月5日，欧洲央行持有的债券规模已达2195亿欧元。仅仅从希腊欧洲央行就购买了500亿欧元的债券。

图 1



数据来源：欧洲央行。

#### B. 长期再融资操作计划 (Long Term Refinance Operation, LTRO)

2011年10月，欧洲央行重启一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2011年11月，推出了新的资产担保债券购买计划 (CBPP2)，购买额度为400亿欧元。12月21日，又推出三年期再融资操作计划，并调低了欧元区银行借贷的抵押和保证金要求，向523家欧元区银行提供三年期低息贷款，总额达到4890亿欧元；2012年2月28日又推出第二轮三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向800家银行提供3年期低息贷

款，总额达到5295亿欧元。这两次三年期再融资操作计划被称为“欧版量化宽松计划”，或是“变相”的量化宽松举措，因为央行并不限制银行拿这些钱去买入欧元区国家发行的国债。这实际上就打通了央行直接购买问题国家国债的渠道，法国总统萨科齐更是公开建议银行利用从央行获得的廉价贷款，去购买欧元区国家发行的高息国债，并从中套利。不少人认为，欧洲央行的这一举措，有助于大大降低欧洲重现“雷曼式”事件的风险。<sup>⑨</sup>

⑨ 摘自百度百科：欧洲央行。

### C. 直接货币交易计划 (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 OMT)

2012年9月6日, 欧洲央行暂停了证券市场计划, 开始执行直接货币交易计划, 决定在二级市场无限量地购买欧元区成员国发行的政府债券。这一计划的特点: 一是无限量; 二是从投资者手中的二级市场上直接购买; 三是启动条件严格, 从而使欧洲央行正式承担起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的“最后贷款人”角色。

#### 3) 扩大对成员国的信贷规模

欧债危机爆发后, 欧猪五国备受煎熬, 欧盟央行不得不突破“不当最后贷款人”的藩篱, 向希腊等国提供资金援助, 例如2010年4月便向希腊提供了1073亿欧元的资金援助, 包括信贷、资助和债务减免; 2012年2月再次向其提供1300亿欧元的资金援助。2010年11月28日, 欧盟、IMF向爱尔兰提供总额为850亿欧元的资金援助等等。与美联储不同, 欧洲央行提供信贷的规模大于购买资产的规模。

#### 4) 资产负债表策略 (Balance Sheet Policy)

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是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进行政策操作等活动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存量表, 从中可以有效评估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执行成本, 央行则可以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来实施自己的货币政策。

欧债危机爆发后, 欧洲央行也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和调整资产负债表项目结构来实现提供流动性等目标, 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始终呈上升态势。到2012年3月2日为止, 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就突破了3万亿欧元, 一年之内增加了56.8%, 是2008年3月的2.19倍。

### 3. 欧债危机走出低谷后阶段

欧债危机走出低谷后, 欧盟经济出现了复苏的曙光, 然而好景不长, 很快就再现低迷。有鉴于此, 2014年6月,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进一步下调利率; 9月4日, 更是宣布将于10月开始正式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具体措施如下:

#### 1) 进一步下调利率

6月欧洲央行决定将主要再融资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0.15%, 隔夜贷款利率下调35个基点至0.4%, 存款利率(仅限于金融机构存放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非法定存款准备金)下调10个基点至-0.1%。这是世界上一个主要银行首次将存款利率调至负值。

9月4日欧洲央行又决定, 自2014年9月10日起再次下调三大利率各10个基点, 存款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隔夜贷款利率分别降至-0.2%、0.05%和0.3%。

#### 2) 启动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TLTRO)

2011年和2012年欧洲央行推出了两轮三年期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2014年6月欧洲央行又通过了第三轮长期再融资操作, 起始规模为4000亿欧元, 定名为“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 规定必须将这些资金借贷给非金融企业及家户, 不得用来购买政府债券或是用作住房抵押贷款, 否则欧洲央行将迫使它们提前偿还贷款。

#### 3) 购买资产抵押证券 (asset-backed securities, ABS)

资产抵押证券是以资产(通常是房地产)的组合为抵押担保而发行的债券, 是以特定“资产池(Asset Pool)”<sup>⑩</sup>所产生的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流为支撑在资本市场上发行的债

<sup>⑩</sup> 把资金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个像蓄水池一样的储存资金的空间, 通常用在集资投资房地产或是保险领域。

券工具，具有广泛的产品组合，并在新增信贷流向中起着指导作用。欧洲央行于2014年10月份开始购买ABS。除了此前市场预期的中小企业ABS外，还包括住房贷款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 MBS），也称住房按揭证券（Resident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RMBS），是一种打包协议形式的金融产品，投资人从该产品中所取得的现金收益是由购房者根据相应的贷款协议支付的本息来支持的，占欧元区证券化市场比例超过50%。德拉吉透露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将会增加0.7万亿欧元，增至2.7万亿欧元，暗示此次欧洲央行将会注入约7000亿欧元。

与此前的LTRO和TLTRO相比，ABS购买计划的不同之处在于：欧洲央行将会直接进入市场购买资产，而非将该类资产作为抵押品，而且，欧洲央行不会冲销购买计划中投放的流动性。于是，这就成了欧洲央行正式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标志。

#### 4) 购买资产担保债券 (CBPP3)

欧元体系将购买一整套由小额信贷机构发行并指定支付地点的资产担保债券，如资产担保债券项目（CBPP3）。由于欧洲央行购买国债所面对的政治阻力太大，于是便先由资产抵押证券入手。这近似美国推出QE3的情况。

## 五、欧洲央行变相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

欧洲央行逐渐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特别是德拉吉上台后，

力排德国的反对，加大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力度，三大主要利率下调，基础货币迅速扩张，消除了流动性短缺，金融系统逐步稳定，欧洲央行成了“最后贷款人”，为克服欧债危机做出了贡献。

但我们也看到欧洲央行实施的变相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也是有限的，甚至有反作用；欧元汇率有所回落，但幅度不大，对欧元区出口的拉动作用有限，自然溢出效应也低，对非欧元区国家的负面效应也少。

### 1. 基础货币迅速扩张，欧元体系的资产负债规模激增

自2007年8月以来，欧洲央行逐渐增加其流动性供给，随着LTRO两轮三年期低息贷款计划的实施，欧元体系资产负债规模也迅速膨胀。到2012年3月2日，欧元区的基础货币比2007年1月增加了近260%，年增长速度超过50%。欧元体系资产总量也从2007年1月的11,383亿欧元扩张到2012年3月的30,232亿欧元。

### 2. 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压力开始缓解，欧元区整体政府债券的长期收益率开始下降

2011年12月以来，由于LTRO计划启动，欧洲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压力开始缓解，欧洲货币市场的3个月同业拆放利率（Euribor）<sup>①</sup>和隔夜指数掉期<sup>②</sup>的利差迅速回落。欧元区整体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开始震荡下行，除希腊之外，各问题国家与德国政府债券的利差明显缩小。

① 指金融机构同业之间的短期资金借贷利率。它有两个利率，拆进利率表示金融机构愿意借款的利率；拆出利率表示愿意贷款的利率。

② 是一种将隔夜利率交换成为若干固定利率的利率掉期，它是衡量市场对于中央银行利率预期的指标。

### 3. 广义货币<sup>⑬</sup>增长缓慢，投资不振，私人贷款不增反降

受到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连影响，欧元区的广义货币增长缓慢，尽管2011年下半年以来，广义货币年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在12月却出现了下降。与2007年1月相比2012年1月的广义货币仅增长了20%，远远小于基础货币的增长速度。在2014年7月的欧洲央行报告中，广义货币M3的年度增速仅有1.8%，远远低于欧洲央行设定的4.5%参考值，大大影响了投资。

私人部门贷款不升反降。根据德国央行统计，2011年欧元区私人部门贷款年增长率为1.1%，比2010年有所下降，存量则较2011年大幅度下降，其贷款期限结构也趋于短期化。这一是反映出私人部门没有获得多大的流动性；二是反映出私人部门对未来经济增长信心不足。

### 4. 对经济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小，甚至起反作用

同日本的情况一样，欧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很小，甚至起反作用。如欧盟的年国内生产总值，危机前仍保持在2.2%以上，危机后下降得异常明显，最高才达到2.0%；欧元区的情况雷同，危机前保持在1.7%以上，危机后下降得同样明显，最高也才达到2.0%；欧盟的失业率变化

不大，但危机后却逐年上升，特别是随着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强化，失业率愈来愈高；欧盟的通货膨胀率变化不大，既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通胀率除个别年份升至3%以上或是降至1.5%以下外基本都在2%规定值附近。

2013年通胀率降至1.5%，2014年前八个月通胀率已经降至0.5%以下。这开始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心和关注，担心出现通货紧缩，这也是欧洲央行急于正式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曼就说过，如果发生通货紧缩，只需要派一架直升机在我们头顶上撒钱就可以了。

欧盟经济增长乏力原因很多，首先是欧盟一直是重稳定不重增长。欧债危机爆发后，一部分国家感到要转向增长，但遭到以德国为首的部分国家的坚决反对，奥朗德上台后极力主张重视增长，得到部分国家的支持，同德国为首的紧缩派形成旗鼓相当之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盟紧缩政策的总体战略。实际贯彻的依然是极度紧缩的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2012年3月初，25个欧盟成员国达成一致的《稳定、协调和治理条约》，更是突出了财政纪律的要求。欧洲央行即便在采取QE政策过程中，也不得不强调要加强财政纪律，招致了增长疲软，甚至下降的倾向。

<sup>⑬</sup> 货币分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狭义货币反映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广义货币既反映现实购买力，也反映潜在购买力。若广义货币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若狭义货币过高而广义货币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

表 2 2005—2013 年欧盟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变化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	2.2	3.4	3.2	0.4	-4.5	2.0	1.6	-0.4	0.1
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1.7	3.2	3.0	0.4	-4.4	2.0	1.6	-0.7	-0.4
欧盟失业率	9.2	8.5	7.4	6.7	8.6	9.7	9.4	10.2	10.9
欧盟通货膨胀率	2.2	2.2	2.3	3.7	1.0	2.1	3.1	2.6	1.5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 5. 逐步稳定了金融市场，成员国赤字回落，但债务总额上升

欧盟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后欧盟和欧元

区的金融市场开始稳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有了明显的回落，但债务总额却不降反升。请见以下三个图表。

表 3 2011—2015 年欧元区主要财政指标占 GDP 比重的变化 (%)

	2011	2012	2013	2014 ( 预计 )	2015 ( 预计 )
a. 总收入	45.3	46.2	46.8	46.7	46.5
b. 总支出	49.5	49.9	49.8	49.2	48.7
其中：					
c. 利息支出	3.1	3.1	2.9	2.9	2.9
d. 一般支出 (b-c)	46.4	46.8	46.9	46.3	45.9
预算平衡 (a-b)	-4.1	-3.7	-3.0	-2.5	-2.3
一般预算平衡 (a-d)	-1.1	-0.6	-0.1	0.4	0.6
周期性预算平衡	-3.5	-2.5	-1.4	-1.1	-1.3
结构性预算平衡	-3.5	-2.1	-1.3	-1.1	-1.2

数据来源：欧洲央行。

表 4 2009—2014 年德、法、英与欧猪五国财政赤字的变化

成员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 预计 )	2014 ( 预计 )
德国	-3.1	-4.1	-0.8	0.1	-0.1	0.0
法国	-7.5	-7.1	-5.3	-4.8	-4.2	-4.0
英国	-11.5	-10.2	-7.7	-6.1	-6.3	-5.2
希腊	-15.6	-10.7	-9.5	-9.0	-13.1	-2.2
爱尔兰	-13.9	-30.8	-13.1	-8.2	-7.2	-4.8

续表

成员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 预计 )	2014 ( 预计 )
意大利	-5.5	-4.5	-3.8	-3.0	-3.0	-2.6
葡萄牙	-10.2	-9.8	-4.3	-6.4	-5.9	-4.0
西班牙	-11.2	-9.7	-9.6	-10.6	-7.2	-5.8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表 5 2009—2014 年德、法、英与欧猪五国负债总额的变化

成员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 预计 )	2014 ( 预计 )
德国	74.5	82.4	80.0	81.0	79.6	77.3
法国	79.2	82.4	85.8	90.2	93.9	96.1
英国	67.8	79.4	84.3	88.6	91.5	93.4
希腊	129.7	148.3	170.3	156.9	177.3	177.0
爱尔兰	64.8	92.1	104.1	117.4	122.3	120.3
意大利	116.4	119.3	120.7	127.0	132.7	133.7
葡萄牙	83.7	94.0	108.2	124.1	129.4	126.6
西班牙	53.9	61.5	70.5	86.0	94.3	98.9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 6. 欧元贬值幅度有限，刺激出口的作用不大

欧债危机以来，欧元的贬值幅度却很小。根据欧洲央行数据，欧元有效汇率在 2011 年贬值幅度为 2%，自 2009 年以来欧元兑美元汇率主要在 1 欧元兑换 1.2 ~ 1.5 美元之间浮

动。除 2014 年开始，欧元贬值的趋势略微增大外，从总体上看，欧元贬值的幅度较小，对欧元区出口的拉动作用有限，自然溢出效应也低，对非欧元区国家的负面效应自然也少。

图 2 2009—2014 年欧元兑换美元的汇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德国金融网。

## 七、结语

1. 近 10 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危机，并波及整个世界。它说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但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它突出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不断地同现有资本增殖的有限目的发生冲突。金融垄断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促进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而且使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更大规模地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当今的现实是，大量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角逐高额利润，使实体经济发展严重受制，虚拟经济却是无限膨胀，最终导致虚拟经济的崩盘。数据表明，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基础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从 380 亿美元激增到今天超过 9 万亿美元，增速超过 200 倍，而实体经济增长还不到 5 倍。全球货币或流动性泛滥是今日世界金融和经济最致命的痼疾。<sup>⑭</sup> 这次殃及全球范围的金融风暴和肆虐欧洲的债务危机都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反映。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历过无数次的危机，但也总能找到拯救自己的办法。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可能就是拯救当代资本主义于金融、债务危机之中的一根救命稻草。

2. 滥发钞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历来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危机社会的典型写照。今天竟然有人敢用它来治理一个国家的经济，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惊奇和愤怒。然而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界、经济界和学界的精英和翘楚们也不会如此之愚蠢。他们恰恰是在深入研究了凯恩斯、希克斯、克鲁格曼的流动性陷阱理

论以及大萧条的争论与债务——通货收缩原理以及历代的治理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后采取的一种新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这种政策的特点：1) 不是“滥”发纸币，而是“量”发纸币；2) 政策可控，可放可收，强调精心观察，一遇反常便可立即叫停、修正，甚至取消；3) 开放，重大政策、举措、工具、数据一律公开，接受监管；4) 临时操作，短期救急，一旦难解，立即金盆洗手；5) 联保，多数央行绑在一起，一荣共荣，一损俱损；6) 及时退出，一旦任务完成，立即退出，返回正常货币政策。应该说，这几条确实保证了量宽货币政策没有出现大的纰漏。

量宽货币政策已经执行了好一段了，有成绩，但不是万能灵丹；有错误，也不是洪水猛兽。而且其成果往往因国情而异，因政策内涵而异。在日本是失败的，在美国基本就是成功的，欧盟如何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特别是进入 2014 年之后通货紧缩和欧元贬值趋势日益明显，新领导班子决定三年投资 3000 亿欧元以促进增长，欧版量宽货币政策如何还需要拭目以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摸出一条行之有效地治理金融危机，特别是治理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来。

3. 欧盟、欧元区的经济问题由来已久并涉及方方面面。但核心问题在哪里，什么是治疗的最佳药方，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令人高兴的是，现在说核心是结构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认为，欧盟的关键问题不是货币政策问题。头疼需要医头，脚疼也需要医脚，但更重要的是治

<sup>⑭</sup> 向松祚：《美联储如何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载《百度文库》，2011年2月25日。

本，是治疗大脑和心脏，也就是要抓结构问题。但在什么是结构问题上看法又有不同了。笔者认为，欧盟的最大结构问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这是欧盟成立以来历次危机的病灶所在。必须正视它，逐步解决它。

在具体政策上欧盟必须找到“增长”和“紧缩”的契合点。“紧缩”是必要的，但是有限的，更不是永恒的。“增长”才是根本的，必须下大气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增长”，其他问题都难以解决。巧妇自然难为无米之炊，同样也难为少米之炊啊！现在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和越来越多的欧盟成员国都主张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增长”。德国的四大经济研究机构也发表联合报告，认为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有限，必须加大投资。<sup>⑮</sup>因此，近期欧盟增加投资的决定便受到普遍的欢迎。

欧盟也真是命运多舛，国际金融危机后又偏遭欧债危机，欧债危机走出低谷进入2014年后经济出现了复苏，又只是昙花一现。如今坏消息纷至沓来。连欧洲危机中的中流砥柱德国也不得不大幅调低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1.8%下调到1.2%。<sup>⑯</sup>德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辛恩甚至已经预言：“欧元区注定陷入‘危机十年’。”<sup>⑰</sup>面对这样的局面欧盟舆论界对是否正式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没了主心骨。有人认为，欧盟经济下滑都是QE政策惹的祸；有人则相反，认为就是因为没有全面正式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致。德拉吉本已决定2014年10月正式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来推迟，2015年1月22日才最后决定实施，显然也是考量了这一局面。

欧盟、欧洲央行确实该好好思考如何摆脱衰退阴霾、如何面对QE政策了。

作者简介：殷桐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sup>⑮</sup> 管克江，李永群，张杰：《德法谋求合力摆脱衰退阴霾》，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2日。

<sup>⑯</sup> 摘自《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或再陷衰退》，载《参考消息》第4版，2014年10月16日。

<sup>⑰</sup> 摘自《欧元区注定陷入“危机十年”》，载《参考消息》第4版，2014年10月6日。

# 工业 4.0 与中德创新合作

史世伟 寇 寇

**【摘要】** 李克强总理访德期间两国发表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其核心主题是建立中德创新伙伴关系，为先前确定的“2015 中德创新合作年”规划具体内容。本文希望对中德创新合作的手段与前景做些探讨，第一节对德国提出工业 4.0 的背景做一个简短的叙述；第二节从中德高科技领域互补性出发，论述中德创新合作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第三节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对中德创新合作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合作的前景进行了预测；第四节对全文的主要观点做了总结。

**【关键词】** 工业 4.0 创新年 《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

2014 年 10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中德政府磋商，之后两国发表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其核心主题是建立中德创新伙伴关系，为先前确定的“2015 中德创新合作年”规划具体内容。双方将开展工业、金融、科技、城镇化、农业、环境等多个领域的创新合作，其中工业 4.0 被当做双方合作的重点。同时双方认为，该进程应由企业自行推进，两国政府为双方合作提供有利的框架条件和政策支持。

近年来中德两国的经贸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13 年中德双边货物进出口额已达

1657.2 亿美元，中国已是德国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sup>①</sup>，德国是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在贸易推动下，双方企业在不同的时期内向对方国家的投资也增长迅速，特别是合资企业合作形式的广泛采用，促进了中德企业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合作和产业链融合。但相比于生产的跨国界流动，创新的跨国界流动的进程要慢得多。这主要是与创新系统的复杂性、跨国企业对本土环境的嵌入性、跨国企业的内聚性要求以及研发活动所需要的优良的当地基础设施和体制环境等相关<sup>②</sup>。中德两国的经济合作多集中

① 引自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8571](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8571)。

② 法格博格，莫利，纳尔逊主编：《牛津创新手册》，柳卸林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9年，321页。

于生产领域，在创新合作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本文对中德创新合作的手段与前景做了探讨，认为工业 4.0 计划的提出为中德两个制造业大国的深入合作提供难得的机遇。第一节对德国提出工业 4.0 的背景做一个简短的叙述。第二节从中德高科技领域互补性出发，论述中德创新合作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第三节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对中德创新合作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合作的前景进行了预测。第四节对全文的主要观点做了总结。

## 一、德国工业 4.0 计划

2011 年，德国政府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牵头，提出了“未来项目——工业 4.0”计划，旨在保持德国的工业制造业世界领先的地位，并在未来的发展与变革中占得先机。其产生的背景如下：

1. 制造业是德国最重要的产业之一，2013 年制造业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 25%<sup>③</sup>。在 2014 年德国最具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 100 强中有 18 个是机械和设备制造商<sup>④</sup>。在过去的十年中，与其他工业国

家相比，德国制造业的就业率一直保持稳定、较高的水平，即使是在金融危机中也未遭受太大冲击。

2. 随着包括中国制造业在内的一些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德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另外，原材料日趋紧缺、能源价格的上升以及人口老龄化，德国制造业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sup>⑤</sup>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值的比重从 2002 年的 73.87% 下降到 2011 年的 54.41%，而金砖五国的比重则上升了超过一倍，中国的比重则从约 8% 上升到 20% 以上，是世界上制造业增加值最高的国家（见图 1）。德国所占比重与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出现了下滑。根据德勤《2013 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2013 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行榜中，中国排名第一，德国排名第二，而该报告预计五年之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仍排在首位，而德国将下降到第四，被印度和巴西超过<sup>⑥</sup>。面对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压力，德国希望在工业 4.0 领域与中国进行创新合作，争取双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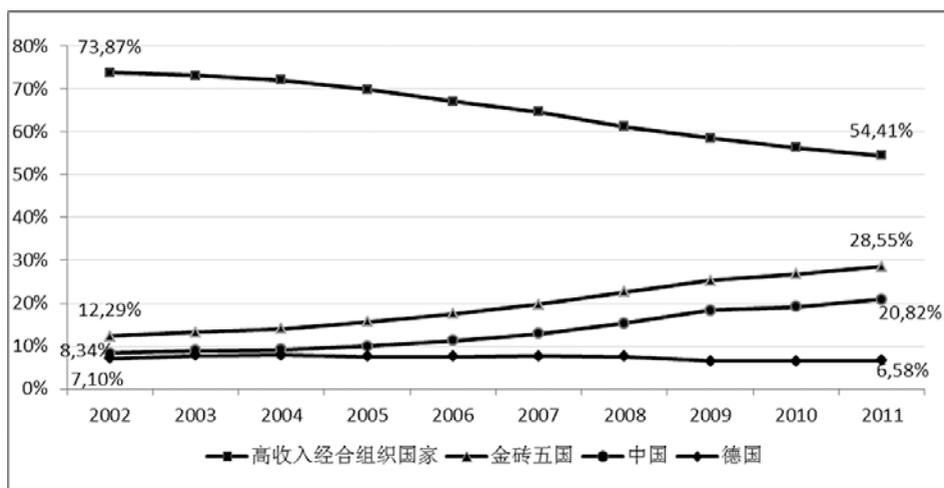
③ 引自 [http://www.statistik-portal.de/statistik-portal/de\\_jb27\\_jahrta66.asp](http://www.statistik-portal.de/statistik-portal/de_jb27_jahrta66.asp)。

④ 引自 <http://www.top100.de/die-top-100/top-innovatoren-2014/index.html>。

⑤ 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瑞士、智利、捷克共和国、德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希腊、爱尔兰、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荷兰、挪威、新西兰、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瑞典、美国。

⑥ 德勤：《2013 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http://www.deloitte.com/assets/Dcom-China/Local%20Assets/Documents/Industries/Manufacturing/cn\(zh-cn\)\\_mfg\\_GlobalMfgCompIndexReport\\_240113.pdf](http://www.deloitte.com/assets/Dcom-China/Local%20Assets/Documents/Industries/Manufacturing/cn(zh-cn)_mfg_GlobalMfgCompIndexReport_240113.pdf)）。

图 1 主要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值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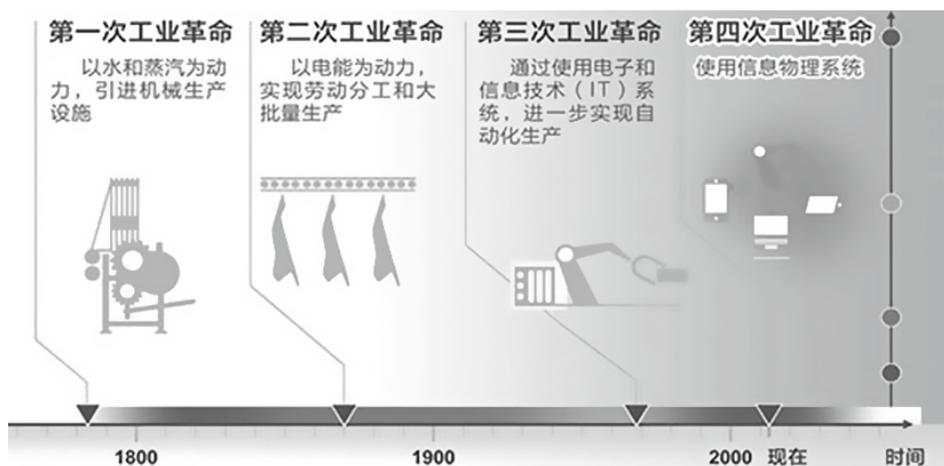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德国认为，我们现在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之前的革命分别是，18 世纪末以机械化生产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 世纪以电气化和大规模生产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电子和信息通讯技术革命。这第三次工业革命包括电子

计算机、智能操纵、企业管理软件等的引入，这一影响持续至今。但是如今工业生产面临又一次的变革：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实体生产与虚拟世界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见图 2）。

图 2 从工业 1.0 到工业 4.0



资料来源：人民网，智能制造带来巨大商机，贝诺·彭泽（<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808/c1002-25426004.html>）

为了实现工业 4.0 的计划，德国实行二元战略：一是继续贯彻将 IT 技术与传统高生产技术深度结合的路径，保持德国装备制造业全球领先的地位；二是装备制造业着力对 CPS 主导市场的研发与开拓。这主要包括：1) 对价值网络 (Value added network) 的横向融合；2) 整个价值链上工程技术的数据化贯通；3) 对不同层面生产系统的纵向融合。“未来项目——工业 4.0”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为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提供了可能。而信息 - 物理融合系统 (Cyber-physical system, CPS) 为新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即在如机械机器和各类材料等物理系统中嵌入带有传感设备的物理系统，通过网络实现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融合。2) 借助互联网和 CPS 可以实现更进一步的自动化，智能控制和自主选择，以准确控制价值链上的每一环节，实现生产的最优化。3) 由于生产的每一环节都能够准确控制，工业 4.0 还能使资源和能源得到最优化的使用。

早在 2010 年，面对经济衰退和全球竞

争，德国就推出了《德国高科技战略 2020》，提出到 2015 年将教育和研发经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0%。而“未来项目——工业 4.0”展望了 2025 年的工业图景，它作为高科技战略 2020 的具体行动计划之一而被寄予厚望。

## 二、中德在高科技领域的互补性

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贸易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从中德近几年的贸易结构的变化中就可以看出。70、80 年代中国主要向德国出口食品、纺织品、服装、木制品，从德国进口钢铁、化学产品和机械设备。产品互补是这一时期两国贸易的最大特点。但如今两国贸易商品结构已发生变化，尽管服装和纺织品仍然占出口产品的较大份额，但中国对德国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的出口份额已大幅增长，中国 88% 的出口品已经是制成品，而像农产品和原材料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普遍的出口品，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很小<sup>⑦</sup>。

表 1 2013 年德国对中国出口主要商品构成 (类) (单位: 百万美元)

商品类型	贸易额	所占比例 %
机电产品	34910	39.1
运输设备	28015	31.4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6484	7.3
化工产品	6066	6.8
贱金属及制品	5298	5.9
塑料、橡胶	3450	3.9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⑦ 史世伟：《中德经贸关系研究》，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 187 页。

表 2 2013 年中国对德国出口主要商品构成 (类) (单位: 百万美元)

商品类型	贸易额	所占比例 %
机电产品	34172	44.8
纺织品及原料	10216	13.4
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6361	8.3
贱金属及制品	4523	5.9
化工产品	3460	4.5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3178	4.2
运输设备	3158	4.1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

而德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中, 机械和电子设备依旧是德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比较两国的出口结构, 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两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就是机械和电子设备, 占两国总出口的份额在 40% 左右。因此, 虽然由于中国加工业升级, 中德产品的竞争难以避免, 但二者的互补性依然很强。<sup>⑧</sup> 这一方面表现在高科技产品整体竞争性上面: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的数据, 2013 年, 德国的高科技产品竞争绩效指数 (CPI) 以 0.5176 排在世界第二位, 而中国的 CPI 以 0.3293 仅排在世界第七位。与德国相比,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双方优势产业的差异上: 德国是汽车、能源效率和环保领域的世界领头羊, 而中国在农业、通讯信息产业和航空航天领域越来越成长为世界的重要力量。<sup>⑨</sup> 因此, 在低碳、环保技术和能效领域、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中德尚有广阔的合

作前景。

正如克拉克 (John Maurice Clark) 在其著作《竞争作为动态过程》(Competition as a Dynamic Process) 中关于有效竞争理论所言, 先进企业的突进和落后企业的追赶构成了一个无止境的动态竞争过程。先进企业首先进行创新, 发展新技术并运用到生产中, 从而获得优先利润,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随后那些相对落后的企业学习或模仿先进企业产品和管理方式, 这一过程循环往复, 两个阶段不断交替, 而从中又实现了技术的进步与创新。作为工业强国, 德国高科技产品的竞争绩效在 2003—2013 年中一直保持世界 50 强中的 1—3 位, 而中国高科技产品的竞争绩效则从 2003 年的第 23 位上升至 2013 年的第 7 位。<sup>⑩</sup> 通过贸易与投资活动学习和掌握先进国家的知识与技术是中国产业和企业竞争力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这次德国将工业 4.0 作为其 2020 高科技战略的重要推

⑧ 史世伟:《中德经贸关系研究》,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第189页。

⑨ 陈衍泰: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Bilateral Collaboration in High-tech Enterpri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Sino-German Innovation Forum 2014, Beijing, 29. April 2014.

⑩ 同上。

手，而中国政府和企业则抓住这一重要契机推动双边合作上一个新台阶。

在对未来技术发展方向判断上，中国的观点与德国类似，中国在多年前也提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工业转型升级。中国的两化融合与工业 4.0 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希望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实体生产与虚拟网络的融合提高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都是涉及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方式，将智能化融入传统生产，改变现有的生产管理方式。德国在高端制造技术和嵌入系统、企业管理软件以及网络安全技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而我国在通讯信息技术方面则走在世界前列。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方面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优势互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 三、中德双边创新合作的现状

#### 1. 企业间合作

尽管中国企业近些年来在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上有较大提高，但在工业 4.0 方面与德国相比仍有差距：基础条件方面，中国在工业基础和企业管理水平、人员素质方面与德国还有一定差距；实施方式方面，德国工业 4.0 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企业，政府只负责设立框架条件，而中国政府的作用更大，企业往往是在学习、研读相关标准或要求之后，再开始实施两化融合<sup>①</sup>。实现方法虽然不一致，但前进方向都是类似的，因此在中德两国政府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中也提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和德国联邦经济和

能源部（BMW）、联邦教研部将加强工业 4.0 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近年来，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国际化越来越普遍，除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之外，供给因素与获取当地能力也越来越成为企业扩大海外研发的重要动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创新活动都在组织内进行，即采取在投资东道国建立研发中心的形式，在许多情况下，国际战略性技术合作——即与东道国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取代了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动。因为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企业技术上的互补性与替代性越来越重要。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国际化为跨国公司和所在国之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之间——提供了“技术溢出”的机会。研发中心由于是母国企业设立，往往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进行全球布局，东道国企业一般受益有限。然而，跨国企业在多大程度上用国际战略技术合作替代内部研发取决于相关区域的企业是否具有补充能力。<sup>②</sup>换句话说，战略联盟对东道国企业的要求有更高的要求。

中德企业间以往的创新合作主要以上述两种形式展开，一种是建立研发中心，这是目前德国投资企业占主导的方式，例如西门子移动通信先驱技术中心、SAP（中国）协同商务解决方案中心、拜耳上海聚合物研发中心、大众汽车上海研发中心等。另一种是建立企业联盟。一个典型案例便是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和中国比亚迪公司的合作。2010 年两家公司签署合资协议，成立“深圳比亚迪—奔驰新技术有限公司”，双方各占股比 50%，公司建立后，迅速推出了新能源汽车品牌 DENZA（腾势），双方将合力打造中国首个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另外一个重点是技

<sup>①</sup> 引自 [http://www.cnii.com.cn/gyhxxh/2014-09/15/content\\_1443812\\_2.htm](http://www.cnii.com.cn/gyhxxh/2014-09/15/content_1443812_2.htm)。

<sup>②</sup> 法格博格，莫利，纳尔逊主编：《牛津创新手册》，柳卸林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 330—333 页。

术研发上的合作，双方成立研究技术中心，在中国研发电动汽车。以往外资企业与中国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多是因为政策限制、对中国市场不熟悉或是用“技术”换“市场”，这次双方更多的是从创新和技术合作的角度出发的。德国方面自不用多说，奔驰是全球最重要的汽车企业之一，拥有巨大的品牌影响力和汽车制造经验，同时在电动汽车技术上也处于领先地位。而比亚迪经过多年来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积累也已经成为中国该领域的领导者。如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长蔡澈所说，奔驰看重比亚迪在电动汽车电池开发方面的独特技术，比亚迪目前在中国电动汽车的研发领域走在了前面，尤其在磷酸铁锂的电池研发方面吸引奔驰<sup>⑬</sup>。比亚迪董事局主席王传福认为，这是技术换技术的合作，品牌注册在中国，是中国的核心电池、电机、电控技术与奔驰造车技术、安全理念的“强强联合”<sup>⑭</sup>。比亚迪与戴姆勒奔驰这种有互补优势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成为未来中德创新合作的一个积极信号。

## 2. 政府的框架条件与国家创新系统的作用

企业间创新合作离不开政府建立的顺应市场发展的框架条件。在中德 1972 年建交以来，中德政府间签订了包括《中德科技合作协定》（1978 年）在内的一系列双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协议以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和《中德创新政策平台》（2011 年）等高端科技合作对话机制。2010 年商定建立的定期政府磋商机制更使双边的经贸、创新合作纳入到一个全面的制度化轨道。在上述

合作案例中，除了企业自身，政府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框架条件和政策支持：中国将新能源汽车提升为“十二五规划”中的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包括《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实施方案》、《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德国政府也对新能源汽车给予了一系列促进措施。这也是吸引奔驰与比亚迪合作的一大因素。2013 年，在中德两国最高领导人主持下建立的《中德电动汽车战略平台》将为加大政府对电动汽车研发、市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扶持起到关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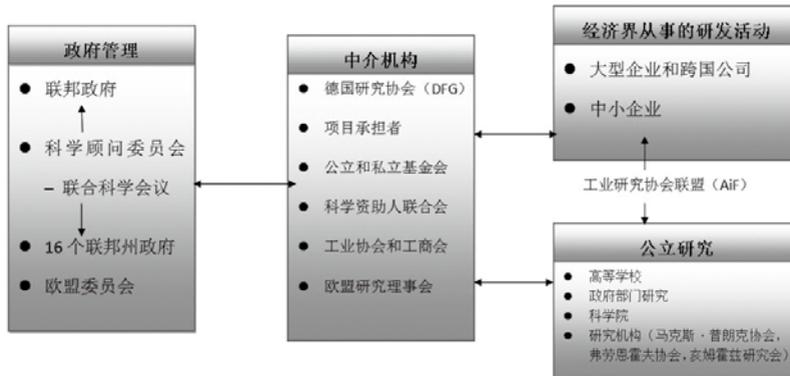
中德间的创新合作不仅仅是技术领域的合作，而且还包括制度上的创新与相互借鉴。企业的创新合作是否有成效，相关国家是否存在“国家化”创新系统十分重要。<sup>⑮</sup>创新系统指公共和私营部门中发起、改变和扩散新技术的活动和互动的制度和组织网络，它主要包括“经济结构”与“制度设置”。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重循环的非线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创新主体：政府、大学和大学以外研究机构、企业以及需求者组成互动网络。创新实质上产生于网络化的合作活动（协同创新），其中异质性群体之间的学习、知识交流和转移起到核心作用。有效率的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是德国实施高科技战略以及工业 4.0 计划的体制方面的优势。

<sup>⑬</sup> 引自 [http://paper.ce.cn/jjrb/html/2010-06/01/content\\_107678.htm](http://paper.ce.cn/jjrb/html/2010-06/01/content_107678.htm)。

<sup>⑭</sup> 引自 <http://auto.china.com/zhuanzai/hangye/11162373/20140918/18797010.html>。

<sup>⑮</sup> 法格博格，莫利，纳尔逊主编：《牛津创新手册》，柳卸林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 333 页。

图 3 德国国家创新系统



来源：VDI/VDE-IT（德国工程师协会 / 德国电子与信息技术协会 / 德国创新与技术研究所）。

如图 3 所示，德国国家创新系统的特点之一是研究机构（包括大学）和企业之间、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分工强和明确：公共部门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企业从事应用研究。但是这种分工要求对知识转化的协调以及对于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在资金上和机制上要有一定的支持。在这方面，德国长期以来有所欠缺。这正是德国联邦政府 2006 年以来制定高科技战略的重要原因。此外，以往的科技政策重点不突出，项目繁多，往往不能使真正需要者受益。因此，需要对促进政策进行欧盟层面、联邦层面和州层面的统领、集中和协调。

自从 90 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开始支持地方性的集群网络，鼓励自我管理的模式，随之出现了 BioRegio 和 InnoRegio 等项目。德国高科技战略、特别是工业 4.0 计划可以说是该创新政策模式的延续，即政府只搭建必需

的制度性框架条件，并不直接干预科技项目的实施。作为德国高科技战略的一部分，工业 4.0 对框架条件也有类似的要求：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参与科研创新活动。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强调要建立一套创新型的框架条件，比如对风险资本的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向创新型产品倾斜，推广行业标准以实现高科技产品的尽早应用。而德国政府早期的创新政策，支持的科技项目多是由政府指定和主导，获得政府资金的往往都是少数大企业的大项目，如航空航天技术，小企业往往难以从中获益<sup>①6</sup>。这很类似当前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更多的还是使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获益，且行业分布过于集中，同时地方政府过多地参与创新集群建设，各类指令式的科技园区层出不穷，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政府在 2006 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

①6 Weyer, J: Transformationen der Technologiepolitik? Die Hightech-Strategie der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Projekt Galileo, erscheint in: Schefold, Bertram/Thorsten Lenz (Hg.), Die europäische Wissensgesellschaft - Leitbild europäischer Technologie-, Innovationsund Wachstumspolitik, Berlin: Akademie-Verlag. (Weyer, J:《技术政策的转型？联邦政府的高科技政策和伽利略计划》)

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系统的目标。在创新系统建设方面中国可以与德国相互学习和借鉴。《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双方将致力于框架条件和政策上的合作,并将“工业4.0”议题纳入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

#### 四、结语

不止是德国,包括美国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已经或准备将互联网和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广泛运用到工业生产中,以期望在工业生产的新阶段占领先机。中国当然也不可错过这一时机。

中国与德国的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以往成功的经贸领域的合作可以继续延续到新一阶段的创新合作中。德国企业在技术方面积累了多年的经验,一直站在世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前沿,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在

近些年也有长足的进步,在智能化融入工业生产、全球制造业转型以及两国都提出新的工业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与德国进行技术合作无疑是恰当的选择。以往中德企业的创新合作多以建立研发机构和企业战略联盟为主,从实际效果来看,以建立合资企业为代表的企业联盟形式能够让两国企业更多参与其中,是更优的选择。此外,在政府的角色、制度的设立上,双方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在德国高科技战略的产业政策中,政府只是提供一个方向性的指导和牵线搭桥的作用,政府创造平台并提供必要的支持,企业、研究机构 and 高校等在其中公平竞争。德国政府立足已有的政策框架和措施,但严格项目要求,重视政策协调和适当集中,加强项目监控,努力消除使中小企业无所适从的“项目丛林”。在实施方法上,采取竞争的方式,使最符合要求的企业和联合体脱颖而出,防止不符合要求的搭便车获利。这些经验都值得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中加以借鉴。

作者简介:史世伟 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校外博士生导师。  
寇 蕊 德国哈勒-维腾贝格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博士生。

# 欧洲央行负利率政策—— 背景、原因和评价

黄燕芬 陆俊

【摘要】2014年，欧洲央行连续两个季度下调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和存款便利利率，其中存款便利利率降至-0.2%，欧洲央行成为首个推行负利率的世界主要央行。欧元区通缩风险的倒逼、“利率走廊机制”的维持、货币供应体系均衡发展以及欧元区内外部经济体的妥协和博弈等原因促使欧洲央行推行负利率政策。欧洲央行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执行既有赖于其本身传导机制的通畅，又需要与欧元区各主权国家财政政策有机协调与配合，而且与丹麦曾经推行的负利率实验有着本质区别。

【关键词】欧洲央行 负利率 通缩风险

## 一、欧洲央行2014年推出以负利率为标志的宽松货币政策

2014年6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欧元区暂时没有通缩风险，但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必要进一步提供一揽子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采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从今年6月开始陆续推出的总额为4000亿欧元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延长固定利率全额配给主要再融资操作（MRO）到2016年底；暂停证券市场计划（SMP）债券购买冲销操作以及筹备资产抵押证券（ABS）购买计划。

此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欧洲央行将欧元区的主要再融资利率（欧元区基准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0.15%；边际贷款便利利率下调35个基点至0.4%；并首次将存款便利利率（仅限于金融机构存放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非法定存款准备金）下调10个基点至-0.1%。欧洲央行成为第一个推行负利率政策的世界主要央行。

2014年9月，欧洲央行为了呼应6月份的筹备购买计划，决定开始购买非金融私营部门的资产，欧洲央行准备购买具有广泛产品组合的资产抵押证券，并明确其在新增信贷流向中所起的指导作用；同时，欧元体系将购买一整套由小额信贷机构发行并指定支

付地点的资产担保债券，这是欧洲央行开发的一个全新的资产担保债券（CBPP3）项目。这些项目将在2014年10月开始对欧元区的宏观经济发挥干预作用。

另外，欧洲央行再次将欧元区的主要再融资利率（欧元区基准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0.05%；边际贷款便利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0.3%；存款便利利率继续下调10个基点至-0.2%。为应对欧元区内部日益严峻的通缩隐患，这是欧洲央行进入“负利率时代”以来的第二次降息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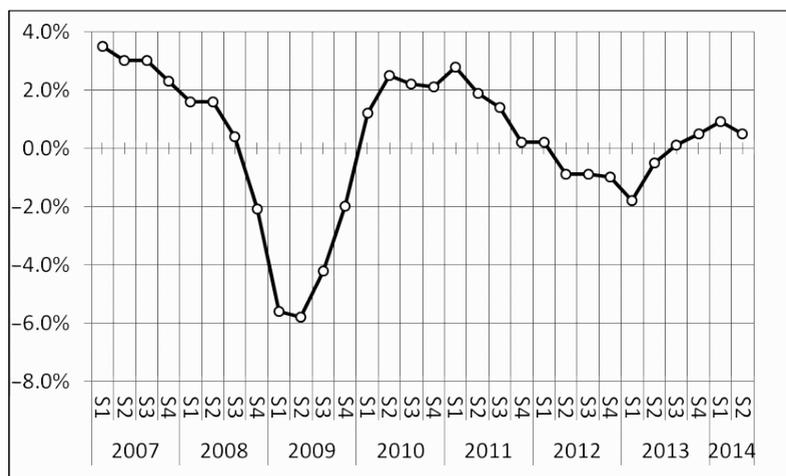
## 二、欧洲央行推出负利率政策的背景

2009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在欧元区持续深化和延续，希腊政府宣布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超过12%（欧盟对此设定的比例为3%），希腊政府主权债务问题凸显；随后主权债务问题向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等欧元区非核心国家扩散蔓延，

随着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连续下调“欧猪五国”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德国和法国等欧元区主要国家的国民经济也受到拖累。

2008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受世界金融危机波及呈负增长的态势；2009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速为-5.6%，第二季度同比增速进一步滑落至-5.8%。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欧元区主要国家政府纷纷推出了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虽然整体上欧元区宏观经济在2010年实现快速反弹，而且同比增速最高达到2011年第一季度的2.8%，但是像“欧猪五国”这一类高社会福利、公共债务存量大的欧元区主权国家难以进一步扩张政府支出刺激经济，因此欧元区的复苏动能备受打压，经济增速趋于下滑。2014年3月，俄罗斯与乌克兰由于“克里米亚公投”引爆地缘政治危机，稍有起色的欧元区宏观经济又面临下行风险（见图1）。

图1 2007—2014年欧元区GDP当季同比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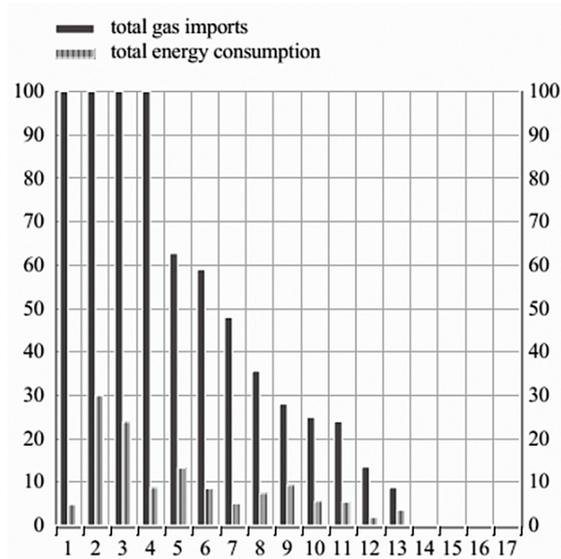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与乌克兰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持续发酵，而欧元区大多数国家需要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和石油（见图2和图3），欧元区整体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的比例超过进口总量的20%，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比例超过进口总量的30%；而且欧元区整体石油的消费量约占能源消费结构的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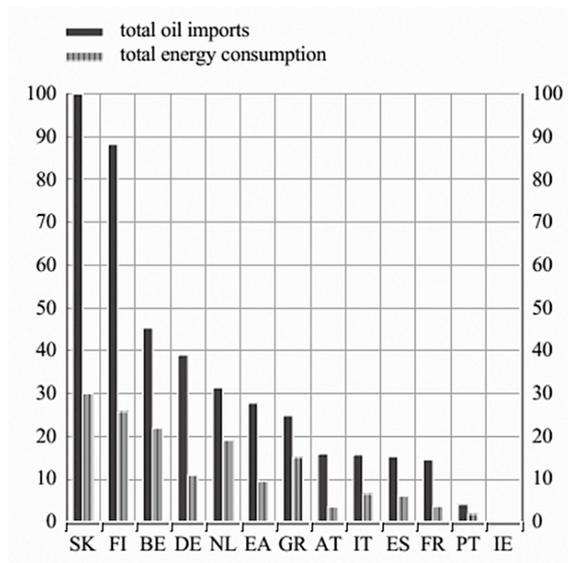
图2 欧元区各国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比重及能源结构（2011年）



注：1（爱沙尼亚） 2（拉脱维亚） 3（斯洛伐克） 4（芬兰） 5（奥地利） 6（希腊） 7（斯洛文尼亚）  
8（德国） 9（意大利） 10（欧元区整体） 11（卢森堡） 12（法国） 13（荷兰） 14（比利时）  
15（爱尔兰） 16（西班牙） 17（葡萄牙）

数据来源：Eurostat。

图3 欧元区各国向俄罗斯进口石油的比重及能源结构（2011年）



注：SK（斯洛伐克） FI（芬兰） BE（比利时） DE（德国） NL（荷兰） EA（欧元区整体） GR（希腊） AT（奥地利） IT（意大利） ES（西班牙） FR（法国） PT（葡萄牙） IE（爱尔兰）

数据来源：Eurostat。

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以及斯洛伐克的天然气完全依靠从俄罗斯进口；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约为总进口量的35%。斯洛伐克与芬兰的石油几乎完全从俄罗斯进口，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比例超过30%，法国该比例也超过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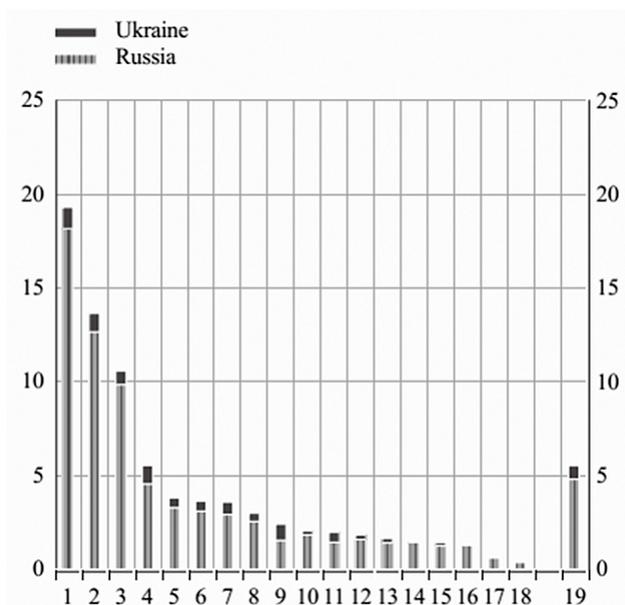
拉脱维亚的天然气消费占其能源结构的比重为30%，斯洛伐克该比例也超过20%。斯洛伐克、芬兰和比利时的石油消费占其能源结构的比重均在20%以上，德国、荷兰和希腊石油消费比重均超过10%。因此，从能源的依存度来说，欧元区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的能源供给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地缘政局关系密切。

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也是欧元区

国家贸易往来的重要目的国，波罗的海三国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商品出口总额均占其国际贸易总量的10%以上，其中拉脱维亚最为依赖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国际贸易关系（见图4），因此一旦出现由于地缘政治危机产生的俄乌冲突甚至引发战争，将会对波罗的海国家乃至欧元区整体的经济复苏产生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另外，由于俄罗斯本国宏观经济已经对地缘政治冲突做出反应：进入2014年以来，俄罗斯连续两个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均未超过1%（见图5），因此以波罗的海国家为主的欧元区国家的能源供应链条和国际贸易往来势必受到严峻的冲击与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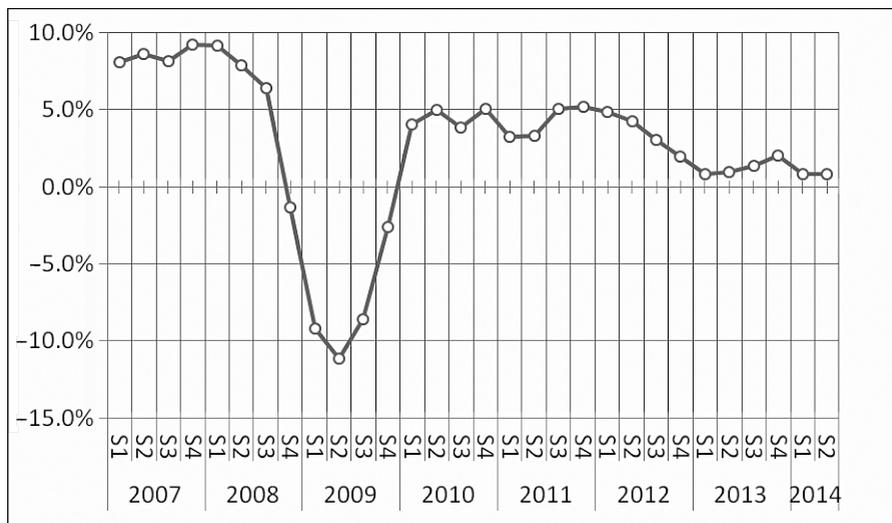
图4 欧元区各国向俄罗斯和乌克兰出口商品总额占比（2013年第三季度）



注：1（拉脱维亚） 2（爱沙尼亚） 3（芬兰） 4（斯洛文尼亚） 5（德国） 6（奥地利） 7（斯洛伐克）  
8（意大利） 9（塞浦路斯） 10（法国） 11（希腊） 12（荷兰） 13（比利时） 14（马耳他） 15（西班牙）  
16（卢森堡） 17（爱尔兰） 18（葡萄牙） 19（欧元区其他）

数据来源：Eurostat。

图5 2007—2014年俄罗斯GDP当季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 三、欧洲央行推出负利率政策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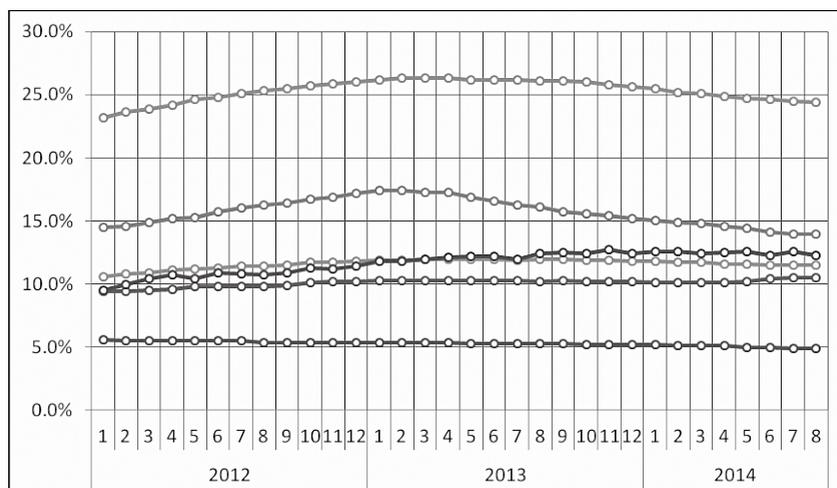
欧洲央行成立伊始，以德国联邦银行为模板，曾被认为是世界上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之一，能够在高度自主的条件下执行货币政策，其首要政策目标是为了维持欧盟的价格水平在中长期基本稳定（欧元区消费价格调整指数年均增长略低于2%，且认定欧元区消费价格调整指数长期低于1%将会引发通货紧缩风险）。根据《马约》（Treaty of Maastricht）相关条款，欧洲央行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保卫货币”，维持物价稳定，且在不影响物价稳定的情况下，欧洲央行可以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操作指标——金融市场的三大核心利率以保持要素价格与产品价格的趋势性协同。

鉴于欧元区国家复苏动力羸弱，经济增长疲软，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质量分化巨大，而且欧元区通货膨胀率长期处于低位徘徊的状态，以“欧猪五国”为代表的部分欧元区成员国家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10%以上的水

平（见图6）；就短期而言，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被充分加码，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欧元区的宏观经济也将面临难以避免的衰退，甚至有可能像日本一样步入“失去的十年”。欧洲央行为了履行维持物价稳定的宗旨，合理引导商业银行的资金向实体经济流动，刺激中小企业信贷增长，因此，选择在采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基础之上推出负利率政策。

对此欧洲央行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如果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对抗面临的较高通货膨胀，往往会选择加息，利率的抬升会使贷款的成本变得更高，因此能够使国民经济降温，由于较高的利率会吸引一部分资金变成储蓄，因此通货膨胀可以得到缓解。与之同理，如果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面临的是长期的通缩风险，那么他的选择将会是降息。但是根据笔者对欧洲央行推出负利率政策这一事件的追踪认为，推出负利率政策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图 6 欧元区 17 国及部分国家失业率月度同比增速 (季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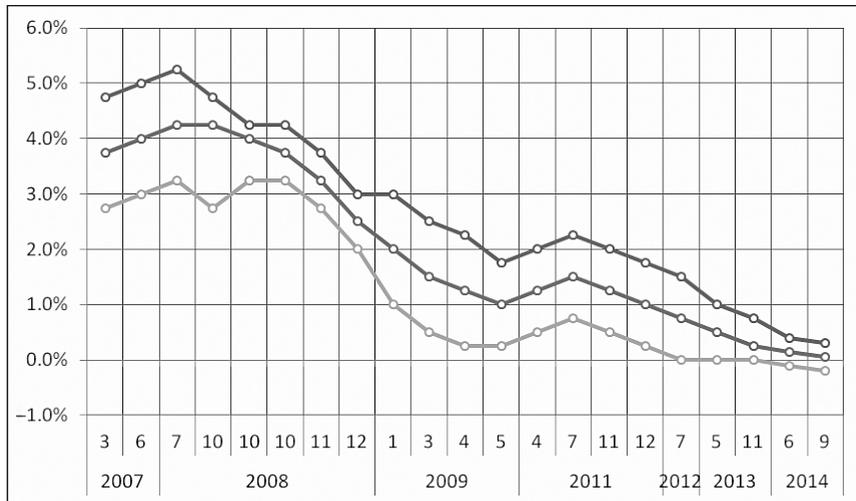
欧洲央行在今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月报中指出，目前的货币政策操作策略依然结合了宏观经济（基本层面）分析与货币供求（技术层面）分析等“两大支柱”上，对欧元区经济前景和通货膨胀预期进行有说服力的前瞻和预判，进而影响资本市场乃至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对三大核心利率调整的合理预期。从政策效果来看，由于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前期的吹风与引导，2014年6月推出的负利率政策的影响已经被市场提前消化，因此从数据上显示降低三大核心利率并未遏制和扭转欧元区通货紧缩的势头。

## 2. 欧洲央行推出负利率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维持三大核心利率形成的“利率走廊机制”。

欧洲央行通过主要再融资利率（欧元区

基准利率）、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和存款便利利率形成的“利率走廊机制”调控货币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见图8）。欧洲央行“利率走廊机制”的上限是边际贷款便利利率（欧洲央行向金融机构提供附带抵押的隔夜流动性支持利率），而其下限是存款便利利率（欧洲央行被动吸收金融机构隔夜存款利率，适用于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居民储蓄不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主要再融资利率是欧洲央行的欧元区基准利率。欧洲央行连续两个季度对“利率走廊机制”进行非对称下调，“走廊宽度”进一步从2013年11月以来的75缩小至50个基点，这是欧元区成立以来最窄的“利率走廊”，其目的只是为了充分调动流通中的货币与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存款进入私营经济部门，扩充民间信贷，为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提供活力。

图8 欧元区“利率走廊机制”



注：根据2014年9月份数据，欧元区三大核心利率自下而上分别为（下限：存款便利利率）

（基准：主要再融资利率）（上限：边际贷款便利利率）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 3. 欧洲央行推出负利率政策也充分考虑了欧元区货币供应体系均衡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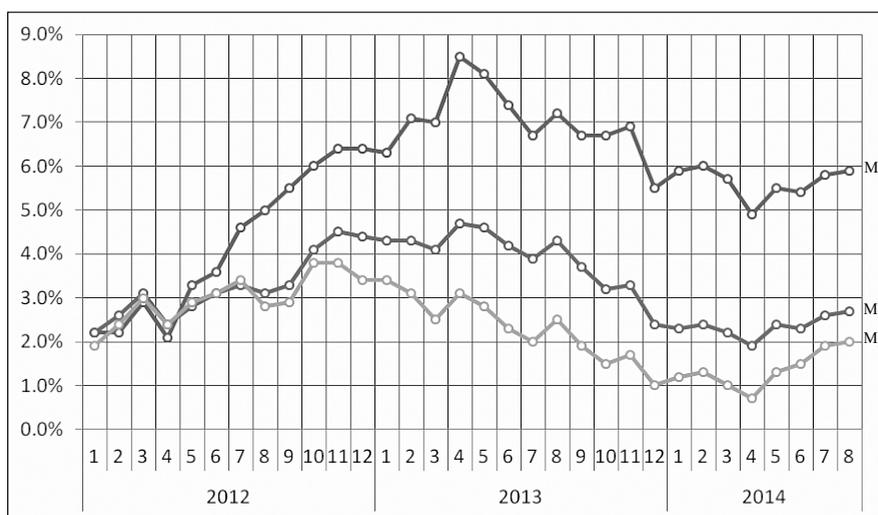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欧元区M1的月

度同比增速开始快于M2和M3的同比增速，而且随着货币供应体系层级的上升，其增速呈现阶梯状的减速分布；其中，2013年4月

M1 的月度同比增速高达 8.5%，M2 的增速为 4.7%，但 M3 的增速仅为 3.1%（见图 9）。这说明了由于欧元区宏观经济复苏动能缺失，广义货币供给领域和实体经济部门信贷的增长疲弱不堪，特别是居民信贷和小额机构信贷持续负增长，欧元区的货币供应仅在流动性很强的同业拆借市场（狭义货币供给领域）表现活跃。因此，欧洲央行推行负利率政策，

其目的是刺激海量的狭义货币供给注入以中小企业信贷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为欧元区的复苏提供动能；与此同时，也将有利于各层级的货币供应体系均衡发展。2014 年 6 月以来，M3 的月度同比增速回升迅猛，2014 年 8 月的同比增速历时一年重新达到 2.0%，与 M2 的增速日渐逼近，负利率政策的效果在此得到体现。

图 9 欧元区货币供应体系的月度同比增速



注：根据 2014 年 8 月份数据，欧元区货币供应体系自下而上分别为（M3）、（M2）、（M1）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 4. 欧洲央行推行负利率政策也从政治角度进行了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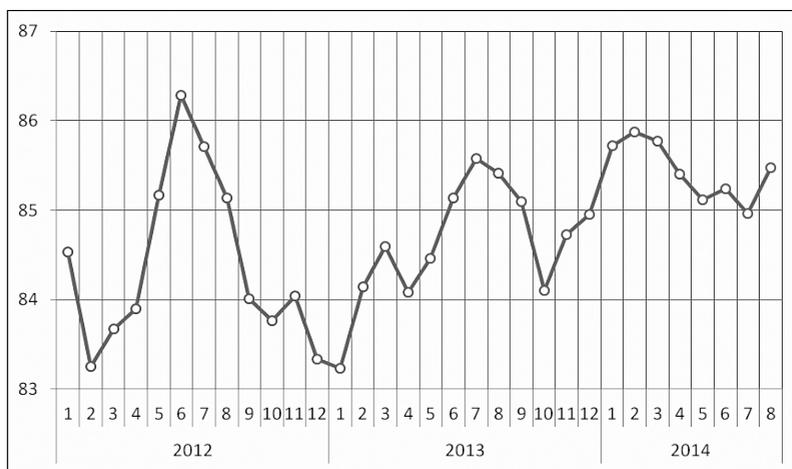
欧洲央行推行负利率政策既是欧元区内部国家之间的一次妥协，又是欧元区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一次博弈。首先，美联储承诺 2014 年 11 月完全退出 QE3，从而美元有稳定趋升的势头。进入 2014 年以来，美元指数相较于去年已经走强，平均水平提升了 1 个基点（见图 10），欧洲央行推行负利率政策一方面是在有意让欧元贬值，缓解欧元区内长期通缩的紧张局面和较大出口压力；另一方面也意在逼高美元，美联储长期的超低利率政策令欧元承压，欧洲央行实行负利率政

策将有可能令欧元内部的流动性活跃起来并开始外流，伴随美国的加息预期，欧元外泄加速，而美元可以作为过剩欧元相对安全的、容量足够大且流动性极高的资金池子。其次，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冲突很可能引发俄罗斯卢布的贬值（见图 11），这将不利于欧元区与俄罗斯的国际贸易往来，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先手打压欧元，有利于缓和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推而广之，欧元区的负利率政策同样可以改善欧元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际贸易环境。7 月份一般是欧元区国际贸易的“淡季”（一般而言，7 月份的经常项目净值会比 6 月份低），负利率

政策推出后，欧元区7月份的经常项目净值略高于6月，政策效果比较显著（见图12）。最后，从长期的汇率关系来说，欧元中间价与美元指数的反向概率为54.6%，而与人民币中间价同向的概率为70%，如果欧元区推行负利率政策影响新兴市场的主要渠道是汇率贬值，那么该政策很可能引发欧元区与新兴市场的竞争性贬值。德意志联邦银行、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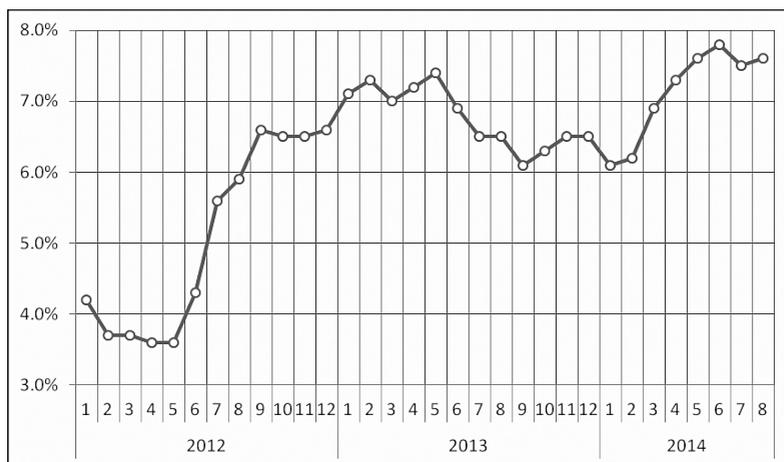
经济学界对欧洲央行实施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和充当欧元区主权债务国家“最后贷款人”的做法早有非议，但是就德国而言，避免欧元区乃至欧盟解体带来的收益将会比欧洲央行“奖懒罚勤”的托底救市思维带来的损失要大得多，因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欧洲央行推行的负利率政策持默许态度。

图10 近期美元指数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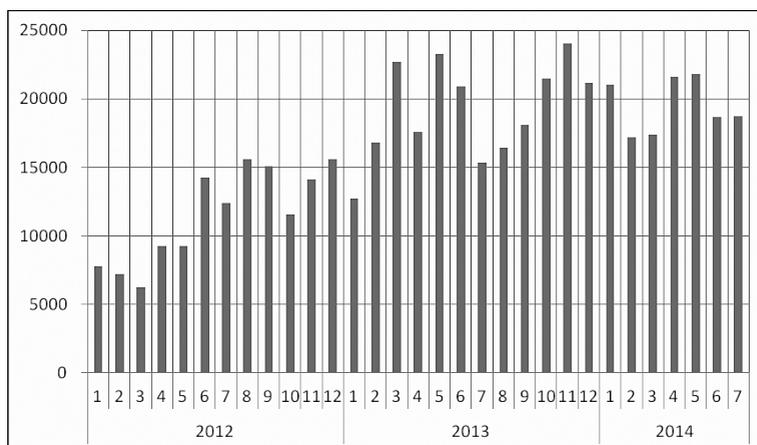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美联储。

图11 俄罗斯CPI月度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图 12 欧元区经常项目净值 (百万欧元)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 四、欧洲央行推出负利率政策的评价

总体而言，欧洲央行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推出负利率政策，可预期该政策将会对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比较积极的影响：从经济层面来看，负利率配合一系列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欧元区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避免经济出现更深层次的滑坡，负利率既可以释放相对充裕的资金流以纾解市场流动性匮乏的问题，欧元贬值也降低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国家的融资成本；从社会层面来看，“负利率时代”背景下的欧元区，其主权债务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的预期有望减轻，欧元区解体的风险在弱化，欧洲一体化的成果也会得以巩固甚至有可能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但是，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并非百益而无一害，笔者将对该政策进行如下两个方面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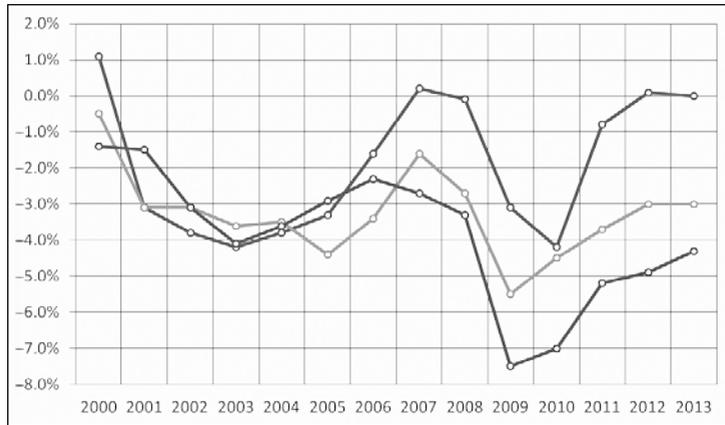
##### 1. 宏观经济调控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机结合，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注定了其经济调控不能“两条腿走路”。

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以宽松的宏观经

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一致的前提下，各国制定并执行的财政政策并非“同心同德”。德国的财政政策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的表现较其他国家更为自律，2011年以来德国财政盈余占GDP的比例始终保持在0%左右，并未出现如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一样泛滥的举债消费情况（见图13）。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月报中反映，2014年下半年欧元区财政赤字的情况会有所减少，预计2014年和2015年总支出的占比会逐年缩减，但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财政调整将变得步履维艰，欧元区赤字情况未能得到根本扭转（见表1）。不过，欧元区国家财政整顿的力度空前加强，比利时、荷兰、奥地利和斯洛伐克在2014年6月明确废止过度赤字项目（EDPs），部分风险可控的主权债务国家虽然未给出明确时间表，但也在努力纠偏并签署稳定增长公约（SGP）以扼制国债超发的势头，确保中长期预算平衡（MTOs）。新成立的欧元区财政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欧元区经济一体化步伐提速。

图 13 德国、意大利、法国历年财政盈余占 GDP 的比例



注：根据 2013 年数据，财政盈余占比自下而上分别为法国、意大利、德国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表 1 历年欧元区主要财政指标占 GDP 比重及预测 (%)

	2011	2012	2013	2014 ( 预计 )	2015 ( 预计 )
a. 总收入	45.3	46.2	46.8	46.7	46.5
b. 总支出	49.5	49.9	49.8	49.2	48.7
其中：					
c. 利息支出	3.1	3.1	2.9	2.9	2.9
d. 一般支出 (b-c)	46.4	46.8	46.9	46.3	45.9
预算平衡 (a-b)	-4.1	-3.7	-3.0	-2.5	-2.3
一般预算平衡 (a-d)	-1.1	-0.6	-0.1	0.4	0.6
周期性预算平衡	-3.5	-2.5	-1.4	-1.1	-1.3
结构性预算平衡	-3.5	-2.1	-1.3	-1.1	-1.2
总债务	88.1	92.7	95.0	96.0	95.4
实际 GDP 增速	1.6	-0.7	-0.4	1.2	1.7

数据来源：ECB。

## 2. 欧洲央行推行的负利率政策乃世界主要中央银行之首创，而且其本质上与丹麦的负利率实验有所不同。

2012年7月，丹麦中央银行决定展开世界首次存款负利率实验。当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许多主权债务国家身陷债务泥沼，拥有AAA信用评级的丹麦政府的法定货币丹麦克朗自然而然就成为国际游资和机构投资者的避风港，丹麦克朗因此对欧元持续升值，丹麦的出口受到重挫。有鉴于此，丹麦中央银行决定实施负利率政策，让丹麦克朗计价的资产贬值，挤出丹麦克朗的泡沫；与此同时，由于负利率政策的一个伴生的短期效果是商业银行纷纷将自己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大额可转让存单（CDs）借入现金账户以减少商业银行将资金放在大额可转让存单账户中所产生的“存放费”，因此也变相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多地将资金流入私营部门。丹麦中央银行直接将存款利率设置为-0.2%，待丹麦克朗对欧元的贬值通道开启后，随即将存款利率调升至-0.1%，负利率政策对丹麦克朗和欧元汇率的影响基本符合丹麦中央银行的预期。2014年4月，丹麦中央银行宣布加息至0.05%，负利率实验结束。

虽然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负利率政策是一个在短期内非常有效地避免不必要资本流入的工具”，但是在长期中，由于丹麦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存款利率已经为零且不可能再降低，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寻找其他方法来弥补中央银行的收费，因此商业银行普遍的做法是提高企业贷款门槛或者直接提高贷款利率。虽说在利率下行的过程中，货币政策给予的环境趋于宽松，但是当利率降低为负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压力，根据银行业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7—10月，丹麦商业银行运营成本额外增加了3亿克朗，银行业利润被进

一步摊薄，这也就相当于变相地收紧了货币政策。

由此可见，欧洲央行为了应对欧元区内部通缩风险并且刺激流动性注入实体经济而出台的负利率政策与丹麦中央银行的负利率实验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在既定通胀目标下保卫货币，而丹麦中央银行的负利率实验则是为了保持汇率稳定，试图将丹麦克朗对欧元的中间价控制在以7.46038为基准的正负2.25%区间以内。其次，丹麦克朗仅作为一国的法定货币具有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政策发挥效用的平台，而欧元是欧元区成员国共同的法定货币，而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负利率政策的实施其实有很多妥协的意味。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是意大利人，其出任行长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均偏向于减轻“欧猪五国”等主权债务国家的负担，因此货币政策的推行更为困难。最后，从货币政策失效的角度来看，丹麦的负利率实验如果失败最大的成本就是丹麦的国民经济崩溃，但欧洲央行负利率政策的失败将很可能让欧元区步入通缩深渊，最大的成本则可能是欧元区解体，因此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决策应该更为审慎。尽管如此，丹麦中央银行的负利率实验也为欧洲央行负利率政策的推出提供了经验，比如合理地锚定负利率的基准才能获得可期的政策效果；再利用负利率刺激流动性流向实体经济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商业银行的成本收益状况以免货币政策“逆向运行”，造成银行、企业和个人都持币观望的“流动性陷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负利率政策的成果主要依仗于“先行者优势”，因此充满了“以邻为壑”的意味，所以负利率政策的执行区间应该是偏重于短期的应激性调整，而不能作为长久之计加以利用，以免引爆货币战争。

欧洲央行推出负利率政策以来，虽然在

某些领域改善了欧元区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欧元区经济复苏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支持，但在负利率政策推行的过程中需要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修复。首先，欧洲央行应该疏通“控制三大核心利率→改变货币市场与主权债券市场的关键利率→影响商业银行对其客户提供存贷款的利率（金融市场的零售利率）→改变实体经济部门投融资成本格局”

这一条关键的货币政策传输渠道。其次，欧洲央行要充分发挥欧洲银行业联盟的作用，清除银行与成员国政府有害的联系，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最后，欧洲央行应该为商业银行进行银行业压力测试，并更多地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增强私营经济部门对商业银行健康运营的信心。

作者简介：黄燕芬，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俊，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经济师。

# 统一监管背景下瑞士金融法的变化

任丁秋

【摘要】瑞士于2009年实行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由分业监管走向统一监管，金融领域的法律和法规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变革。本文探讨在统一金融监管背景下，瑞士金融法律法规的一系列变化以及未来调整方向，提出对我国金融法规建设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统一监管 瑞士 金融法规

瑞士于2009年实行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大变革，由分业监管走向统一监管。在金融业统一监管的背景下，瑞士的金融和金融监管法规密集出台，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变革<sup>①</sup>，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困境和挑战，并紧跟欧盟金融法快速发展的步伐。

## 一、瑞士金融法规的变化

瑞士金融部门的法律框架是瑞士政治程序建构的组成部分。瑞士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根据国际法则和标准，适应瑞士国情，颁布本国的法律和法令。瑞士金融监管局负责保证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际标准在瑞士的正确实施，并为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提

供专家支持，以使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入议论程序。

瑞士金融监管局在颁布法规方面的权限很小，只有颁布法令和通告的权力。通过发布法令，在专业技术层面细化联邦议会的法律或法令；通过发布通告，解释其监管的规则和惯例，阐述对现行法律和法令的理解。<sup>②</sup>

### 1. 银行法规的变化<sup>③</sup>

#### 1) 修订《银行法》

2012年，瑞士对《银行法》加以修订，重点针对“大而不倒”的问题。规定到2018年，系统重要性银行要达到更高的股权资本要求，满足更为严格的流动性要求，符合特殊的风险分散规则，该法修订案于2012年3

① 瑞士金融监管局：年度报告2009—2013，www.finma.ch。

② 瑞士金融监管局：Annual Report 2013，P.9。

③ 瑞士金融监管局：Annual Report 2011，P.36；2012，P.44；2013，P.49。

月1日生效。

在瑞士，系统重要性银行首先是指两家“大银行”，即瑞士信贷集团和瑞士联合银行。2013年12月，瑞士金融监管局发布两个政令，根据瑞士联邦委员会颁布的《资本充足性法令》中的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规定，针对瑞士信贷集团和瑞士联合银行提出特别要求，对其系统重要性的具体内容做出规定。

瑞士金融监管局还对其通告《银行风险分散》(2008)加以修订，补充了详细说明，强调对系统重要性州立银行的风险也不能忽视和轻视。2013年11月1日，瑞士中央银行宣布，苏黎世州立银行为系统重要性银行<sup>④</sup>。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基于苏黎世州立银行在国内存贷款和支付服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该修订通告于2014年1月1日生效。瑞士金融监管局还新发布了《银行集团内部风险控制》的通告，旨在减少集团内部在财务和操作上的相互依赖性，该通告于2013年7月1日生效。

## 2) 实施巴塞尔协议Ⅲ

巴塞尔协议Ⅲ生效于2013年。为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瑞士联邦委员会颁发了《资本充足性法令》，于2013年1月1日生效。为贯彻巴塞尔协议Ⅲ关于流动性的新要求，瑞士的做法是将银行法令中的相应条款移植到新的流动性法令中去，同时由瑞士金融监管局发布通告，对相关业务内容加以规定，作为补充。

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技术细节和法规解释则体现在瑞士金融监管局的通告中。瑞士金融监管局修订了关于信贷风险、市场风险、信息披露和合格资本等相关通告，包括<sup>⑤</sup>：

《银行信贷风险》(2008)、《银行市场风险》(2008)、《银行资本充足性披露》(2008)、《银行合格股权资本》(2013)、《银行资金缓冲区和资金规划》(2011)，对原有通告仅做少量的详细说明和个别调整。为了便于银行机构实施，瑞士金融监管局还印制了有关问题解答的小册子。上述修订后通告均于2014年1月1日生效。

为实施巴塞尔协议关于操作风险管理的规定，对原有《银行操作风险》通告进行了部分修订，增加了关于数据安全的附录，对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提出质量控制要求，修订后的通告将于2015年1月1日生效。

## 3) 修订《资产管理指南》

为了反映和适应瑞士民法关于资产管理方面的新规定，瑞士金融监管局对其通告《资产管理指南》(2009)做了部分修订，包括资产管理中的权利返还、信息与调查的义务和恪尽职守、谨慎处理的责任，充实了附录和详细说明，修订后通告于2013年5月30日生效。

## 2. 保险法规的变化<sup>⑥</sup>

面对全球及欧洲保险市场及其法律法规的发展趋势，瑞士相关法律体系的差距更加凸显，迫切需要对保险监管和涉及保险公司的法律进行变革。

### 1) 出台《瑞士保险监管法》

瑞士金融监管局的意图是完善保险监管立法，增强对保单持有人的保护，消除矛盾，与国际标准相协调。《瑞士保险监管法》自2006年1月1日实施，经过全面修订，于

④ 瑞士金融监管局：Annual Report 2013，P.13。

⑤ 瑞士金融监管局：Annual Report 2013，P.49。

⑥ 瑞士金融监管局：Annual Report 2011，P.47；2012，P.52；2013，P.59。

2011年9月1日生效。

瑞士还部分修改了《保险监管法令》，关于偿付能力、数量风险管理（包括流动性要求）、自有风险和偿付能力评价等规定有所变化。对保险监管法令的任何修改均由联邦委员会负责。瑞士金融监管局于2013年底向联邦财政部提交了关于修订《保险监管法令》的提案。

## 2) 颁布《保险破产法令》

自2011年9月1日，瑞士金融监管局负责设立和操作保险破产程序。由于保险监管法只有关于破产的基本规定，瑞士金融监管局须在保险破产法令中制订详细的破产程序。经过前期一系列细化工作，2013年，瑞士金融监管局颁布了《保险破产法令》，其核心内容是保险破产的执行，细致规定了保险监管法第53—59条款下的保险破产程序，使其运作快速而有效，以更好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同时彰显保险法律的确定性，该法令于2013年1月1日生效。

## 3) 发布《瑞士偿付能力测试调整》通告

“瑞士偿付能力测试”自2011年1月1日实行，是一种经济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风险导向的测试方法，瑞士金融监管局以此作为衡量保险公司经济实力的因素之一。

2012年底，瑞士金融监管局做出暂时性调整瑞士偿付能力测试的决定。究其原因，一方面，国内经济存在困难，利率持续走低。2013年初，10年期联邦债券的收益降至0.5%以下。<sup>⑦</sup>瑞士金融监管局的目标是保证保险公司维持偿付能力和充足的准备金。另一方面，欧盟经过多年内部审议，同步启动偿付能力安排的时机尚未成熟。欧盟于2013年11月

宣布：将于2016年1月1日实施新的偿付能力制度，测量偿付能力的工具将更紧密地反映市场变化的趋势。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瑞士决定对偿付能力测试进行临时性调整。

《瑞士偿付能力测试调整》通告于2013年1月1日生效。调整的内容是基于风险的收益曲线。规定在低利率期间，可以使用非免除风险的收益曲线，对已生效业务产生的保险义务进行评估。这导致风险支承资本的增加和更高的偿付能力比率。此外，瑞士金融监管局还暂时降低对保险公司进行干预的临界点。瑞士偿付能力测试的调整期为三年，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底。自2016年1月1日，临时性调整将终止，所有保险公司将重新使用免除风险的收益曲线来评估其保险义务。瑞士金融监管局认为，对瑞士偿付能力测试的调整是值得的，已经收到积极的成效<sup>⑧</sup>。

## 4) 发布关于保险的系列通告

2011年瑞士金融监管局发布了《再保险规定》的通告，适用于所有再保险公司和经营再保险业务的公司，主要规范再保险业务的技术准备金的构成和清算，规定准备金的最低要求，特别是种类和规模，该通告自2011年3月实施。瑞士金融监管局2011年发出通告，要求保险公司将其总资产组合分成次级资产组合，并更多关注再保险公司的准备金，一方面审查特定的次级资产组合；另一方面检查特殊交易的情况。

2012年，瑞士金融监管局发布了《保险公司流动性》通告。对保险公司而言，流动性管理是财务管理的关键。该通告对保险公司规定了风险管理的细致要求，提出了确定和报告流动性风险的原则，规定了流动性报

<sup>⑦</sup> 瑞士金融监管局：Annual Report 2013, P.52。

<sup>⑧</sup> 瑞士金融监管局：Annual Report 2013, P.55。

告的类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该通告于2013年1月1日实施。

### 3. 市场法规的变化<sup>⑨</sup>

#### 1) 颁布关于集合投资计划的系列法规

##### (1) 修订《瑞士联邦集合投资计划法》

2011年金融市场法规的变化，首先表现在集合投资计划上。《集合投资计划法》自2006年6月23日起实施。2011年，为了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针对该项法律进行了部分修订和完善。涉及金融监管局权限的修改条款于2011年9月1日生效，据此瑞士金融监管局不仅负责强制性清算，而且负责设立和运作破产程序。修订后的《集合投资计划法》于2013年3月1日生效。

##### (2) 发布《集合投资计划破产法令》

为了紧跟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和与欧盟的法律同步，瑞士联邦委员会于2011年6月29日决定，引入欧盟的《关键投资者信息文件》，作为当年修订《瑞士集合投资计划法令》的一部分内容。自2011年9月1日，瑞士金融监管局负责集合投资方案的破产程序的设立和执行。依据这一新的授权，2012年瑞士金融监管局确立的首要工作任务，即是完善集合投资计划破产法令，针对各种法律形式的集合投资计划，设立规范的破产清算程序。2013年，瑞士金融监管局颁布了《集合投资计划破产法令》，该法令于2013年3月1日生效。

##### (3) 修订《集合投资计划分销》通告

伴随《集合投资计划法》和《集合投资计划破产法令》的实施，“公共广告”的提法被更广义的“分销”概念所代替。瑞士金融监管局全面修订了《集合投资计划分销》通告，取代了之前的《集合投资计划公共广告》，由于这一修订，以往“公共广告”和

“非公共广告”的区分不复存在。

《集合投资计划分销》通告于2013年10月1日生效。它提供了关于集合投资计划中“分销”的确切定义，规定了属于“分销”的活动内容，并解释了构成分销活动的法律后果。该通告针对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商、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公司、集合投资的有限合伙人、集合投资计划的资产管理人、外国集合投资计划的代表、分销商，以及所有分销集合投资计划的人。

瑞士在集合投资计划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享有世界声誉。2013年10月，瑞士作为东道主，集合投资计划监管扩大联络组年会在苏黎世召开，瑞士金融监管局主持了会议。来自19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如法国、卢森堡、爱尔兰、美国、南非、新加坡等国的高级代表参加了会议。集合投资计划监管扩大联络组成立于1975年，是一个由世界各基金重地金融监管机构组成的非正式团体，为集合投资计划专业领域提供交流信息观点、讨论业务和监管局势的平台。

#### 2) 修订证券交易披露通告

2011年，瑞士金融监管局对2008年发布的《证券交易披露要求》通告进行了修订，主要是对于证券交易商的披露要求更加详细，于2011年11月1日生效。

#### 3) 发布信用评级通告

2011年8月，瑞士金融监管局发布了《信用评级机构》的通告。瑞士金融监管局对于信用评级的要求适用于各个监管领域，不仅有银行、证券交易商，还包括保险公司。该通告于2012年1月1日生效，适用于保险公司的过渡条款的期限为2014年底。

<sup>⑨</sup> 瑞士金融监管局：Annual Report 2011，P.53；2012，P.59；2013，P.69。

#### 4) 确定货币市场基金指南

自2011年7月1日起,所有欧洲货币市场基金必须符合欧洲证券监管委员会颁布的“欧洲货币市场基金共同定义指南”。瑞士基金会发布了“货币市场基金指南”。瑞士金融监管局认可瑞士基金会发布的“货币市场基金指南”,以此作为最低标准,提供了瑞士的标准化要求,加强了对投资者的保护,该指南于2012年7月1日生效。

#### 5) 规范管理场外衍生工具

20国集团于2009年在匹斯堡召开会议,推动场外衍生工具的改革。瑞士金融监管局检查了贯彻G20决定对于新法规的要求,联邦委员会在金融监管局工作的基础上确立了目标,即建立规范管理场外衍生工具的法律框架,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护投资者。

#### 6) 反洗钱和打击恐怖活动融资

瑞士的金融行动工作队经过两年的努力,于2012年2月公布了修订的标准,联邦委员会审议了该成果,并指示成立一个独立工作组,其任务是根据金融行动工作队的建议起草提案,瑞士金融监管局为该小组的成员之一。

### 4. 法规实施的变化<sup>⑩</sup>

#### 1) 修订证券交易法

瑞士证券交易法经修订于2013年5月1日生效。该法对于证券交易的违法行为,如内部交易和价格操纵行为的规范更加严厉,同时将各州的刑事程序责任转交给联邦司法局。一般市场监管由瑞士金融监管局负责,凡是确定构成市场滥用的行为都归瑞士金融监管局管理。

#### 2) 修订市场行为规则

2012年,瑞士金融监管局全面修订了2008年发布的市场行为规则通告,详细规定了对于市场参与者的内部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的监管,补充了犯罪定义的条款,扩展了内部交易的犯罪定义,增加了股权披露义务和公开收购出价的内容,还修订了组织机构的要求,该规则适用于所有被审慎监管的机构。该通告于2013年10月1日生效。

#### 3) 修订证券交易法令

2013年,瑞士金融监管局部分修订了《证券交易法令》,具体修订了该法令的第11条,于2013年5月1日生效。

## 二、瑞士金融法规调整的方向

瑞士金融监管局自2009年1月1日成立,至2013年已整整5年。这期间,瑞士金融和金融监管的立法和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和突破,未来将继续加强和完善金融法规建设,其近期的工作重点如下<sup>⑪</sup>:

### 1. 跨行业法规

#### 1) 金融服务法

根据瑞士金融监管局的立场,金融服务法的相关文件已于2012年2月发布。联邦委员会2012年3月要求财政部开展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在金融产品分销方面进一步完善对客户保护。

#### 2)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

2013年初,瑞士金融监管局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上实行基于风险的监管方法,年底对每个机构在评估基础上进行评级。根据监管分类和评级结果,瑞士金融监管局决定对

<sup>⑩</sup> 瑞士金融监管局: Annual Report 2011, P.60; 2012, P.67; 2013, P.83。

<sup>⑪</sup> FINMA: Annual Report 2013, P.104-105。

有关机构的监管层次。瑞士认为，为了维护瑞士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加强金融稳定，瑞士必须与其他金融中心一样，履行20国集团的义务，尽可能全面地实施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场外衍生交易的提议，瑞士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方面的法规也必须符合国际标准。

### 3) 反洗钱法

2012年2月，金融行动工作队采纳了部分修订的关于反洗钱、恐怖活动融资的标准，后来又增加了关于大规模杀伤武器销毁融资方面的内容。2012年4月，瑞士联邦委员会要求成立一个跨部门工作组，在财政部领导下，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 4) 清白货币策略法

瑞士制订清白货币策略法的目的是：对瑞士的所有金融中介机构推行恪尽职守、谨慎处理的义务，以保证遵守税收法律。瑞士将按照国际标准，寻求与最重要的伙伴国家达成信息自动交换协议。无论是否能够与其他国家达成信息自动交换协议，瑞士都将讨论清白货币策略法。

### 5) 审计公司监管法

联邦审计监察署负责对从事财务审计和合规审计的审计公司进行监管。在瑞士，审计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实际上构成了金融监管基础性工作的重要部分，被称为金融监管的“延长臂膀”。审计公司代表金融监管局对银行、保险公司和集合投资计划进行合规审计。审计公司须按要求向金融监管局提交预期风险分析和包含更多信息的报告。2013年1月1日，金融监管局修订的《审计》和《审计公司和牵头审计师》的通告开始实施。

### 6) 金融市场审计法令

审计公司的监管职责转交给联邦审计监

察署，需要修正金融市场审计法令。审计体系的优化方案已在审查之中。

## 2. 银行法规

### 1) 休眠资产法令

瑞士银行已被允许使之前公布的休眠资产流动起来，收益将归联邦。如果资产受益人对于公告没有做出反应，其主张资产的权利将终止或失效。银行法令将做全面修改，以适应这种调整。

### 2) 会计法令或通告

瑞士关于会计标准的立法的修正，是通过修订股份公司法来进行的。瑞士联邦委员会和瑞士金融监管局共同起草一个实施规定，对银行法令做全面修订，以适应这种调整的情况。

### 3) 杠杆率通告

杠杆率将于2015年公布，将清晰地确定杠杆率的计算和公布。

### 4) 银行流动性通告

瑞士金融监管局2013年的相关通告中，已经体现了巴塞尔协议Ⅲ关于流动性的要求（短期流动性比率）。银行法令和通告的上述变化将逐步实施。

## 3. 保险法规

### 1) 保险监管法令

瑞士的保险监管法自2006年1月1日起实施。根据市场发展和国际趋势，瑞士需要在法律层面做出变革和调整，其目标是消除矛盾，完善保险立法，更好地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并且与国际标准相协调。

### 2) 保险合同法

瑞士修订保险合同法的目的是：建立一

个符合形势变化要求的法律框架，为被保险人提供合理而可行的保护。

#### 4. 市场法规

集合投资计划通告。随着集合投资计划法的部分修订，集合投资计划法令也需要做出相应的修正。

### 三、瑞士金融法规变革的启示与借鉴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可以预见，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金融法律体系的建设将跨入全新的发展时期。

金融法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整金融

关系、从事金融业务和金融监管活动的行为准则。其中心任务在于提供完备、严密的法律规范体系，维护国家金融系统的安全、有序、高效地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瑞士统一监管背景下金融法规的调整变革，对我国的金融法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在我国目前金融分业监管的模式下，第一，对现有金融法规进行全面梳理，加以改善和优化，使之成为精简而实用的流线型法规，适应国内金融市场的需要，同时符合国际金融法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标准和惯例相协调。第二，待时机成熟，可以分行业制定相关的金融监管法，如保险监管法。第三，适时出台跨行业的统一金融法规，如金融服务法。第四，重视金融法规的立法和实施，更加明确各金融监管机构在立法和法规实施方面的职责任务和权限范围。

作者简介：任丁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德国在华跨国公司中德员工语言交流与跨文化人际交往

姚 燕

**【摘要】**企业的成功与企业中成功的人际沟通和交往密切相关。德国在华跨国公司中德员工的交往是利用语言沟通双方的工作和生活的过程，这种跨文化的人际交往成功与否影响双方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并进而影响企业政策的执行、企业经营的成功，蕴含着一种交往的伦理态度。笔者结合5家德国在华跨国公司所做的问卷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在华跨国公司中德员工语言交流和跨文化理解与沟通的情况。

**【关键词】**跨文化交往 跨国公司 语言 理解

## 一、引言

人际交往是人际共处的一种形式，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受到伦理规范的调节。平等且相互尊重的基础、相互信任的氛围、相互沟通理解与合作的态度、具有人的生活世界不同的意识和设身处地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的移情能力都是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也是人际间交往的伦理基础。而个人的生活世界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人际间的交往是借助语言构建语篇、进行思想沟通与交流的过程，旨在沟通不同的生活世界，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并以公众认可的社会规范来作为共同的行为规则。

德国在华跨国企业的成功离不开成功的

中德员工跨文化人际交往，因为，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履行所有责任最终要依靠组织成员——作为个体的员工，而德国在华跨国企业则要更为复杂地依靠中德员工在个人层面的交往。在经济伦理学中，个人层面的伦理主要强调企业领导者的伦理，因为处于较高管理层和决策层的领导者的伦理素质和价值观念决定了企业行为的伦理道德导向。而同样重要的是员工的道德伦理素质，毕竟企业决策最终由员工来执行完成。员工在企业人力资源中占主体地位，一种理念能否为员工所理解、能否在转化为企业制度以后有效地实施，不仅取决于领导，也取决于员工的道德伦理水平与素质以及领导与员工及员工之间的互动理解和沟通。

德国在华跨国公司中德员工的交往是利用语言沟通双方的工作和生活的过程,这种跨文化的人际交往成功与否影响双方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并进而影响企业政策的执行、企业经营的成功,蕴含着一种交往的伦理态度。那么他们运用外语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语言运用和理解上的问题?原因在哪里?他们是否对对方的生活世界有所了解?在中国的跨国企业中,来自不同文化的员工在交流与沟通中对于语言使用、相互理解的具体问题,尚缺少结合实证调查的研究。为此,笔者曾在5家德国在华跨国公司做过问卷调查,旨在调查受问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是否能够避免误解和具有真正做到相互理解与交流的意识,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来自异文化合作伙伴的语言,从而反映出他们对于异文化的态度。笔者收到了61位中国员工和24位德国员工问卷反馈。因笔者力量有限,不能在德国在华跨国公司中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些现实。

## 二、中德员工的语言交流

### 1. 中德员工使用的语言

交往离不开语言,语言常常被看作人际沟通的工具。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精神,起到传播文化、沟通文化的桥梁作用。它的这些重要作用在跨国公司的跨文化人际交往中体现得极其明显与深刻。英语国家在近几年来的经济强势发展体现为: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中,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之一。笔者所调查的德国在华跨国公司中,中德员工各有超过90%的人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分别为93.7%和96%。而他们用作与对方同事交流的语言手段中,英语超过70%,分别为79.4%和77.4%。

### 2. 中德员工的语言表达与语言理解

中德员工都用非母语的第三种语言交流,其间出现交流失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一般来说,用母语的言语符号交流时,“能指”与“所指”的对应性强于使用非母语言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对应性。用非母语的言语符号进行编码(创造语篇),即是用另一种言语符号系统中的“能指”联结自身要表达的“所指”,这种对应关系与母语符号体系中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不是一一对应、可以简单转换的,因此在跨文化人际交流中,具有这样一种意识,即言语符号体系的差异可能使语言表达不能完全表述思想及可能产生误解,是取得交流成功的第一步。中方员工一半以上(59%)意识到用非母语交流时可能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而50%的德方员工认为辞能达意。

在是否具有避免误解非母语言语符号的意识方面,中德员工“意识到这是我的非母语,我很可能不完全理解对方的表述,要多反问一下,以便确定他的意思”的人数比例分别为42.6%和66.7%，“意识到这是我的非母语,但我能够理解对方的表述”的人数比例分别为37.7%、25%。由此可见,中德员工中有不少人在用非母语与外国同事交流时具有避免沟通中产生误解的意识,但这个比例并非占绝大多数。

在发生误解几率、其后果及双方如何对待发生误解的情况方面,中德方员工都有超过一半的人与同事用非母语交流时发生过误解,分别为60.7%和75%。从以上两项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仅有避免产生误解的意识还不足以真正避免误解,误解仍然会发生。其中,大部分误解导致的结果不严重,只有很少情况是误解导致了严重后果(德方员工4.2%),甚至有小部分人没有发生过误解的情况(中方27.9%、德方8.3%)。在笔者与有关管理、技术人员的访谈中,多次听到关于因语言误解带来严重后果的情况,特别是在技

术工程环节方面。有时，误解一个词甚至导致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损失。非母语交流中的语义问题也常产生在跨文化经济交往的其他环节，如合同中术语的不同，某些概念在另一种文化中不存在，对于“质量”等重要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内涵不同等情况，都会导致误解，甚至导致法律性后果。<sup>①</sup>

在跨文化交往中，重视语言的符号属性，避免因不同语言能指与所指差异而产生误解，是语言沟通最基础、关键的一个环节，也蕴涵着愿意通过准确表达、准确理解语言符号而真正理解他人、努力使自身为他人所理解的伦理态度。

### 三、中德员工的世界知识、文化意识与交往

#### 1. 语篇交流沟通人的生活世界

交往者在互动中用语言沟通彼此的生活世界。语言是符号的体系，用语言交流的过程也是用以符号构成的语篇 (Text) 的交流过程，语篇是交流的基本形式。语篇是“内容连贯、作为一个整体用于可识别的交际功能的、有限序列的语言符号”<sup>②</sup>，人际间的口头或书面交流都可被看作用语言符号构成的语篇的交流过程，人际间的语言交流即是编码、认知和解码这几个主要环节不断重复的过程，即语篇的构建与理解不断重复，受到语言内和语言外两方面因素影响。

符号本身总是包含“能指”与“所

指”两个方面的基本属性。相应地，由语言符号所构成的语篇也分为由符号构成的表层结构——衔接 (Kohäsion) 和通过符号传达的思想所构成的深层结构——连贯 (Kohärenz)。语篇理解就是要透过语篇的表层结构到达其深层结构，构建一种连贯。语篇接受者所建立起的“语篇连贯”与语篇创造者原来的“语篇连贯”总是不同的。创造者所要表达的意图与接受者所作出的解释可能拥有共同之处，但不会完全相同，因为二者的生活世界不同。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二者的世界知识 (Weltwissen)、行为知识 (Handlungswissen) 和概念性解释模式 (konzeptuelle Deutungsmuster)。世界知识由日常知识、个人的经验知识以及接受教育获得的知识 and 专业知识构成；行为知识受文化的影响很大，是正确评判语篇创造者产生语篇的行为价值的重要前提之一；概念性解释模式被人们用来在日常生活控制 and 组建对“世界”的感知，这种感知大多是潜意识的，概念性解释模式使人能够把不同的事件、事实以特定的方式前后贯穿起来看待。<sup>③</sup> 每个人的生活世界不同，所以每个人所拥有的世界知识、行为知识和概念性解释模式都不同于其他人的。在语篇理解的过程中，语篇所传达的内容只有一小部分以符号形式展现出来，而大部分内容都要依靠接受者具备的世界知识、行为知识和概念性解释模式在理解过程中进行补充，这种积极的知识补充过程往往是接受者意识不到的。

① Trommsdorff, Volker/Wilpert, Bernhard : Deutsch-chinesische Joint-Ventures, 2. überarbeitete Auflage, Wiesbaden 1994, 122页。

② 原文为: ...eine begrenzte Folge von sprachlichen Zeichen, die in sich kohärent ist und die als Ganzes eine erkennbare kommunikative Funktion signalisiert. Brinker, Klaus: Linguistische Textanalyse: Eine Einführung in Grundbegriffe und Methoden, 4., durchges. und erg. Auflage, Berlin, 1997, 第15页。

③ Linke, Angelika/Nussbaumer, Markus/Portmann, Paul R. : Studienbuch Linguistik, Tübingen 1996, 第227—229页。

## 2. 中德员工的世界知识——对对方文化中经济体制、企业制度的了解

世界知识、行为知识和概念性解释模式这三个因素深刻影响着语篇的理解,进而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同时,这三个因素也是语篇理解的一个结果。语篇中的新信息在经过头脑加工后被纳入原有的知识结构中,被内化,同时扩展和丰富了原有的知识结构。语篇接受者被扩展了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又会影响到以后的理解。在解释语篇、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被扩展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语篇接受者扩大了自己的经验范围,深化了对世界的认识,丰富自己的生活世界。可以说,语篇理解是一种交往,用语言符号构成的语篇形式把语篇的创造者和接受者的生活世界联系沟通起来,是人际交往的重要环节。

在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中,潜移默化且最直接影响中德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交流的世界知识,是对对方国家的经济体制、企业制度的了解。企业经济活动直接受一个国家经济体制、企业制度的决定,企业雇员在工作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直接受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影响,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决定其企业雇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同。跨国公司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员工是否了解对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潜在地影响着人际间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因为双方对对方文化的了解能够构成共同的背景知识,这种背景知识潜在地影响双方对对方思想和行为的理解。否则“某些事实和期望没有得到交流,因为大家都认为对方理所当然地已经了解了这些事实和期望,结果最后造成误解”。<sup>④</sup>

大部分中德员工对对方国家的经济制度、企业制度都有一定了解,但自认为尚了解得不清楚,比例分别为55.7%和62.5%,根本不了解的分别为31.1%和25%,了解的只占11.5%和4.2%。

在对对方经济体制的看法上,11.3%的中方员工认为德国经济体制“很科学,照顾了人的福利”,17.7%认为“虽然享受福利,但税收太重”,46.8%认为“值得中国学习,但要考虑中国国情”,还有11.3%的人表达了其他看法,“有序但不够灵活”、“很成功”以及“如果把经济体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同起来,我觉得有些片面”。52%的德方员工认为中国经济体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政府干预还很多”,20%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很难实现体制的转变,至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体制转变”,8%的人认为“与德国的经济体制有相似之处”,还有16%的德方员工认为“变革计划正在统一领导下实行”,“还是一个混合体制”,“是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统制经济共栖的体制”。这种看法同德国媒体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从本身所处的自由市场经济成分较多的经济体制出发来看待中国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制。

中德员工对于对方国家经济体制、企业制度的了解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直接影响着彼此间的合作,他们如何看待这些知识对他们合作的影响?大部分中德员工都认为对方国家经济、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工作(中方80.3%,德方58.3%),中国员工与德国员工在发生意见分歧时,文化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中国员工大部分(86.9%)没有同德国同事发生过争论,而德国员工与中国同事发生争论的比例(50%)多于中国员工同德国员工

<sup>④</sup> Bosch, Aida/Reichenbach, Thomas/Schmidt, Gert : Organisationskulturen in Deutschland und China : Typische Problemlagen, 第182页, in : Böhn, Dieter u. a. (Hrsg.) : Deutsche Unternehmen in China : Märkte, Partner, Strategien, Wiesbaden 2003. 第179—205页。

发生争论的比例(11.5%)。

其中的原因从中德员工交谈的低频率中可见一斑(见下一段中关于中德员工对同对方同事交谈看法的调查结果):中方员工较少同德方员工交谈,发生意见分歧的机会也会较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中重视“和”的因素对中国员工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反映在对中德员工如何对待冲突的态度上:中方员工有59%的人选择在同德方员工发生意见不合时“要争论,但是注意方式方法,以巧妙委婉的表达方式说服他”,27.9%选择“不争执,认为他是外国人,和我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应首先确认他是否因不理解中国文化背景而与我的意见不合”。只有1.6%的人选择“直言争论,吵起来也没关系”,4.9%的人在其他意见中写道“了解对方对这件事的基本态度和观点,找出症结所在,努力得出解决方案”,“看情况而定,一般不争执,特定情况下需说明事实、解释事情”。这个调查结果同以往关于中德合资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常描写中国员工为给德国人面子、避免与德国同事争论的描述有所不同:中方员工会与德国同事争论,但他们仍然注意方式,避免与德国同事直面冲突,以求在平和的气氛中,用委婉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德方员工中也有56%的人选择“同他争,但注意方式方法”一项,与以往关于中德合资企业管理的书中所描写的德国员工常常坦言自己的意见、而不考虑中方同事感受的情况不同,接受本调查的德国员工也考虑到中国人注重面子、维护人际间和谐关系的需要这一文化因素。也有24%德国员工选择“不争执,认为他不是德国人,和我的文化背景不

一样,应首先确认他是否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与我的意见不合”,显示出他们处理与中国员工人际间关系、解决问题时考虑中国文化因素的跨文化态度。

世界知识与文化因素影响中德员工的语言交流与理解。那么,在跨国公司这种经济活动中,中德员工怎样看待与来自异国文化的同事的语言交流,是否在工作环境中仅重视通过语言交流达到完成工作的目的,还是除此之外能够借助跨国公司这个接触世界的窗口,了解异国的文化,从而促进他们工作中的相互理解?对此,中德员工分别有24.6%、95.8%的人经常同对方员工交谈,德国员工同中国员工经常交谈的比例大大多于中国员工同德国员工交谈的比例,73.8%的中方员工不经常同德方员工交谈。以上状况的原因可以从下面的调查结果看出:中方员工中认为“同德国同事交谈只是工作往来,没什么意思”的比例(34.4%)明显多于德国员工对与中国同事交谈的相应看法(0,即无德国员工认为同中国员工谈话没有意思),而认为“能够看到德国人的一些有益的思维方式和德国文化,很有意思”的比例(44.3%)明显少于德国员工相应的对中国式思维方式和中国文化的看法(91.7%)。中方员工方面呈一种消极的循环:很少交谈-交谈没意思-很少交谈。德方员工方面则呈现一种积极的循环:经常交谈-交谈很有意思-经常交谈。这里还要考虑到接受调查的中德方员工在交谈中的“权势”状况。“权势”是指在等级框架中交际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地位距离或垂直距离,<sup>⑤</sup>是影响话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公司的等级框架中,上司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为

<sup>⑤</sup> 罗纳德·斯考伦,苏珊·王·斯考伦:《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正权势关系”。<sup>⑥</sup> 受问的德方员工 75% 为中、高层经理，20.8% 为普通员工，而中方受访者只有 14.8% 为中、高层经理，83.7% 则为普通员工。中、高层经理要掌握部门运作的全局，会同每位下属普通员工有更多的接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跨国公司中中德方员工总体地位差别、交往频繁程度的现状及频繁程度和个人感受之间的关系。

### 3. 中德员工对语言文化培训的看法

就跨国公司中的中德员工之间的跨文化人际交往而言，有必要使中德双方员工都更多地了解和理解对方的文化，从而创造出双方共享的背景知识、加强双方在工作中的相互理解。笔者的调查结果也反映出中德员工的这种需要：中德员工分别有 75.4%、88% 的人认为“有必要给员工开设德国/中国文化的讲座或进行培训”，分别有 78.3%、79% 的中德员工认为其原因在于“有助于理解对方同事的思想和与他们的交流”，15.2% 的中方员工“纯粹出于兴趣”，6.5% 在补充意见中写道“学习德国的历史先进性，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有助于工作上的合作，相互理解，尤其是工作方式上的”。由此可见，中德员工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公司开设关于对方国家的文化讲座或进行文化培训有助于理解来自对方国家的同事及与他们的交流，有助于工作中的合作，意识到对对方文化的了解给中德同事之间的理解、合作带来的重要作用。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对方国家语言，是学习和从感性上体会对方国家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接受调查的中德员工持同样的想法：42.6% 的中方员工、68% 的德

方员工认为“用英语同德国同事/中国同事已经能够交流了，有必要学德语/汉语”，这个比例没有认为有必要开设对方国家文化讲座、进行文化培训的人数多（见上段），47.5% 和 20% 的中德员工认为没有必要再学对方语言。关于学习对方语言的原因，58.1% 和 66.7% 的中德员工认为有必要学习对方语言由此可以更直接地接触对方文化，有助于理解对方同事的思想和与他们的交流；25.6%、9.5% 的认为有必要学习对方语言是纯粹出于兴趣。另有 11.6% 认为有必要学习对方语言的中方员工在补充意见中写道“多会一种语言好”或者“德国同事的英语不好”，和 19% 认为有必要学习对方语言的德方员工“有益于融入中国文化，而且对于以后的很多方面都有益”、“为了生存”、“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比如买东西的时候”、“能够在中方伙伴那里打开一扇门，因为如果外国人努力学习中方伙伴的语言，他们就会积极地看待外国人”。德国员工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中都需要中文，而且学中文不仅仅局限于同中国同事语言交流和日常生活的功用。学习中文也有助于他们理解中国同事的思想，融入中国文化，甚至有利于搞好同商业伙伴的关系。相对而言，中国员工生活在本国语的环境中，学习德文的要求不很迫切，而且从笔者在实际生活中的体会来看，英语在中国处于强势地位，是中国人的第一外语，首先学好英语，能够自如地同外国人交流，适应国际化的趋势，是大多数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目的，也是找到好工作的前提。

近年来，国外学习中文的人大大增加。但是，在英语仍在经贸领域中占统治地位、

<sup>⑥</sup> 罗纳德·斯考伦，苏珊·王·斯考伦：《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49—50 页。此书作者认为在大多数商务和政府机构中，其组织示意图都显示出这种正权势关系。当交际参与者之间存在很小的或不存在等级距离时，这种关系就为负权势关系。

德国在华跨国公司中仍然通过英语这第三种语言实现中德员工之跨文化人际交往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员工实际的工作压力和工作中的需要，可以尝试在跨国公司中为中德员工开设对方国家文化的讲座，其中包

括必要的语言学知识、对方国家语言的知识，并结合工作中中德员工交往的实际感受和实际事例，培养员工的跨文化知识和意识，以促进中德员工的思想交流、深化理解和加强合作。

作者简介：姚燕，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 Chinesische Resonanz auf die europäische Versicherungsaufsicht

Von XU Siji

**【 Abstract 】** Da beim Aufbau des Versicherungsaufsichtssystems in China europäische Erfahrungen stets als Beispiel herangezogen werden, nimmt der vorliegende Beitrag die chinesische Resonanz auf die europäische Versicherungsaufsicht als Untersuchungsgegenstand. Zunächst wird das aktuelle EU-Reformprojekt Solvency II kurz vorgestellt. Anschließend wird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darüber zusammengefasst und die chinesische Bewertung des europäischen Modells als Schwerpunkt analysiert. Schließlich wird der Entwicklungsprozess der chinesischen Versicherungsaufsicht dargestellt, auf den das europäische Aufsichtssystem deutlich einwirkt. Dabei kommt man zu dem Ergebnis, dass die europäische Versicherungsaufsicht von den Chinesen überwiegend positiv bewertet wird, und dass man aber bei der Aufnahme des europäischen Modells die spezifischen Verhältnisse in China beachten muss.

**【 Schlagwörter 】** Versicherungsaufsicht Solvency II EU China

Bei der Entwicklung des Versicherungsaufsichtssystems in China werden europäische Erfahrungen stets als Beispiel herangezogen. Die ersten aufsichtsrechtlichen Vorschriften zum europäischen Solvabilitätssystem in den 1970er Jahren, die sich aus den Richtlinien 73/239/EWG für die Schadenversicherung und 79/267/EWG für die Lebensversicherung ergeben, werden in China als „Solvency 0“ bezeichnet. Die dann im Jahr 2002 von de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und dem Rat verabschiedeten Richtlinien 2002/13/

EG und 2002/12/EG nennt man „Solvency I“, und die jüngst im Jahr 2009 verabschiedete EU-Richtlinie 2009/138/EG betreffend die Aufnahme und Ausübung der Versicherungs- und der Rückversicherungstätigkeit „Solvency II“. Da das aktuelle chinesische Versicherungsaufsichtssystem eigentlich in hohem Ausmaß auf Basis des europäischen Vorbildes „Solvency 0/I“ aufgebaut worden ist und angesichts der dramatischen Veränderungen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Finanzmarkt offensichtlich auch kontinuierliche

Erneuerungen braucht, schenkt das chinesische Versicherungswesen große Aufmerksamkeit auf das EU-Projekt Solvency II. Seit einigen Jahren fokussiert sich die relevante Forschung auf das fast einzig gewordene Thema Regulierung über Solvabilitätsregeln für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und die Forschungsergebnisse finden auch relativ große Resonanz bei der Politik. In welchem Zustand steht die chinesische Forschung über Solvency II? Wie schätzen die Chinesen die europäische Versicherungsaufsicht ein? Und in welchem Ausmaß wird das europäische Modell von den chinesischen Aufsehern akzeptiert? Auf diese Fragen werde ich in dem vorliegenden Beitrag näher eingehen.

## 1. Allgemeines über Solvency II<sup>①</sup>

Solvency II ist ein Projekt der EU-Kommission zur grundlegenden Reform des Versicherungsaufsichtsrechts in Europa, vor allem der Solvabilitätsvorschriften für Eigenmittelausstattung von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Es soll ein weitgehend wettbewerbsneutrales Aufsichtssystem geschaffen werden, das die tatsächliche Risikolage des Versicherers umfassend und realistisch beschreibt und Anreize für die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setzt, unternehmensinterne Risikomanagementsysteme zu implementieren.

Solvency II verfolgt analog zu Basel II einen Drei-Säulen-Ansatz, der quantitative Aspekte des Finanzmanagement mit qualitativen Anforderungen an das Risikomanagement und Offenlegungspflichten verknüpft.

a) *1. Säule:* Bestimmungen über quantitative Anforderungen hinsichtlich der Dotierung versicherungstechnischer Rückstellungen, der Vermögensanlage und der Solvabilität des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s. Auch bei Solvency II bleibt die grundlegende Solvabilitätsidee eines Vergleichs zwischen den vorhandenen Solvabilitätsmitteln und den geforderten Solvabilitätsmitteln erhalten. Dabei werden die geforderten Solvabilitätsmittel zweistufig definiert. Die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müssen mindestens das Minimalsolvenzkapital (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 MCR) vorhalten, das über einfache Faktormodelle ermittelt wird. Zur Vermeidung aufsichtsrechtlicher Eingriffe müssen Solvabilitätsmittel mindestens in Höhe des Zielsolvenzkapitals (Solvency Capital Requirement, SCR) vorgehalten werden. Dieses kann wahlweise über ein von der Aufsichtsbehörde vorgegebenes Standardmodell oder über ein von der Aufsichtsbehörde zertifiziertes internes Risikomodell des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s berechnet werden.

b) *2. Säule:* Vorschriften für die internen Modelle und Prozesse für das Risikomanagement des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s sowie Festlegung des aufsichtsrechtlichen Überprüfungsprozesses.

c) *3. Säule:* Offenlegungsvorschriften zur Förderung der Marktdisziplin der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Hierbei ist eine Koordination mit den Offenlegungsvorschriften der externen Rechnungslegung (IAS/IFRS) notwendig.

① Wagner, Fred: "Solvency II", <http://wirtschaftslexikon.gabler.de/Archiv/85201/solvency-ii-v8.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5.10.2014.

## 2. Überblick über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Das erste Buch, das den Chinesen das EU-Projekt Solvency II umfassend vorstellt, wurde im Jahr 2008 von Ökonomen aus Universität Beijing herausgegeben.<sup>②</sup> Darin werden nicht nur der Hintergrund, die Gestaltungsidee und der Rahmen von Solvency II ausführlich dargestellt, sondern auch die möglichen Auswirkungen des sogenannten Umbruchs von Solvency I zu Solvency II auf die Versicherungsaufsicht selbst, die einzelnen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und den gesamten Versicherungsmarkt auseinandergesetzt. Anschließend werden die europäischen und die chinesischen Verhältnisse in Hinsicht auf die Versicherungsaufsicht verglichen und politische Implikationen für den Aufbau des Solvabilitäts-systems für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in China herausgezogen. Danach wurden viele Artikeln und Arbeiten von Wissenschaftlern aus verschiedenen Universitäten bzw. Forschungsinstituten und Gesetzgebern im Bereich der Versicherungsaufsicht i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veröffentlicht, insbesondere im Jahrgang 2008 und 2010. Zu erklären ist wahrscheinlich, dass der Vorschlag der EU-Kommission an Europäisches Parlament und Europäischen Rat für Solvency II-Rahmenrichtlinie 2007 und die Verabschiedung von Solvency II durch EU-Parlament 2009 Anregungen für die entsprechende Forschung in China gebracht haben.

Zu nennen sind ein paar Artikel von den Verantwortlichen aus der chinesischen Versicherungsaufsichtsbehörde und den dominierenden Versiche-

rungsgruppen auf dem chinesischen Markt, die hohe politische Akzeptanz des europäischen Regulierungsmodells im chinesischen Versicherungswesen andeuten.

- 吕晨:《欧盟偿付能力监管体系改革及启示》,载《中国保险》,2008年7月号,第59—63页(Lü Cheng:“EU Insurance Supervision Reform and Its Implication”, in: *China Insurance*, 7/2008, 59-63). [Autor aus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group) of China*]
  - 姜波,陶燃:《欧盟保险偿付能力II监管体系改革最新进展》,载《中国金融》,2010年,第23期,第37—39页(Jiang Bo/Tao Ran:“New Progresses in EU Solvency II”, in: *China Finance*, 23/2010, 37-39). [Autoren aus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 江先学:《欧盟偿付能力II对完善我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启示》,载《中国金融》,2010年,第23期,第40—41页(Jiang Xianxue:“Implication of Solvency II for the Improvement in Insurance Supervision System of China”, in: *China Finance*, 23/2010, 40-41). [Autor aus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 杨琳:《欧盟保险集团监管制度的借鉴与启示》,载《中国金融》,2012年,第13期,第39—40页(Yang Lin:“Implication of EU Supervision on Insurance Group”, in: *China Finance*, 13/2012, 39-40). [Autor aus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group) of China*]
- Erwähnenswert ist noch der im Jahr 2012

② 孙祁祥,郑伟:《欧盟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及对中国的启示》,北京:经济科技出版社,2008年。

③ 张中华,未新蓉,陈红:《2012年中国金融发展报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bekanntgegebene Bericht über die chinesische Finanzmarktentwicklung,<sup>④</sup> der ein spezielles Kapitel über EU-Solvency II und seine Implikation für die Reform des chinesischen Versicherungsaufsichtssystems hat, das die jüngsten Forschungsergebnisse von chinesischen Analysten über Solvency II und seine Übertragbarkeit nach China zusammenfasst.

Die bisherige Forschung und Debatte über EU-Solvency II in China zeigen folgende zwei Merkmale:

1) Die meisten Arbeiten beschäftigen sich hauptsächlich mit der Vorstellung von europäischen Erfahrungen, während fachlich tiefgehende Analysen aus chinesischen, asiatischen oder internationalen Perspektiven fehlen. Voller Interesse verfolgen die Chinesen die Notwendigkeit des Umbruchs von Solvency I zu Solvency II, seinen Zusammenhang mit Basel II, die ideelle Grundlage und den Rahmen von Solvency II sowie die möglichen Effekte nach Inkrafttreten von Solvency II. Auf die QIS 1-5 (Quantitative Impact Studies 1-5) unter der Leitung von EIOPA (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 wird auch Aufmerksamkeit gerichtet.

2) Die bisherige Forschung über die Versicherungssolvabilität in China beschränkt sich grundsätzlich auf die qualitativen Analysen, auch beim Forschungsthema über die Anwendbarkeit von Solvency II in China, während quantitative Analysen der Solvabilität von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sehr selten sind, wahrscheinlich wegen den fehlenden Datenquellen. Eine Ausnahme

bildet die Forschung von Prof. Zhang Lianzeng und Liu Yi,<sup>④</sup> die durch empirische Analyse anhand Chain ladder Verfahren und Mack-Modell die Überlegenheit von Solvency II im Vergleich zum Solvency I bei der Schätzung der versicherungstechnischen Rückstellungen bestätigt.

### 3. Chinesische Bewertung der europäischen Versicherungsaufsicht

Es ist festzustellen, dass die europäische Versicherungsaufsicht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sehr positiv bewertet wird, insbesondere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Beispiel dafür ist das Forschungsergebnis von Wang Ying<sup>⑤</sup>, dass durch einen systematischen Vergleich zwischen den derzeit dominierenden Regulierungsmodellen auf der Welt – das amerikanische RBC-Modell, das europäische Solvency II, das schweizerische SST-Modell und das internationale ISIA-Modell – das EU-Solvency II am besten zielgerichtet und zukunftsorientiert ist. Detailliert werden die folgenden neun Thesen bezüglich Fortschritte von EU-Reformprojekt Solvency II von den meisten chinesischen Forschern und Gesetzgebern geteilt.

1) Bei der Zielsetzung der Solvency II-Reform geht es um ein System, das eine hohe Stabilität der Versicherungsbranche gewährleisten soll, gleichzeitig aber den Unternehmen genügend Freiraum lässt, um erfolgreich wirtschaften zu können. Dabei wird versucht, die Interessen von den Versicherten und den Versicherern gleichzeitig zu berücksichtigen und möglicherweise einen optimalen Ausgleich zwischen Regulierung und Dere-

④ 张连增, 刘怡:《欧盟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标准 II 框架下的技术准备金估计》, 载《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3年, 第2期, 第20—28页。

⑤ 王颖:《保险监管模式国际比较研究》, 载《保险研究》, 2012年, 第12期, 第94—100页。

gulierung im Versicherungswesen zu erzielen.<sup>⑥</sup>

2) Solvency II ist angelehnt an die Solvabilitätsregeln des Bankensektors Basel II und verfolgt damit ebenfalls das Drei-Säulen-Modell, das quantitative Aspekte des Finanzmanagements mit qualitativen Anforderungen mit dem Risikomanagement und Offenlegungspflichten verknüpft. Damit werden widersprüchliche Handlungsvorschriften für den Versicherungs- und Bankensektor vermieden und die Koordination der Regulierungen in verschiedenen Sektoren auf dem gesamten Finanzmarkt erleichtert.<sup>⑦</sup>

3) Im Gegensatz zu den relativ starren Vorgaben vom heutigen System ist Solvency II eher risikobasiert. Je mehr Risiken die Unternehmen bei ihren Anlageentscheidungen eingehen, desto mehr Eigenmittel müssen sie vorbehalten. Diese Grundidee, die Kapitalanforderungen für Versicherer stärker an ihrem tatsächlichen Geschäfts- und Risikoprofil auszurichten, passt sich genau an den dramatischen Veränderungen an den Kapitalmärkten seit Mitte der 1990er-Jahre an.<sup>⑧</sup>

4) Bei der 1. Säule von Solvency II unterscheidet man sich zwischen der regulatorischen Solvenzkapitalanforderung mit dem risikobasierten Indikator Zielsolvvenzkapital und der regulatorischen Untergrenze des zu haltenden Solvenzkapitals mit dem einfach zu ermittelnden Indikator Mini-

malsolvvenzkapital, der eigentlich die letzte aufsichtsrechtliche Eingriffsschwelle darstellt. Diese Unterscheidung differenziert das europäische Regulierungsmodell deutlich von dem amerikanischen, und die Chinesen ziehen solche zweistufige Definition der geforderten Solvabilitätsmittel vor.<sup>⑨</sup>

5) Das neue Aufsichtssystem ist marktwertorientiert. Solvency II betont die marktnahe Bewertung von Aktiva und Passiva eines Unternehmens, was mit der derzeitigen Erneuerung bei der externen Rechnungslegung (IFRS) in Einklang gebracht werden kann.<sup>⑩</sup>

6) Die vorgeschriebene Möglichkeit, SCR durch ein vom jeweiligen Unternehmen entwickeltes internes Modell zu berechnen, und die Überprüfungsprozesse für das Risikomanagement des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s reizen die Versicherer an, durch Verbesserung des Risikomanagements die Risiken unter eigene Kontrolle zu bringen und die Gesamtsolvabilität sicherzustellen.<sup>⑪</sup>

7) Die 3. Säule von Solvency II, nämlich strengere Offenlegungsvorschriften, zielt darauf ab, Markttransparenz zu schaffen und die Marktkräfte zu benutzen, um das Versicherungswesen besser zu regulieren.<sup>⑫</sup>

8) Die Neuerung zur Beaufsichtigung von Versicherungsgruppen, und zwar die kooperative Gruppenaufsicht anstatt Solo-plus-Aufsicht

⑥ 朱南军, 何小伟:《欧盟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标准 II: 框架、理念和影响》, 载《南方金融》, 2008年, 第6期, 第31—34页。

⑦ 杨琳:《欧盟保险监管新规 Solvency II 理论框架及其影响》, 载《新金融》, 2012年, 第283期, 第40—45页。

⑧ 吕晨:《欧盟偿付能力监管体系改革及启示》, 载《中国保险》, 2008年7月号, 第59—63页。

⑨ 张中华, 未新蓉, 陈红:《2012年中国金融发展报告》,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294页。

⑩ 江先学:《欧盟偿付能力 II 对完善我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启示》, 载《中国金融》, 2010年, 第23期, 第40—41页。

⑪ 吕晨:《欧盟偿付能力监管体系改革及启示》, 载《中国保险》, 2008年7月号, 第59—63页。

⑫ 同上。

beachtet die Konzentrationstendenz auf dem Finanzmarkt und die zunehmende Verflechtung verschiedener Teilbereiche (Bank-, Versicherungs- und Wertpapiergeschäfte).<sup>13</sup>

9) Solvency II ist nicht rein regelbasiert, sondern eher prinzipienbasiert, was seine Durchsetzung in verschiedenen Mitgliedsländern der EU erleichtern kann. Die neuen Regeln schaffen dann ein modernes und einheitliches Aufsichtssystem für ganz Europa mit angemessener Berücksichtigung auf die Besonderheiten der nationalen Märkte.<sup>14</sup>

Trotzdem wird über einige kritische Punkte von Solvency II sowohl in der Politik als auch in der Wissenschaft debattiert.

1) Über die Berechnungsmöglichkeit mit unternehmensinternen Modellen. Da die Entwicklung eines internen Modells nur mit hohen Kosten realisiert werden kann, ziehen voraussichtlich nur große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diese Alternative vor, während die kleinen und mittleren das von der Aufsichtsbehörde vorgegebene Standardmodell benutzen. Man fragt sich, ob die kleinen und mittleren durch diese in der Tat begrenzte Wahlmöglichkeit benachteiligt würden. Zudem würden sie wahrscheinlich wegen den umfangreichen Berichtspflichten auch Übermaß an Bürokratie beklagen.<sup>15</sup>

2) Über die marktnahe Bewertung der Passiva-Seite der Solvenz-Bilanz, insbesondere der nicht-hedgebaren Rückstellungen, für die kein

Marktwert besteht. Die Verschiebung von IFRS 4 stellt schon ein Problem dar. Daneben gibt es immer noch häufig diskutierte technische Fragen wie z.B. die angemessene Modellierung der Zinsstrukturkurve und der Risikomarge.<sup>16</sup>

3) Über die Festlegung von Zeithorizont (1 Jahr) und Konfidenzniveau (99,5%) bei der Berechnung des Zielsolvenzkapitals. Bei dem Abschätzungszeitraum von einem Jahr fällt der Lebensversicherung schwer, die Risiken genau zu identifizieren und festzustellen, und für die Schadenversicherung werden die Auswirkungen vom Underwriting-Zyklus kaum berücksichtigt. Eine technische Sicherheit von 99,5% finden manche Analysten in Krisenzeiten zu hoch, da die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eigentlich nicht so häufig wie die Banken pleitegehen. Zu strenge Aufsichtsregelungen zwingen die Versicherer, sich bei kurzfristigen Schwankungen prozyklisch zu verhalten, was dann destabilisierend auf die Finanzmärkte einwirkt.<sup>17</sup>

4) Über die hohen Anforderungen an die Aufsichtsbehörde und die entsprechenden hohen Aufsichtskosten.<sup>18</sup>

5) Über die Anwendbarkeit des Äquivalenzprinzips bei der Aufsicht von Versicherern aus Nicht-EU-Ländern.<sup>19</sup>

#### **4. Bestandsaufnahme der chinesischen Versicherungsaufsicht**

Die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Versiche-

<sup>13</sup> 杨琳:《欧盟保险集团监管制度的借鉴与启示》,载《中国金融》,2012年,第13期,第39—40页。

<sup>14</sup> 张中华,未新蓉,陈红:《2012年中国金融发展报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3页。

<sup>15</sup> 陈志国:《欧盟保险偿付能力 II 改革的最新进展》,载《保险研究》,2008年,第9期,第88—92页。

<sup>16</sup> 张中华,未新蓉,陈红:《2012年中国金融发展报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3页。

<sup>17</sup> 同上,294。

<sup>18</sup> 姜波,陶燃:《欧盟保险偿付能力 II 监管体系改革最新进展》,载《中国金融》,2010年,第23期,第37—39页。

<sup>19</sup> 陈志国:《欧盟保险偿付能力 II 改革的最新进展》,载《保险研究》,2008年,第9期,第88—92页。

rungsaufsicht kann in drei Phasen eingeteilt werden:

1) 1985 – 1995: Aufsicht über Marktverhalten der Versicherer unter der Zentralbank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Im Jahr 1995 wurde das Versicherungsgesetz eingeführt.

2) 1995 – 2003: Parallele Aufsicht über Marktverhalten und Solvabilität der Versicherer

Im Jahr 2003 wurde das Versicherungsgesetz revidiert, und im Jahr 1998 wurde die spezielle Versicherungsaufsichtsbehörde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CIRC)* etabliert.

3) Seit 2003: Aufsicht über Solvabilität der Versicherer unter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Die aktuelle Versicherungsaufsicht basiert auf der am 1. September 2008 in Kraft getretene Verordnung über die Solvabilität der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in der *Solvency adequacy ratio* (Quote von Ist-Wert zum Minimum-Wert an Kapital) als Kernindikator der Aufsicht definiert wird. Falls die Quote niedriger als 100% ist, sollte die Aufsichtsbehörde mit Regulierungsmaßnahmen wie z.B. Kapitalerhöhung, begrenztes Dividendenausschütten und Verengung der Beschäftigungsbereiche eingreifen. Falls die Quote zwischen 100% und 150% ist, aber große Risiken bei der Solvabilität vorhanden sind, sollte die Aufsichtsbehörde von den Versicherern davon verlangen, Sanierungsmaßnahmen durchzuführen. Und die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mit einer Quote von über 150% gehören offensichtlich zu der Gruppe mit ausreichenden Sol-

vabilitätsmitteln.

Zu beachten sind dabei:

1) Die jetzige chinesische Berechnung der Solvabilität basiert auf einfachem Faktormodell, d.h. sie ist nicht risikobasiert.

2) Die aufsichtsrelevante Berechnung der Solvabilität ist statisch, nicht dynamisch. D.h., man bewertet die gegenwärtige und zukünftige Solvabilität eines Versicherers anhand der vorhandenen Geschäftsergebnisse aus der Vergangenheit. Seit 2007 sind die chinesischen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zwar ermutigt, regelmäßig an dynamischen Tests ihrer Solvabilität teilzunehmen, aber solche Testergebnisse werden bis jetzt leider nicht bei der offiziellen Aufsicht berücksichtigt.

Mit dem Status quo der Versicherungsaufsicht sind die Chinesen nicht zufrieden. Am 29.03.2012 wurde die strategische Planung zum Aufbau des 2. chinesischen Solvabilitätsaufsichtsystems von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veröffentlicht, in der das Ziel festgesetzt wird, dass China innerhalb von 3 bis 5 Jahren ein risikobasiertes Drei-Säulen-System einrichtet, das international üblich ist. Am 14.05.2013 wurde dann die Richtlinie „China Risk Oriented Solvency System Conceptual Framework“ offiziell bekanntgegeben, die zwar dem europäischen Rahmen ähnelt und selbstverständlich auch chinesische Prägungen, insbesondere in den technischen Fragen beinhaltet.<sup>20</sup> Zur Zeit steht der Auswirkungstest QIS 1 bereits vor der Tür.

作者简介：徐四季，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sup>20</sup>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China Risk Oriented Solvency System Conceptual Framework”,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4566/info3905736.htm>, letzter Zugriff am 31.07.2014.

## 欧洲央行抗通缩政策评析

李 微

【摘要】自2013年1月以来，欧元区通胀率持续低迷。尽管欧央行采取了大量常规及非常规货币政策试图挽救通胀率增速颓势，并一再释放要学习美国和日本，走“欧版量化宽松”之路的信号，但直到目前为止，欧元区通胀率走势依然悲观，如若欧洲央行再不发出“重拳”，恐怕这种“长期超低通胀”的情况会发展至真正的“通缩”泥潭。此外，一旦欧洲央行真正开始执行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也会带来一定冲击。因此，分析欧洲央行的抗通缩政策、预测欧元区通胀情况的发展趋势，不但能够展望欧元区经济的未来走势，也能够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抗通缩 资本支持证券

2014年10月2日，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在例行的月度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继续维持上个月执行的0.05%的主要再融资利率，同时将隔夜存款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保持在-0.2%和0.3%。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欧央行行长德拉吉表示，欧央行在短期内不会再有进一步的降息计划，与此同时，欧央行将从10月中旬开始购买资产担保债券（CB），年底开始购买资产抵押证券（ABS），该购买计划将持续至少两年。<sup>①</sup>

欧洲央行的以上决策基本符合之前的市

场预期。自2013年1月以来，欧元区通胀率持续低于2%，2014年9月份的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甚至只上升了0.3%，创2009年10月以来最小增幅，这无疑违背了欧央行一直以来的政策目标，即“从中期看，欧元区的通胀率（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均增速应低于（但接近于）2%”<sup>②</sup>。尽管欧央行采取了大量常规及非常规货币政策试图挽救通胀率增速颓势，如在今年6月份，欧元区隔夜存款利率被下调至-0.1%，成为全球首个推行负利率政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① 以上消息来源参见欧央行官方网站：<http://www.ecb.europa.eu/press/pr/date/2014/html/pr141002.en.html>, 2014年10月2日。

② 赵婷：《欧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策略及工具研究》，载《南方金融》，2009年，第3期，第37页。

央行。此外，欧央行还在今年6月份推出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并一再释放要学习美国和日本，走“欧版量化宽松”之路的信号，但直到目前为止，欧元区通胀率走势依然悲观，如若欧洲央行再不发出“重拳”，恐怕这种“长期超低通胀”的情况会发展至真正的“通缩”泥潭。另外，一旦欧洲央行真正开始执行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也会带来一定冲击，因此，分析欧洲央行的抗通缩政策、预测欧元区通胀情况的发展趋势，不但能够展望欧元区的未来走势，也能够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

## 一、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策略和工具

### 1.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保持物价稳定

根据欧洲联盟条约（“马约”）有关欧洲央行系统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系统的首要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马约》明确表示，在欧元区实行以保持价格稳定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是对实现欧盟其他广泛经济目标的最大贡献。这基于以下考量：稳定的价格有助于增大相对价格机制的透明度，以确保市场能够有效率的配置实际资源。此外，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长期利率的通胀风险，有助于

刺激投资和增长<sup>③</sup>。维持货币政策的公信力，避免追求过多的政策目标，符合欧央行“货币政策从长期效果来看应当是中性”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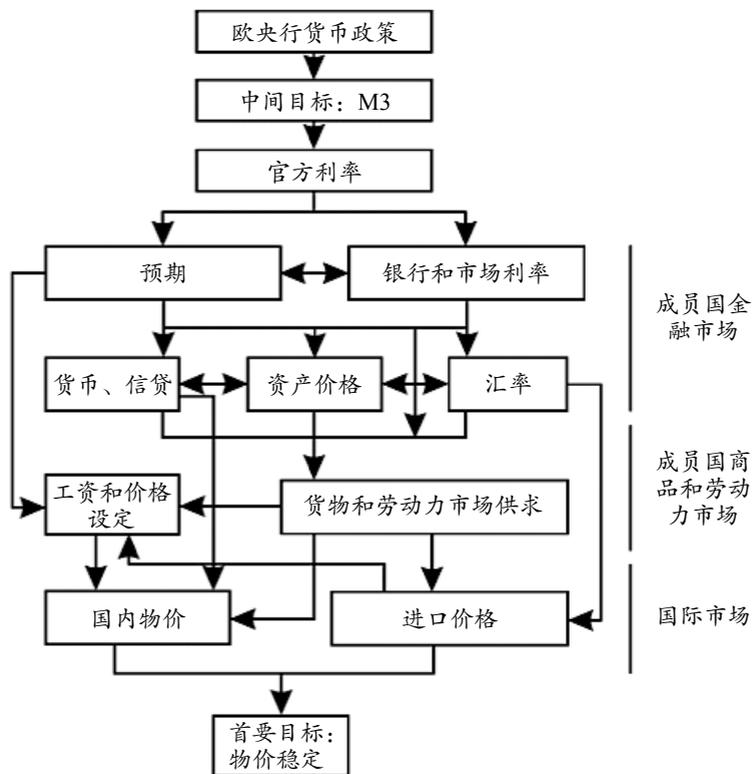
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洲央行的各种政策手段虽然一再受到多方质疑，但如果深入分析，事实上与其基本目标并未发生实质偏离。即使在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之际，欧洲央行的“救市政策”虽然引发各方对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风险的疑虑，但根据欧洲央行副行长比托尔·康斯坦西奥在2012年的说法，央行所执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并不是以挽救金融市场、恢复经济运行作为最终目的，而是以实现金融稳定，从而疏通货币传导机制，恢复中期内维持物价稳定能力为基本导向<sup>④</sup>。至于由于这些政策而出现的物价波动，他解释，把通货膨胀作为短期政策目标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长期易变的滞后因素太多，而一旦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的失衡慢慢积累，将对长期的宏观经济和价格稳定造成威胁，从而阻碍经济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正常功能，而这种现象是需要极力避免的。因此，为了防止健康的金融机构在流动性危机中坍塌，提供非常规手段是必要的，与中长期的物价稳定政策也是一致的<sup>⑤</sup>。

③ 毕吉耀：《欧洲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载《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第60页。

④ 康斯坦西奥，比托尔：《欧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载《中国金融》，2012年，第2期，第14—15页。

⑤ 同上。

图1 欧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sup>⑥</sup>



此外，针对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否给通货膨胀带来意外风险，康斯坦西奥认为，欧洲央行在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时，严格遵循“分离原则”，即非常规政策只是常规政策的补充，而非替代。一般情况下，欧央行管理委员会采取降息的措施，是为了向市场参与者发出一个货币政策倾向的信号，而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常规货币政策到物价的传导机制是有效的，但在非正常的金融市场条件下，为确保金融市场失灵不会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造成严重破坏，有必要采取非常规措

施。因此，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放松货币政策，而是助益常规政策实现其有效性，非常规措施的范围和性质都是暂时的<sup>⑦</sup>。

面对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时，欧洲央行尚且不忘其物价稳定的终极目标，在目前低通胀风险成为主要矛头时，欧央行更是将一切重心摆在如何使消费者价格指数回归到略低于2%的水平上来。有鉴于此，欧版“量化宽松”是各方一直在争论、但也一直在等待的终极方案。尽管通过“量化宽松”会否导致抗通缩抗过头，从而引发通胀危险的

⑥ 瞿艳红：《统一货币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欧元区的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经济体制改革》，2011年，第3期，第149页。

⑦ 康斯坦西奥，比托尔：《欧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载《中国金融》，2012年，第2期，第14—15页。

质疑声一直不断，但这种声音在不断减少。连原本在2012年欧洲央行通过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时跳出来坚决唱反调的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都从2014年4月份开始放松口径。虽然他仍然对量化宽松计划显得忧虑重重，警告欧洲央行这可能会是“甜蜜的毒药”，但其态度已经明显缓和，认为欧央行目前的思维已经转移到“QE（量化宽松政策）”上去了<sup>⑧</sup>。而德拉吉在今年9月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货币政策例会之后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也称，虽然对于欧版量化宽松执行的方式和程度还存在有争议，但“绝大多数人都认同执行这一计划”<sup>⑨</sup>。

可以看到，欧洲央行直到目前为止，并未忘记其维持物价稳定的初衷，并始终坚定认为，目前所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都是“替代性的”、“暂时的”，并都是为最终的通胀稳定而服务的。因此，在抗通缩风险的道路上，欧洲央行会持续目前的谨慎作风，不断审视其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会否与物价稳定的大目标相悖，并在危机过去之后，尽快回到传统货币政策道路上来。

## 2. 策略和工具

目标明确之后，欧央行采取何种策略和工具以保证其货币政策的实施能够达到想要的结果，是值得研究的。欧央行的货币策略是一种“双支柱”型策略，其中包括“货币分析”和“经济分析”，以确定货币政策的执

行是否具有一致性和系统性。第一个支柱的“货币分析”中，欧洲央行选择将广义货币M3<sup>⑩</sup>作为货币增长监控指标，设置其参考值为年增长率4.5%，并将M3年实际增长值和参考值之间的偏差与其他经济金融数据（即另一支柱“经济分析”）放在一起进行评估，以确定物价实际风险<sup>⑪</sup>。此外，这种“双支柱”型策略主要着眼于中长期的指数变化，因为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这也是为什么欧版“量化宽松”呼声已久，却直至今年6月份才真正开始拉开帷幕的重要原因之一。欧洲央行需要更为长期的数据来监控之前采取的各种政策工具有没有起到作用。直到连“未知水域”的负利率政策也未能激起较大水花，传统货币政策区域已再无调整空间，欧元区通胀率却还是持续走低的情况下，欧版量宽才真正面世。

在确定有影响中期物价稳定的风险时，欧洲央行会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进行前瞻性操作。从传导机制看，欧央行主要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实现货币政策的传导。与此同时，通过选择适合的政策操作工具来实现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使之尽可能接近基准利率。欧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有三类：公开市场操作、经常性融资便利和最低储备金制度。

⑧ “毒药”说参见：<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40613/112219404884.shtml>，“思维转变”参见：<http://forex.xinhua08.com/a/20141008/1394688.shtml>。

⑨ 德拉吉在9月份记者发布会上的发言全文。Mario Draghi: Introductory Statement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with Q&A), [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http://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 2014年9月4日。

⑩ 狭义货币M1由流通中货币和隔夜存款组成；广义货币M2由M1和到期期限最多为2年的定期存款和到期期限最多为3个月并经过通知可提前支取的存款组成；广义货币M3则由M2加回购协议和货币市场基金份额、货币市场流通票据，以及到期期限最多为2年的债券组成。

⑪ 赵婷：《欧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策略及工具研究》，载《南方金融》，2009年，第3期，第37页。

表 1 欧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工具<sup>⑫</sup>

货币政策操作	操作工具	交易类型		期限	频率	
		流动资金的供给	流动资金的吸纳			
公开市场操作	主要再融资操作	逆回购	——	一周	每周	
	长期再融资操作	逆回购	——	三个月	每月	
	微调操作	逆回购	逆回购	——	无固定标准	不定期
		买断式回购	买断式回购	——		
	结构性操作	逆回购	逆回购	发行债券	有 / 无固定标准	定期 / 不定期
买断式回购		买断式回购	买断式回购		不定期	
经常性融资便利	边际贷款便利	逆回购	——	隔夜	凭交易方意愿	
	存款便利	——	存款	隔夜	凭交易方意愿	

在欧央行实施抗通缩风险政策的过程中，首要办法是降低三大基准利率，以向市场释放信号，锚定通胀预期，影响通胀率走向。与此同时，通过其他常规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欧央行希望清除货币传导机制中出现的障碍，以引导市场实际利率，实现中期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

## 二、欧洲央行抗通缩政策回顾与分析

### 1. 常规降息发展至负利率“未知水域”

自 2013 年 1 月份，欧元区出现低通胀趋势以来，欧洲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之对抗。首要作法便是一再降低主要再融资利率、隔夜存款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

从 2014 年 6 月 11 日开始，欧洲央行存款利率首次达到了负值，这不仅在欧洲央行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丹

麦央行曾经在 2012 年采取过这样的措施，这使得欧央行成为世界上首个使用负利率的主要央行。

降息是欧央行的重要传统货币政策手段。通过降息，欧央行向市场传递了一种信号，鼓励银行将存放在欧央行的资金释放出来，投入借贷市场，与此同时，引导市场的通胀预期，拉动人们的消费和投资欲望，从而进一步影响物价水平。由于该信号的传递需要通过上文所述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时间上会有滞后性，因此，在低通胀情况发生的中前期，欧央行一直较为谨慎，在每次降息之后，都留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观测，使用“双支柱”策略监督政策发生效果。例如在 6 月份，欧央行首次作出将存款利率降至负值的决定之后，尽管 7 月和 8 月的货币政策月度例会前后业界都普遍期待欧央行在宽松货币政策方面的进一步加码，但真正的实质性

<sup>⑫</sup> 赵婷：《欧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策略及工具研究》，载《南方金融》，2009年，第3期，第38页。

步骤却延至9月份才正式展开。而9月份再次降息，外加宣布购买资产抵押证券（ABS）的“组合拳”出击，则是出于对8月份数据的失望。尽管国际油价的低迷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但德拉吉在9月份记者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的情况表明，我们的复苏计划并未起到作用”<sup>⑬</sup>。

时至今日，降息的手段确实只对短时的通胀走势起到影响，并未将欧元区整体经济从走向真正通缩泥潭的趋势中拉回来，甚至非常规的负利率手段也见效甚微。今年6月份，欧央行第一次推出负利率的时候，配合当时的第三轮长期再融资操作工具（LTRO3），德拉吉显得信心十足，一再强调这尚属“未知水域”，会向市场释放强烈信号，以拉动通胀预期。虽然这轮政策实施之后，西班牙国债收益率确实被成功拉低，葡萄牙和爱尔兰等重债国也提前获得了所需资金<sup>⑭</sup>，在交易的欧洲股市应声反弹，法国股市盘中涨幅超过1.5%，德国股市DAX指数更是历史上首次升破10,000点。欧元兑美元汇率掉头向下，盘中跌幅超过0.4%<sup>⑮</sup>。但两个月的中期观测之后，到8月份，欧元区调和消费者价格指数（0.3%）达到了2009年10月以来最小增幅，充分说明降息很难继续起到作用。因此，在9月份的例会上，虽然欧央行对基准利率做了进一步的下调，但在之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德拉吉在降息问题上显得言辞矛盾。在记者问他，为什么央行之前就一再强调“降息已经触底，不会再

有所调整”，但直到9月份却还在进一步执行降息政策的时候，他回答说“现在降息已经只是‘技术性’调整，以后确实再无空间”。但在另一名记者问到“您之前从未把降息说成过‘技术性’调整，而一再强调降息意义，您如何解释6月份那次降息和此次降息之间的区别”时，他则解释“因为上一次降息就已经触及人们预期中的最低点，此次降息并不太可能带来太多实质变化”，并最终承认“这种表述确实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政策效果减弱”<sup>⑯</sup>。从德拉吉的上述态度来看，尽管9月份依然采取了降息的措施，但欧央行对于该政策手段的实施效果已经失去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应当不再有进一步的降息措施，而只会采取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

## 2. 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发展至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

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央行已经使用过一系列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其中包括在2011年底和2012年初的两轮为期三年（历史最高纪录）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在今年6月份的例会上欧央行通过第三轮长期再融资操作，初始规模为4000亿欧元。9月份，欧央行宣布首次具体注入资金额度为826亿欧元，且此次长期再融资操作将进行8次。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此次被名为“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的政策工具限定了银行获得低息资金的前提条件：必须将这些资金借贷给非金融企业及家庭，而不能

⑬ 德拉吉在9月份记者发布会上的发言全文。Draghi, Mario: Introductory Statement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with Q&A), [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http://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 2014年9月4日。

⑭ 杨舒：《欧版量宽，是时候了》，载《国际商报》，2014年8月29日，第A04版。

⑮ 千龙网：《欧元进负利率时代，将引入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见：<http://finance.qianlong.com/30055/2014/06/06/5404@9657059.htm>，2014年6月6日。

⑯ 以上问答均参见：德拉吉在9月份记者发布会上的发言全文。Mario Draghi: Introductory Statement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with Q&A), [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http://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 2014年9月4日。

用来买政府债券和用作住房抵押贷款。否则欧央行将迫使它们提前偿还贷款。此外，TLTRO 的期限比 LTRO 的时间更长，达到了 48 个月。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Peter Praet 表示，TLTRO 的作用在于解决了银行过度债券市场直融的问题，使得银行出借资金的动力大为加强，最终将流动性传导至企业和家庭用于购买其他类资产<sup>⑰</sup>。

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无疑是欧央行在继续迈向宽松货币政策的新步伐。尽管德拉吉和欧央行其他官员都一再强调，并未真正开展欧版“量化宽松”政策<sup>⑱</sup>，从实施途径上看，LTRO 也确实与美版或者日版量化宽松政策不同，央行并未直接干预市场，而是通过银行间接干预。但业界普遍认为，实施 LTRO 和 TLTRO 的最终目的，无疑是希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即使不能被直接称为量化宽松，至少也是一种“类量化宽松”的政策手段。

欧央行对于此次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充满信心，德拉吉在 9 月份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基准利率的再一次下调已经真正触及最低操作空间，欧央行在短期内绝不会再次降息。因此，银行不应因为潜在的进一步降息可能而对参与 TLTRO 存在犹疑，而应当马上决定，积极参与<sup>⑲</sup>。虽然第二批 TLTRO 预计在 12 月份进行，第一批效果目前并未完全凸显（9 月份 CPI 增速持续低迷，维持在 0.3%），

但德拉吉和欧央行副行长康斯坦西奥在各种场合下均表示，TLTRO 的效果将是显著的。

但事实上，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目前为止得到的反应令人无法满意。首先，欧央行在此次操作中提供的资金低于最初的预期。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7 月 3 日宣布，银行业总共可通过该计划获得最高 1 万亿欧元资金。但目前业界预测，最终金额最高不会超过 6000 亿欧元。在 TLTRO 的首轮操作中，欧洲央行向 255 家银行发放了 826 亿欧元贷款，远低于经济学家 1000 亿至 3000 亿欧元的普遍预期。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银行借款占比较重，达到了总量的 45%。此外，有分析认为，对于欧央行的首批 TLTRO 操作，银行反应令人失望，很多银行在放贷前景不明确的情况下，并不愿意吸收过多贷款。这表明欧央行拟通过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来提高流动性，增加小企业和家庭贷款的愿望可能难以实现<sup>⑳</sup>。如果 12 月份的第二次 TLTRO 效果依然不显著的话，可能会刺激欧央行真正走上欧版量化宽松之路。

### 3. 从结束证券市场计划 SMP 到购买资产抵押证券（ABS）和资产担保债券（CB）

2014 年 6 月份，欧央行管理委员会月度例会后，德拉吉宣布将结束 SMP 购债冲销操作，并筹备 ABS 购买计划。

⑰ 金投网：《ECB 启动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延缓危机蔓延》，见：<http://forex.cngold.org/c/2014-07-17/c2652040.html>，2014 年 7 月 17 日。

⑱ 2014 年 9 月份欧央行例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德拉吉，为何到目前为止采取的各种政策都不能被称为“量化宽松”，究竟德拉吉所定义下的“QE”究竟需要多大规模。德拉吉就此回答：“是否量化宽松不在于资金规模，而在于政策工具的模式选择。所谓的‘QE’应当是指对资产的直接购买，比如欧央行不再将这些资产视为借贷的抵押物，而是直接购买这些资产。这才是 QE。这种政策会直接将金钱注入系统。我们现在的各种措施只能称为‘信贷宽松’”。

⑲ 德拉吉在 9 月份记者发布会上的发言全文。Mario Draghi: Introductory Statement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with Q&A), [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http://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 2014 年 9 月 4 日。

⑳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欧央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银行反应令人失望》，见：<http://ccmc.mofcom.gov.cn/article/i/jyj/m/201409/20140900738984.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2 日。

2010年5月，欧央行推出证券市场计划（SMP），旨在通过干预欧元区国家债券市场，来解决严重阻碍欧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SMP可以推升国债需求并降低收益率，该收益率对成员国拍卖国债的收益率具有指导意义，最终结果是降低成员国融资成本<sup>①</sup>。2012年9月，欧央行推出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终止了SMP，不再购债。但每周通过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招标的方式回收流动性，起到冲销的作用。今年6月份，德拉吉宣布停止购债冲销行动，其目的是为了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截至5月末，仍在账面的SMP总额达1645亿欧元，约合2230亿美元。虽然额度小，却多少能扭转近期欧元区流动性下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给欧央行自己真正的QE建立了一个先驱<sup>②</sup>。

6月份的欧央行管理委员会例会上，德拉吉同时宣布将购买资产支持证券，并在10月2日例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购置ABS和CB的细节，其中包括：

1) 计划将持续至少两年；

2) 将加强货币政策传导，对欧元区经济进行信贷提供支持，从结果上来看，提供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

3) 欧元区体系抵押品框架将为购买资产的符合要求提供指导原则；

4) 资产购买将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10月下半月先购买资产担保债券<sup>③</sup>。

对于资产担保债券（CBPP3）的购买，欧洲央行将直接购入对象为以欧元计价在欧元区发行的担保债<sup>④</sup>。而对于资产支持债券，欧央行则将从一级和二级市场上购入ABS证券高级和有担保中间级的部分。其中既包括新发行的，也包括已经发行的，同时包括房地产ABS。欧央行期望，原本购买了房地产ABS的机构在向欧央行出售该ABS之后，会将得到的资金投入到其他商业决策中去。因此，虽然定向长期再融资计划不包括资助新兴房地产的融资计划，但ABS购买中却包括房地产ABS<sup>⑤</sup>。此外，ABS基础资产的绝大部分应由欧元区的非金融私营部门担保，具体看，至少95%的担保额是以欧元计价，至少95%的担保额所对应的担保人在欧元区区内<sup>⑥</sup>。欧洲央行购买ABS和CB的目的在于，释放原买家（包括银行和私人投资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期增加流动性，振兴实体经济。尽管有业界人士认为，目前欧央行制定的超低利率政策会使其提供的ABS购买计划显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但德拉吉认为，虽然目前经济不景气，但随着央行组合计划的施展，利率会有逐渐上升，而ABS购买计划也会变得越来越受到青睐。此外，他同时认为，ABS购买计划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欧央行购买ABS证券之后，会释放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他们能够

① 华尔街见闻：《解析德拉吉的火箭重炮之二：取消SMP冲销》，见：<http://wallstreetcn.com/node/93548>，2014年6月6日。

② 同上。

③ 网易财经：《欧央行公布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担保债券购买计划》，见：<http://money.163.com/14/1002/23/A7JBSIF700252C1E.html>，2014年10月2日。

④ 同上。

⑤ 德拉吉在9月份记者发布会上的发言全文。Draghi, Mario: Introductory Statement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with Q&A), [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http://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 2014年9月4日。

⑥ 同上。

更深入地参与到 TLTRO 操作中去<sup>②7</sup>。

到今天为止，欧央行所采取的所有政策中，购买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担保无疑是占全计划最具有量宽“特色”的。连德拉吉都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央行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购入 ABS 证券高级和有担保中间级部分，这非常像美联储在几年前（即 2009 年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 ABS 购买计划）的作为，因此，我们必须说，ABS 购买确实具有量化宽松的要素。”<sup>②8</sup> 在德意志银行 9 月 4 日发布的一项预测中，德银分析师称购买 ABS 为“私有领域 QE”，但同时指出，欧央行离购买政府债券（即所谓“公共领域 QE”）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sup>②9</sup>。

### 三、欧央行抗通缩政策前景展望

#### 1. 欧版“量宽”：正在路上？

虽然德拉吉一再重申，目前欧央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不是所谓的“量化宽松”，德意志银行也预测，距离欧央行直接购买政府债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业内普遍认为，在执行 TLTRO 和 ABS 购置计划之后，欧央行已经走上了实质的欧版量宽之路。当然，与美版量宽政策相比，欧央行目前为止所执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不同：从定位上来说，美联储的信贷宽松货币政策是常规利率政策的替代，而欧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则是常规利率政策的补充，目的是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一旦货币传导渠道通畅，非常规货币政策将马上退出舞台”<sup>③0</sup>。

从工具手段来说，美联储更加重视直接购买金融资产，而欧央行购买资产的规模小于信贷工具规模。此外，欧洲央行目前资产负债表大幅缩水，仅达到 2 万亿欧元，德拉吉表示，应通过新一轮的宽松货币政策使欧央行负债表回到 2012 年底的水平，即 3 万亿欧元。

虽然欧版“量宽”与美版“量宽”还存在许多不同，欧央行也一直坚持欧版量宽并未正式面世，但从 2014 年 TLTRO 操作和 ABS、CB 购置计划的推出可以看到，为了维持中期物价水平在略低于 2% 这一目标上，欧央行会不断采取措施，直至达到目的。由于第一轮实施 TLTRO 操作的效果并不显著，而 ABS 和 CB 购置计划金额也受到限制，如果 12 月份的第二轮 TLTRO 操作同样反应不良的话，欧央行将在无奈之下，真正祭出 QE 的法宝。

#### 2. 抗通缩货币政策的“内部效果”

2014 年 9 月份，在欧央行进一步调低原本已经处于负值的再融资利率，并推出第一轮 TLTRO 之后，通胀率却依然维持在 2009 年 10 月份以来的最低位：0.3%。虽然欧央行表示，现在欧元区还没有陷入真正的通缩，而仅仅处于长期低通胀状态，但连续 13 个月调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维持在 1% 之下的窘境表明，欧元区通缩压力明显近在眼前。要扭转这种局势，避免过低的通胀预期导致实际消费和投资的延迟，从而真正陷入恶性通缩，欧洲央行势必需要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②7 德拉吉在 9 月份记者发布会上的发言全文。Draghi, Mario: Introductory Statement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with Q&A), [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http://www.ecb.europa.eu/press/pressconf/2014/html/is140904.en.html), 2014 年 9 月 4 日。

②8 同上。

②9 德意志银行在 9 月 5 日发布的研究报告：Deutsche Bank Research: The House View – Fragile Equilibrium, 2014 年 9 月 5 日。

③0 康斯坦西奥，比托尔：《欧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载《中国金融》，2012 年，第 2 期，第 14—15 页。

目前畏首畏尾的做法显然无法提振市场信心，传达良势信号。

此外，单纯依靠货币政策，也无法真正扭转欧元区经济颓势，甚至很难达成欧央行的首要中期物价稳定指标。在2014年8月22日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举办的全球央行行长及金融界人士年会上，德拉吉发表以“欧元区失业状况”为题的主题报告，报告中，他直指欧元区主权国家在危机中应更加配合，以免使欧央行的货币政策落空。他强调，恢复经济增长不能只依靠单纯的货币政策，如果欠缺“有野心的、重要的、强烈的结构性改革”的话，货币政策所提供的刺激将无法落到实处。因此，各国应当行动起来，切实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同时在欧元区统一财政政策上付出努力，让渡更多主权，以真正振兴欧元区实体经济，提高通胀率<sup>③</sup>。

9月份，欧央行宏观经济报告预测，2014年欧元区年度调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最终将达到0.6%，2015年将上升至1.4%，2016年则将达到1.6%（2012年7月份为2.4%）。而广义货币M3在7月份欧央行报告中的年度增速则仅有1.8%，远远低于欧央行设定的4.5%参考值（2012年7月为3.2%）。从这些指标

可以看出，欧元区通缩压力并未得到缓解。这是因为，货币“中性”理论表示，货币政策并不能直接改善实体经济，而在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更是有限，解决经济低迷、超低通胀的源头在于欧盟和各成员国政府，如果经济复苏效果不明显，低通胀压力很难仅仅通过货币政策得到实质性解决。

### 3. 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外溢效果”

欧央行为了对抗长期超低通胀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将会带来不同的“外溢效果”：一方面，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全球流动性，促进全球资本市场的回暖；另外一方面，欧元汇率会在宽松货币政策下发生贬值，可能会引起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而言，欧元贬值同样可能引起国际热钱的涌入，导致人民币的升值，从而影响中国产品的出口。但与此同时，欧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欧央行的这些货币政策能够促进欧元区经济发展，将会有利于中国对欧洲的出口，稳定中国国际投资外部环境。因此，我国政府只要做好积极应对措施，并不会受到欧版“量宽”的强烈影响。

作者简介：李微，北京科技大学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sup>③</sup> 欧央行官网：Draghi: Unemployment in Euro area, <http://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14/html/sp140822.en.html>, 2014年8月22日。

# 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 《联合执政协议》的经济等部分（译文上）

孙浩林 詹佩玲

## 1. 增长、创新与民生

### 1.1. 增强德国经济

由基民盟（CDU）、基社盟（CSU）和社民党（SPD）组成的联合政府认为，德国的机遇存在于这样一种经济中，中小企业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现代而充满活力的工业仍旧是这种经济的核心。我们希望通过实现新增长和增加就业来加强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基础，将增强企业家责任和发展良好的劳资关系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金融市场方面，我们希望继续推行有效的调节政策，并确保风险与责任的准则正常运行。我们希望为企业创造更强的吸引力，推动它们的行动具有可持续性，为此我们将通过与经济界的对话，来检验那些有助于实现赔偿与补贴机制的长效措施。

我们相信，德国是一个可以让大小企业都能充分利用机会的工业和经济区位。我们寄希望于一个在德国和欧洲实行的双重策略，即稳定预算和刺激增长。

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个“新的经济繁荣年

代”。我们要加强企业家群体的力量，强化创业精神，并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承认。我们将着力改善创新和投资的框架条件，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我们会保持劳动力市场中有效的灵活性，并使社会保障机制与人口变动的需要相适应——这包括工作岗位稳定且良好、经济充满活力、公平的分配政策以及高生活质量。

### 我们为可持续进步所采取的战略

我们正面对新挑战，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包括来自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的竞争；知识和技术的迅速进步，尤其是数字化在迅猛发展；人口结构变动，专业人员缺乏；还有自然资源的短缺。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几年中，将创新、投资、优质高产工作的整合以及国际化作为我们战略的核心。我们将在这四个行动领域制定具有前瞻性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政策：

创新：我们的经济需要创新来创造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就业岗位。我们希望通过研究和对发展的私人 and 公共支出成

为全球的领军国家。因此我们会将 3% 的国内生产总值投入到研究和发 展方面。我们要让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充分应用于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只有这样，德国才能保持有竞争力的工业和生产区位，同时开发与工业相关和知识比重更大的服务业领域中创造新工作岗位的潜力，这尤其适用于中小型企业。

**投资：创新需要投资。**只有有了投资的推动，我们才能确保德国的增长与就业，同时它也是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德国经济需要一种更加清洁、更加安全且能够支付得起的能源供给方式。德国的增长需要基础设施的持续现代化。我们不仅寄希望于国家投资，还会为私人投资创造更好的框架条件。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总投资额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值。

**优质高产工作的整合：**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动，确保合格的专业人员具有一定的基础性数量便成了中心任务，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德国的技术人员储备。我们要让此议题更紧密地与专业人才联盟联系在一起，并使其成为政治、经济和工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我们要加强工资标准的统一性、关联性和可信性。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高效高产工作岗位的充分就业。

**国际化：**我们取得成功的一根重要支柱是德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其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成功和富裕。因此，我们要为实现全球性的市场和稳定的金融体系而努力，因为它们形成有利增长的投资环境的前提，为此我们必须不断落实和发展国际准则。我们希望通过加强国际协调来充分利用存在于自由贸易中的发展机遇。在工业大国圈内（G8 和 G20），特别是在德国 2015 年担任八国峰会主席国期间，我们要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达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意见。尽管德国经济在欧洲之外的新兴市场上

获得了很多新机遇，欧洲的销售市场仍在德国出口中占据中心地位。德国需要强有力的出口，需要强大的国内经济，需要由投资和购买力带来的国内需求。

这一战略为我们在这时期经济上遇到的挑战给出了正确的答案。50 年前的第一届大联合政府颁布了《稳定与增长法》来回应当时经济政治上遇到的挑战。我们希望面对当今的挑战，如人口结构变化、国际化、数字化以及资源短缺，发展一种新的经济与增长政策战略，因此我们将与专家委员会一起重新审视现行的稳定与增长法。

为克服经济上的巨大挑战，我们希望市场和 国家进行智慧的配合，企业主与职工、企业 与工会合作。我们希望实现可持续的进步。

进步、生活质量和富裕是多方面的：优质的工作、充裕的收入、健康，以及非物质的价值，如家庭、朋友和自由。我们要使政府行为更加以公民的价值和目标为导向，并与他们就生活质量的理 解进行对话。我们也会关注现有的专家意见和指标体系，如联邦德国议会任命调查委员会和宏观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咨询委员会。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拟定有关德国生活质量的指标和报告体系，它会定期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对德国生活质量改善的现状和进步进行详细说明。我们希望以此改进从社会、生态及经济维度提供的关于生活质量和进步的信息。

我们要将获得的认识转变为一个名为“美好生活”的跨部门行动计划，以此促进德国生活质量的提高。

## 欧洲经济政策

我们支持建成欧洲内部市场，而扩建跨境基础设施则是形成这个共同市场的必要条件。现有的障碍必须消除，特别是中小企业

面临的障碍。我们要在欧盟内部阻止对外国纳税人低征税收的做法、摧毁避税天堂、促进税务协调，在欧洲层面要实现去官僚化。我们将逐条落实欧盟的规定，这也保证欧洲内部市场的机会平等。欧洲的立法不能在不同的政治领域相互矛盾，它必须具有连贯性，并能长期提高欧洲的国际竞争力。

### 对外经济

外贸对于德国国民经济具有突出的意义。如今，德国与国外市场联系愈加紧密。在很多国家中，国家对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这一切都要求政治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占据更大比重。巧妙运用建立信任关系的方法、合同式的协议、经济政策和发展政策工具以及人权原则，也会有助于减少外贸中的紧张关系。

### 发展自由贸易和贸易协定

我们十分担忧地看到，限制甚至阻碍自由贸易的措施正越来越多地被使用，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的行为在不断增多。必须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框架中稳妥治理自由、公平的世界贸易，这也更易使发展中国家今后按照所有成员国都遵守的原则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因此，我们希望世界贸易组织更加强大，并继续努力为当前的多哈回合画上圆满的句号。正如欧盟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取得了的进展，我们也在追求与正日益发展的新兴国家顺利缔结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我们的目标是深化经贸关系。在此过程中，我们信赖多边贸易规则的作用。在欧盟贸易协定中，我们应该考虑到遵守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核心劳动标准，才不致使自由贸易成为工资和社会福利倾销的切入点。

### 外贸促进

我们将有目的地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国门

的步伐。继续发展促进外贸的有效工具（德国贸易和投资管理局、德国各种在海外的代理机构、海外商会、展会促进、咨询指导等），并优先定位于民生和就业。我们会改进进出口许可的申请和审批程序，适当发展国际出口信贷规则，并努力让所有国际竞争者都能使用这些规则。未来的欧洲投资保护协定必须与有效的高保护标准相适应。总体来说，我们在外贸政策中追求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国际标准。

### 军备出口

政府决定是否向所谓第三国出口军备，必须遵守2000年颁布的、十分严格的“对战争武器及其他军备产品出口的政治原则”。联邦政府要向德国联邦议会即时告知在联邦安全委员会做出的最终许可决定，并由联邦议会决定被告方。此外，我们将在第二年夏季休假前发布年度军备出口报告和附加的中期报告，以此来提高对议会和公众的透明度。

我们要努力做到与欧盟内部的军备出口方针相适应。欧洲的和谐不能低于2008年出台的欧盟共同立场的最基本要求。

### 国际市场上负责任的企业

有责任心的企业家的榜样应该是那些自愿且自发为社会、文化和生态利益担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为继续增强德国企业在国外的负责任的企业行为，我们将努力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跨国公司指导原则为尽可能多的企业所接受和应用。

### 竞争法

公平竞争以及防止达成不利于竞争的协议是社会福利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欧洲竞争法和反卡特尔法的继续发展对德国和欧洲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只有不断消除竞争的障碍，竞争法才能达到最优。

我们将评估《反限制竞争法》的第八条补充法规的影响，并检验审查违反卡特尔法行为的行政和诉讼程序是否更加严密化。此外，我们在欧洲层面和国家层面都会努力加强实施反卡特尔法。通过反卡特尔法的改革，我们会简化出版社之间编辑层面下的企业经济合作难度，我们希望以此应对数字媒体变革给出版多样性带来的危险。

邮政：我们保证向公民提供质量上乘、覆盖广泛、价格合理的邮政服务，并坚持邮政的全面服务。

### 经理薪金的透明度

为使经理薪金的确定透明，股东大会未来将会根据监事会的建议决定董事会成员的报酬。

### 原材料保证

德国的很多重要原材料都依赖于进口，如稀土和一些金属。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原材料需求的增长，政府在原材料市场上不断加强干预，因而出现了阻碍公平竞争的行为。有鉴于此，我们将采取目标明确的行动，避免可能产生对德国创造附加值的消极影响。企业自身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市场来满足其对原材料的需求，并放眼长远，调整自身，以适应未来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会用政治创意对此进行辅助，为国际原材料市场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创造和保证可信赖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条件。我们遵循完整统一的、覆盖全部原材料种类的原材料战略，如通过提高原材料利用效率、寻求替代品、回收有价值的材料、开发本国原材料矿藏以及确保世界市场的原材料供应等。

### 国内原材料开采

我们支持在德国以经济环保方式进行原材料开采和加工。我们将在国内原材料开采

方面征求公民的同意，并坚决保证国内原材料开采的安全性和环保性。比如，我们在进行土地规划时会更多地考虑不同利用方式的竞争，并在仔细权衡之后给予原材料开采合理的评估。另外，我们还会继续改善原材料开采的数据基础。

### 扩大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努力消除在原材料供应链上所有不利于德国和欧洲企业的、扭曲公平竞争的因素。我们会支持德国经济重新加入国际原材料全部附加价值链，并扶持保障德国原材料供应的新倡议。国家间的原材料伙伴关系和企业间的原材料联盟是对欧洲国际原材料保证政策的有效补充。在德国举办的国际原材料大会的框架下，我们将组织政治界、经济界和公民社会的全球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拟定由全体参与成员共同改进的自愿认证体系。

### 消除贸易壁垒

我们致力于在欧洲层面采取更强有力的原材料战略，并在世界贸易组织和 20 国集团中有效代表德国和欧洲在原材料方面的利益，如消除原材料贸易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以及在发展政策框架下改善国外原材料开采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 扩大监督范围

我们将委托德国的原材料代理机构对关键原材料进行监督，并定期报告对德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原材料的可使用情况。我们要继续发展那些有助于确保原材料供应的对外经济手段，如自由信贷，使公司签订长期原材料供应合同变得更加简单。此外，我们还会寻找改善申请程序的方法，以使这些手段让更多企业受益。

## 工业

德国经济的重要性归功于十分高效、享誉世界的工业。其他国家工业的比重在近几十年中不断下降，而德国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业，而是继续发展它。在前瞻性政策和劳资双方良好合作的积极影响下，德国工业以其强大的中小企业为德国的经济增长、富足以及劳动岗位的创造奠定了基础。商品生产是工业附加价值链的基础，这条附加价值链连接了众多的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但同时，公众对工业重要性的认识下降了。因此，我们要推动与公众的对话，这些对话有利于使公众认识到这种未来导向的工业的作用和必要性，使社会接受这种工业。

## 战略性创新政策

我们主张实行研发于德国传统工业核心能力的战略性创新政策。我们将比以往以更大的力度来支持建立新的跨行业网络以及培养创新人才群体。我们要促进程序创新，这可以改善工业和与工业相关的服务业（如IT业和物流业）之间合作。我们希望，来自经济界、工会、科学与教育界的人士能够联合成为创新联盟。我们希望在所有的主要市场——包括在欧洲市场——推动创新进程，如通过顶尖人才竞争或通过电动出行国家平台网络等。

这些主要市场包括：

- 机械设备制造，以及在系统的、节约资源能源的生产过程中作为重要创新推动力的生产技术。
- 具有联系传统行业与核心技术之特殊潜力的新型材料，这些核心技术包括纳米技术、微系统技术、光子技术以及生物技术。
- 有着宽泛附加价值链的交通和物流业。
- 对各行各业都有影响的信息与电信经济。

- 与众多其他行业相交织的能源与环境经济，目前世界范围内都对建立可持续系统性解决方案有着很高的需求。
- 媒体和创造性经济，它们对未来物质和非物质产品及服务的设计会做出重要贡献；
- 健康经济和医药技术，它们在人口结构变动的背景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 跨越全行业的工业4.0、轻型建筑技术和电动出行技术具有特殊重要性。
- 物联网已经进入工厂。附加价值链内部的智慧型联网也可以减少资源消耗。为保持机械制造业的技术领先地位，我们会在该行业积极引进工业4.0理念。
- 促进轻型建筑技术的发展是对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贡献。我们要使德国发展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先供应商，因此我们会继续促进和扩展轻型建筑技术理念在不同行业中实施，实现材料和技术开放型工业化。
- 我们坚持明确的目标，即让德国成为电动出行领域的领先市场和领先供应商。为此，我们追求技术开放型理念，包括氢气技术、混合动力技术、电池技术以及燃料电池技术。我们将利用复兴信贷银行的现有自有资金，向购买环保型车辆——特别是电动汽车——的项目提供低息贷款。

## 继续支持核心工业发展

我们的目标是，在关键技术和IT核心能力（IT安全、网络技术、嵌入式系统、程序和企业软件、密码学、机器对机器通讯等）方面，保留在德国和欧盟的自有技术平台和生产线。联邦支持和促进软件行业开发开放式平台和开放源代码的解决方案，作为封闭式数码生态系统的备选，联邦在欧洲层面上也在为此进行努力。我们希望在国际竞争中，

使“德国制造的软件”成为在安全、数据保护、设计和易用性方面高质量的代表。我们支持实现标准化、互用化和资格认证的进程，并将其视作德国产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参数。

为了实现工业的数字化并保持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的能力，我们也把微电子行业视为未来的核心工业之一，并会继续改善其在德国区位的框架条件。

航空航天工业对我们的经济区位具有战略性意义，它同时也是欧洲合作的一个支柱。它是发展和检验新技术的先驱行业，是向其他经济领域进行技术转移的创新驱动器。因此，我们会相应地继续推行高科技战略，坚定发展国家资助和扶持结构。我们会继续发展和扩大联邦的航空研究项目。

安全和国防工业不仅在经济意义上，而且在技术和安全政策意义上都是国家关注的重点。因此我们要保持德国的核心能力和工作岗位，并继续发展技术和能力。

我们会加强海洋经济，使德国扩展为海洋高科技区位，并继续举办国家海洋大会，继续发展“德国领导力（LeaderSHIP Deutschland）”这个未来战略。我们会继续为造船业提供现有的融资工具，尤其是商业参考利率-利息补偿保证和出口保证（赫尔梅斯出口信用保险）。造船技术和海洋技术包含在我们的高科技战略中，该战略促进了海洋经济与海上风能行业的联系。

## 中小企业、手工业、商业和自由职业

### 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是德国十分具有创造力的就业推动力，它把区域联盟和国际化结合了起来，为德国在经济领域保持其附加值链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小企业，特别是手工业，作为“国家的培训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希望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独立从业和创业的

框架条件。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我们会继续目标明确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检验积累规定是否适用于个体企业，继续进行“企业区域”项目，整合促进项目，简化申请程序，使更多的中小企业加入进来。

作为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工具，中小企业核心创新促进项目（ZIM）得到了广泛支持。该项目在2014年之后仍将继续，使中小企业能够带来更多的创新。

中小企业融资：我们将消除中小企业的融资障碍并阻止新的障碍产生。我们将有效保障中小企业的传统融资渠道，如通过储蓄银行、人民银行、合作银行、私营银行、发展银行以及担保银行。出口导向的企业在未来也需要外贸保障方面的支持，如通过赫尔梅斯出口信用保险。国有复兴信贷银行必须继续向中小企业提供出口和项目融资。我们会紧密关注《巴塞尔协议III》的引入情况，若有可能也会对其进行进一步完善。银行必须继续向中小企业提供当前这种良好的融资条件。

### 手工业

我们要加强手工业的发展。德国将有建设性地参与欧洲关于进一步开放内部服务业市场的讨论，但我们会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让我们的学徒制度不会受到欧洲内部市场政策的损害，将其保留下来。

我们拥护行业协会的地位，并会加强它的作用，继续发展其为会员企业提供的服务功能。通过更加严格地遵循自治理念，并更好地代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利益，行业协会必定会得到会员企业更多的支持。决策透明是民主原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手工业的成功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劳资协定自主权。为使手工业在未来仍能

保持其竞争力，我们要加强劳资双方的伙伴关系和劳资协定的约束力。我们呼吁那些作为公共法律团体的行会履行并承担重要的社会任务和责任，成为劳资伙伴。

### 零售业

零售业目前正在经历一场结构变革。我们会同企业和协会一起为城镇和工会建立一个平台，以展示零售业新前景——既要防止荒芜化（Verödung）现象，又要保证乡镇地区足够的供给。

### 自由职业

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独立从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是中小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努力在欧洲层面上保证自由职业者行会和协会的自治。

### 创业者和增长融资

今天的创业者就是明天中小企业的一分子，因此我们要鼓励创业。我们会目标明确地促进创业培训的发展，尤其是对失业者创业的培训。

我们要提高股份投资的吸引力，特别是对新成立企业的投资。我们希望用现有手段为那些投资于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年轻企业，特别是投资于高科技领域企业的投资者改善框架条件。高科技启动资金就是早期融资的一种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充分推广。我们要使风险投资的法律和税收框架条件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让德国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融资地。为此，制定一套独立的规则就不可或缺了。一些新的融资方式，如群众集资，同样需要令人信赖的法律框架。

我们会像鼓励创业那样鼓励建立合作社。为此，我们会提供一些合适的促进工具，并调整现有的手段。我们会继续允许合作社通过成员贷款进行投资的融资。

## 区域结构政策——加强德国统一

### 区域结构政策

我们将“完善区域经济结构”（GRW）这个共同体任务视为促进经济结构薄弱区域发展的特有工具。不同的共同体任务，如“完善农业结构和海岸保护”（GAK）以及“完善区域经济结构”，应该相互协调。

鉴于欧洲结构基金的资金减少，以及2013年底将要取消投资补贴的情况，“完善区域经济结构”任务对于减少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希望在2009年水平的基础上通过职权内部的预算调整为“完善区域经济结构”任务补充资金。

从2020年起，促进经济结构薄弱地区的发展就需要一个更加完善的系统。这个系统必须重点关注各个联邦州的经济薄弱地区，以此消除东西差距。我们希望在此任期之内为该系统打下基础，从而保证各州和地区在2019年之后也有系统的规划。我们的目标是让全德国都享受到同样的生活环境。

### 加强德国统一

通过大额的财政支持和德国东西部民众的共同努力，新联邦州已经成功发展成为适宜居住并具有吸引力的区域，其经济竞争力不断增强。我们国家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使新联邦州的失业率降到统一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取得了全面的进步，但德国东部的失业人口仍然明显多于西部。同时，东部也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强烈影响。在此背景下，联合政府意识到使东西部达到同等的生活水平是整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我们希望在东部实现平稳良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为达到此目标，对工商业经济、研发以及农业区域的投资都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会如约地实施《团结公约II》中的激励政策。对于我们是否应该且如何将各项

激励东部联邦州的具体项目整合到全德国促进经济结构薄弱地区发展的系统中来，我们会咨询即将建立的联邦-州财政委员会，联邦和各州的“完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体任务则应作为其出发点。

我们将继续进行并发展高水平的投资促进举措，简化申请程序，提供并推广电子结算方式。我们会在欧洲层面上继续支持东部建设，并继续推行在东部行之有效的研发型有限公司 (Forschungs-GmbH) 制度。

我们会继续支持东部联邦州的经济促进协会开发国际市场，以及争取德国贸易与投资协会的投资。

我们希望续写“新联邦州——科学区位”的成功历史，继续支持各项研究，特别是将新的知识转化为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具有较高生产力和较高收入增长水平的自主经济飞跃。

我们还记得联邦制度委员会的一项决议，即新建的联邦设施首先应考虑设在东部联邦州。

能源转型为新联邦州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因为新州既是机器设备也是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地。而褐煤在经济结构中仍旧具有重要地位。

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区域像德国东部新州这样面临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如此强烈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乡村以及结构薄弱区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希望展示，一个人口减少、老年人比重增加的社会如何保持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此，我们会继续开展能获得新知识的试点项目，这些知识也会帮助其他区域，因为它们会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中面临同样的发展局面。

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良好发展的基础。我们希望完善波罗的海港口和机场与德国和欧洲交通干线的连接，以及与波兰和捷克的轨道交通连接。这对于我们经济的蓬

勃发展，以及与我们东部邻居的紧密合作都具有重要作用。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和黑海的跨欧洲轴线的实现也属其中一环，是我们将继续支持的项目。

## 文化和创造经济

文化和创造经济为我国带来了经济和文化巨大的机遇。要想根据其作用和潜力相应地予以促进和发展，就必须制定全面的计划。因此联合政府要在联邦政府“推动文化和创造经济”计划的框架内，继续支持并加强其发展，更多向文化企业提供促进经济的项目。同时也要将联邦促进项目所内涵的创新概念运用并扩展到文化和创造经济上。除更专业的咨询以外，这也需要新的模式计划和对研发与技术的促进。促进文化和创造经济发展可能的途径应展现在数据库中。必须通过更好的建议来提高德国在欧盟促进项目中的参与度。

## 旅游业

德国的旅游业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它为包括乡村地区的人们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投入产出关系、高质量且亲切友好的服务以及为消除各种障碍所做出的努力。例如旅游业必须改善培训工作，努力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必须利用现有行之有效的促进手段继续支持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

德国旅游中心 (DZT) 应该以目前的水平继续支持德国作为旅游对象国的国际化，并努力提高当前较不知名旅游区域的知名度。我们希望同文化和经济部门合作开展“推动文化旅游”计划，其重要目的在于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行动主体共同协作、开发新的模式和有创造性的合作方式。

## 公司继承

为简化公司继承的程序，我们会继续支

持和扩大中介平台，如由行会开设的“next change”平台。在未来，继承公司不应该受到遗产税的阻碍，因此，在宪法中确定有利于中小企业的遗产和赠与税条款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条款要规定在公司保留就业岗位情况下的税收例外情况。

## 法律框架

通过担保法，我们要做到不让手工业者和其他企业主承担供货商或制造商应承担的产品缺陷所带来的全部后续成本。

为照顾中小企业的利益，我们将努力建成欧洲私营公司（“Europa-GmbH”），并保证其不会避开国家关于共决制、税收和贸易注册法的规定。

集团公司的破产应在将来通过更好协调单个公司的破产程序而更有效地进行。此外，为确保业务规划及雇员信任会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数额，我们将审查破产撤销权。

## 消除官僚作风和建立更加完善的立法

消除不必要的官僚作风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而言。高效的公共管理和简洁的办事程序是重要的区位优势。我们会继续减少对经济界和公民而言不必要的官僚作风，为此我们会推行一些计划，让公司、协会、标准控制委员会、联邦各部、州政府机关和城镇能够共同为简化办事程序而努力，并设法相应地完善立法。我们会在法规颁布之前在适当的情况下检验法规的实用性。我们必须制定简单、易懂、目标明确的法律，以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官僚作风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推动建立有利于企业的公共行政管理也十分必要，这可以通过不断推广电子政府管理（E-Government），以坚持实施企业与政府机关间电子的互联互通。我们希望简化企业在履行提供信息和证明义务时的繁琐手续，

减少企业的各种投入。

我们要努力在欧洲层面建立一种更加有效的标准控制机制。欧盟必须在制定标准方面退居二线，这不仅适用于现行规定，也适用于新规定的发布。我们还要努力使欧盟在今后制定所有法律时都要考虑，是否可将中小企业排除在某些规定之外。

## 1.2 投资德国的未来：教育和研究

### 高校

教育、科学和研究对社会发展、人类同等的的生活机会和我们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过去的几年中，联邦政府、联邦州和各乡镇都成功实行了优先发展教育、科学和研究的战略，这体现在“10%目标”中。今后几年中，这个优先战略将继续得到加强。我们在联邦政府、联邦州和县市的共同作用下加强对教育、科学和研究的投资，从而实现我们社会的共享、融合和教育公平，并让后代也享受到我们的富裕生活。

### 科学体系的未来

德国的科学体系为我们国家应对未来的能力和社会做出决定性贡献。该体系的核心就是高校，它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形式使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高校有着特殊的作用，为教育、科学接班人的培养以及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希望保持德国大学卓越计划、高校公约和研究与创新公约的活力，继续发展其对科学体系的积极作用，并从总体上扩展科学促进计划。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加强高校和科学组织的实力、促进战略方针和科学体系中合作的实现。我们会确保规划的可靠性，为德国的科学体系设计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 高校公约的延续

我们要延续高校公约，顺利地进行关于第三阶段的磋商。高校将获得更多的资助，来提供良好的教学和让更多学生能够高质量成功毕业的课程。让更多就业者能够进入高校学习的这一目标，我们也会将其植入高校公约之中。

## 大学卓越计划的继续发展

联邦和州的大学卓越计划以一种极其成功的形式为德国科学体系注入了新活力，这是我们希望保持并扩展的。我们也会继续按照科学性程序发展行之有效的资助大项并予以新的资助规模。其时，我们会考虑大学卓越计划第二轮评审中特别优秀的项目。此外，我们还会促进区域性联盟的发展。

## 研究与创新公约的延续

通过研究与创新公约，德国科研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能够得到明显提高。我们将通过可靠的新生科研力量在2015年之后继续支持五大科学组织：德国科学基金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亥姆霍兹联合会、弗劳恩霍夫协会和莱布尼茨学会。我们会与这些科学组织在很多具体目标上达成一致，如平等、新生力量的培养以及在科学体系上的更多合作。

## 高校基础经费的增加

高校是科学体系的中心。今后几年，科学政策的核心必须是向高校展现可靠的前景和规划。我们将在未来的四年中从联邦层面向高校提供更多的资金作为基础经费。

## 可计划的且可靠的科学职业发展之路

科学领域一直天然存在着有期限的聘任关系，该关系取决于受聘者的资历、有期限

的研究项目以及其他客观因素，其比重——尤其是极短期的聘任关系比重——在过去几年中所达到的程度使有关机构必须采取行动。这首先需要作为雇主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其采取积极的调节措施。我们欢迎科学组织对此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会通过修改科研人员聘任时间合同法（Wissenschaftszeitvertragsgesetz）对它们进行协助。我们希望为科学的新生力量提供可计划且可靠的职业道路。联邦政府会在其资助的框架内及关于新支持方式的协议中重视聘用合同有效时间的问题。

## 科学体系中的机会平等

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科学体系中的机会平等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从德国科学体系的结构上来讲，女性仍然受到歧视。从大学生到博士、博士后及其他资格群体、直至大学教授，女性的比重持续下降。以未来为导向的政策必须创造这样一个前提，即女性在所有科学体系层面上——尤其是领导层——都能达到合理的数量。因此，我们今后将在有关促进科学发展新手段的协议中更多强调要遵守平等原则，并确定让更多女性担任领导层工作的具体目标。按照梯形模式（Kaskadenmodell）确定具体的目标比例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会坚定要求研究组织中有效执行这一规定。

我们希望续写“女性教授计划”成功的篇章。为实现家庭与职业的协调，我们会继续支持高校和科学组织建立有利于家庭生活的结构。

## 增强教育系统的渗透性——完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衔接

我们特别重视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过渡，在这方面，德国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会支持两个领域中的主体开发并扩展二者之间的桥梁，

为从业人员提供接受大学教育及后续进修的机会。通过推广“通过教育晋升——开放的高校”这一竞赛，我们会支持高校为从业人员这一目标群体提供定制的课程。我们也会支持这些相关主体继续为那些从大学进入职业教育领域的人员开发课程，并使之系统化。

### 加强人文科学、文化科学和社会科学

我们会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意项目继续推动德国人文科学、文化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会重点考虑欧洲和国际因素，有目标地培养后继力量，扩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建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国际学校。通过新创意推动“小学科”的成功，使之联结成网。

### 科学领域的数字化和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会为科学领域的数字化变革采取一种策略，比如改善复杂研究数据的取得渠道和实用性。我们会同联邦州一起建立一个信息基础设施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科学体系中的相关主体会就制定跨学科、跨机构的战略和标准达成一致意见。此外，我们会增强虚拟研究环境建设，让研究者们能够借助数字媒体实现跨越学科、机构和国界的合作，并由此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我们会继续发展针对大型研究基础设施的国家路线图进程（Roadmap für Forschungsinfrastrukturen），并寻求联邦和州之间新合作，这包括所有的科学机构和研究组织，尤其是这些基础设施对高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会继续在欧洲和国际层面上积极参与对欧洲及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基础设施的建设。

### 科学的国际化

我们希望在国际科学合作方面达到新水

平，并继续推行国际化战略。为此，我们将与德国的科研组织就使其国际化行动的网络化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给予支持。此外，我们要继续发展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战略性研究合作。

德国目前已经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的第三大外国学生的留学目的地。我们会在这十年末努力做到使外国学生的数量再增加约1/3，达到350,000人。我们会针对性地增加德国到国外学习的数量，希望实现每两个大学毕业生中就会有一人具有国外的留学经历。

高校和研究机构赴国外交流的核心推动者就是德国学术交流机构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它们有大量的国外办事处，在国际高校市场内为德国这个教育和科学区位进行宣传。我们希望提高它们的影响力，并有效利用它们的协同作用。

### 培养精英

几十年来，通过支持精英培养机构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基金会的工作，联邦政府已经成功培养出了一批青年才俊。为培养高素质的后继人才，我们会继续进行这种努力。我们会在任期之内继续为2%的大学生提供德国奖学金。

### 普及性教育

#### 扩展文化教育

文化教育可以打开新的眼界，对人格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因此，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必须接受文化教育。通过“文化令人强”这一项目，我们提高了文化教育的广度。

### 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是加强民主的核心因素。我们也希望加强校外的政治教育，特别是通过政

治基金会来实施。

### 为了明天的专业人才：扩展 MINT（数学、信息学、自然科学、技术）教育

我们会加强 MINT 教育，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并提前在 MINT 领域为填补专业人才的缺口做准备。我们会同知识界和经济界一道对“小研究者之家”基金会给予支持，希望到 2015 年有 80% 的日托托儿所都能得到基金的支持。

### 数字化教育

我们将与联邦州和所有教育领域的相关主体共同发展和实施“数字化学习”战略，这个战略可以有效利用新媒体给教育带来的机遇。

我们会同联邦州一起改善数字化教学工具自由使用的情况，其基础则是有利于教育和研究的版权法和全面的开源政策（Open-Access-Politik）。教科书和教学材料应该尽可能地自由使用，包括高校的教科书和教学材料，还应该扩大免费授权和版式的应用范围。

我们不仅要在中小学和托儿所推广 IT 技术和建立媒体环境。强大的数字经济需要优秀的专业人才，因此我们将在联邦与州的合作中以实践为导向，加强 IT 和技术领域的教育。

我们支持从小学到高校对科学能力的培养，为此我们会推动 MINT 领域的项目和比赛，并从小学开始开设合乎时代潮流的信息学课程。为能使相关知识传授给教师，为增强教师媒体能力，继续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此外，我们会尽力设立足够的 IT 硕士学习名额，有针对性地鼓励更多女学生和年轻女性进入该领域，建立在数字经济中的女性导师网络就是一个合适的措施。一些学科中的女性学生比例应该提高，如信息学和电子技术，在 MINT 学科中我们也更加重视增加女性学

生的比例。

由于体育精英学校为我们树立了成功的榜样，所以我们将与联邦州商谈引入把信息学作为重点的 IT/ 数字专业学校（Profilschulen），在此过程中，与高校、研究机构及私人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 教育研究

实验性教育研究为人们了解教育过程和检验方法的有效性提供重要认识。我们在今后几年中的新重点将是教育系统包容性、职业教育和过渡问题。联邦政府将会通过修改相关法律确保教育统计数据的获得。

### 职业教育

德国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为很多人提供了优秀的资质和由此带来的良好职业发展和生活机遇，它为我们未来保障专业人才的后续和民众的富裕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联合政府将重点加强职业教育。

### 职业机会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动，我们如今绝不能让年轻人得不到机会，我们希望顾及所有年轻人。咨询服务起到预防的作用，以个人的教育背景为导向，打破以性别论机会的模式。中小學生、学徒、大学生以及对继续教育感兴趣的人都应该接受系统的指导，从而打开不同的教育之路。我们将为此建立植根于各地的咨询与信息网络。

我们会与联邦各州合作拓展“教育链”这个成功的项目，让尽可能多的年轻人及早发掘自身的潜力，认识不同的职业选择，并完成学业和职业教育。在向职业培训过渡方面，我们会继续扩展职业入门指导项目，利用辅助培训带来的机遇，努力实现不同教育道路的连接。

## 培训和继续教育联盟

我们将和社会合作伙伴以及联邦州一起将培训公约发展成为“培训和继续教育联盟”。联盟的目标是在德国推行培训保证，任何青年都不能被忽略，或让他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等待上。我们会与联盟的伙伴一起，通过向年轻人提供培训帮助或辅助培训，支持他们克服最初的不利条件。我们会重视培训质量，并防止培训中断。我们尤其关心有残疾的青年人接受职业教育的问题。我们会与联邦州一起对过渡系统和推动职业教育的方法进行检验，并努力建立完全达标的企业职业培训体系。（以上由孙浩林译）

## 加强双轨制职业教育

我们希望加强双轨制教育，使之更加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因而我们将对职业教育法进行评估审核并做适当调整，尤其是在提高透明度、提升培训质量、加强分级教育培训、构建职业家庭以及保障审查小组的义务工作等方面。此外，我们在职业准则方面高度重视公共部门和劳资伙伴之间达成共识的原则。

跨企业的培训中心和人才中心为就业指导以及支持中小企业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因此我们将在现有水平上进一步推动其发展。

## 能力认定

为改善对在国外获得的职业资格认定，我们将对《认定法》的某些部分进行必要的修改。对于那些移民前还未完成职业资格培训的移民者，我们将在经济上资助他们完成培训以获得同等的认可。我们还将加强国内外的咨询机构的建设，提高在这方面的关注度。

对于那些习得所谓“非正式技能”的移民，即他们的技能无法通过证书得以证明，我们将开发和试验新的方法，使这些能力测

试透明化并得到认可。

## 国际教育合作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国际层面上，我们都致力于改善年轻人的就业前景，降低欧盟内年轻人的失业率。通过咨询工作以及实施“灯塔项目”，我们支持欧盟各成员国组成的欧洲教育联盟。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与那些对双轨制教育感兴趣的国家进行合作，以建设成功的职业教育并使之现代化。我国正在接受职业培训和已完成培训的专业人才应当成功进军国际市场，提高自己的跨文化能力。因此，我们希望为更多年轻人提供在培训期间的海外学习机会，将其所占比例提高一倍。

## 扩大继续教育

鉴于人口结构的变化，终生学习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我们希望在“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联盟”框架内积极应对这项全社会的任务。

我们深信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同等重要，这一点可以从德国的学历资格框架得到证明。我们将确保新文凭能表明相应的资格水平。另外，我们将提高透明度，并支持在职人员通过受教育而自己掌握个人的职业发展。

执政联盟将对《职业晋升深造促进法》（Aufstiegsfortbildungsförderungsgesetz, AFBG）进行修订补充，以提高资助金额，扩大资助范围。在普及教育与职业教育平等的基础上，如果学士毕业生能证明具有相应的工作经验，我们会为其提供资助进修晋升的渠道。而进修晋升的奖学金将继续由我们提供。

民主的公共体要依赖所有成年公民。我们非常关切加强普及性继续教育的事业。执政联盟希望继续并加强消除教育不足情况的努力。在未来的十年里我们将继续发展各联邦州的扫盲战略并扩大资助规模。同时，我

们也会继续发放具有显著成效的教育津贴。

## 研究

过去几年里，通过德国联邦、各州和经济界的共同努力，德国对研发的投资明显增长。我们将通过继续支持高校研究，加大对科学研究项目以及高校之外的研究机构的资助，推动这一良好趋势继续发展，努力保持研究投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

## 德国的高科技与创新战略

我们将在德国继续实施高科技战略，并使之成为全方位的跨部门创新战略。我们希望通过实施这种创新战略来应对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人口发展的变化、数字化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并与科学界、社会、经济界和政治界一同应对未来的这些任务，并将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纳入我们的视野。同时，我们还将大力支持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辅助研究及跨学科合作，促使科研人员更加负责任地对待研究及其结果。我们将深化欧洲和国际研究合作的扩展。

## 人类健康研究

健康研究在我们资助项目中依旧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将以科学性的程序继续发展德国健康研究中心的理念。

在“一生健康”这一口号的指引下，我们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并从预防保健的角度出发，努力在儿童与青少年医学、劳动医学、性别医学以及老年医学方面推出新创意。我们希望通过结构创新和广泛研究进一步推动个性化医疗的发展。

只要用于护理系统的资金能够得到长期保障，我们也将加强医学护理研究，例如护理学、生物识别技术、流行病学、医学信息学和临床注册体系的建构，以改善病人的日常护理。

我们将加强生物活性物质研究，以促进新药物研发，比如在对抗多重耐药性和败血症的抗生素研发领域，我们也将促进医疗技术的提升。

通过加强研究与贫穷有关及易被忽视的疾病，并与相关地区进行科研合作，特别是与非洲合作，我们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打破贫穷与疾病之间的恶性循环。

## 能源供应、气候、资源研究

能源研究始终围绕能源转型开展，前提条件是在能效、节能、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供应系统（其中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存储、网络、系统服务）领域研发有效的解决方案。执政联盟将在能源研究计划中提出一些全面、系统的新研究方法，从而开发整个附加价值链中的创新的潜力。资助项目是有效的调控手段，使政策性行动有针对性，因此，我们将稳定能源研究计划的基金。

我们也将使研究措施形成一套适合的网络，考虑此议题所涉及的欧洲维度，并将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纳入考虑的范围。气候研究的重点是加强气候模拟和区域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估。气候所带来的机遇、风险和可能采取的行动也是研究重点。

随着生物经济的推广，我们希望实现从主要以不可再生原料燃料为基础到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高效利用资源的经济转型，这也是对能源转型的支持。海洋和极地研究对气候变化研究同样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将加强在这些领域的研究，继续推进德国研究队伍的更新。

研究成果必须顺利转换为有创意且符合上市标准的产品。此外，鉴于全球对创新型能源技术以及对于德国加强作为出口导向型技术区位的需求不断上升，我们应当大大加快从创新到进入市场的过程。

我们将在一定的有限水平内继续促进核

聚变研究。

### 核能安全和核废料处理研究

执政联盟将聚焦于核能研究这一重要的未来议题。我们将通过各机构和项目所进行的核安全及核废料的处理研究，致力于改善国内外的安全，寻求核废料处理的解决方法并保持德国的竞争力，这也是国际合作的要求。我们将在重启核废料最终存放地的寻找进程之后，继续加强对最终存放地的研究工作。

### 信息技术安全的研究计划

为加强德国国内信息技术领域的研发活动，我们将继续发展“信息技术研究与安全的创新”计划，用以协调不同使用群体的信息技术安全和易用性。在招标中优先考虑开放源码（Open-Source）的方法，使其发展成果以及系统可供开放使用，提供数据以及结果时实行统一标准，并要经过检验。在信息技术安全方面我们要启动新的研究项目“数字化时代的自主与安全”。此外，还要扩展专业后继人才掌控信息技术安全的能力。

### 原材料研究

原材料及其有效利用对于德国高科技产业具有战略性意义。我们将有针对性地促进相应研究，以继续帮助德国高科技产业更好获取原材料。

### 未来流动性研究

包括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由我们资助的流动性研究在未来将扩展整个流动性服务的广度。在汽车研究方面我们面临许多挑战，以电动出行平台为例，挑战主要是在实际应用中能源储存和能量消耗问题。我们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通信技术保障流动的网络化和安全高效。

### 开发保障公民安全的创新解决方法

通过资助科学界、经济界和用户之间的合作研究，我们希望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来控制如因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所引起的险情，并将其引发的后果对公民的伤害降到最低。因此，我们将以民众为中心，积极推动民用安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 为未来工作进行研究

我们希望，德国在将来能继续保持其作为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的优势区位以及出口大国的领导性地位。要实现这点只有进行创新，对生产和服务过程持续进行组织和技术的变革。我们要与劳资双方协同来加强劳动、生产以及服务研究，并将资助一个新项目。这对维持高就业率、创造更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 科学知识转化和效果推进

德国将加强并加快社会和经济领域研究新发明的转化。我们将扩大地区性和专题性研发活动的集群结构，通过加强德国与欧洲、全球的网络性联系提高其经济影响力。此外，我们还将创造新工具推动高校基础研究过程中的创新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实用的产品及服务，而效果推进的发展将对此转化过程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我们希望挖掘经济与社会巨大变革中的发展空间，无论是通过开创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服务或者合作这些形式，还是通过为新颖的、有创意的解决问题思路建立并扩展开放性创新平台。在此过程中，我们尤其关注中小企业，希望它们能够与客户、国际伙伴、大型企业、各高校以及研究机构共同推动新的发展。

## 在新州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我们将加强现有科学研究的建设与扩展，在新州开展高效的前沿研究。同时，我们还将继续支持各地区科学界及经济界集群的研究项目，如“区域企业”（Unternehmen Region），“20-创新伙伴”（Zwanzig20 – Partnerschaft für Innovation）等。

## 欧洲研究区

我们将承担德国在建立欧洲研究区（der Europäischen Forschungsraum, EFR）方面的责任，并始终在德国和欧洲层面上贯彻执行欧洲研究区战略。为此我们将改善研究者的流动条件，共同推进项目计划的设计，建立共同的研究基础设施，降低知识转化难度，支持欧洲科学体系内的男女平等，扩大与欧洲之外第三方国家之间的合作。

我们坚信，对于欧盟各成员国来说，建立欧洲研究区应根据各国体系的现实情况制定相应的战略。欧洲委员会的立法倡议统一不利于构建多种促进竞争、科学与创新的欧洲研究系统。

我们要支持德国科学界和经济界积极参与新的研究框架计划“2020视野”（“Horizont 2020”），并将努力提高其参与度。

同时，德国的科学界应当在加强欧洲科学和创新系统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也将加强与新入盟的东欧、东南欧成员国及深受此次债务危机影响的其他欧盟成员国在创新方面的双向交流协商，以及共同开展研发项目。

## 对中小企业的研究资助

我们将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更多与高校以及非高校的研究机构进行研发合作的机会，从而促进在德国开展技术导向型的创新活动。

## 部门研究

部门研究对联邦德国的科学研究整体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将继续推进部门研究的发展，并希望所有部门研究机构都能得益于科学自由法所带来的优势。

## 扩大在高等专科学校的研究

资助在高等专科学校的研究尤其为中小企业在区域合作方面提供大量机会，以资其更好地提高创新能力。因此，我们将扩大联邦资助高等专科学校研究的规模，扩大资助的渠道，加强其与综合性大学共同培养博士的可能性，从而加强科学体系的研究性特征。我们期待德国研究协会能推动更多高等专科学校参加相关的项目。

## 保障专业人才

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进而影响到德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体系。因此我们将满足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从而尽力保障民众的富足生活，促进经济增长和机会平等。在这届任期内我们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

为此，我们首先考虑国内的专业人才，当然在全球、尤其在欧洲劳动力市场上抓住机会为德国引入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这对我们同样重要。专业人才政策的重点如下：

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政策应更多面向年轻人，使他们尽早做好成功开始职业生涯的准备。我们将通过加强教育、建立联系网络、实施融入计划和继续进行职业资格培训、更多地认可国外的学历以及开展专业咨询等方式，持续促进外来移民融入德国劳动力市场。

为了保持德国就业能力，我们将加强“终身学习”理念的传播并提高较年长的继续学习者的比例。我们努力使联邦劳动局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继续开发帮助重新就业者的渠道, 在为待业人员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 重点关注单亲人员和长期失业者, 并有针对性地说服那些处于备用劳力 (Stille Reserve) 的人们重新投入工作。对于年轻父母则应当采取劳动力市场政策措施或对其进行非全日制职业培训。

我们要与工会、雇主一起将所有这些构想打造为职业资格培训的新攻势, 使之成为培训与专业人才保障一揽子计划中的核心, 把它与现有并将继续落实的培训一揽子计划对接起来。与此同时, 我们也将确保双轨制教育和维护学徒制度。

尤其是企业应当更加努力为雇员提供与其年龄相适应的且顾及人员老化现实的工作环境, 并在实施人事政策时应敏感地考虑人口变动的因素。对此, 我们以“劳动新质量”(INQA) 的倡议和 50 周岁以上人员就业的创意予以支持。我们主张引入与需求相适应的高素质移民, 在欧洲劳动力市场上实现更大的流动性。此外, 我们要在德国改进欢迎外国专业人才进入德国工作并定居的文化氛围。因此, 我们希望加强“专业人才引进攻势”(„Fachkräfte-Offensive“) 的宣传活动, 并使保障专业人才就业的区域联系网络更专业化。

在大选期间, 我们也将检验那些为吸引专业人才、推动其融入劳动力市场的措施是否已经取得效果 (特别是欧盟的“蓝卡”, 还有居留法的改变, 就业管理条例以及改进认证国外职业培训资格证书法), 并推导出可能产生的后果。

### 加强移民的社会参与

我们主张外来移民进入德国后继续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我们希望以此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机会, 也考虑到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移民中的很多人已在外国完成了职业培

训和高等学历教育, 但这方面的内在潜力常常未被充分利用, 而同时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却面临着专业人才愈加短缺的情况。控制这一趋势的一个重要步骤是, 联邦和各州现行的针对在国外获得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认证法, 在此方面, 应提高咨询的质量。

我们支持能被社会所接受的审批费用。认证法的实施表明, 个人对适应性培训和充电式职业资格培训需求日益增加。因而我们一方面将在职业教育资助 (联邦教育促进法 Bafög, 职业深造促进法 AFBG, 社会法典 SGB III) 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框架所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更好地利用现有资金, 如有必要还将提高资助额度。另一方面在欧洲社会基金会项目“认证法背景下移民的职业资格”框架内也应同样如此。另外, 我们还将考虑, 是否有必要在联邦范围内增设中期奖学金计划, 这是一个平衡措施, 主要针对那些常住德国但没有资格申请加入社会法典 II 或者 III 的人。

## 1.3. 投资德国的未来: 基础设施

### 交通运输

流动性是实现个人自由、社会参与、民众富足生活和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前提, 而流动性的基础则是一个高效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它保障了我们在欧洲乃至全球的竞争力。过去几十年实行的交通运输政策如今取得了巨大成功, 尤其表现在顺利完成了德国统一后的交通规划。考虑到多年来进行的结构性融资, 我们将通过根本性改革为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融资奠定一个长期稳定且高效的新基础。

### 以网络为导向的联邦交通运输道路规划

新提出的 2015—2030 年的联邦交通道路计划 (BVWP) 是一种联运式网络规划, 我们将公开透明地推行这一计划, 并让公众参

与进来。同时，在这些新建或扩建项目中我们将注意根据实际需求来设计规模。但并不是每个愿望都能够实现，对于那些特别紧急、需要快速实施的跨区域重要计划，我们将在新的联邦交通道路计划以及轨道、公路和水路等交通运输载体扩展法中确立一个“国家优先理念”，优先考虑这些计划的实施。用于新建和扩建交通系统的资金中80%将会流入这些项目计划，其中包括以下工程：扩建超负荷运行的交通枢纽，扩建陆港连线，扩建主要交通干线，弥补跨区域交通网络的重要漏洞，加强欧洲以及国际法条约中规定的交通干线建设。

### 扩大投资

我们为联邦的交通基础设施创造可靠的融资基础，在今后4年中我们还将从根本上提高联邦层面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

对此，我们还会补充资金，这些补充资金来源于对进入高速公路的卡车收取通行费这样一种用户融资方式。现有的收取货车通行费措施将被扩展运用到联邦内所有道路。考虑到道路成本鉴定的新结果，我们将会继续实行对货车收取通行费这一政策。收费参照标准有载重量、网络和外部成本。我们在此保证，用户融资的所有净收入将无任何截留，全部用于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为给高速公路网的保养和扩建筹措更多资金，我们将适当对在德国经过审批的私人车辆征收一定的费用（养路费），前提是，不再加重德国车主的经济负担。该计划将遵循欧盟法律的标准，与此相关的法律将在2014年颁布。

为确保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可持续融资和长期规划及融资的安全性，我们将在联邦预算中为此创造必要的预算法规条件。在交通运输领域未使用的投资资金将长年如数保存。不同交通运输载体之间要能形成一种平

衡的互补关系。用户融资的所得净款项将全额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公共-私人伙伴关系(ÖPP)的发展需要广泛的社会共识。我们要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投资者或者基础设施公司之间的合作机会作为额外的筹资方式加以利用，由此节约成本并更加经济地实施项目。这正如把业务移交给某个企业一样，每项合作都必须证明是透明和独立的。我们将从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方向发展公共-私人伙伴关系，评估和规范经济性研究的方法。

### 保持和扩大的关系

经过数十年的基础设施网络扩展，现在最重要的是资产的保护问题。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开始扩建和新建工程之前的保护和修复。我们将继续实施桥梁、隧道和水闸的加固战略。

### 铁路服务和融资协议的未来

在现有铁路服务和融资协议到期之前，我们将与德国铁路公司签订一项新的协议。该协议必须确保通过引入更多的优质功能保障铁路网络的延伸范围和承受能力。

####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报告

我们将每两年发表一份交通基础设施报告，作为未来优先投资交通运输道路维护和修复的基础。该报告将使联邦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状况更加透明，并列出了需要补充的需求，提供所需的投资信息。

### 县市交通运输的融资

联邦政府仍然是县市公共交通融资的可靠伙伴，作为回报我们希望各州充分利用专门用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公共客运交通基础设施和县市道路建设）。我们努力为

县市交通融资法案中联邦在 2019 年后的计划争取可靠的后续资金。我们将在改革联邦与州的融资关系的框架下讨论这一问题。

### 噪声防护

流动性的接受度和基础设施进一步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能否降低噪声。因此，我们将改善交通噪声的防护状况，在联邦公路和联邦铁路上采取针对运输噪声的防护措施，其实施依据必须是公路和铁路上的噪声总量。我们还将扩展现有路线上所进行的自愿降低噪声计划，并根据法律对其提供保障。现有降低噪声的技术必须始终应用于实践。

到 2020 年，我们要将德国的铁路噪声强度减半。此后，那些产生噪声的货车将不能进入德国铁路网。我们将继续资助这些货车将制动装置更换成低噪声制动，并于 2016 年对置换情况进行评估。如果到那时在德国还有至少一半或以上的货车没有完成制动装置更换，我们将在本任期内根据治安法对繁忙的货运线路实施监管措施，比如禁止未更换制动装置的货车夜间行车。

另外，我们还必须在欧洲层面提出倡议，例如规定从 2020 年起在欧盟范围内禁止使用高噪声的货运车辆以及实施促进高噪声货车改造的欧盟计划。我们将通过扩大路线定价的差额，更加有效地设计按噪声强弱收费的路线定价体系。我们将通过法律明示，在上一届政府任期内，针对铁路新线设定的将噪声下限降低 5 分贝（A）的规定也适用于现有铁路网，这需要通过新的规划确定程序（Planfeststellungsverfahren）。

投入降低公路和铁路噪声计划的资金将有所增加。

在航空运输方面，我们优先考虑从根源上减少飞行噪声，从环境方面优化土地资源利用，并使飞行操作程序能够降低噪声。

根据飞行程序和空中交通管制放行的定

义，尤其应加强夜间的噪声防护。正如我们关心航空区位的经济发展前景及其创造的就业岗位一样，我们也同样关心在机场附近生活的居民。我们将在本届任期间检验降低飞机噪声法的限制范围。

在确定飞行航线时，我们将从法律上确保及早通过透明的程序告知当地居民，并保证他们能参加到这一透明程序中。我们将为城镇和公众参与航线的确定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在这方面飞机噪声委员会应发挥重要作用，今后我们会加强该委员会的工作。

噪声和有害物质减排目标的实现应借助于航空技术的创新。我们希望航空公司加大生产低排放的飞机从而加快机种现代化的步伐。在航空法中，我们将根据飞机型号的不同进行更细的区分，确定不同机型白天与夜间应向机场缴纳的噪声相关费用。我们主张在国际层面（ICAO）上加强对新飞机的噪声合格界值进行审定，反对包括禁止夜间飞行在内的一般业务限制。

### 铁路、公路和水路结合

在未来的交通管理中，不同的交通运输载体应发挥各自的最大优势。为此，我们将更好地使之结合，将更多的交通运输量转移到铁路和水路上来。

### 铁路系统

我们希望加强和扩大铁路运输，建设高效的铁路基础设施和现代化的无障碍火车站。正点率和可靠性应当成为铁路的商标。我们将在不影响德国联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效益的前提下使其商业政策面向此目标。为此我们将根据股份公司法对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的管理方案进行修订，董事的红利要与上述目标的实现挂钩。监事会对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的监督由设置在联邦交通部的国务秘书进行协调。我们将调整铁路基础设施的规划，目

标是实现德国节奏，即全国各地的火车联运互相协调，并建立高效的货运通道。我们将及时贯彻实施规划，通过有针对性去瓶颈方式显著增强铁路的客货运能力。

我们主张在德国联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成立综合性的集团。铁路基础设施属公共生存关怀的一部分，因而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我们将保证联邦铁路基础设施公司的所有利润流回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我们要进一步增加私营铁路的竞争机会，例如通过继续扩大资助非联邦所有、但对铁路货运网络基础设施有重要意义的铁路线路。除提高投资水平外，我们还将制定适当的备用计划，以确保重要铁路专用线的扩建和新建。我们希望通过提高效率加快铁路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和获得许可的过程。

我们将努力与各州就 2014 年区域化资金现有修订方案顺利达成协议。为确保铁路客运的长期融资，我们将从 2019 年起为区域化资金提供新的基础——联邦和州融资委员会。我们希望各州能够有效利用资金，并鼓励铁路提供良好质量和增加乘客数量。

通过加强铁路调控，我们将确保铁路基础设施的透明度和非歧视性市场准入原则，此外还应保障适当的价格调控和基础设施的可持续融资。我们将继续加速和高效组织审批轨道车辆准行的程序，并为其创造必要的法律基础。此外，我们希望在欧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火车准行程序。铁路交通非常节能环保，因此，与远程、近程轨道交通有关的公司可免缴可再生能源费。

### 公路——利用创新技术提高效率

我们希望使公路运输提高运力，更加高效，从而增加交通运输量。在“21 世纪之路”这一方案的指导下，我们将更多依靠智能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并增加使用交通远程信息处理技术和最先进的信息和通信系统。

在基础设施规划方面我们会考虑开发交通控制设备。

为了避免施工造成交通拥堵，我们将通过实行各州统一规定的施工现场高效管理措施来缩短施工时间。此外，我们将与各州共同制定并实施公路委托管理改革的提议。在基础设施项目招标时加强实行激励机制有利于控制成本和时间的准确度（如奖惩机制）。

### 联邦的水路

内河航运具有相当大的潜力。为充分利用其潜力，我们应发挥联邦水路的强大功能，因而我们明确规定将其设为投资重点。基于联邦交通道路新计划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报告，我们将根据紧急程度定期制定维护联邦水道的计划。除吨位之外，也会进一步考虑划分优先级的其他标准。

在联邦推动水路与航运管理改革过程中，我们将提高员工在这一过程的参与度，从而保证各区域必要的竞争力。我们还将宣传水上旅游的理念。

我们将协调统一联邦水道技术设施使用的缴费系统，使其不参与竞争。我们还将调整北海—波罗的海运河的费用，对在内河航行的低排放量的发动机实施更具吸引力的资助政策，从而加快船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 常规和替代动力系统及燃料

我们支持新型驱动器、燃料及能源的技术开放式发展，继续激励创新型解决办法在市场中立足。我们将进一步发展流动性和燃料策略。生物燃料的生产和使用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因此我们要发展基于现实规模潜力的生物燃料战略。我们将在航运领域加强研究新型燃料和引入使用液化天然气（LNG），并进一步延长对使用利于气候的液化天然气和天然气的能源税实行减免政策的期限，该政策目前的有效期是到 2018 年。

## 电动出行

我们始终坚持至 2020 年在德国道路上有一百万台不同类型电动车的目标，并推动相应充电和加油基础设施的发展。从 2016 起，全国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组织（NOW）会将其工作重点放在燃料电池技术在固定和移动应用领域的运用和市场运行方面。

在支持电动出行的市场运行方面，我们更支持面向用户的鼓励措施，而不是购车优惠。同时，我们也为快速颁发电动汽车标识及其上市创造良好的框架。联邦将逐步为车队更换车辆。交通运输部要承担起交通研究的责任。

## 新的流动性文化和联网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起可持续的流动性文化和将各种交通运输工具进行人性化的联网。为此，我们鼓励建立跨运输模式的开放式数据平台，其数据能够提供有关流动性供给、交通堵塞、延迟和出行计划的信息。随着交通信息和票务系统的网络化，人们可以更好地享受创新的数字化流动性服务。

## 城市和农村的公共交通

我们将推动创新，发挥公共交通的环保优势。我们支持在联邦范围内推出电子票并升级乘客信息系统。考虑到农村地区，我们将改善现有交通形式的框架条件，例如改善呼叫巴士和公民巴士的环境并支持各地创新流动性方式的发展。通过道路交通法，我们应该确保县市用法律保障共享型汽车和电动汽车使用的停车场。

## 远程公交车

在远程公交车市场发展方面，我们密切关注其对铁路运输的影响、遵循劳动和社会标准的情况和安全情况。依靠联邦货物运输

管理局的帮助，我们保证拥有足够的控制强度。我们将与各州共同努力，对长途车进行统一审批，并与交通主体共同编辑一本手册，用以支持法定的无障碍理念的落实。

## 自行车交通

我们希望进一步提高自行车这种环保型出行方式的比例。为实现德国 2020 年自行车计划的目标，我们将加强有关新路线和如何促进实施自行车交通战略的广泛社会对话，继续扩大联邦交通道路中的自行车道数量，并为在联邦水道边的人行道路新建自行车道创造法律基础。为加强自行车交通的安全，我们要优化基础设施的规划，防止在国道上形成事故高发地并消除现有的事故高发地。我们将继续推动面向未来的连接公共交通 / 共享汽车 / 自行车项目的发展。同时我们要努力使更多的骑车人戴上头盔。

## 无障碍设施

我们将继续实施联合国在交通领域规定的残疾人公约。我们的目标是所有人在整个出行链中无论使用任何交通工具都可以毫无障碍地行动。除进一步扩大无障碍获得乘客和票价信息的渠道，我们还将提交火车站现代化计划，其中包含有约束力的列车时刻表，无障碍地扩建和改建所有较大型火车站。对于较小的火车站和停靠点，我们将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制定节约成本的适用的解决方案。

## 交通安全——所有人的流动性

我们将进一步改善交通安全状况，以显著减少交通事故受害者的数量，并通过安全宣传支持在交通安全工作领域的志愿工作和相关协会。我们要在联邦、州与工作组的框架下审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以减少人口给人与交通相互作用方面带来的负担。另外，我们将细化安装冬季轮胎义务的内容。

我们希望改进对新驾驶员的培训，提高对驾驶教师培训的质量，优化驾车陪练，并开发新驾驶员培训中的多阶段模式以及驾驶安全课程。我们正在更新医学心理研究。鉴于越来越多的交通参与者年纪较大，我们将致力于让更多人自愿进行健康检查。

增加使用最现代化的远程信息技术对改善交通安全甚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成功发射“伽利略”欧洲卫星导航系统意义重大。

### 航空交通

我们将加强德国的航空运输，并致力于保持其国际竞争力。随着在航空业引入财政或监管措施，我们还将关注效益成本比。这些措施对德国流动性的影响及对有效噪声防护、环境保护的影响要相互协调。我们主张公开透明，并希望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尽早开展对话。

我们对 2015 年新的联邦交通道路规划进行了补充，联邦应努力在规划德国机场网络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我们与各州政府和关心此事的公众进行对话，并提出“空中交通”的概念。联邦承诺建设柏林-勃兰登堡机场（BER）。

我们希望在欧洲航空领域执行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交易，不受竞争影响，并支持其转化为以国际民航组织为基础的国际排放权交易制度。在欧洲层面，我们致力于推行欧洲航空一体化（欧洲单一空域，Single European Sky）。对欧洲航空保障组织应提出高要求，但也要立足于实际。在进一步开放机场地勤服务方面必须要注意平衡德国机场的竞争力和员工利益之间的关系。

### 货运及物流

我们将进一步巩固货运和物流网络，并扩大“德国制造的物流”营销攻势。同时，我们会继续发展“货物运输及物流”这一行

动计划，特别是实施清洁节能的货物运输战略。我们支持货运和物流行业的产业升级，反对工资倾销，并希望改善运输和物流行业的工作条件。我们将检查现行的跨境公路运输和内河航运的市场准入规定，并同意进一步放宽外国公司在德国的运输规定，但前提是两国劳动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差距不会导致市场扭曲。必须严格控制卡车车况的安全性以及遵守驾驶和休息时间规定的状况。我们将在公路上扩大卡车停车指引系统，并在此任期内增设 6000 个货车停车位，同时运用远程信息通信系统，加强私人投资者的参与。对于满足欧六标准的环保车辆，我们将对其设立一个最低的特别收费级别。我们将通过对联运设施进行高额资助来加强跨区域的运输。

### 强大的海运、港口和海洋经济

我们要建立强大的海运区位，目标是形成的强大海运体系，该体系要利用运输链中的优势，又满足气候和环境保护要求。我们要有效限制北海和波罗的海海运中有害物质的排放量，同时不会将具有生态优势的水路交通排挤到陆路交通中去。在这方面，北海-波罗的海运河的高效运转就起着核心作用。我们将帮助海运业达到对北部和波罗的海船舶排放的新要求（SECA），实施并进一步发展“海洋发展规划”。

我们将继续发展关于就业和培训的海事联盟，继续根据需要促进海运的职业培训和就业保障。我们还将与海运经济界和劳资伙伴共同制定具体措施，以保障此行业的新生力量。我们会制定出长久有效的政策，维护传统航运。

我们想要从根本上统一挂国旗船只的管理并使之现代化。我们也会修改海事法律使之符合现代化的要求。我们要避免一国或欧洲单方面的特殊规定。船舶吨位税将保留。

这里我们希望船主能遵守欧盟法律的强制性先决条件。我们坚持执行到 2015 年底船舶所得收益都可以免除纳税义务的政策，并检验实际解决方案是否在未来适用。

为加强德国港口的竞争能力，同时考虑到 2015 年联邦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计划，我们正在拟定国家港口提案，进一步突破德国海港和内河港口与陆、海连接方面的瓶颈，该提案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我们对复兴信贷银行集团的“海上风能”这一特殊项目打开了港口和航运能力领域的大门。此外，我们将审查复兴信贷银行集团的特别信贷计划，该计划用于制造特种船舶及建立离岸结构（Offshore-Strukturen）的融资，目的在于促进海上风力发电的发展。

## 数字化基础设施

### 扩建宽带

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广泛部署宽带网络是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将进一步发展宽带战略，旨在消除人口密集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为实现这一点，我们将支持县市扩建宽带设施，以利农村地区通信方面的生存关怀（Daseinsvorsorge）。

在那些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我们将减少投资壁垒、弥补经济性的缺陷，更多依赖于协同效应和额外激励电信企业进行投资等方式。在扩建高速互联网过程中，我们也将确保技术的开放性，其中包括根据需求使无线通信网络频率覆盖德国所有地区。另外，我们将与各州共同努力，使用第二代欧洲数字地面电视广播传输标准技术而形成无线频率，从而主要在农村地区扩大宽带覆盖范围。

为了拓展高速宽带网络，首先应通过欧盟电信法（EU-Telekommunikationsrecht）和德国电信法（Telekommunikationsgesetz）创造有利于竞争和投资的框架条件，加强企业

之间的合作，创造更好的融资机会和促进联邦、州和县市之间的良好协调。

我们要尽快发展那些数据速率低于 2 兆比特/秒（Mbit/s）的地区。到 2018 年，德国数据速率至少应达到 50 兆比特/秒。为了更好保障网络运营商在农村地区投资的安全性，我们将审查用于网络运营商与网络用户之间就扩建宽带基础设施及其融资签订较长期合同的法律框架条件，视情况将农村地区签订的合同有效期延长至 3 或 4 年。

快速和安全的数据网络是在现代工业和服务社会中保障创新、增长和就业的基础。为应对全球经济和安全政策方面的挑战，我们需要强大的德国及欧洲电信和信息技术行业。我们将努力确保欧洲和德国电信市场的监管规划实施有利于在农村地区的投资有所回报。我们主张在欧盟委员会的援助框架下在德国发展下一代网络（NGA）的框架性规定，其中包括矢量技术，并借助非官僚且技术中立、有利于竞争的资助程序来推动宽带在农村地区的扩建。

宽带网络的部署在将来也应得到欧盟的资金援助，另外，要简化资助的程序，如欧盟关于生存关怀的法律提供了相关框架。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集团所提出的“高水平资助网络扩建”特别融资新计划将对现有计划进行补充。我们还要建立一个宽带建设的公民基金，个人将能够投资于此基金，并得到稳定回报。

### 无线网络

我们应当在公共场所充分发挥利用无线局域网（WLAN）接入互联网的潜力。我们希望在德国城市提供无线网络，由此每个人都能进入移动互联网。我们将为这些开放网络的使用及网络供应商提供法律基础。无线网络运营商亟须法律保障，例如可以采用明确担保规定的方法（类似于对网络连接服务

商的办法)。我们还将告知消费者使用此类网络对于敏感数据的危险性。

除澄清法律问题之外,我们要推动建立异质的、可自由联网的地方社区,并建设该地的基础设施。在研发战略的框架下,我们促进上述社区及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建设无线随意网络(Ad-hoc-Netzwerk),以支持地方的分散式网络,其中包括为固定用户群提供补充性的基础设施,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使所有人进入高效的互联网。

我们要对电信供应商的网络接入问题进行明确的法律规定。消费者应当保持自由选择路由器的权利。因此,我们拒绝强制用户使用某种特定的路由器。电信供应商应主动告知客户路由器接入网络所需的接入数据(电信终端设备)。

### 网络中立性

数字化议程的重要目标包括维护开放和自由的互联网、确保参与的安全、观点多样性、创新和公平竞争,其基础是非歧视性传输互联网上的所有数据包,尤其要确保供应商不应在竞争中通过提供更高的数据流量或更快的传输速度来首先推广自己及合作伙伴所提供的服务。搜索引擎也需要中立性,要确保所有的信息都能不受歧视地搜索到。

保证网络的中立性由此被确立为电信法的监管目标之一,执政联盟将努力在欧洲层面上为保障网络中立性提供法律基础。联邦网络管理局被授权从技术以及人员方面监督执行该目标的情况。因此,无线服务供应商在某些情况下要对网络电话进行单独收费。

所谓的尽力服务式互联网(Best-Effort-Internet),代表平等对待数据包,进一步提高其质量,而不应被各种“管理式服务”所排挤。技术允许,网络管理就要使用,以使带宽敏感的数据和使用信号能够毫无延迟地全部传输,并投入使用。我们将从法律上明确

禁止用于服务歧视或为监管用户所进行的深度包检测(Deep Packet Inspection, DPI)。

## 1.4 引领能源转型走向成功

### 成功进行能源转型和环境保护

能源转型是工业社会道路上重要且必要的一步,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保护价值创造的义务,有利于保护环境和气候,使我们不再依赖进口,保障德国的就业和附加值创造。因此,执政联盟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便是使环境保护成为进步的动力,同时提升富裕水平和加强竞争力。我们要继续发展无核能的能源供应,并有计划地持续增加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所占的比例。我们重申,我们愿意遵守国际和国家保护气候的目标,致力于实现欧盟设立的2030年应达到的目标,从而为2050年全球长期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基础,我们积极推动国际社会设立远大的气候保护目标和签署有约束力的协议。实现欧洲的气候目标时不应给高耗能、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带来消极影响,应该避免出现碳泄漏的现象。

### 能源政策三角

能源政策三角的目标,即气候与环境保护、能源供应安全、社会可承受能力,对我们同等重要。只有能源的供应安全和可承受性得到保障,产业附加值链和就业得到保证,能源转型才能为公民和经济界所接受。在进一步发展可再生能源时,包括网络扩建及必要的备用容量在内的整个能源系统是否取得成本效益和经济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应更多考虑欧洲电力市场。在此框架内,为保障德国能源供应安全,德国那些可灵活投产的传统电厂应维持必要的发电能力,其经济运行则要使社会能够承受。

### 可再生能源改革

执政联盟的目标是对可再生能源法（EEG）进行快速和根本性改革，并在2014年复活节提交改革方案，计划在2014年夏天

得以通过，从而在能源政策方面创造可靠的框架条件。老设备可享受存续保护。相应地，要给予已经实现及正在进行中的投资以信任保护。（以上由詹佩玲译）

译者简介：孙浩林、詹佩玲，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 • 文教论坛



# 奥地利对外文化交流政策与现状

贾建新

【摘要】奥地利有着悠久的文化和文化交流传统，重获独立后就非常注重在国际上为自己树立一个完美的形象，并且强调要通过在国际上大力宣传奥地利的文化来促进世界对它的了解，从而逐步提高奥地利在国际上的中立地位和威望。本文拟从历史悠久文化独特，专门设立负责对外文化交流的机构，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载体形式，继续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政策和奥地利与中国的文化关系等六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

【关键词】奥地利 文化交流 载体形式

## 一、历史悠久文化独特

奥地利共和国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内陆国家。面积 83,859 平方公里。人口 844 万。历史上奥地利曾长期统治德意志各诸侯国，后与普鲁士逐鹿天下，失利后退出德意志同盟，旋即与匈牙利组成“奥匈帝国”称雄中东欧。一战结束前奥地利通过多年的联姻政策使其势力一度扩大到东南欧和拉丁美洲，也被称为是“日不落帝国”。当时在帝国首都维也纳云集了欧洲许多文化艺术精英。著名的音乐大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著名的文学大师歌德、席勒、茨威格、卡夫卡；著名的美术大师丢勒、克里姆特、西勒和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都曾在此地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种带有昔

日帝国遗风和皇家传统的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它与奥地利特有的阿尔卑斯山山民文化和多瑙河流域的农民文化一起组成了当今独具风格的奥地利文化。

1918 年 11 月奥匈帝国崩溃后，奥地利共和国成立。1938 年 3 月奥地利被希特勒德国吞并。1945 年 3 月奥地利全境被苏、美、英、法四国占领。1955 年 5 月奥地利与四个占领国签订《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结束占领状态。1955 年 7 月《国家条约》生效，奥地利全面地重新获得了独立。

## 二、专门设立负责对外文化交流的机构

奥地利重获独立后就非常注重在国际上为自己树立一个完美的形象，并且强调要通

过在国际上大力宣传奥地利的文化来促进世界对它的了解，从而逐步提高奥地利在国际上的中立地位和威望。1956年奥地利在联邦总理府、联邦外交部分别设立文化司负责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64年奥联邦外交部设立文化新闻司主管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69年奥联邦外交部设立文化政策司专门负责制定和实施对外文化政策并归口管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1973年奥地利政府根据议会通过的“联邦部委法”将归口管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权力正式赋予奥地利联邦外交部，具体事务由外交部文化总司负责落实。目前是由奥地利外交部文化总司司长；艾希廷格大使、文化总司副总司长；殷珊大使、国际文化促进处处长；布鲁迈尔公使具体负责。

奥地利对外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中的具体项目则由联邦各对口部委负责实施。1997年2月奥地利联邦总理府曾增设一名国务秘书专门负责联邦直属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维也纳大众歌剧院、维也纳城堡话剧院、维也纳学院话剧院）、音乐、戏剧、文学、电影、艺术节、体育和欧盟方面的工作以及对外交流。2006年奥地利执政党更换，新政府将国务秘书的工作划归奥地利联邦教育文化部。该部除了负责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艺术教育外，还负责博物馆、图书馆、文物保护方面的工作以及在国内外举办大型艺术展览等活动。奥地利联邦外交部负责归口管理对外文化交流的项目和经费，并制定和签署对外文化交流协定和执行计划，同时向各驻外使馆和文化机构派遣文化外交官和工作人员。

### 三、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

奥地利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奥地利联邦外交部明确表明奥地利的对外文化政策是奥外交政策的

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就是要向世界所有地区的广大公众介绍奥地利的现状和文化。奥地利对外进行的文化交流一直是广义上的交流，其范围包括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和体育等。多年来，奥地利坚持以古典传统为基础、本世纪当代文化为重点的对外文化交流方针。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奥地利政府曾把对外文化交流的重点放在向国外介绍奥地利是个音乐之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和拥有许多著名艺术宝藏的国家。当时派到国外演出的各类艺术团组为奥地利赢得了“音乐之乡和戏剧之国”的荣誉。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奥地利的对外文化政策为之一变，采取了“厚今薄古”的方针。在国际上大力宣传奥地利当今在文化、艺术、科技、教育、体育方面取得的斐然成就，大力宣传奥地利当代的文学、音乐和绘画艺术，大力宣传奥地利是拥有高科技、新创意的现代文明国家。

历届奥地利政府高度评价本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认为它不仅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也巩固了奥地利在国际上的中立地位，更重要的是长期有效的“润物细无声”的对外文化交流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则是其他手段所达不到的。奥地利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战略考虑把与之进行文化交流的国家和地区分为几个档次。1995年奥地利加入欧盟后，便把文化交流的重点放在欧盟国家，其次是周边邻国和东欧以及东南欧发生变革的国家。在1989年后中欧和东欧急剧变革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与合作领域出现了全面变化。由于这些变化，那些迄今与中欧和东欧国家存在的文化协定部分已经到期，或者本来形式上的合同伙伴已经不再存在（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处理已经存在的以及实际上继续执行的文化协定时，呈现出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导致这些协定未来不过是些非常灵活的结构

框架。因此，这种新的文化协议模式使文化创造者在避开可能的官僚障碍的情况下，可以更有目的和更有成效地进行双边文化交流。

在艺术领域内，“奥地利文化联谊会”能够在1989年后政治变更的国家里进行很有价值的建设性工作。除了资金上大力支持具体文化项目外，也越来越注重在萨尔茨堡国际文化和管理中心培训文化管理人员，加强文化赞助体系的培训措施。在欧洲委员会里，奥地利向文化委员会的全部文化项目都派有专家，共同在领导地位上协作实施。同样，奥地利也承担了音乐方面的国际义务，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工作给予了很有力度的支持。此外，它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一些领域中的研究计划，参加了“阿施贝格-布尔萨利艺术家体系”，分别接收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区各两名造型艺术家、舞蹈家和音乐家赴奥地利进行短期培训和深造。联邦总理府艺术部负责造型艺术和照相技术的专业部门进一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艺术家提供在奥地利的“艺术家研修项目”，同时也为奥地利艺术家在国外提供工作室。值得强调的是，在保持民族和文化认同性的情况下，奥地利与许多国家之间所进行的短期而深入的国际艺术交流符合全球化发展趋势。

奥地利参加了欧盟全部文化项目。这些项目给在国内外工作的奥地利艺术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欧盟的扩大也给艺术领域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在奥地利的倡导下，中欧和东欧预备加入欧盟的国家越来越被强有力地纳入对话交流之中，从而使这些国家从2000年秋天起就有可能进一步参加“2000文化”欧盟计划。对奥地利文化舞台来说，由于这个计划的拓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可能性。许多中欧和东南欧国家表明有兴趣与奥地利进行文化交流。奥地利的艺术创作者也就有可能实现酝酿已久的愿望，与来自预备加入欧

盟国家的伙伴共同进行项目研究。

为了持之以恒地促进文化交流，展现奥地利文化的新面貌，奥地利分别在阿格拉姆、贝尔格莱德、柏林、伯尔尼、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布鲁塞尔、伊斯坦堡、开罗、基辅、克拉科夫、卢布卡雅那、伦敦、马德里、米兰、墨西哥城、莫斯科、纽约、渥太华、巴黎、布拉格、普雷斯堡、罗马、德黑兰、特拉维夫、东京、华沙和华盛顿设立了隶属于奥地利外交部的专设机构。这些类似文化中心的机构从计划和组织上支持文化和科学交流，并且努力通过网络信息和举办各种活动（研讨会、音乐会、诗歌朗诵会、展览、电影周、德语班、报告会、出版物、发放奖学金、咨询和资助科研项目、记者服务等），使当地民众逐步了解和熟悉奥地利。每个专设文化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组织各类活动的自由空间。它们尤其重视与所在国家文化主管部门进行合作，并且尽可能到更多的地方组织活动。从1989年起，奥地利在国外推行建立“奥地利图书馆”的特别项目。这种以合作形式开办的图书馆，最终应该发展成体现奥地利文化的“小型文化研究所”。目前，奥地利在20个国家建立了将近50个此类图书馆，主要分布在中欧和东欧地区。凡是设有专门文化机构的国家，奥地利文化和科学的介绍任务则由奥地利驻外代表机构负责实施。另外，由奥地利外交部资助的双边协会也起着重要的文化交流作用，如的里雅斯特的意奥文化协会、伦敦的英奥交流协会。此外，奥地利通过提供信息资料，共同组织和资助举办与奥地利有关的各种活动，大力支持这些欲与奥地利建立文化和科学联系的大学、学院和文化协会的工作。

#### 四、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载体形式

1. 举办展览活动：奥地利每年在国外举办各

种绘画艺术、造型艺术、现代艺术的展览和举办各类书展以及各种博物馆藏品展等。

2. 开展文学活动：奥地利在国外举办各种诗歌朗诵会、文学报告会、文学研讨会、新书及文学特刊发行仪式、剧本朗诵和话剧演出等。另外，在国外教授德语的奥地利教师也向外国学生介绍奥地利的文学作品。但由于语言的限制，此项活动大部分在德国、瑞士、荷兰和捷克举行。
3. 举办赠书活动：自 1995 年起，奥地利每年向国外各大学、院校赠送各类价值不菲的图书，其重点国家是东欧和东南欧所谓发生了变革的国家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图书种类为奥地利文学书刊、奥地利国情介绍、科学技术和哲学书籍。
4. 设立图书馆：奥地利目前在 20 个国家建立了将近 50 个奥地利图书馆。目前奥地利外交部已陆续在东欧及东南欧国家的科学院、大学图书馆或国家图书馆内建立了奥地利图书馆或奥地利图书室。东道主国家的有关机构提供场地和管理人员，奥地利方面提供各类图书。奥地利图书馆开架图书最少为 3500 册，而后每年再补充新图书。另外，奥地利外交部每年还向每家图书馆提供一名来维也纳进修 4 周的奖学金名额。
5. 举办音乐活动：奥地利外交部集中精力协助奥地利乐团或乐队与国外演出单位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组织演出。由于奥地利乐团、乐队和独唱、独奏演员均具有很高的演出水平，所以他们到国外进行的巡回演出不是从经济界得到赞助就是由演出商组织的商业性演出。如奥地利乐团或乐

队到国外演出奥地利现代或当代音乐时，奥地利外交部将负担他们在国外的大部分开销。奥地利的乐团或乐队到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东南欧的国家演出，大多也是通过转让电台录音、电视台转播权来得到部分经费。奥地利还努力在发展中的国家和初步发达的国家通过举办音乐大师班，或音乐工作室以及派遣客座指挥和提供乐谱来使当地乐团了解并熟悉奥地利的音乐和演奏技术，以便为今后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6. 开展科学学术性活动：奥地利目前举办的此类活动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人文科学上。对外介绍奥地利战后的文学、当代的话剧以及各种科学研讨会和报告会。
7. 举办电影活动：奥地利电影资料馆可对外提供故事片、短片、纪录片、默片等各类影片，其中配有外语字幕的影片比较受欢迎。奥地利每年都要派出国产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并利用部分参赛得奖的影片在国外举办奥地利电影周。奥地利外交部目前拥有近千部各类影片和光盘，其中许多部已翻译成多种外语。奥地利外交部每年都不断地向驻外使领馆、文化机构和在国外的奥地利图书馆提供最新的影片和光盘。另外，奥地利外交部还提供配有各种外语文字说明的 PPT 幻灯片供举办各种专题报告会用。

## 五、继续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政策

奥地利政府在继续贯彻“厚今薄古”的对外文化交流方针政策时，把重点放在全面地介绍当今奥地利的主题上。奥地利政府认为，仅把奥地利看作是一个古典音乐之国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为了加强世界对现今奥地

利的了解，奥地利政府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向外介绍奥地利的当代艺术、文化创意、科学技术。

奥地利政府为了贯彻统一的对外文化政策，从1980年起每年举行两次全国对外文化交流联席会议。奥联邦政府各主管部门对外文化交流的官员以及各州文化局的负责官员均出席此会。奥联邦政府各部和各州文化局可利用此机会相互协调工作并交流经验。按惯例每年的春季会议在某个州的首府举行，秋季会议则在维也纳举行。另外，为了搞好在国外的文化交流工作，奥地利外交部从1980年起每年9月还要在维也纳召开一次对外文化工作会议。奥地利派驻国外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类似文化中心机构的主任和没有设专职文化外交官的驻外机构的代表均参加此会。他们在会议上总结上一年度的工作并制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奥地利政府从1978年起每隔4年选择一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文化交流工作的重点区域。奥地利通过做重点地区的工作，取得以点带面的效果，为今后顺利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开创局面。

另外，奥地利向驻国外的16个大使馆和总领馆派遣了文化参赞和文化专员。从1996年起奥地利在驻华大使馆增设了文化参赞，后又在驻上海总领馆增设了文化领事。奥地利目前和中国、埃及、比利时、保加利亚、芬兰、法国、英国、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卢森堡、墨西哥、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突尼斯和匈牙利等国家签订了双边文化、科学和教育协定，与阿尔巴尼亚、阿根廷签订了文化合作备忘录，与伊朗、蒙古签订了意向性协议。自1994年以来，奥地利与德国、丹麦、荷兰、瑞士定期协商文化交流事宜。另外，奥地利还与中国、俄罗斯、保加利亚、法国、以色列、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和匈牙利签订有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由于历史原因，奥

地利联邦各州与接壤的邻国有密切的文化交往。奥地利政府支持各州与邻国进行区域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奥地利下奥州与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多瑙河中游文化风景区。奥地利蒂罗尔州与意大利、瑞士建立了阿尔卑斯山文化风景区。布尔根兰州与匈牙利、克罗地亚建立了中欧平原文化风景区并共同举办一些文化交流和文化娱乐活动。奥地利在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不搞固定模式而是提倡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同时也鼓励驻外文化官员到驻在国首都以外的地区开展活动。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奥地利提倡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并认为基于共同的兴趣而举办的活动才更有意义。奥地利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也十分重视活动的质量，他们认为高质量的活动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此外，奥地利还十分注重调动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国内，奥地利支持各种机构和个人开展民间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 六、奥地利与中国的文化关系

中国和奥地利于1971年5月28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奥地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把亚洲国家列为它进行文化交流的重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崛起，奥地利已把它的目光转向东方，并加强了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交流。进入21世纪以后，奥地利已把亚洲作为文化交流的重点区域。他们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上升中的世界大国，并且是亚洲崛起的象征。而奥地利不仅拥有光荣的文化传统，也掌握着十分先进的技术。因此，奥中两国要继续加强合作，尤其是加强在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2011年中奥两国隆重庆祝建交40周年，双方共举办了200多场活动，其中文化活动分量很重，极大地促进了两国

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了感情。奥地利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文化项目走进中国，也希望中国能更多地把近年来在音乐、美术、文学等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介绍到奥地利，使奥民众对中国的发展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奥地利与中国每两年签署一次文化交流

执行计划。目前奥地利还没有在中国开办类似文化中心的机构，但派出德语教师到中国大学任教，并与中国互换留学生。中国目前也没有在奥地利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但国家汉办与维也纳大学、格拉茨大学和萨尔茨堡大学共同合办了三所孔子学院。

**作者简介：**贾建新，中国原驻奥地利大使馆文化参赞、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现任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常务理事。

# 德国高校经济专业的新观察

张 凯 徐四季

**【摘要】**在博洛尼亚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德国高校经济专业也在不断地改革提升。从学制的变化到课程方向的细化，从课程内容上的调整到培养模式的转变，这些都体现出德国高校在经济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本科阶段注重基本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培养；硕士阶段强调专业方向的深化和实践能力；博士阶段重视学术科研产出的能力。实现基础教学标准化、模块化，增强学科的时代性，提升教学与培养的个性化与国际化成为近年来德国高校经济专业的主要改革方向。

**【关键词】**德国高等教育 经济专业 国际化

众所周知，德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强国，同时作为高等教育发源地的德国也同样以高质量的教学和科研水平闻名于世，每年吸引大批的国内外学生进入德国的高校体系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例如2013年就有10万的外国新生，这占德国当年大学外国新生数量的五分之一。经济学专业是德国综合大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其学生数量和比例远远超过其他专业，而且近年来还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本世纪初德国经济专业在校学生共有约30万人，所占大学生总数的比例为16.5%，到2013年冬季学期已增加到50万人，所占比例也上涨到19.3%。

2014年夏天，笔者由束荣胜德国经济研究基金会资助在德国考察了三所公立大学及一所私立大学的经济专业<sup>①</sup>，同教授、学生们就所在大学的教学与学习的情况进行了交流，从中收获了一些新的观察体会，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 一、专业方向更加细化，更具时代性 也更具跨学科特性

德国传统综合性大学中的经济专业设置主要分为国民经济和企业经济学，其中在国民经济中又分设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

① 三所公立大学分别为爱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私立大学为欧洲商学院。

学、经济理论、国民经济政策；企业经济学下设与企业经营和管理密切相关的课程，如会计、审计、企业管理、国际贸易、金融、营销、人事管理、税务等方向；另外还设有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课程，如公司法、税法、统计和经济信息学等。

随着德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模式的演化以及就业市场需求的转变，近年来，德国大学中尤其是企业经济学中的专业也随之进行整合和增设。如传统的企业管理细化并增设了针对医疗卫生行业的管理专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工业企业管理、物流管理、国际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管理、政府公关等新的专业方向，以适应新的企业发展趋势。营销专业也添设了营销情报和针对保险或证券行业的营销学以及品牌管理与营销等符合企业最新需求的专业方向。一些新兴行业如地产、电子商务也成为德国大学经济专业新增方向。如自 20 世纪 90 年代在德国大学中新开设的经济信息学便进一步增设了工业企业信息管理体系、电子商务与数码市场等融合信息学、营销学、工程学甚至是社会学、心理学的跨学科专业方向。在私立大学欧洲商学院（EBS）中，还增设了在德国高校中较为稀有的地产经济管理专业。

与此同时，德国大学经济学科的专业设置也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与方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亚洲经济的崛起，以中国经济、东亚经济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业方向在经济学科中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以法兰克福大学为例，现代东亚研究已经成为同货币和金融学、管理学、国际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研究以及经济教育学并列的硕士学位专业，开设有诸如“中国市场营销”这样具有鲜明国别或区域研究特色的课程。

## 二、专业设置特色化，突出本校教研优势

尽管德国综合性大学都开设了经济专业，除了传授有关经济学的基本课程之外，每所大学还会根据自身和区域优势提供特色化课程，以突出本校在这一专业上的教学和科研的优势。如 EBS 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就凭借处于欧洲金融中心的地域优势在设置金融专业方向的特色课程。如资产交易与定价、金融机构监管、金融衍生品设计等一系列面向金融市场的课程，承担这些课程的教授们也大都有过在银行或交易所等金融机构任职的实际经验，或为某家金融机构所赞助。这些课程也更具实战性，往往以金融机构的实际案例或问题作为教研工作的出发点。依托巴伐利亚州活跃的中小企业，借助慕尼黑周边的如宝马、奥迪以及西门子大型制造企业，慕尼黑大学则在企业革新这一经济专业方向拓展了一系列特色课程。从电子商务，到科技管理和战略组织与管理，从革新研究到跨学科的经济信息新媒体等专业方向都是围绕着革新这一特色所设置，这不仅使得慕尼黑大学获得了有别于其他大学的教学特色，同时也使得那些相应的授课教授取得在这一领域中的科研优势，在专业领域中具有较强的权威地位。

此外，由于学校性质及经费来源的差异，各校经济学科的建设导向也各具特色。例如，作为私立大学的 EBS 大学强调市场导向，在教学、研究中重视学生职业素质与能力的培养，其毕业生在欧洲就业市场中极具竞争力；作为主要依赖于第三方资金的基金会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学术研究以贴近经济、社会生活为导向；作为传统的公立大学，爱尔朗根-纽伦堡大学

和慕尼黑大学则强调学科建设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基础研究中的权威性鲜受挑战。

### 三、学士学位的教学内容模块化、标准化

在博洛尼亚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德国高校的经济专业顺应国际化标准引入学士学位，通过欧盟统一认证的高等教育学分制将原有统一硕士学制分为可以分别取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两个阶段。在为期6个学期的学士学位阶段，学生必须取得180个学分，通常还会更细化为两个学期需取得60个学分的评估基础期和包含撰写学士毕业论文的共120个学分的学士期。课程内容被区分为四个方面：一为经济专业的基础必修课，即所有新生在评估基础阶段都必选的课程；二为素质教育课程，其中外语为基础阶段的必修课；三为专业方向的核心课程，这是经济专业学生确定专业方向重点后在第二个学士期的主要学习内容；四为专业方向的深化课程，既包含所选重点方向的必修课程模块，又有辅修方向的选修模块。

以爱尔朗根-纽伦堡大学为例，在经济专业的第一和第二学期，学生必须完成相关基础知识模块，四个主要课程模块分别为经济导论课程、经济研究方法、国民经济和企业经济学。在经济导论模块中，新生会通过企业和商务模拟课获得对企业运转的直观感受，其他如企业市场与国民经济等课程可以让新生更容易理解经济运行中各部门的相关联系和互动。在方法论基础模块中包含会计、电子商务、数学等方法类和入门课程，这些都是今后学习和研究经济领域中各方面问题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国民经济学模块中为经济专业传统必修的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在企业经济学模块中，新生必修有关销售、企业年终结算等基础课程，以认识企业

中各个环节的运作与协调。这些课程模块在德国乃至欧盟其他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中都基本类似，都是经过欧盟统一认证过的，以保证各大学教学内容和水平的一致性。

德国大学中的经济专业也转变了原来举行中期考试的方法，将原来的包含国民经济学、企业经济学、统计和经济法基础的多门课程的大型考核拆分为在每个基础课程模块后的学期考试。这样的课程和考核设置即可为学生打下经济专业学习的基础，同时也为新生提供了适应经济专业或转换其他专业的空间。新生必须全部通过所有基础课程的考试才能进入下一个学士学习阶段，这个阶段的专业方向重点是由学生在第二学期末选择确定下来。

在学士学制的第二阶段，即从第三个学期开始，经济专业的学生除了继续学习相关的基础知识，如经济法、统计学之外，其课程内容主要集中于所选专业方向的核心课程和深化课程。其中，第四至第六学期还增加了研讨课。学生们在专业重点方向，借助已掌握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对国民经济以及企业经济中的相关问题开始初步探究。在选修模块中，学生们既可以在选定的专业方向重点中选择，也可以拓展到相关的交叉领域，如经济法、经济信息学、经济社会学中。在这一阶段中，学生们书面以及口头演示研究成果能力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从研究方法来看，国民经济专业更重视培养学生以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分析经济各个部门的问题；在企业经济学专业中，行业分析、案例分析成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们完成学士毕业论文的撰写，各大学除了组织论文讨论课程之外，还会提供学术论文撰写的辅导课程，在写作方法、写作技巧以及体例方面给予学生更多细心有效的指导。

#### 四、硕士学位的学习内容个性化、国际化

在为期4个学期的硕士学位阶段，学生需取得120个学分（ECTS）。在这一阶段，经济学专业所提供的课程选择更具专业性并且更以具体的就业方向为导向。学生在入学时就需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专业重点作为硕士阶段的主攻方向。在课程设置方面，不仅有深化专业知识的导论课程，还会提供更多的专题讨论。在专业重点方向上，学生可以更具体地选择在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中进行研究或拓展。从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学生未来就业的需求，许多德国大学都纷纷开设以英语为课程语言的硕士课程，加强硕士课程国际化进程。慕尼黑大学经济专业的硕士学位更是全部以英文授课，包括毕业论文也需以英文撰写。

在专题讨论课上所研讨的题目除了传统的经济问题之外，更多的是结合当今德国和世界经济热点问题所提出的课题，如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德国新兴工业政策走向、能源问题等。很多专题讨论课都会请业内的专家或其他大学与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士来做专题报告，进行多角度解读。这种形式不仅可以让学生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所研究的题目，更可以激励学生自发研究的动力，开拓研究思路，学习研究方法。这些专题讨论课上的内容基本为各授课教授组的科研重点或课题项目，一些优秀的课程论文还可以入选课题论文集或公开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转化为科研成果。许多企业经济学的硕士生还有机会参加教授所主导的与企业共同开发的项目，在实际工作中应用所学知识，更有针对性地完善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体系，并在项目中完成自己的硕士论文，实现教、研、产的共赢。

#### 五、博士培养团队化，强调科研产出

经济专业的博士生通常学制为3到4年，需取得30个学分。博士生在读期间往往也作为助教工作，领取工资，在实际工作中选择并完成自己的研究课题。以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系为例，绝大多数的在读博士生都在系内的研究机构从事全职或半职研究工作，他们也是金融系5个研究中心（欧洲金融可持续结构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电子金融实验室、货币和金融稳定研究所和保险监管国际中心）的基础科研力量。这一培养模式一方面至少在人员上增强了本学科的科研实力；另一方面也给在读博士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发展平台——他们可以充分利用所在研究中心的资源（如内部数据库）从事学术前沿课题的研究，并将其与自己的学业结合起来。

在毕业标准上，德国各大学现在大都改变原来以一本博士论文答辩通过的方式，而是转向美国大学博士培养的模式，更强调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的水平和能力。通常博士生必须有三篇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并至少一篇为国际水平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经过专家匿名评审过的论文，才可以申请博士学位毕业，取得博士头衔。这一改变一是可以提高本校本专业在同行科研的评分；二是可以锻炼博士生的科研发表能力；三是能使博士生所研究的题目更具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经济学科的研究在过去几年中不断趋向实证性和计量化，这就大大提高了对博士生导师的要求。在许多大学中，往往实行双导师制。一位主导教授对博士生的科研论文提供经济专业方面的指导；另一位教授提供研究方法上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甚至是编程方面的指导。这种双导师制不仅可以保障博士生在专业研究方面的深度，同时还可以让他们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保持国际领先水平，进而更容易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

另外，鼓励博士生积极参加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宣读自己的研究论文也是现在德国大学中经济专业在博士培养方面的重要举措。参加这类学术会议不仅可以折算为相应的学分，更可以使博士生开阔眼界，更多地联系学术界的同行。博士生参加研讨会所宣读的论文往往为即将投稿发表的论文，在研讨会上所得到的肯定与批判都会成为这篇论文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有益建议。

在博洛尼亚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在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德国高校经济专业也在不断地改革提升。从学制的变化到课程方向的细化，从课程内容上的调整到

培养模式的转变，这些都体现出德国高校在经济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本科阶段注重基本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培养；硕士阶段强调专业方向的深化和实操能力；博士阶段重视学术科研产出的能力。这不仅为德国经济输送了高质量、高素质的人才，满足了就业市场上不同层次的需求，同时也提高德国高校经济专业在国际高等教育横向比较中的地位，可以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学生到德国高校学习经济专业，吸引更多优秀的教授转向德国大学来进行教学与科研，从而形成“学-教-研-产”的良性循环。

作者简介：张凯、徐四季，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 **科研环视**



# 科研新动态

孙嘉惠 邹露

## 一、国内学术会议和报告

- 2014年5月1日至5月29日，德国汉堡国防军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施塔克教授（Prof. Dr. Michael Staack）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为德国外交与经济方向硕士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讲学。在此期间他还分别为北京大学德语系和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就乌克兰危机问题做了专题报告，并与在京的研究德国问题及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们展开了讨论与交流。
- 2014年4月25日，联邦德国“左翼党”领袖之一吉西博士（Dr. Gregor Gysi）拜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并在北大就“左翼党与联邦德国的左翼政治”做了专题报告，与师生学者展开讨论。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和人民大学德语系的部分研究生也前往学习。
- 2014年5月2日至5月3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举办的题为“如何铺就博士论文的创新之路”的第三届中德高校德语专业博士生学术研讨会在北外新图书馆召开。共有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外国语

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德国波鸿大学等25所大学及学术科研机构的79名专家学者及博士生参会，其中21位中德博士生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项目，并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这些研究项目涵盖了语言学、文学、翻译学、教育学、外交学、媒体学等跨文化日耳曼学的各个研究方向。本次研讨会在组织形式上还打破了专业方向之间的界限，没有采取通行的按主题进行分组的报告形式，而是让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博士生及博士生导师在同一平台进行交流，以促进学科间的思想碰撞，反响热烈。

- 2014年5月4日至5月5日，中国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研讨会在北京中德中心举行。此次研讨会题为“何为科学研究中的新意缘起？——在多元文化的新奇感中发轫的创造力”。来自25所大学及学术科研机构的87名中外专家学者出席中国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会纪念研讨会。“中国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会”于2004年3月在北京成立，今年是中国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会成立

10周年，该研讨会由北外国际处和北外德语系承办。

- 2014年5月31日，《德国发展报告(2014)》发布会暨“大选后的德国何去何从”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主持发布会，常务副主任郑春荣教授介绍了《德国发展报告(2014)》(德国蓝皮书)，中国前驻德大使梅兆荣就当前中德关系进行主旨发言。随后，国内进行德国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就“德国内政”、“德国外交”、“乌克兰危机与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 2014年6月19日至22日，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十五届年会暨青岛市德国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广正、前中国驻德大使梅兆荣、马灿荣、德国巴伐利亚州经济交通部原部长、巴州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威斯豪耶博士，德国研究会会长迈尔博士等嘉宾出席会议，来自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日报、国家发改委、各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德国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青岛市有关单位的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6月20日的全体大会由德国研究分会会长顾俊礼教授致开幕词、青岛市副市长王广正到会讲话，来自中德双方的官员、专家学者围绕中德关系、德国外交政策、中德城市合作及经济发展等主题进行大会发言和讨论。会上还举行了青岛市德国研究会揭牌仪式及网站开通仪式。在6月21日的德国研究分会第十五届年会上，与会者在德国外交政策与德国内政的专题讨论环节中围绕德国外交政策的走势及中德关系、德国大选、移民问题、政党、养老金改革、信息化政策等内政

议题进行发言并展开热烈讨论。在德国经济专题讨论环节中，专家学者们围绕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城镇化、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议题进行发言，交流看法。新成立的青岛市德国研究会设置11个专题研究室，涉及经济、社会管理、科技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领域，将依托在青高校、科研院所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展开对中德关系的研究，打造双方交流合作的平台和纽带，服务青岛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 2014年9月17日下午，德国使馆政务处参赞 Dr. Zumkley (中文名朱旭杰，法学博士，2012年来华，曾在驻美国使馆工作3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给德语系硕士研究生们做了题为“乌克兰危机与德国外交”的专题报告。
- 2014年9月23日，施塔克教授应邀在外交学院讲学，期间再次来到北外，介绍了关于“当前德国政治形势与乌克兰危机”的最新情况，并与北外师生展开了讨论。

## 二、科研与获奖成果

1. 《纳粹的精神解析：德国帝国元帅戈林与美国心理学家凯利致命的智力交锋》，(美)杰克·艾尔海著，刘苗苗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14年3月。

这本历史书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心理学家凯利对被俘的纳粹高官，包括戈林等22个战犯所进行的精神评估：一方面了解他们的精神状况是否适合纽伦堡审判；另一方面试图揭开纳粹犯下滔天罪行的精神因素。作者根据独家得到的凯利档案记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心理医生凯利对纳粹22个被俘高官所

进行的精神评估的过程和结论，并从侧面反映了纽伦堡审判的相关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社会民主主义的未來》，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编，夏庆宇译，四川：重庆出版社，2014年3月。

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进入了政治上的低潮期，除个别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仍在执政外，多数成为在野党。面对这种危机局面，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在积极探索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和本国政党自身的问题，力图摆脱当前的困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老牌的、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其智库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为了探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的原因，并为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发展寻找方向而组织了一组论文。论文分别介绍了欧洲社会党、德国、西班牙、英国、法国、挪威、荷兰、加拿大、美国、波兰以及拉美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该书从全球的视角出发对“社会民主主义”这一重大现实课题给予了回答，即总体上看，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景将比较光明。同时，各篇文章也对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并提出了发展建议。

3.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与日本德国的经济比较》，贾保华，郑建成，王卓著，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年4月。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本书从日本、德国以及美国等国的具体经济指标出发，与中国进行了比较，说明了彼此的差距，分析了现状及未来走向。作者通过对中国崛起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比较，指出二者的异同和问题，并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发展理论更符合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因为它以人为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潜能的全面发展，为此，人均收入的提高则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一个手段。本书的结论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超越美国——即便哪一天中国的GDP可能超过美国——而是要超越自己。

4. 《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修订增补版）》，周弘，彼得·荣根（Peter Jungen），朱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4月。

《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一书，自2012年3月首次出版以来，国内各界反响强烈，被评为2012年度金融书籍。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马克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遇到的多个问题，关注汇率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多层次的复杂联系。这是一本具有前瞻性的历史书，本书的文章作者都是1948—2000年德国马克国际化过程的亲历者或研究者，他们从马克货币角度阐述德国从废墟到崛起的发展历程，为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改革提供借鉴。这是一本寓史于今的金融书，纵观从战后至全球化时代的一系列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为微观企业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进行决策，提供宏观层面的经验参考。

5. 《第三帝国图文史 纳粹德国浮沉实录》，（英）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著，朱鸿飞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4月。

从1933年到1945年，用图片和文字记录一个癫狂帝国的命运轨迹——借助镜头的纪实，权威的研究，丰富的档案和生动的叙述，全景式展现纳粹政权的兴衰；跟随私人日记、信件和口述，以及官方的图片和文字资料，细节式记录第三帝国的浮沉。这是一本了解纳粹德国活历史的实

用手册，一部研究第三帝国历程的权威工具书，通过镜头的透视，详尽记录每个时间段里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集历史图片、档案文件、叙述文字于一体，构成了一部独有的编年体巨著。

6. 《德国的欧洲：危机下新的势力分布图》，乌尔里希·贝克 著，袁杰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

德国社会学大师对欧洲危机的新诠释。原著已被译成英、法、日等十余种文字。“德国的欧洲”中的“欧洲的德国”，我们似乎目前就在经历这么一种微妙的变体。在德意志历史上，这是迄今为止最出色的德国。但偏偏此时，欧洲却陷入了危机。这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社会和政治危机。这次危机让德国一跃成为整个欧洲的教师爷，稳定的德国模式悄然成为了整个欧洲的指导思想。

欧洲危机造就了欧洲势力的新分布，布鲁塞尔的民主受到质疑——经济危机正在演化成分裂危机。是否希腊或其他债务国退出欧元区就能解决欧元危机？解决了欧元危机是否就意味着能解决欧洲危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谁把欧元与欧洲相提并论，谁就已经放弃了欧洲！表面上是欧元的即将崩溃，但更深层的问题是欧洲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的崩塌。

危机正在考验欧洲——欧洲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团结一致，究竟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除了“财政契约”，欧洲是否更需要一个“社会契约”？“但凡有危险的地方，也会有解救的希望”——或许度过这次危机，我们就能看到“欧洲之春”。

7. 《愿为德国效力：平民总理默克尔传》，郭文洋，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5月。

当今时代，女性的崛起并不罕见。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不同的领域内发挥着比男

性更重要的作用。“铁娘子”撒切尔之后，能称得上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性的，非默克尔莫属。实际上，默克尔早已荣膺《福布斯》年度百名权威女性排行榜榜首长达3年。在世界政坛的聚光灯下，这位来自东德的女性早已演出了一曲令人击节称赞的舞蹈。2013年9月22日，安格拉·默克尔，这位联邦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第三次赢得了大选，将开始又一个为期四年的执政历程。如无意外，执政时间将达12年的默克尔会超越撒切尔夫人，成为新时期里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性国家领导者。

默克尔从一名不知名的平民少女成长为德国第一位女总理，在冷漠、枯燥、内敛，甚至没有女人味的外表下究竟住着一个怎样的灵魂，才能让她以不屈不挠的意志迈向权力之巅？本书用细致朴实的笔法展示了德国第一位女总理默克尔的成长轨迹。从初出茅庐的青涩到处理危机的冷静，从联邦部长到党派领袖，最终，她以“我愿为德国人民服务”叩响人们的心扉，凭借着坚定的意志成为德国总理。作者用最平实的文字将这位遥远的领导人带到读者面前，展现了默克尔沉稳、镇定的形象，以及她勇敢、坚强、不服输的特性。

8. 《百年世事：德国原总理施密特与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恩对话录 Unser Jahrhundert: ein gesprach / Helmut Schmidt, Fritz Stern》，(德) 赫尔穆特·施密特，弗里茨·斯特恩著，王荣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5月。

《百年世事》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对话录，凭借赫尔穆特·施密特的丰富政治阅历和弗里茨·斯特恩的深厚历史素养，为回顾世界史提供了一种独具洞察力的眼光。两人相交已久，三天时间内促膝而谈，谈的都是心上话题：从历史吸取

哪些经验教训？百年之末如何总结共同经历的 20 世纪？遇到的人里，谁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最深？

两位月旦长者，口无遮拦，三天跑下一场跨时空马拉松，共同畅谈世界两百余年的历史事件和三百多位国际人物，进而整理成书，内容涵盖如纳粹在德国的兴起、美国政治精英和对外政策的演变、戈尔巴乔夫与苏东的垮台、两德合并、洪堡兄弟对德国教育科学的影响、俾斯麦与德国政治体制的缺陷、当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美国医疗改革、欧盟奇迹等。书里历史断片的陈年老窖俯拾皆是，枚举了不少他们相识的老朋友和亲历事件，从非常私人化的侧面让人看到某些大人物的举动、大事件后的小细节，读起来别有韵味。

9. 《德国历史辞典 Lexiko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李长山等编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年 5 月。

德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德国历史辞典》勾勒出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本书主要介绍了从古代到 1990 年间德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组织机构、著作和名词术语等，尤其是兼顾了两德统一后发生的有关历史范畴的哲学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等方面的词目。书末附有《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王国君主一览表》等。

10. 《大国文化心态·德国卷》朱范，杜青钢主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 5 月。

对中国读者而言，德国并非一个神秘、陌生、充满未知的国度。马克思、恩格斯、贝多芬、爱因斯坦、尼采、康德、黑格尔等享誉世界的名字对中国人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德意志民族作为两次世界大

战的失败者，却能两次迅速地再度崛起，尤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德国在分裂 40 多年后重新统一，并一举摆脱包括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内的外国政治、军事势力的控制。让世人猛然发现一个强大德国的回归。

什么是大国，除了广袤的土地，强大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外。更为重要的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德国的底蕴究竟在哪里？为使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德国，更好地理解德意志民族精神，更清晰地认识德国人行为模式背后的深层涵义，朱范主编的《大国文化心态·德国卷》将对德国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教育、工业及日常生活等方面进行介绍与分析。

11. 《德国科技创新态势分析报告》，德国科技创新态势分析报告课题组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 5 月。

《科技发展态势分析国别报告系列丛书》是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组织编写的。德国科技创新态势分析报告课题组编著的《德国科技创新态势分析报告 / 科技发展态势分析国别报告系列丛书》从科技体制、科技投入与研发产出、研究与创新政策，科技人才政策与措施、知识与技术转移、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对德国的科技创新态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德国科技创新态势分析报告 / 科技发展态势分析国别报告系列丛书》有助于各级决策部门和公众了解德国的科技创新发展态势，可供各级领导干部、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及社会公众参考。

12. 《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4）》，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 6 月。

《德国蓝皮书》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

中心组织编写，逐年对德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的形势进行跟踪介绍与分析，为了解和研究德国提供最新的信息、动态、发展趋势相关学者的观点。2013年是德国的大选之年。本书政治篇盘点了2013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的结果，详细论述了几个主要政党在大选中成败的原因，并对德国政党格局未来可能的走向进行了研判。经济篇对德国的经济形势进行了综述与展望，对德国在欧洲治理中的角色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德国“重新崛起”这一命题。外交篇重点研究了德国新政府的欧洲政策，以及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德美关系的走势。

13. 《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德国历史学家之争》，（美）哈贝马斯等著，曹卫东，崔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

1980年代，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后来被称为“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争论围绕纳粹罪行的独特性、如何评价第三帝国在德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和书写历史等问题展

开。参加争论的有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和德国一大批著名的历史学家，如恩斯特·诺尔特等人。争论并不局限于学术圈和思想界，而是在德国的报纸、期刊等公共媒体上展开，因而在公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在西方世界引起重视。参与论战的各方，虽然也有言辞激烈之处，但总体上而言，较好地遵守了学术讨论或者思想论争的基本规则，力争以逻辑力量阐明自己的观点，取得上风。

虽然这场争论没有明确的最终结论，但提出的问题是整个德国社会二战以后虽未明言却普遍关心的，参与争论的学者从历史和现实的多个角度进入，没有使用过多的学术语言，公众理解起来没有障碍，各方的观点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各自的逻辑非常清晰。因此，对整个社会开放数十年以来的思想禁区，加深关于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的思考，确认德国在历史和世界中的位置，有很大的推进作用。了解这场争论，对中国的读者解读东亚的历史和自己的当代史都很有借鉴作用。

作者简介：孙嘉惠、邹露，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稿约

一、本刊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办，研究德语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社会 and 文教问题的刊物，但凡上述内容的稿件，一概欢迎。

二、请用电子邮件投稿。来稿一律投编辑部邮箱。

三、正文使用 Word 文档，五号宋体，注释用小五号宋体。

四、来稿请在正文之前附上 300 字以内的中文摘要或 150 字以内的德文摘要和 5 个以内的关键词，并附上中文及外文标题和作者简介。资讯稿件总篇幅以 1000—5000 字为宜，研究稿件以 5000—8000 字为宜（包括注释）。

五、文中第一次出现不常见的外国人名、地名及机构名称或专业术语时，请在中文译文名称后加圆括号注出原文。

凡涉及引文或引证的观点，请注明出处，体例如下：作者（外文姓名也是姓在前，名在后，但用逗号隔开）：书刊名，期刊号，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页码等。引用外文著作的注释请用原文，无须译成中文。引用网络资源，请注明具体网址和访问日期。

每篇文章注释一律采用脚注，脚注编号通篇连续。

六、本刊编辑部可能对来稿作一定的修改或删节，作者如不同意，请在投稿时声明。

七、本刊编辑部在接稿之日起三个月内将通知作者有关处理意见，在此期间请勿一稿两投。未被采用的稿件本刊不负责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八、凡作者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一律文责自负。

九、来稿需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单位、地址、邮编、职务、专业等信息，写明电子邮箱及电话以便联系。凡学生来稿请务必注明学校、专业和年级。发表时可用笔名。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相应稿酬。

十、本刊亦有电子版，请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网站（<http://de.bfsu.edu.cn>）上阅看。

十一、《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 24 号信箱。邮政编码：100089，电话：(010) 88816516, 13641271934, E-mail: dygizxyj@bfsu.edu.cn。